

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

徐艳玲 龚培河 著

当代
社会主义
研究文存

Passive Globalization Becoming

al Evolution of Socialism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级出版社

Passive Globalization Becoming Activ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cialism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ISBN 978-7-209-06977-9

定价：40.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

徐艳玲 龚培河 著



Passive Globalization Becoming Active:
rical Evolution of Socialism
lobal perspective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徐艳玲,龚培河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1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文存)

ISBN 978-7-209-06977-9

Ⅰ.①从… Ⅱ.①徐…②龚… Ⅲ.①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研究-中国 Ⅳ.①D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6786号

责任编辑:隋小山

装帧设计:蔡立国

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

徐艳玲 龚培河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开(169mm×239mm)

印 张 28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09-06977-9

定 价 40.00元

目　录

导 论

该课题是200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最终成果。当时接受这一课题，感觉似乎有点远离“时尚”的意味。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斑斓驳杂的学术纷争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现象。一些学人回避政治，也回避活生生的现实，把学术变成了一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推演式的智力游戏。在调研的过程中，不止一人向笔者坦言做类似的题目会出力不讨好。在一些人的眼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提法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党派偏见”，作为学术研究应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笔者感到对此说不以为然。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的见解使笔者深受启发。在霍氏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和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在梳理了许多事实后，霍氏指明：“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1]霍氏的见解或许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表明，“意识形态色彩”和“党派偏见”并不只具有负面的意义。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远没有消解的世界上，“意识形态失语症”却是不正常的。

在历时八年的苦苦探索中，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的理想，曾经不仅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革命激情，也在走上社会主

[1] 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4页。

义道路以后催生出了无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很大距离的。社会主义理想走进现实的土壤，并不必然结出华美的果实。相反，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迄今为止，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现代化的“优等生”，在全球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中国一直蹒跚其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是一种活生生的、宏大的历史运动，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实验工程，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指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意蕴是什么？“特色”究竟是什么颜色？只有在全球化话语中，在宏阔的世界体系中，我们才可以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中国特色为什么是这种颜色而不是那种颜色。思之深而行之远。如何获得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的新的解读，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就成为当下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最为核心的问题。

由此，问题已不在于能不能研究，而在于怎样研究。这就是，不仅要有视角的新颖，还要有学术的“丰度”和“深度”。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接受了这一子课题后一直在思索：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显然有不同的视角和向度，从什么视角出发能够既有视角的新颖，还可能做出学术的“丰度”和“深度”？苦苦的思索后，我们最后把该课题锁定在全球化视角，认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中国历史进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具体来说，本课题把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放置在既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又有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世界图景这一宏大叙事框架之中，描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际遇，省察中国的社会精英曾作过什么样的尝试和努力，有过什么样的分歧和争论，导致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向前追溯，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近现代中国的命运，我们是从两条线上进行考察的：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现代化因素的生长。鸦片战争以后，两条线曾经长期背离，改革开放以后，两条线开始平行发展。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经历了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的复杂历史进程，也就是从身处边缘到努力进入中心、从被迫进入到主动参与、从自然发展到自觉建构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一幅纷纭复杂、由淡至浓的历史画卷。如果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被迫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为主动、全面、深入地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从中，不仅可以透视出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

主导的全球化面前从被迫回应到主动回应、从自然发展到自觉建构的复杂心路历程，而且可以折射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致思取向。

很大程度上，从全球化视角客观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从整体考察局部，从宏观透视微观，宏微互动，在微观中把握细节。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突破了过去以中国为分析单元的狭窄视野，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放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昭示了中国从人类文明的侧翼到纳入人类文明主轨道的客观历史进程和客观规律。同时也昭示出在世界历史中，中国历史曾经占了和正占着怎样的分量。

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方面的功绩可圈可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最“绕”不过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既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又是历史上的领袖人物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主动选择的产物。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卡莱尔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代，我们发现伟人是他的时代必不可少的拯救者，是离开了它干柴就不会燃起来的火花。我已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们的传记。”[1]这一段话，乍听起来有点英雄史观的嫌疑，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唯物史观的辨证表达。唯物史观从来没有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关键是它强调英雄作为个体的能动作用如何把群体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社会性能动作用中蕴含的客观发展规律顺畅地体现出来，并由此引领人民群众免于或者减少逆行社会规律所带来的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回复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雄发挥的是一代人的历史拯救者的作用。因为，如果时代没有及时涌现英雄人物，那么，这个社会遇到小小困难就可能绕一个大弯才能被历史发展规律牵引到正轨中来，或许一代人的幸福就这样葬送掉了。唯物史观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同时，也肯定了历史人物的伟大作用，尤其是在历史人物的重大历史活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时，他们就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或代言人。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也表明，伟人的业绩只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相辉映，才能熠熠照人。

很显然，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全球化思想遗产是十分丰厚的。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1]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21 页。

果，但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全球化思想研究却显得相对滞后，至多在一些研究成果中零星提到而无系统研究成果，特别是有深远现实意义的拓展。同时许多研究成果只是就毛泽东论毛泽东，就邓小平论邓小平，而缺乏一种将其放置于更为宏阔的全球化视角中以观照其价值和意义的学术努力。当然，从全球化视角解读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就笔者的视界所限，毛泽东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全球化术语或借助全球化术语来思考问题。从国际范围来看，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很早就开始了，但全球化理论研究只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风险恰恰是过去被忽略或含混不清的东西，这正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度挖掘的地方。人们一般认为，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这是对的，但仅此尚不足以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如果把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放置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代中国人的现实体验有多么复杂、多么痛苦和深刻：由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却仍毁于一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仍倡导“救亡图存”，除了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际环境中取得了胜利，其余绝大多数中外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悠悠100载，国土丧失，生灵涂炭，民族压抑无以言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情感氛围中，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使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毛泽东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就不仅仅是饱含了自豪之情，而更多的是充满了悲怆之感。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都与这个大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离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大背景，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涵，更难以把握其思想的真谛。所以，不能因为毛泽东本人没有使用过全球化这一术语而否认他的全球化思想遗产。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侵略的痛苦回忆是纠缠在一起的。因而，对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如果不联系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全球化的屈辱史，就难以得到深刻的理解。理解是批判的前提，舍弃现实的体验，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变得僵硬而失去其应有的光泽。如果我们不真诚地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面对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全球化思想遗产，那么，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

如果说，毛泽东的全球化思想遗产是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的奠基，那么，邓小平的全球化视野和思维方式则标志着“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的形成。在这里，把“国情”因素考虑进去是“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形成的重要表征，也是主动全球化的表征。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对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反思，更意味着“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的建构。虽然“国情”的概念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提出，但在“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那里却获得了更为广泛和真实的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的提出不仅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且不啻于一次颇有力度的理论冲浪。

由此观之，从全球化的视角，尤其是从历史上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中去透析毛泽东和邓小平全球化思想遗产的思想质地和精神底蕴，以及它们在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中的价值和意义，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它使我们在当下和未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这份重要的历史参照，而多了一份清醒和自觉。在笔者的认知框架中，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全球化思想遗产（包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强势挑战进行被动回应的产物，而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全球化思想遗产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强势挑战进行主动回应的产物。

从宏观角度来看，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全球化对每一个后发的民族国家都构成挑战，因而维护国家安全就成为一个后发国家谋求进入全球化、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因而，本课题关于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是围绕两条脉络展开的：一个是维护国家安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前提，一个是谋求现代化发展——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内容。如果以新中国为界限，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虽然也一直探索现代化发展，但无疑维护国家安全是主线，是一代一代先进中国人苦苦追求的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宏观长视角来看谋求现代化发展成为主线，但是这不是一帆风顺的。毛泽东虽然意识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国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他本人主观上的判断失误，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往往不惜以牺牲谋求现代化发展为代价，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波折不断，动荡不止。十年“文革”之后，邓小平从历史教训中感悟到加快现代化发展的紧迫性，强力推动改革开放，从此中国主动趋近全球化，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

然而，个人的有限性决定了开拓历史进程的领导责任不可能一两代人完全承

担起来，总要一代一代人传递下去。如果说邓小平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点燃了中国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新道路的火炬，那么，成功地把这一火炬传递下去的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国改革30年"风景独好"，不能否定接力者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把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留给了后人，邓小平则把一个充满活力、走向世界的中国交给了继承者。这时候的中国已经获得了腾飞的动力，但是，并不意味着此时的中国已经足够壮大可以"藐视"全球化的挑战。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新问题、新困境接踵而至。运动着的全球化不断地向中国提出很多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东欧剧变，中国何去何从？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如何应对？中国如何应对加入WTO后的问题？中国如何回击"中国威胁论"？面对世界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污染，中国该做些什么？立足全球科技新高潮，中国如何提升科技自主能力？2008年世界经济发展困境，中国如何应对？等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国内新的举措与国际环境的变迁是紧密联系的。从二者联动的角度来审视江泽民、胡锦涛的新的治国理念和新的重大政策，使我们不仅立体地感受到在时代风云变幻中中国稳步融入全球化、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性，也能深刻地感受到在全面地融入全球化之后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应该说，相比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中国对战争绷紧的神经可以稍稍缓松一些，中国越来越充满安全感，毕竟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毕竟中国已经开放，已经融入世界全球化的主流流程之中。但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此起彼伏——在意识形态的斗争、金融危机、粮食困境、能源威胁、环境破坏、资源紧缺、收入差距、科技垄断威胁等等一系列问题，小则无事，大则误国。可以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来没有坦途，任何一代领导人都要励精图治，奋勇向前。我们走进全球化丛林，可以发现更多的蘑菇，也可能撞见毒蛇猛兽。我们以全球化的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历程，不仅获得经验教训，昭示未来发展，还有就是忧患意识——长存忧患之心，才能长兴不败！

应该说，在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执政的新时期，他们使邓小平竖起的参天大树在经历了一番国际风云洗礼后更加枝繁叶茂。直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火炬历经几届领导集体的传递，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运动中越来越自信，中国人的胸怀越来越宽广，一个充满包容、豁达、自信的大国心态的中国正在起航。在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还要破浪前进。在这个一波接着一

波的推动中，江泽民、胡锦涛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从研究整体脉络中看，近代中国是被迫卷入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征程的，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希冀依靠效仿西方现代化实现自强，抵御外辱。由于此路不通，才选择了革命救亡。在一场场鲜血铸成的教训中，社会主义才跃然纸上，成为中国人的选择。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主要目的是救国，是维护国家安全。毛泽东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造成许多挫折，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就是在处理维护安全和促进发展关系问题上判断有误，沿袭革命历史经验，偏重于维护安全。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把促进现代化发展提高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从而摆正了二者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才有了新的特色、新的生机。江泽民、胡锦涛仍然把促进发展放在第一位，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有新的要求——那就是中国不仅仅要"自保"，还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筑安全网络。

纵览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纷纭变幻，我们不难提炼出一个基本的认识：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反对全球化，只是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他们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导航的全球化，从而形成一种共赢共存的利益框架。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远眺昆仑山脉时浮想联翩，写下了"念奴娇"词《昆仑》最能表达这一思想意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希望将来能够成功地改造自然、改造世界，使普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但在当时，"环球同此凉热"还只是一种理想，只有在共存、共赢的全球化背景下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另外，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认识和情感认同，在全球化的视角中，仅仅正面铺陈中国社会主义历程的画卷是不够的，还必须横向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相比较，看一看孰优孰劣，只有如此，才能提升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艰辛付出的价值，只有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把社会主义事业坚定地、毫不动摇地继承下去。

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二者孰优孰劣？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优越吗？且不说它血泪斑斑的发家史，仅就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就说明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现代化之路。马克思主义出现、国际工人运动兴起、社会主义国

家诞生，这些无不折射出资本主义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优越吗？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行不通？而资本主义却能够劫后复活？难道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优越吗？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越走越宽广？要合理地解释这些困惑问题，视阈极为宽广，如果不缩窄研究的着眼点，在一个有限的篇幅中，很难得出科学结论。在这里，是以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构成评价的二重尺度，来对比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苏联模式）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之路是非得失问题。

运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评价历史的结果常常是相悖的——符合历史尺度的不符合价值尺度，符合价值尺度的却不符合历史尺度。原因就是二者的衡量标准不统一，出现分析的对象错位现象。如果运用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来评价，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平台上，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财富和享受财富。动力体系关注的是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是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根据；而价值体系关注的是如何分配、怎样分配，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规定。用两个体系来评价社会历史，主要是比较二者之间功能方面和状态方面的相对态势关系。

在两个体系视野下，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实际演变成三条路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曾经陷入劫难之中，但却劫后复活，坚持下来，在中轴线上走出一条由远及近的演进轨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却渐入困境，最后出现苏东剧变现象，在中轴线上走出一条由近及远的演进轨迹；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也曾陷入泥潭之中，但是，通过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中轴线上走出一条由近及远后又由远及近的演进轨迹。

在资本主义社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动力体系的核心驱动力，价值体系则完全服从服务于这一动力要求。在私有制平台上，对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们来说，两个体系是对立的——他们创造财富却不直接占有财富，而他们的收入却成了资本家成本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让工人们生产更多的商品并获得尽可能少的工资就是资本家的理性生产法则。这就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出现严重缺欠，与动力体系之间出现矛盾。由于社会购买力的提高落后于商品生产的扩张，经济危机就发生了。这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史不仅以残酷剥削为

基础，而且以生产力的浪费为代价，结果陷入困境。资本主义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不得不经常改革具体制度、调整政策。这在客观上不断弥补由于忽视价值体系作用造成的缺陷，有力地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空间。但是，由于片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却出现经济发展的滞胀现象。私有制使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之间在生产领域中存在天然的对立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家生产，而高福利制度中的很多成分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的。因此，过分追求分配领域中的平均化就使得工人感觉到劳动效用变小了。这就造成动力体系运转低效化，最终使社会经济发展陷入滞胀困境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个体系是不可能达到永久正相发展的和谐状态的，只能追求二者的动态平衡。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通过不断调整、改革坚持了下来。

苏联模式是以价值体系为根据来建构动力体系的，使得整个动力体系的运转不是首先从自身规律出发，而是要服务、服从于价值体系的目标要求。但是，价值体系又不是完全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的出发，而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为基础，从具体的、形式上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出发来建构。因此，政治化的目标规定必然通过价值体系而干预到动力体系中。这不仅容易造成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蛮干现象，而且这种动力体系也容易出现功率递减现象。苏联模式的动力体系功能发挥需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这一个转化机制来启动生产的内驱动力。这种动力机制是把个人利益诉求的时空放大了——强调成就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来间接满足个人利益，而劳动者的劳动觉悟的提升也主要靠这一实质性根据来实现。但是，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们个人的直接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这就必然会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出现生产功率递减趋势。但是，苏联为什么会在改革中崩溃，而中国却在改革中取得成功?

中国渐进式改革是针对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作为切入点进行的。中国改革既跳出了社会主义框架又坚持了社会主义框架：为了解决动力不足问题，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调整、建构动力体系，跳出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框架，没有被教条理论束缚住手脚。但是在建构新的价值体系过程中，贯彻两个原则：一个是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融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另一个是直接体现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　体现出坚持社会主义框架，没有走邪路。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苏联改革

走了两个极端：早期的改革限定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不能自拔，结果铩羽而归。到后期改革则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搞全盘私有化改革，结果也失败了。

苏东剧变以后，世界上还是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竞长的局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构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性的价值体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但是，这正是中国力图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固有矛盾的结果，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和谐”理念的提出，已经为其提供了启发性思路。

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社会历史是人的能动作用的结果，历史规律不是在人的能动作用之外，而是在其中。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建构起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会天然显现的，它也需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指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是具体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普遍性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起到原则性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成功地把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

从总体上说，该课题采用的是纵横交错的架构，纵向主要是分阶段的历史线索，横向则侧重于梳理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我们的全球化思想遗产，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对新时代全球化的认识，这既是在阐释他们的思想本身，更是在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另外，该课题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也做了一些新的探索，主要是采取夹述夹议的写作手法。对社会发展历程的研究，一般传统方法就是按着时间顺序排列史实，把一个链式过程展示开来，读者由此获得的认识是全面的、系统的。但是，有得必有失。追求面的完整性，就会伤害到点的闪光性。而且只强调单面正叙，无法认知横向的理论研究状况，也就不能提升理论认知的高度，由此信息传递就缺乏深刻性、启发性。这样一部著作，给读者的主要是信息综合，是资料的整编，从而可以为读者研究问题提供佐证，但是，却不能给读者思想的闪烁、智慧的启迪。

国外很多著作读起来像是满天飞絮，头绪众多，但是，形散而神不散，总是有一条线索贯穿其中，而较多的理论分析夹在其中，给读者许多感悟和浮想。读这些著作，也许我们不能够获得完整的一段“故事”，但却能够激发起想参与其

中进行一番议论的冲动，这就是这种写作风格的优点所在

本文吸收了国外写作风格中的一些优点，在述议结合中，述只是一种基调、一种开场，议才是“主体”、“正文” 史实记述提供的是一个议论基点，一个议论作证，而横向理论评价和纵向价值考察，才是本文着力打造的“品牌” 因此，在从中国近代史到当下这个宏大的历史跨度中，不可能选择史实罗列的写作方法，而只是在历史坐标系中，选择重大的史学问题和闪光的历史事件加以集中阐述和评叙 这样，可以尽可能地突出问题，深入探讨，把研究拓展到一个高度、一个境界 不过这样会不会伤害到全文的完整性、系统性呢？这就看我们如何理解史实研究的完整性问题 完整性不是详细、严密的意思，而是结构上的统一性、系统性 在数学坐标系上，一个连续的线段的展开是完整的，而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点的布阵展开也是完整的 本文采取的就是后一种完整性的表现方式，在研究焦点的展开上，存在着内在的时间线索和研究脉络的衔接，整个篇幅是有机的整体，而不是点的无序堆积 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研究脉络，突出和扩展点的研究，才不会有纷乱的感觉 而对问题认识的宽度和深度都获得了很好的张扬

本课题采用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他说与我见”——首先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论证理由摆出来，分析其价值以及存在的问题或者不足，然后做出自己的解释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使自己的见解更有说服力，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分清“你我”，避免剽窃现成的理论使得“你我不分”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方法，如定性分析方法、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理论论证与实例论证相结合的方法等等

总之，本课题在方法论上，也想突破陈规，做出新的探索 如果能借此表达出更加准确的研究意图，则可以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推广开来，如果不是很完美，或者可以改进创新，或者作为一个教训，告诫他人少走弯路

第一章 历史镜鉴（17世纪—19世纪中叶）：中国在全球化中由盛转衰

17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涌起，迅即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从17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中国经历了一段从全球化的赢家到全面拒斥全球化的复杂历史。梳理这一段历史可以为我们今天在全球化中的致思思路提供有益的镜鉴。

第一节 全球化起源于西方吗：一种批判性分析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全球化起源于西方。因为无论是新航路的开辟还是作为全球化动力的工业革命，最先都发生在欧洲。这种观点虽然有道理，却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东方在全球化中的作用。

站在我们今天全球化认识的高度，可以认为，全球化在历史上曾有过两个传播出发点，其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无疑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起到了先行的作用，这是从西方的中心向边缘的扩展；另一个则是更早一些的始自华夏大地的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它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路径形成了逆向相反的方向，这便是从东方的中心向西域的扩展。如果前者是资本全球化的开始，后者则是文化全球化的另一起点，只不过后一种由东向西的全球化过程一度被中断了，但中断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在今天的全球化大语境下对

之进行恢复和重建，使之为中国文化的西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边日出西边雨” 中国是农业经济时代世界上最大的赢家，令中世纪黑暗的西方社会望尘莫及。因为，在近代制造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前，世界各国的文明进步都是以农业文明为前提的。从公元前3世纪起到16世纪以前，中国的农业文明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其业绩足以使西欧中世纪历史银河中的群星黯然失色。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达到了巅峰。明代中期以后，除了拥有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农业外，中国也出现了相对发达的工商业和城市。到18世纪，清帝国的领土又比明代扩大了一倍，人口增加了1倍，从1亿多增加到3亿多，这是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人口的两倍。在手工业方面，1800年中国的手工制造业的产量占当时世界总产值的33.3%，而当时整个欧洲只占28.1%，英国只占4.3%。[1]据政治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的估计，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到183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的工业产值只是中国的40%。[2]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1700年，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欧洲的4倍。[3]世界史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认为，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格林堡在《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中也谈到：16世纪至18世纪，在将近300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拿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生产时代之前，即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业技艺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4]。

如此，一个被忽视已久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历史是最好的导师。特定的地理环境并非注定要使中国形成一种“隔绝机制”，成为一种内向的、封闭的、超稳定的文化类型。有

[1] 具体可参见刘笑盈：《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308页。

[2]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其实，当时工业革命尚未完成，西方学者事后估计的工业产量实际上以手工业产量为主。

[3] Angus Maddison: China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1998, p 25, p 40

[4]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

人总误认为中华民族历来闭关锁国，这是不对的。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1]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是以博大开放的胸襟，采撷异域的文明之果；同时也把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被誉为东方哥伦布的张骞便开通了经西域通往中东、欧洲的“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的联系，“丝绸之路”使东方和西方第一次真正相遇。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发展了与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海上来往，并能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直航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之后，唐时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唐宋之时，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中国与世界各国掀起一次又一次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当时，作为盛唐文明象征的长安，其博大的气概、壮美的景观、发达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吸引着许多国家的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就多达五、六百人。可见，兴盛总是与开放相随。同欧洲“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强汉、盛唐的“盛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唐代高度开放的胸襟。

明时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的友好使者走向世界，打开了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各国的航路。[2]郑和船队为文明礼仪之师，既未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掠夺当地一分一毫的财产。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明水平。他的船队数次穿过马六甲海峡，却从未对马来西亚有过一寸土地的要求。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几百年来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无数次地把战刀插在这个沟通东西方的咽喉上。一些航海家、探险者同时也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侵略者、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为争霸海上，把地球“咬”成两半：西班牙独占美洲，葡萄牙抢占亚洲与非洲。哥伦布这位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热那亚水手，毫不隐讳地宣

[1]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2页。

[2] 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为什么没能改变历史？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郑和的船队有数百艘，出访了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的许多港口。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向我们提供的关于郑和所率船队的规模、实力和远航能力来看，完全可以绕过非洲航行，并“发现”葡萄牙，而其发现时间要比西方航海家的海外探险要早好几十年。但有的历史学家指出，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国际贸易或与别国在政治上进行交往，主要是打探被朱棣吓跑的小皇帝的下落，找不到也就不再找了。就事情的特殊性而言，郑和是个太监，本身没有征服欲、侵略心。可能换一个真正的军事统帅，就征服了这一切蛮荒之地。有时一个人的悲剧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悲剧。

称自己要去“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中国和印度，就像当年十字军东征的士兵坚信“东方遍地流着奶和蜜”的蛊惑一样；葡萄牙海上远征队公开声称其在非洲西海岸的主要目标，是贩卖奴隶、寻找黄金和象牙。利益使航海家变成殖民强盗。今天非洲一些国家的博物馆里，欧洲人登陆时使用的火炮和中国人馈赠的陶瓷瓦罐排列在一起。这种鲜明对比是对郑和的和平之旅与欧洲航海家的扩张之旅、殖民之旅最好的评判。[1]

通常认为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闭关锁国。其实，明朝乃至清朝中叶之前，中国仍然是以开放为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和历史舞台的。明初推行“礼治”外交，力图构建以“天朝”为中心的“封贡”与“柔远”的外交格局，恢复汉唐以来长期中断了的万邦来朝的“华夷秩序”。明末以后，西方文化较多地传入中国。为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与合理因素，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展学习、介绍、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清时中国思想界启蒙者严复悉心研究、积极翻译、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不仅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说中国“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2]。他认为，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愚昧黑暗之中的时候，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写道，中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甚至两千年[3]。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贡德·弗兰克的见解。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的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西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甚至有些人宣称，自公元1000年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某些“独特”性质导致了这种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具有所谓早在基督诞生前就已经产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人们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弗兰克书中不仅对这种论证作了回顾并加以扩

[1] 参见刘汉俊：《郑和下西洋：一个民族的征帆》，《人民日报》2005 年 7 月 11 日。

[2] 具体可参见韦尔斯：《世界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3] [法] 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477 页。

充，还试图比这走得更远一些。弗兰克描绘了和分析了1400年到1800年间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按照弗兰克的统计，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源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只有印度能够望其项背。另外，在弗兰克看来，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因此，虽然许多人依然声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1]

让人（包括欧洲人和亚洲人，也许尤其是中国人）吃惊的是，弗兰克认为这个时代，也就是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的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被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1980年代以前的弗兰克视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自身并没有脱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仿佛只能在“欧洲路灯”（European street light）的下面看待一切事物，远处的东西似乎总是显得暗淡无光，同时又身不由己地觉得现代早期发生在欧洲的那些事件光芒四射，具有开辟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但是，如果人们能够真正从封闭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一种全球视野（globological perspective）来看世界，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

[1] 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0页。

是欧洲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即从欧洲内部发出一个现代世界体系并以欧洲为中心向外扩张，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吸收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所以，在弗兰克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欧洲发生了什么，而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尤其是其领先部分亚洲以及亚洲（从而也是世界）的领先部分中国和印度发生了什么。[1]

其实，弗兰克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在弗兰克看来，"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事实上，与当时欧洲依然处于边缘的前哨阵地（不是灯塔！）带给亚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亚洲给欧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经济光芒，更不用说文化光芒了！"[2]

对于社会理论和历史学家来说，亚洲经济在很长的时间里比欧洲经济更为繁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在于人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弗兰克指出，马克思和布罗代尔都对欧洲之外的"其他"经济给予一定的注意，"但只是在其巨著的第二卷里，而它们本来应当构成第一卷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对于欧洲来说，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但它确实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3]在此基础上，弗兰克更深地指出了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欧洲资本主义统治全球之前，就存在一个非洲——欧亚为主的经济圈，而欧洲及其"世界经济"乃是早已存在的非洲——欧

[1] 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2]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3]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亚的一部分，而这种非洲——欧亚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变成了全球性的，而且也造成了欧洲许多方面的发展，如果说在1800年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全球化也起源于东方　然而，历史往往由无数遗憾所构成　以后的中国历史为什么被重新改写，昔日辉煌的中国在近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为什么日渐丧失了它不可动摇的全球化中心的显赫地位，成为大国遗梦？历史深处飘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第二节　中国从全球化的赢家到全面“拒斥”全球化

中国虽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四大文明古国的辉煌却没有“必然”地把中国引向近代的辉煌，而是日渐地走向了衰落。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数千名作家和学者搜集了文学的和历史的资料，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争论明代早期或者晚期、或者是在清朝，甚至更早一些——在宋代或唐代，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上〔1〕对于这些争论的结果，我们姑且不去理会，但问题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为什么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从全球化中最大的赢家变成了最大的输家的深层原因究竟何在？

对中国从全球化中最大的赢家变成了最大的输家的原因有不同的分析维度，如有的学者从经济上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狭小、产品单一”；有的学者从政治上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所致（专制制度的阻碍）；还有的学者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分析原因，归咎为儒家保守思想和农民固守土地的传统观念，等等

〔1〕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何时产生的问题，有人认为，早在唐代天宝年间，安徽寿县就有200多人共同劳动的茶叶作坊，作坊中的生产就具有简单协作的性质，应是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参阅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6页。）另一种看法认为，南宋年间，在苏州、杭州一带那些发达的丝织业部门，资本主义萌芽已稀疏出现。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中叶，苏杭地区一些从事丝织业的“大户”，织机发展到20多张，雇用没有织机的“小户”为其生产，他们之间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动力买卖关系，明显是资本主义萌芽。（参阅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马克思·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德》一书中也通过对中国的货币体系　世袭、宗教组织、法律的状况的分析后指出，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着不少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到了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相继出现在苏州的丝织行业和制铁及铁器制造业中　到了清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伸展到制茶业、制烟业、酿酒业、榨油业、制糖业、棉布加工业、造纸业　印刷出版业等行业中

客观地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从全球化中最大的赢家变成了最大的输家、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的懒惰和愚笨，而是那种落后的、具有较强惰性的封建的政治经济结构。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步伐踏上中国土地之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的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1]这种自然经济由于是建立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特别不是想通过对剩余财富的相互交换达到取得货币的目的，而是保持劳动者自给自足的生存，其结果必然是对生产社会化的自然阻抑。而这种经济结构与支撑它的生产方式根本不敌外来的具有社会化大生产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的冲击下，就像一座腐朽的大厦迅速倾倒于顷刻之间。在中国，“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

质言之，在西方殖民主义尚未大举入侵前，中国从全球化中变成了最大的输家正是由历史上所曾经有的“最大的赢家”所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一位美国学者的论述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他认为，相对于现代社会具有的那种成就取向标准，前现代中国的近似值可谓最大。中国为各个家庭追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创造了一个具有秩序性、可测性的十分宽松的环境。就非现代化社会而言，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成就取向性的社会。其表现是：（1）中国不存在基本属于僵硬不变的等级农奴制或长期世袭的贵族制，而是形成了流动性的社会阶级制，从而使广大人士都有机会去谋取成就和报偿；（2）不是由国家抽取难以承受的税收，并必然地要在财政上依靠农奴主或别的什么人，而是形成了相对来说十分方便契约权力和投资的转换的市场机制；（3）地方上对外来权威没有强烈的猜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9页

疑心理，而是在专业化国家官僚体制和地方上家庭及宗族总体利益之间形成了互利互存的关系。以上这段论述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姑且不论，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开放性和灵活性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优于欧洲封建社会的体制，但这种具有比较完善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再生机制的封建体制又是资本主义因素难以在封建社会内部进一步发育的重要原因。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曾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取得赢家地位的原因，又转化为巨大的历史惰性，成为最大的"输家"。

另一方面，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是中国从全球化中最大的赢家变成了最大的输家的重要原因。自明成祖以后，中国从开放走向了封闭。清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厉行闭关政策。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禁海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后期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设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片帆不准入口"、"寸板不许下海"，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未能保住中国封建王朝的独立与繁荣，却提高了中国社会中工业和商业与农业分离的艰难程度。而一个国家工商业的发展有赖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中国的经济基础却抑制了这个阶级的产生，最后竟使近代中国简单的商品经济萌芽拿捏在地主化和官僚化的商人手中。这大大延缓了社会发展的进程，使中国在全球化中逐渐落后于西方。

从全球化发展的视角看，应该说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二百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西欧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强盛。尤其是在英国，一场新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个新运动——启蒙运动正在迅速展开。历史发展到18世纪60年代，一种新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革命正在萌发。这种新文明使整个欧洲都着了魔：机器在加速运转，化学在奇妙运用，铁路在荒野延伸，轮船在大洋航行……。这场挑战全球的产业革命最早开始于英国，生产发展特别迅速。从1837—1847年10年间，煤的开采增加了47%，生铁的冶炼增加了67%，造船增加了23%。蒸汽机的总动力从1840年的60万马力增加到1850年的125万马力，铁路从1836年的251公里，增加到1848年的

8203公里。当时英国生产着全世界需要的各种工业品，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首都”、“世界工厂”。这场由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史称第一次科技革命），把资本主义大工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完成了从手工生产方式到机器生产方式、从手工工场制到工厂制的过渡。继英国之后，法、美、德等国也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先后开始了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导致了资本的急剧扩张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突飞猛进，使史无前例的生产率增长成为可能，增长的观念充斥于整个社会。诚如历史学家哈特维尔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无论国民产出或人均产出的增长率，都持续地提高了，而且增长的速率与以往相比是革命性的。”[1]1750年以来的200多年中，从增长规模来看，全世界的工业生产量大约增加了430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0倍。1820—1992年，世界人均产值增加了8倍，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0倍，世界贸易增长了540倍。工业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不仅如此，工业化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工业化之前，中国和印度等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工业化之后，整个世界的工业文明中心开始从中国和印度等国，转向原来文明的边缘——西欧国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迅速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2]以至于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这样告诉我们：“十八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英国发端或崛起的工业革命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工业革命可说是若干世纪前早就开始的‘工业化’进程的终点。但它不断获得新生，至今还始终在我们周围徘徊。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未来的时代仍将长期属于它。”[3]正是在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在西欧得到了迅速发展，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建立了新式工业。西方社会迅速驶进了更高级的工业文明社会，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的转型，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

正是在同一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却由开放走向封闭，由繁荣走向衰落。虽然从绝对量上看，中国的海外贸易是比较发达的。但是，从相对量上和出口结构上看，中国的海外贸易则弱小得很。“中国18世纪下半叶贸易出口量总值只有200余万两，这对中国如此之大的空间起不了震动作用。在出口结构方面，

---

[1] 参见刘大椿等：《社会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促力》，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论丛》2003年第3期。

[2] 对于工业化所创造的文明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刘德福、汪澄清：《中国大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9页。

[3]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0页。

中国大宗出口的产品只是茶叶一类的半制造品，出口的主要制造品即土布当时在出口总额中的最高比例只占到8.5%。”[1]

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重新定位写下了浓艳的一笔。1792年，英特使马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8种，清朝只是视为贡品收藏，予以赏玩，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量和其中的军事价值。因为当时大清流行的风气是把科技知识视为“行而下”，把发明创造视为“奇技淫巧”。马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练，谅来也没有什么稀奇。”雍正、乾隆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康熙大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把玩。当时的国人不能说没见过西欧的轮船，它曾经在广东停泊了100多年，但是内部的发动机，可能没人研究过，那代表什么？当然更没想到的是，仅仅10年以后，当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国人竟不知道已经在广州湾停泊了上百年的轮船，摇身一变竟成了威力如此巨大的怪物。

1793年马葛尔尼来华，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预言“英国从这样急剧的变化中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加强它的霸权地位。”[2]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迅速从整个世界最大的赢家变成了最大的输家。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提供的统计数字：183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量是英国的3倍。当时工业革命尚未完成，西方学者事后估计的工业产量实际上以手工业产量为主。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发生的这种魔术般的变化，被马克思称之为“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

[1] 叶险明：《马克思的工业革命理论与现时代》，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2] [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32—533页。

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1]邓小平也曾深刻地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伍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近三百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中国从全球化的赢家到全面拒斥全球化的屈辱历史令人喟叹不已。

站在我们今天认识的高度，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历史性的挑战与机遇摆在世界各民族的面前时，中国的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有抓住机遇，丧失了历史提供给一个民族最好的发展机遇。在对外关系上闭关锁国，昧于世界大势，与全球化相脱节，依旧在农业社会文明的迟暮中蹒跚着。由于失去了与之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会，中国仍躺在古代文明的"安乐椅"上原地不动，一直满足于自认的泱泱中央帝国的地位。自足，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心理上的。如前所述，中国是农业经济时代世界上最大的赢家，但恰恰是这一事实使得封建老大的心理极度膨胀，欣欣然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神话般的"帝国"中。

何兆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关于《中西文化和全球化》的演讲中，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外交部，处理国与国之间事务的，有一个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邦事务的部门。当时与中国交往的都是藩属，都是属国，所以把处理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就叫做理藩院。一直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连续打败仗。打了败仗以后，西方的列强就要求中国也设立自己的外交部。中国的外交部就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个外交部的建筑，就非常反映当时中国的那种心态。按照中国的建筑，一般说都是三个门，中间是正门，两边是两个旁门。正门一般是不开的，除非有大典，比如说皇帝来了，普通事务都是走两边的旁门。外国使臣来了，也要他们走旁门。可是外国使臣不干，外国使臣是代表国家的，代表国家就一定要走正门。这就闹矛盾了。中国的心态还是天朝上国，所以外交部建筑就只有两个旁门，没有正门，让你出入的时候就只能走旁门。[3]

接下来是长夜无歌，中国社会进程骤然下跌。结果，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0页。
[3] 何兆武：《中西文化与全球化》，《文汇报》2005年1月30日。

17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在这期间的200多年中，中国的闭关锁国被1840年的鸦片战争强力打破，一直骄傲地孤立着的中国毫无防备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汹涌大潮中，导致自身解体。从此，全球化的视点从东方转向了西方

第三节 鸦片战争：中国从赢家到输家的历史拐点

封建末世的中国“遭遇”了迅速成长的欧美资本主义。落后的闭关政策“遭遇”了疯狂的殖民扩张。两者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斗争，最后以鸦片问题为矛盾的爆发点。

历史上往往把鸦片战争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和历史时代分水岭。鸦片战争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表征，从全球化的视角看，也是当时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当然，这不是说，在此以前，中国的帝国地位没有受到过威胁。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殖民扩张，至少可以追溯到1557年。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贸易据点，从此揭开了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进行挑战和渗透的序幕。之后，1662年荷兰人进攻台湾，1689年俄国人入侵东北。此外还有许多小的挑战，难以列举。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封建根底是这样的牢固，以至于300年来的殖民活动，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封建帝国的基础。时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尽管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也开始了农业的商品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开始增长，但中国始终维持了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农业大国地位，然而，这一切，最终还是为鸦片战争的到来打破了。[1]

17—18世纪殖民主义者的政策一种是偏重于把殖民地当作自己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如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英国、荷兰），另一种是以抢劫掠夺殖民地财富为主（如处在封建社会的西班牙、葡萄牙）。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促使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其殖民政策也把商品输出作为主要手段，如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然后大量倾销商品，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其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其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英国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成为奔走全

[1] 参见刘德福、汪澄清：《中国大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球、寻找殖民地、侵略中国的急先锋。鸦片贸易是在英国对中国贸易巨额逆差的背景下开始的，它的直接目的是弥补贸易上的逆差。但是鸦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当时英国禁止鸦片输入本国、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禁止毒品贸易的情形来看，鸦片应是被排除在自由贸易原则之外的少数物品之一。从世界禁毒史的角度看，虎门销烟绝不是只在中国本土才有意义。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的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即鸦片进口税，[1]这使英国人在中国的鸦片贸易遇到巨大的阻力，于是一场“强卖”的霸道贸易在冲天的战火硝烟中开始。“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使“广州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2]可是英国政府却对事情的真相始终保持缄默。今天的英国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鸦片战争，英国政府长期的教化使他们形成这样的观念：在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军队对中国发动过一场正义的贸易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但究其实质，鸦片贸易就是英国政府在武力支持下的一场公开的贩毒。鸦片战争，就英国而言，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就中国而言，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但是，由于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中国经济技术落后，中国失败了，英国打胜了，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一直把鸦片战争当作国耻，而真正应该感到耻辱的应该是英国人。的确像一位中国学者所言：鸦片战争，于中国，这是一场失败的自卫；于英国，这是一场成功的犯罪。

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中国人痛感耻辱的开始，其最严重的后果是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意志，从天朝大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停滞的农业文明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第一次遭遇。其悲惨结果，是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强行拖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可以说，进入 18 世纪后，西方的商品、科技、思想、文化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扩张，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涌进来的。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清王朝被迫进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进行交往的国际格局之中，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形成了建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畸形的国际关系。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2、634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4 页。

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双重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条线上进行考察：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现代化因素的生长。从国家安全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可以说，中国首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与国际关系，但却是以丧失国家安全为代价的：（1）丧失了中国的政治安全：从割占土地到强辟租界，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外国兵船可任意在各通商港口"巡查贸易"，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领事裁判权"的规定，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自主权。列强还不断加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控制；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使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处于列强的监视之下；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立，控制清朝的内政和外交等。（2）丧失了中国的经济安全：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使中国丧失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机会，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缺少充足的资金；不断增开通商口岸，侵略势力从中国东南沿海扩大到整个沿海，进而沿长江深入内地；英国人还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管理权，确保他们的工业品倾销中国市场和大肆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在中国农民大量破产的情况下，列强还诱骗掠拐华工，贩卖到海外充当苦力。（3）丧失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门户洞开，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西方传教士。许多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通过传教布道的方式，进行侵略渗透，想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腐蚀中国人民的反抗斗志，以配合其政治方面的侵略，巩固其在华的利益，等等。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列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侵略和破坏，使得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不断遭到破坏，国家安全失去保障。中国被逐渐地强行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不同意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硬要把"外国侵略中国"说成中性的"世界走向中国"。从封建到半封建，就社会进化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却沦为了半殖民地。旧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了，新的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像一列破旧不堪的列车呻吟着动荡前进。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描述英国殖民侵略对印度的影响的那样："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剧色彩"[1]

从现代化因素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客观地说，西方的入侵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支异军。18 世纪中期，中国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衰世"。长期以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79 页。

来，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甚至衰退萎缩。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掌握在皇室、官僚、地主手里，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购买、强占等手段，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土地。乾嘉之际，和坤一人就占田8000余顷。而当时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耕地面积的1%左右。繁重的地租、税负、劳役和高利贷使广大农民陷入极端贫困之中。他们不但无力改进生产技术，无法扩大农业再生产和发展家庭手工业，而且常常连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由于统治阶层自身的衰败，不可能有什么宏大的举措，足以使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突破或者更新。恰在此时，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商品、货币资本长驱直入。抛开他们的主观意图，客观上，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遭到重创，为资本主义发展打开了一条缝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受到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刺激，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期的发展。

根据历史尺度，不言而喻，在封建社会中新生的资本主义，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历史的进步，一般说，它应该只有发展的一面。但是，具体到近代的中国，我们就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原则，需要进一步联系中国的历史环境，联系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出分析和论证。

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地说，它面对着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和统治地位。而其中的官僚资本主义，亦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作威作福、狐假虎威。代表着中国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未老先衰。所谓先天不足，指的是：它的产生，不是从封建社会内部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成熟时期的降生，而是受到外力冲击下的临盆；所谓后天失调，指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未老先衰，指的是：它有所发展，但又不能顺利和充分地发展。不是不发展而是欠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但它并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开辟发展的道路。中国内部的封建主义势力一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最终也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

虽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独立发展，但是，这种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反过来必然促使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激起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要求。这是外部因素激发起来的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动因素。于是，外国列强侵华的客观积极作用就在马克思的所谓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国家的发展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历史使命的名义下被肯定下来。马克思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做了以下论述："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

鸦片战争还使中国面临着"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天使和魔鬼的双重性挑战。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摧毁了中国处于东亚文明中心地位的优越性，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促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逐渐抛弃狂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走上了艰难的向西方学习之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中西互补"，从自强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与立宪运动直到辛亥革命，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努力学习西方并最终确立实现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目标且为之努力的历史。

对于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动因，近年来，学界大致形成了"内因论"与"外因论"的思维框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樊百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樊百川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手工业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并没有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手工业中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从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9页。

而也就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在他看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是"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1]

和樊百川相对，戴逸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2]

对此，罗荣渠做过如下评说："内因论"以"传统—现代性"的对立为研究的基本框架，认为中国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外因论"以"侵略—反侵略"为研究的基本框架。国内采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框架，其基本趋向与外因论大致相同。在罗荣渠看来，这"两论"虽然都有一定的见解，但同时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外因论"忽略了中国的历史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而排斥历史过程的多样性选择，这实质上是"一种隐藏的西方中心论"；"内因论"虽然强调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但却抹杀了帝国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化扭曲和"断裂"的直接作用，这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3]从全面性的视角，笔者基本认同罗荣渠的分析。

这一问题其实也为英国学者怀特所关注。他认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产生的"破坏性的政治影响"是中国没有走上日本式道路的"关键性因素"。怀特分析到："首先，通过削弱中国政府在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些领域（特别是对税收、关税和海关收入的控制）的决策自主权，通过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失败而削弱中国的国家权威，帝国主义破坏了其国家政权成功地组织起国防近代化事业的能力。第二，尤其是清政府1900年后终于准备力争为拯救国家

[1]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85年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

而努力之际，清政府实在已无能为力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天罗地网使其手足无措，义和团起义后帝国主义强加的巨额赔款耗尽了国家发展所亟需的财源。"因此他认为，"外国势力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也逐渐为王朝崩溃后的时代中更激进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和发展事业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1]怀特基本上取"外因论"。这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也基本上取"外因论"。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在毛泽东看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即主要是由于"老师不断打学生"。"学生"指的是以西方制度为榜样的先进中国人，"老师"自然是指西方列强。

总之，中国从被动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到主动努力使中国西方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外在的苦难和内心折磨痛苦的过程。在这一历程中，我们既不应该仅仅从推动历史进步的客观结果上看问题，而忽略掉当时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耻辱，忽略掉当时中国有机会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可能性，片面地认定帝国主义侵华"有功"；也不能因为帝国主义侵华带给中国的战火、破坏和民族危机而抹杀掉它在客观上所产生的积极反应。历史就是这样展开的，它本身具有的双重性使我们必须从两个角度看问题。有的时候，苦难是孕育生机的土壤，幸福则是埋葬生机的坟墓。当然，我们不能把获得生机归结为遭受到的苦难，因为从苦难中获得生机的根源是战胜苦难的斗志和动因。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是"外因论"还是"内因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着中国在民族困境中探索现代化之路。

[1] [英] 怀特：《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日本式道路》，载罗荣渠等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24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第二章　边缘抗争（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中国被动回应全球化

中国的闭关锁国被1840年的鸦片战争强力打破，一直骄傲地孤立着的中国毫无防备地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1]的汹涌大潮中。由此，中国几乎所有的尴尬和困境，都可以归结为一点：被动全球化。其意蕴是：中华民族本来没有想要汇入这个异族（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西方的坚船利炮逼它进去的。资本帝国纳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进程，是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逐步控制和操纵中国而进行的。

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次次陷入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过程里，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不得不以半边缘化地位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历史发展关联性来看，这也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一波三折的心理基因。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行拖入殖民主义的全球化体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显然，对中国社会性质

〔1〕笔者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姓“社”姓“资”之分，只是由于全球化对资本主义有利，所以资本主义才刻意推动。所以为了避免误读，笔者不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提法，而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提法。

的变化和特征的把握，要给予深入全面的研究，需要全球化眼光。只有以全球化坐标系为基点，我们才能定位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迅速开始了半殖民地、半边缘化过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842年到1872年的30年间，清政府与外国签订了76个不平等条约，从1873年到1894年的20年间，又签订了95个条约。西方国家从中国取得了各种特权20余项。主要包括在华的治外法权、租界权、军队驻扎权、内河航运权、商品自由通行及低关税以及香港、澳门的主权。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动荡，从而促使中国社会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认识已经为革命实践和历史发展所检验、证明。但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种种调查、研究、论证，提出了新的假说。如有说"两半论"是所谓毛泽东的"失误"，影响了中国反封建任务完成的；有说外国侵入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有说辛亥革命以前为封建社会，以后为资本主义，无所谓"两半"的；有说"半封建"不准确，妨害与"境外"同行交流接轨的，等等。对历史上传流下来的学术概念有疑问，应当讨论、阐述，但事实终归无法改变。

事实上，"半殖民地"概念的发明权当属列宁[1]。列宁在1915年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最早提出"半殖民地"概念，指出"'半殖民地'国家"是指"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并将中国列为半殖民地国家之一。次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2]一文中，又强调半殖民地国家是从独立国到殖民地的"中间过渡形式"或附属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3]，并再次明确指出"处在列强瓜分中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1920年7月，

[1] 周兴樑：《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

[2] 有的学者考证，在列宁生前1917年出版的此书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个版本有列宁写于1917年4月26日的序言。直到列宁逝世10年以后，本书才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为书名出版。不知道1917年的版本出于何种考虑不用"最高阶段"而用"最新阶段"的提法。在俄文第1、2、3版的《列宁全集》中书名用的也是"最新阶段"。从提法本身看，"最高阶段"是到了顶的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有新的阶段出现，而"最新阶段"则意味上不封顶，此后还可能有更新的阶段出现。1935年的版本大概是根据1916年的手稿标题改回去的，但是这种改动是否注意到列宁1917年改书名的考虑？这是列宁思想史研究中有待查明的问题，同时也留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

[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1]。

可见，列宁是用“半殖民地”来指涉中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的国际地位。但在笔者看来，指涉中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的国际地位，用“半边缘化”似乎更合适。“边缘化”的说法来自“依附论”及后来的“世界体系论”，依附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组成的等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中心”国家通过资本扩张的需要普遍重构“外围”国家，并剥削这些国家的“经济剩余”而获得发展，成为支配的一方；而“外围”国家在贸易、金融、技术等各方面都依附于“中心”国家，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按照依附论的观点，后发国家的特征是“欠发展”。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是用来指资本主义的卫星国国家经济的一种畸形发展的状况。这种畸形发展并不否认某种单一的、西方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的大增长，但这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建立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之上的片面经济增长，而不是后发国家所谋求的经济发展。[2]在这里，后发国家的欠发展是指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正是这种片面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发达国家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

据此，“依附论”者指明，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核心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和后发国家的不发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正是建立在后发国家的“不发达”之上。因此，边缘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并非如李嘉图所说的那样是发挥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对后发国家有益无害的过程，而是受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规律的制约。在现存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外围”的后发国家只是低度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外围”国家要谋求自主发展，必须切断与“中心”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依附状态，实现真正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脱钩战略”。

---

[1]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2]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单纯的产出增加，往往是不可持续的；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而且包括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独立的、有自生能力的经济持续增长，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颇有影响的"世界体系论"。他动态地、系统地考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置于"世界体系"中来分析。沃勒斯坦认为，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分为三个地带：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世界经济体的不平等劳动分工派生出等级化的世界政治结构。"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基本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外部区域不断被"融入"和"边缘化"，接受其世界范围内劳动分工的角色，逐渐沦为"外围或边缘"国家地区。同时，他认为世界体系的长波每40至50年重复一次，每个周期都要重组世界体系格局，形成新的扩张机制，产生新的核心国家而将老的核心国家取而代之。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构筑的这个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元、以"核心—半外围—外围"为基本结构的宏大的理论体系，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认为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世界整体发展与变化在每一个组成部分上的具体反映。[1]

近代中国半边缘社会的深层意蕴是：中国是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威逼进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完全被动的，历尽苦难并不断丧失独立和加深着依附。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化中的中心地位与中国的半边缘化地位，形成一种不平等交往格局。这种不平等地位，既是西方国家掠夺中国的手段，又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原因。

全球化无疑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从现代化这一指标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生防御型现代化"。从动因和动力看，现代化有两种："内生自发型现代化"和"外生防御型现代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属于"内生自发型现代化"模式，其显著特点是：一是自发性，即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变迁是由于其内部现代

---

[1] 从方法论上说，"世界体系论"是从宏观透视微观、从整体考察局部、强调普遍性和客观规律的"历史性"研究范式，这种研究突破了以具体的国家、地区或文明为分析单元的狭窄视野，从"全球史观"出发，将世界历史运动的载体——世界体系作为基本的研究单元，从而为考察日益显示出整体运动特性的当代世界提供了其他研究范式尚无法提供的理论工具。（具体可参见余伟民：《关于20世纪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武克全：《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2页。）这种看法是中肯的。虽然这种"世界体系论"只是一家之言，特别是它在强调外因的同时，忽略了导致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的内因，但是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分析工具却是有用的。

性因素的不断积累、扩大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制度创新等所引发的；二是渐进性，即由于现代化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因而现代化历程徐徐展开，平稳运作，避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大起大落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一般属于“外生防御型现代化”，其显著特征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动力主要根源于社会的外部，是由于外部现代化的挑战而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具有防御性特征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外生防御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的　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着灭亡的危机，为了在列强的炮口下寻找到一条生路，中国才被迫启动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路程　因此，“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海内外很多学者开始对传统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外因取向分析模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们反对单纯地从“西潮冲击”视角来解释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主张改变研究视角，从“亚洲的角度”来分析观察亚洲国家近代剧烈的社会变迁。毫无疑问，上述观点对于学术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研究发现非西方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变迁的特殊规律，尤其是揭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大有裨益的。但应该指出的是，人类文明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发展的进程是不平衡的，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十七八世纪的中日两国已经发生了种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但由于此时西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业已兴起，使得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因此，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便成为此时期非西方国家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课题。

第二节　中国革命：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被动回应

历史表明，虽然中国已经历了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这一连串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尝试，但中国真正实现其创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还是靠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在军阀们秣马厉兵、分赃正酣之际，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这个当时只有五十来人的团体，因其先进的理论和明确的宗旨迅速赢得了人们的支持　也正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实现民族

独立和社会进步的现实可靠力量，不再是孤独地呐喊与彷徨，而是振臂一呼、应者如云，革命之火呈燎原之势，在挫折中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它的发生，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以外，也有着特定的全球化背景。

中华民族在遭受外来的蹂躏之时，首先拿起的是民族主义武器，但在全球殖民体系时代，中国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更不要说维护国家利益。

在中国，资本主义将古老的天朝帝国殖民化的同时，也培育出了革命的火种。在谈到发生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时，马克思这样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1]如果前期革命以殖民主义者主动而中国人被动为特征的话，那么，后来的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中国人民自觉主动地发动的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以及民主自由权利而抗争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无论成与否，都是中国人民自我主宰自己命运、争取自由和幸福的革命。

众所周知，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之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时时煎熬着民族魂，救亡图存的意识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知识精英的心灵深处。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几代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20 世纪初到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可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是导致中国革命的一个最重大的外生变量，它迫使中国精英努力思考并力图改变国家贫弱挨打的处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的统一战争（北伐战争），都是精英们为民族繁荣富强所作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尽管优先解决的是贫民生存问题，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却是中国精英发动下层民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7—608 页。

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最宏伟的运动。由资本主义入侵而引发的中国革命，其价值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在全球化中的半边缘地位，恢复作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前提的自主和独立。通过革命，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

中国近代史的脊梁或者说是贯穿于其中的主旋律是革命运动，是人民起义。中国严肃的历史著作是这么叙述的，西方严肃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是这么讲的。因为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伟大的中国革命》，主要讲孙中山、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他出版的另一本书题目叫《观察中国》，也是叙述中国革命的，一直讲到"四人帮"垮台。这两本书总得来说还是比较客观地铺展了中国近代历史画卷，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他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主要是由于不了解近代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的基调是革命。"基调是革命"这个观点确实讲到了中国近代史的点子上。

但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上出现了一股来势凶猛的思潮，即所谓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它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革命，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如比较典型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这种理论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以后毛泽东还要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1]

这种否定革命的思潮姑且不论观点对错，它首先使当代中国发展失去了基本的历史前提和价值支点。因为按它的逻辑，当代中国应该在清朝体制的外壳下走

[1] 参见李泽厚、王德胜：《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事实上，当中国一些学者在叫嚷什么"告别革命"时，资产阶级学者却掩面窃笑。因为无论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发达国家正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后，资本主义才真正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向现代化，由此将变成一个成长在封建主义之上的不伦不类的东西。不要认为这是在主张中国走英日君主立宪式的现代化道路，而英日也是通过革命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它的致命问题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在实践中行得通吗？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基于理性推理，往往只考虑逻辑上的关联，没有或者忽视了这个逻辑前提是否具有现实性。"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曾经被许多所谓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用来争取生存权、发展权，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著名口号，为什么到了它们的后辈们接过这个口号，以争取本民族的独立解放的时候，便是陷入假民族主义的误区呢？在世界还被划分为民族和国家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都会把民族的尊严、国家的独立视作比生命还要重要。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一个被视为与狗同类的民族，从何谈起所谓现代化运动？因此，就一般而言，失去独立自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必须首先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恢复国家的完整主权，然后才谈得上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当然，也许会有人拿二战后的日本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说明问题。首先，这不是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例子。美国推动日本现代化获得快速发展具有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斗争的历史背景，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的经济繁荣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遭受西方经济封锁被迫通过香港作为中介与西方进行外贸交易的社会背景。就这些因素之外，像中国这样历史发展包袱沉重的庞大的落后国家，哪一个殖民者能承担得起开动中国现代化发动机的费用呢？哪一个殖民者又心甘情愿地扶植一个将来有可能威胁到它霸权地位的国家走向富强呢？或许，我们同殖民地时期的菲律宾、印度作比较更合适。因此，立足于中国当时的国情，没有革命就没有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现代化选择的机会。

有人说，"告别革命"说的激进论断宣布与旧范式——革命范式决裂，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新范式，这就是现代化范式。问题是，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截然对立的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是出于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吗？难道革命所指向的"民族化"不是现代化的前提吗？难道革命要实现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化不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吗？在此问题上，笔者认为要打破"革命——现代化"两极互斥的思维方式，而寻求一种整合的新思路。这就是，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

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推动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角度说，有的学者的分析是很到位的："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1]

那么，先从发展工业、发展资本主义入手，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然后再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行不行？人们不是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物质救国的主张者，都从这方面作过努力。但是，行不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使中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下，就是因为那种统治秩序竭力保护的生产关系，使中国变得越发贫穷落后，生产凋敝，民穷财尽，严重阻碍着中国新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大片国土沦丧，民族生存尚且不保，中国这时哪里还有工夫、力量去实行近代化？帝国主义怎么会允许中国去实行近代化？事实摆在这里，此路不通。剩下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历史就是沿着这条路行进的，而且终于走通了。事实说明它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对侵略的抵抗，实质是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排斥，不利于中国的进步，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历史的基本矛盾，这是在世界近代史范围内的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进步对保守、革命对反动的矛盾。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也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所充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近代中国，所谓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属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而这时的中华民族仍然是中世纪的封建民族，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

笔者对此不能苟同。抵抗侵略不等于排斥文明。在近代中国存在着既要抵抗

---

[1]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侵略，又要学习西方文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过程。不能以资本主义文明先进为由，否定落后的封建国家对西方入侵抵抗的正义之举。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作用，却丝毫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应当欢迎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就印度问题来说，印度确实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来摧毁传统社会组织的羁绊，但马克思却没有因此把英国在客观上实现这种摧毁并着手重建认定为历史必然，在有关"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论断中只是强调这是历史真实，尽管英国根源于罪恶的主观目的。这就是说，马克思没有因为要谴责英国的罪恶而否定它对印度的客观积极作用，反过来也没有因为它对印度在客观上造成的积极作用而否定英国的罪恶，英国对印度在主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就是双重影响——这是马克思坚持了他所赞许的李嘉图科学研究上的公正、诚实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奴役和不幸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谴责海外殖民统治是"海盗式的侵略"。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对被统治民族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使他们在失掉一个旧世界时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因此更具一种特殊的悲剧色彩。在"野蛮人"和所谓"文明人"的斗争中，正义往往是在"野蛮人"一边的。野蛮人的命运和抗争赢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道义上的支持。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形成了把世界上所有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的进步趋势；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全世界广大地域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使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阻碍了这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侵略的斗争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的历史趋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其实并不都是"亡我之心不死"式的阴谋，相反，很可能是善意的，他们内心是真诚地认为自己的制度、价值和理想是最文明的，他们希望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们也能像他们一样生活。但这种观点却忘记了：一方面，西方人这种浓郁的种族优越感恰恰违背了他们一再宣称的自由、平等、多元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在看起来即使是美好动机的背后，却隐藏着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民族性的戕害，胡萝卜变为大棒，一个民族自主发展的道路就会被阻遏。

以往对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华民族反侵略的矛盾斗争，人们往往从道德层面上来谈问题，往往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谈问题，而缺乏从全球化视角看问题。一旦从这一更宏阔的世界历史视角看问题，一个我们久已忽略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革命和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关系？

对于中国革命的案例，可以以这样一个文本来解读：革命运动、人民起义是中国近代史的脊梁或者说是贯穿于其中的主旋律。世界上没有哪个伟大民族、先进国家不把自己历史上的革命运动看作民族史上的闪光点，并引以为荣。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中国近代最突出、令人睁眼就能够看到的，是一场接一场连绵不断的战争。其中一类，是列强发动侵略，施加民族压迫，中国抵抗侵略的对外战争。从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包括英军进攻西藏、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与"九一八"事件占领东北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共12次、历时16年又9个月。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每10年里，就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在外国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中度过的。这一类是中国各阶级共同起来直接抵抗侵略的战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势力，多半先出来组织或参加抵抗，然后屈服退出。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政权没有中途退出，那是人民力量兴起和国际环境影响造成的例外。再一类是民族内的战争，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这些战争从现象看好像不是对着外国的，但实际上都是在外国侵略压迫的背景下出现的，而且战争也必然直接或者间接与外国各种因素发生关联。虽然对外对内两种战争直接针对的对象与参加者不同，前者是各阶级联合起来抵抗帝国主义，后者是人民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同盟进行革命，但是，那个同盟的盟主正是帝国主义。两种战争的交替，反映的只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哪个为主为次，哪个暂时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而不是变换追求民族独立的目标，不是要肯定或者否定民族矛盾存在的问题。如果把两种战争集中到一点，就表明中国的近代首先存在着民族不独立，中国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问题。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猛然觉醒：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国家富强，迅速成为民族时代强音。民族独立（实际是指国家政治自立）处于逻辑的最高层，政治精英当然最关心这一问题。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争取民族独立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也是中国以一个民族国家的姿态真正进入全球化的最基本条件。我们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往往就只能满足于某种单线式的过程研究和现象描述，无法使人正确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线性。革命就是要为参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开辟道路。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要独立。如果没有一个政权独立的

国家、对外，我们缺少参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对内，我们缺少发展现代化的政治保障。第二，就要反封建。因为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制度平台。从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就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打破地主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扫除封建割据、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障碍。如果没有革命风暴，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中国是不可能和平地创造出这两个条件的。

也有人认为，中国是由于贫穷落后才引来外敌，失去独立，那么只要致力于经济建设，使国家富强，"西人即可敛手"，外敌自退，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自然恢复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好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乃至某些革命派，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先富强后独立，而事实证明：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永无富强的可能。

如果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中国革命是从边缘到中心的努力。但革命所致力于实现的不仅是"从边缘到中心"，而且更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中心的消解来重构社会主义的中心。革命的深层指向，是努力取得作为一个国家真正参与全球化所必需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只有在真正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真正参与全球化才有可能。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全球化只能是殖民化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从半边缘化到中心努力的一种尝试，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挑战的被动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努力取得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所应有的国际地位，禁止外部干涉以及强调对本国资源的自主权，也就是把争取民族独立作为革命的目标。其分量必须与革命前在中国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非正义和压迫的严重性相称，必须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在四分五裂状态、沦落到对西方列强与日本无力抗争的地位，中国人民遭受侮辱的深重性相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绝不仅仅是对中国一国带来深远影响，它对世界影响也是深远的。毛泽东说过："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1]他又说过："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2]他还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5页。

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1]这里，他的意思可能是指把中国的革命形式，应用于其他的落后国家，由此带来世界意义。事实上，中国的革命对世界的影响还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一面。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继十月革命之后又被深深地划开了一个裂痕，社会主义旗帜下价值诉求进一步影响到全球化进程。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开始独立自主地探讨现代化进程，从政治层面说，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沉重打击，从经济层面上说，则是使全球化发展大大地融进了社会主义新元素。尽管在一个长时间里，社会主义被游离在主流全球化之外，但是，它出现本身已经给全球化带来深远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学习和借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竞争也没有中断过，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被全球化所真正隔离。所以，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是长远的。

第三节　服膺马克思主义：反帝立场和全球化诉求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革命来铺平道路。问题是，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来完成这次宏大的革命画卷？中国人民为什么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淘得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眼光敏锐的中国人意识到，近代文明的主导模式是工业化，其政治上的特征，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倡导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新的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以西欧北美为中心，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求生存，这已经成为举国一致的定论。毛泽东也不反对这一点。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2]

问题是，怎么学？在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意识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或商人左右一切的制度，这种制度绝对不可能令人神往。在《共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64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1470页。

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说过：“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马克思对金钱关系和冷酷算计的抨击也必然会触发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个特征也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憎恶。

在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时期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一度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的指导原则。这除了盲目推崇中国中央集权制的优越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缺乏传统文化上的认同感。中国儒家文化倡导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视物质利益为侵蚀圣贤操守的根源，极力贬抑商人社会政治地位，因此，不可能认同商人主宰的政治制度——这与大众文化中的商业思想不一样。在儒家文化中的大众文化中，并不排斥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商业行为，因为这与民众必不可少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而儒家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中，追求的是德行品格、权势名位，并不考虑也不会忧虑一般物质生活，因此，对含有浓郁的物质利益气息的商业行为嗤之以鼻。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是要“全盘西化”。有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日本学习西方成功，是因为没有深重的传统文化这个历史负担，而中国学习西方失败，是因为传统文化氛围太浓厚深重了，严重削弱了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动力。例如，一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不断演变的世界中发生了一场文化冲突。”——这就是中国专家们理解中国与西方对抗的出发点。他们认为：塑造东亚近世史有两种主要因素，“一是大部从西方引进的近代化势力，二是当地的传统”。“既然，‘对中国和日本来说，外来力量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就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土传统的内部特点上；要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做出了有效的反应，有些国家则不然，其关键就在于此。”“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她的社会自给自足，她的文化孤立而自成体系。可是，面对19世纪欧洲的巨大财富与威力，中国的传统文化‘辜负了她的期望。过去的一套做法根本应付不了近代世界’……正因为中国文化完美无瑕，‘浑然一体，结构稳定，就从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根本上妨碍了它向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回应'。"[1]这个观点本身不值得赞同，正如詹姆斯·佩克在一篇文章《花言巧语的根源：中国动态观测者之职业性意识形态》指出："以此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为依据来认定一个社会蹂躏另一个社会，就等于忽视这场对抗的更加深刻的本质。"[2]但这个观点的根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尤其精英文化，确实不利于中国人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尽管这不是中国学习西方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学习西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失掉了学习西方、实现社会大变革的社会环境。正如世界上众多殖民地国家一样，经常处在外国侵略状态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中国，已经没有稳定的社会条件允许政府安下心来学习西方，实现社会根本性变革。不管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大清王朝，还是先天不足的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不管是内讧不断的北洋政府，还是血雨腥风中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当时的内外社会环境决定了它们除了想办法维持存续外，根本没有能力搞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相对来说，南京临时政府是最有进取心的一个政府，但是生存危机迫使社会改革胎死腹中。这就是说，正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使中国丧失了学习西方的机会。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期，中国决心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怎样复兴民族和现代化。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3]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虽然曾经学习西方，但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最终失败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挡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

[1]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G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in, 1965), pp. 5, 9-10. Marion Levy, "Contrasting Factors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3), 2: 163-164. John K. Fairbank "The Great Wal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8, 1968, p. 28.

[2] James Peck,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October, 1969.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1]

我们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没有成功，但为什么在众多的“主义”中，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

20世纪初，活跃着各种社会救国思潮，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在中国步入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必然要在这些思潮中选择出一个担负起引领中国走出历史梦魇，走向光明未来的责任。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其中比较大的思潮，有四个：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以吴稚晖、周作人、王光祈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社会主义，以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这四大思潮中，除了改良主义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地说，它反对所有的“主义”，强调“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2]之外，其他三大思潮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思想的价值坐标，不管内容如何，在外包装上都贴上了反对封建主义独裁专制、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倡导民主、自由、公平等社会主义标签。例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中，在中国流行的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此外，还有孙中山、胡汉民等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研究系中，张东荪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称之为“三种文明”——第一种文明即封建时代，第二种文明即资本主义时代，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时代。他说，就整个世界看，“这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3]他认为，世界第一种、第二种文明已经过时，第三种文明必然兴起。而无政府主义者也打着社会主义大旗鼓噪呐喊。不仅号称“以提倡社会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4]，而且在实践中，开办过“社会主义讲习所”、“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同志社”等，用“社会主义”为无政府主义贴金带银。在当时，甚至安福系政客、军阀陈炯明也在大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时间成为思潮中最流行的概念，令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十分向往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2—1403页。

[2]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

[3]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张东荪任主编创办的杂志）

[4] 刘师复：《师复启示》，《晦鸣录》第2期。（1913年刘师复创办晦鸣学舍机关刊物，后改为《民声》）

为什么当时人们如此热衷谈论社会主义呢？这应该从世界的视角来看待。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暴露出帝国主义的贪婪和血腥，战后人们生活的极度困苦则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值得中国学习的社会制度，人们发现，资本主义似乎正在走向灭亡。梁启超等人在欧洲游历一年多，目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疮痍满目"，"困难万状"，认为社会革命是早晚发生的事情。因此，要想救中国，就得另辟蹊径。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没有捞到好处，而且自己应得的主权也没有顺利收回来，这激发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失望和愤怒。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发生的导火索就是巴黎和会中西方几个主要列强擅自强迫中国将山东主权由德国转交给日本引起的，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主流开始由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转变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另一个方面看，自从"社会主义"概念被创建起，它就与实现公平、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目标交织在一起，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一来到这个世间，就成为不公正、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的对立物，就成为追求人类美好社会发展状态的代名词，就成为追求真理、正义、公平价值目标在社会发展层面上的化身。

西方社会主义理论是应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而产生的。经典作家分析"现代社会主义"（即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成因时指出："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1]19 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相继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资本主义"表面上承认理性"，却"使非理性真正达到了顶点"，它实际上"变得更不合乎人性"。[2]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与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不同，他们不是局限在对理性社会的抽象的逻辑推导上，而是从批判现实社会出发，具体构建"有形"的社会模型，通过实验，把"社会主义"价值内涵"实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3 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4 页。

体化"。不管是圣西门的"实业制度"[1]、傅立叶的"和谐制度"[2]，还是欧文的"公社制度"[3]，都相对完整地构建出"实体性"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来。这些"理想的社会组织"都把社会平等、民主、合作等价值取向放在第一位，无不体现着对建立一个充满和谐状态的理性社会的憧憬。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较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来构想理想社会的，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较为具体、明确，甚至在很多方面具有可操作性，正是从这一点来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很有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热衷谈论"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来担当起拯救中国命运的思想指导历史重任？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从理论上看，各种思潮虽然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有所差异，但从根本上看，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实现社会主义途径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表现出几种思潮，如互助论、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虽然它们谋求进入理想社会主义的具体办法不同，但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直接对抗政府和帝国主义，希望通过一种理想设计和实践上的示范作用，在逐渐推广中把中国引向一个新境界。这一点与后来的乡村建设派的主张和实践具有相似性。王光祈曾这样描绘他在工读互助团运动中的"新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这追求的显然是一种避世的生活方式，在实践中失败是注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4]在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现实社会中，自下而上地营建一个世外桃源范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等于在一个鲜活的自由的老虎身上动手术——或许在剪毛的时候还可以操作，但一旦开刀见血时、就会挨咬了。工读互助团运动和后来的乡村建设派的实践活动轰轰烈烈地失败，就证明这些办法是在沙滩上起高楼，一有风吹草动，便

---

[1] 它是一个平等、幸福的新社会的表现形式。它实行计划经济，实行劳动协作和联合，每个人的收入与他的能力和贡献成正比，由民主选举委员会担负行政事务、管理公共事务。反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2] 其基本单位是"法郎吉"。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在其中，人人参加劳动，可以自由选择和交换工作，主张按劳动、资本和才能进行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3] 这是一个劳动公社联合体。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国家，联合劳动、联合消费、权利均等，实行按需分配。由全体社员大会行使公社的最高权力。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529页。

顷刻坍塌。研究系的社会主义主张也反对阶级斗争，强调阶级调和。"阶级的运动是反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当是为全社会的。"[1]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连带的，缺了甲，乙便不能生存，……所以我们要改造社会，必定预定一个全体谐合的计划。若是只注目在一部分，将来必定有自相矛盾。"[2]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曾在中国讲演时倡导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当务之急不是革命斗争，而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他的实业思想得到张东荪、梁启超的喝彩和响应。显然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思想，是一个没有现实性途径的天国似的理想。因为他们的口头政治主张不可能化解现实社会中阶级矛盾，全民的超阶级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实现的机会。但是，反对阶级斗争却实实在在影响着社会中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与胡适的实用主义如出一辙。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实现社会主义途径上，与理论创始人蒲鲁东的主张大相径庭。普鲁东主张通过"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任何公民的充分自由"来步入一个理想社会。但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的影响，认为通过互助能够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强调通过自勉自新、教育感化、示范实践来实现人的绝对自由。因此，在追求理想社会的途径上，与空想社会主义无本质区别，在某种意义上，特别在强调人的绝对自由问题上，比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更不现实。

与这些主张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设计，不是一个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简单的理想化目标追求，而是一个基于现实社会又超越于现实社会的、需要经过长期发展的运动过程，是通过鲜活的实践努力推动的结果。"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正因为如此，通过血与火的阶级斗争是解决阶级矛盾，走向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我们通常认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空想社会主义才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不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阶级斗争的天然主张者呢？马克思说过：

[1] 公展：《社会主义的误解》，《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1919年9月张东荪任主编创办的杂志）
[2] 张东荪：《改造要全体谐合》，《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号，（1919年9月张东荪任主编创办的杂志）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这就是说，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本身不具备孕育新社会婴儿的功能，但在新社会的婴儿要出生的时候，需要它来“引产”或“助产”。在一个充满社会冲突的时代，若没有革命的行动，就没有实现理想的可能性。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但这种手段，在阶级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它使得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活生生的实践的基础上。让我们回到中国问题上。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相互勾结，沉重地压迫着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通过革命的暴力就不能打倒反革命的暴力，任何理想就无法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资本主义在确立自己政治制度的时候，就是通过火与剑来完成的，社会主义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显然，也不能离开暴力革命的“助产”。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这种实践理性判断的结果。在毛泽东的思想逻辑中，首先通过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然后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反帝立场和争取在民主公正原则下发展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与他们的理想诉求内在契合。

选择马克思主义，还要从实践来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是可行的，表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是能够救中国的。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生的苏俄政权对中国的友好态度相比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探索拯救中国的新路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既然苏俄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那么，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就是必然选择。

当然，任何一个伟大的理论只有通过人的能动作用，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显示出真理的光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且在众多的“主义”中，能够脱颖而出，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积极努力功不可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1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传播不久，胡适就抛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而研究系、安福系、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支持者也抛出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反对、诋毁马克思主义。就像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传播的实践过程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是经过激烈的论战实现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施存统等都曾参与过激烈的论战。他们以《新青年》为主阵地，通过论战，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大大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人力基础。反过来，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立即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组织者，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使之成为转变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毛泽东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

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来承担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中国通过革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时候，中国人民有理由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吗？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2]显然，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至少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不具备步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陈独秀抛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只能首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各方面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凭什么直接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1]分析毛泽东这段话，中国革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前途，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自身的特点，二是所处的世界时代。区分这两点原因，前者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的条件，即条件性原因，后者才是走上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的理由、根据。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中国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2]，中国革命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前途。

同时，从中国与世界关联上看，在殖民体系以欧洲为中心迅速向外延伸的过程中，中国被纳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是极为严酷的。当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半封建状态之中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已侵入了中国沿海地区，并沿着长江等主要大河向内地逐渐渗透。瓜分中国这块肥肉的是几个西方国家，他们在殖民扩张中蜂拥而至，各自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相互矛盾和竞争中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交织影响。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正在失去，正在陷入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锁链之中。这造成了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发展存在地域上的严重失衡状态。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反帝，必须选择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道路。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采取了与原来沙皇俄国截然相反的对华政策，在原则上平等、友好对待中国，支持中国革命。这种鲜明对照，使得中国对社会主义向往必然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心声。

按照"五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是不是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历史是人的能动作用的结果，没有人的能动作用，就没有社会历史发展，当然，也就不存在历史规律了。历史规律不是在人的能动作用之外，而是在其中。人的能动作用体现着确定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2 页。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4 页。

素，其确定性因素孕育着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所体现出来的理论理性是深刻的，但所需要的条件是宏大的，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把它汇集出来说明问题。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依靠的不是理论理性，而是根据实践理性认识、选择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所以，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处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放眼世界，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带给本国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人民的苦难已被认识和体验，而资本主义肌体自身具有的弊端和腐朽已经显露并在加剧，相反，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正在满怀豪情地激励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那么，基于实践理性，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理由再让饱受殖民压迫的中国人民重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类似地，如果中国遵循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指导，也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正是处于那个革命高歌猛进的国际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心声，是实践理性选择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五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是从具体历史轨迹近似性发展现象归纳出来的规律性的认识，不是对任何一个具体国家、具体民族历史发展历程的具体规定。中国社会历史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不是例外，因为在大致相似现象的本质规定的抽取而获得的规律中，个性不能完全展现共性可以是常见现象。正如我们可以把人一生经历的恋爱模式概括为青年恋爱、中年恋爱和老年恋爱三个依次更替的过程，但实际上会有多少人完整地经历这全部过程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凭什么走上社会主义，但是，如何解释怎样走上社会主义？在一个尚未完全具备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国家，怎样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说："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3]那么，在一个贫困落后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459页。

的、具有厚重封建思想残余的国家里，怎样才能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显然，我们建立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元马克思主义原理意义上的具备完全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或是民族主义的？这就要从全球化视角来得到解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1]类似地看问题，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原则、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型社会制度，都属于社会主义体系。尽管我国由于生产力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要求，按着邓小平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从基本属性上讲，应该属于社会主义。因为全球化已经发展到这样程度，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开放直接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把我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优越性与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嫁接起来。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相对于世界上资本主义来说的，而且以它们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谈到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他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2]

总之，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思想钥匙，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立足全球化视野，一个世界新时代推动的结果。

第四节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化因素的艰难成长

中国现代化发展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明末开始（这是一种观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点），到清朝中期陷入困境。随着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用战舰强迫中国卷入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漩涡中，于是，中国现代化开始在被动回应西方侵略的情况下犹豫徘徊着发展起来。中国从求索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始，最终转变为探寻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应对全球化所引致的历史跃迁。

1. 封建势力主导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懈求索

19世纪60年代，正值世界范围内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改革派发动了第一次学习西方、求强求富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它在指导思想上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一次被动回应。面对中国由于闭塞而落后于西方、倍受外国列强侵略欺凌的现实，洋务派在实际策略上主张"制洋器，采西学"。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外强入侵和中华民族不断反抗的历史，因此中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要面对"救亡"的主题。尽管在洋务时代，"救亡"还不是时代的中心词，但人们已经开始觉醒，并希望借助外来较为先进的事物来变革中国。西方费正清主持的剑桥派学者认为"'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但这主要是总理衙门的工作，而"自强"是所有衙门都必须考虑的大事。他们强调说："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他们毫不含混地把这段史事称为"自强运动"[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追述中国进步历程时，也说到"自强运动"，而不说"洋务运动"。

更为重要的是，洋务运动带动起来的洋务思潮，促使全国朝野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就是这一目标，使中国向着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被动地蹒跚前进了。因此，这是顺应着世界潮流而动的中国近代化的起步。罗荣渠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作为现代化第二次大浪潮时期遭受西方扩张侵略的东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中国的"自强新政"走的正是"外生型"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防御性现代化道路。[2]"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自强效果，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加强了中外经济的互动。30多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

[2] 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白银，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白银。进口货物中，19世纪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19世纪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总进口绝对数值一直上升[1]

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在世界殖民体系初步形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情况下，中国进一步成为列强侵略的目标。列强先是加紧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继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甲午战争，再一次打败中国。于是，沉醉于实现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洋务派做梦也没想到，中日甲午战争却给他们“轰轰烈烈”地推进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个方面，标志着中国开始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昭示着自强运动的夭折，殃及中国民族近代化的发展。在西方列强欺压的裂缝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艰难地喘息、生存。同时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中国丧失了现代化发展的最后机会，开始加速陷入了半边缘化的泥潭。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是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这时帝国主义开始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从1895年至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建立厂矿130多家，到1914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总额达22.5亿美元，比甲午前增加十倍[2]。故甲午后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急剧进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3]

另一个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跟随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加紧加强。

甲午战争以后，全球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平衡、跳跃性的变化，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大量资本输出到殖民地和附属国而获得高额利润，国内投资减少，设备更新困难，科技发展缓慢，生产停

[1] 徐伟新等：《绝出前古，再铸辉煌》，《学习时报》2004年10月25日。
[2] 孔凡岭：《辛亥革命应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研究》1991年第6期。
[3]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68页。

滞不前，逐渐地落后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德、美、日、意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从国外积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机器设备，在较短时期内赶上甚至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决定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打破了原有的世界均势。这可以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势力的消长过程窥见一斑。英、法、俄、美、德、日等国是近代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中晚期，英法俄三国特别是英国在华势力最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德日三国特别是美国在华势力急剧扩大；一战后至40年代，美日两国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国家。上述侵华势力的消长变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列强各国政治经济实力变化在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直接反映。

总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被资本主义的宗主国划分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1]这使得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矛盾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2]从当时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来看，“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3]在新老资本主义国家疯狂的全球性的殖民扩张中，中国这个长期停滞不前的东方大国无疑成了他们加紧争夺的目标。资本输出成为其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对中国的侵略表现为争相向中国提供政治性贷款、抢夺路矿权、竞相在华设厂等，反映出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侵略方式。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掠夺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1900年，八国联军直抵北京，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1905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战争，结果中国东三省广大人民从沙皇俄国魔爪中沦为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生活。这次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割让，数十亿两白银作赔款，更多的沿海及内河港口落入外国控制之

---

[1] 如，英、法、俄、德、美、日6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抢占的殖民地总面积共达6500万平方公里，等于他们本国领土的4倍半。其中，抢的最多的是英、法两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1914年，拥有3350万平方公里、3亿9千多万人口的殖民地，比它自己的面积大100多倍，人口多80多倍。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可参见赵曜著：《赵曜讲学录》，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下，同时，外国对华侵略方式也从经济渗透、商品贸易发展到了资本入侵、投资办厂，直接奴役中国廉价劳动力。列宁引用希法亭的话指出：“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1]总之，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初步形成了，中国被迫卷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半边缘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历史学家刘大年曾经指出：“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维新运动。同样地，维新运动也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辛亥革命。”[2]在近代中国社会，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大大促进了革命的发生。可以说，近代中国革命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逼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人被迫进行的革命斗争，是一种被动的应变举措，是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这使中国人无法逾越时代的界限和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作回顾和前瞻，因而无法真正完成民族的独立，也就无法使中国进化到具有现代意义的近代化了。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清末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衰微的中国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观点。清政府在20世纪以前在产业领域一直顽固地坚持“官营”政策，抑制民间资本的发展。正是这一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民间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而日本却正是利用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资本输出的时机大力发展民间资本，使日本的现代化抢先中国一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商品输出过渡到了资本输出，中国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庚子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庚子之变”之后，清政府终于推行“新政”，开始倡导私人资本的发展。但除了设商会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在培育民间资本上，没有任何有力的行动。这与日本的明治政府的举措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是所谓的“新政”在经济上完全失败的主要根源。另外，“新政”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是完全失败的。其文过饰非式的花样文章导致立宪派也开始反对清政府，说明清政府已

[1]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2] 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完全不能适应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需要诉诸于革命，以重建国家体制。[1]

2.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逶迤前行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正处在山雨欲来的大变革浪潮中。各种势力，风起云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不断的融合，也有不断的分化。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曲折成长起来的，其革命性的要求和其软弱性的本质属性交互影响着它历史发展的命运。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黎澍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是由于手工工场主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转化来的。这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长久地保持着他们原来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和心理特征，而且即在经济上也没有割断同封建经济的联系。"[2]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也未能割断它同帝国主义经济的联系。在这方面，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证。他指出："辛亥革命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工业迅速发展的帝国主义不仅是外界的客观存在，而且已经侵入中国达半个世纪以上，并且无可避免地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可以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不必重复西欧经由工场手工业阶段然后再进入产业革命那样的历史常规。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已经逐渐丧失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以封建主义为支柱奴役中国，严重地阻碍和摧残刚刚有所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资金、设备、技术以至市场等方面受外国资本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较诸西欧前辈更为稚弱。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不成熟的经济、阶级基础上发生的，而它面临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又较诸西欧封建势力更为强大和根深蒂固，因此它难以取得如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3]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推

---

[1] 具体可参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2 页。

[2] 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 5 期。

[3] 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依照欧美近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创立了一个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近代民主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规定，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这体现了政治民主化的正确方向，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为主旨的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如，国会的建立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初步实行是中国政治制度化起步的标志；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新世界观；以纺织和食品加工为主的新式工业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城市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其范围逐渐由沿海和沿江向内地渗透，从而使全国性市场开始形成，等。同时，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由于清政府已经是“洋人朝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辛亥革命在实质上具有反帝的性质。

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没有进入革命党人所设计的太平的民主共和之境，少了一个满族君主，却出现了无数个土皇帝，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军阀割据的时期。对于割据局面的形成，毛泽东曾归因为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余年的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更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改善。相反，民族危机愈演愈烈。掠夺性关税协定、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以及西方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融入全球化所必需的资源积累。

从全球化视角看，孙中山的政治、经济思想中所贯穿的全球化视野是辛亥革命留下来的重要遗产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只有反清思想，没有全球化视野。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整个西方社会已经步入了全球化发展的快车道，而且其影响已广布全球的背景下，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遭到列强肢解、凌辱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发达富足之间的巨大反差，遂产生了革命思想。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其第一要义是民族主义，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全球化意蕴。“我们这种民族，处现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与世界各个民族的人数比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

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解读是：“什么是民族主义呢？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2]用孙中山的话来说，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存于世界。”[3]由此观之，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所说的民族概念，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他所说的民族主义，是要彻底扫除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恢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和世界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可见，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正在于他的全球化视野，他把中华民族放在世界范围内，其目标是建设一个“与英美并驾齐驱”的富强的中国。

不仅如此，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也有不少值得我们珍视的全球化思想遗产。这体现在他写于1921年的《实业计划》中。他的实业计划规模宏大，是从整个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大潮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而设计的。例如，进行实业建设需要巨额资金，远非中国国民财力所能承担。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他认为应该利用外资。“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他认为，阿根廷、美国、日本的勃兴就是靠借外债的结果。他批评了中国传统观念畏借外债如畏猛虎的弊端：“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鸩毒，不知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4]。他还批评了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外资的短视行为。他认为，利用外资，我们暂时会让外国人赚不少钱，但从长远考虑，是我们赚大钱，关键是我国能迅速地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否则，等着钱攒够了才搞建设，就只能永远落后于外国。在这里，孙中山的全球化视野由此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效应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一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暂时放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个短暂发展的机

[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页。
[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0页。
[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会 据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一书记载，1903—1908 年全国注册的公司数为 127 家，平均每年设公司 21 家；1913—1915 年新注册公司 124 家，平均每年 41 家 可见辛亥革命后平均每年新注册公司数较前期增加近 1 倍 又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 年为 986 家，1911 年为 787 家，1912 年为 1504 家，1913 年为 1378 家，1914 年为 1123 家[1]这表明辛亥革命后我国曾出现一个设厂高潮，说明辛亥革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中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进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这一发展是短暂的，不久即转入萧条 一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通过华盛顿会议，中国又恢复到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局面，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争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曲折中又有了一定的发展 1920—1927 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矿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8.5% 和 8.6% 同时，交通、金融、邮电等行业的民族资本也有一定的扩张 但民族工业只集中在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中，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其本身又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限制及外国资本的压制 1903 年，中国拥有卷烟厂 30 多家，在英美公司的强大攻势下，到 1909 年只有几家 相对于民族资本来说，这一时期的外国资本发展很快 1894 年，在中国工业企业中，本国资本还占全部资本产业比重中的 39.3%，外国资本占 60.7%，到 1936 年，这一比例则成了 21.6∶78.4 到 1936 年，外国资本大体已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 95%，钢产量的 83%，机器采煤的 66%，发电量的 55%，掌握了中国的主要资源和能源[2]从对外贸易方面看，据统计，1894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 2.9 亿两黄金，1913 年为 9.7 亿两黄金，1928 年为 21.8 亿两黄金 在这 30 多年的历程中，始终有 90% 外贸总额为外商操纵 不仅如此，外国资本是商业掠夺性的，它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利用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 中国资本根本没有力量竞争，处处要仰外国资本鼻息，求得生存

1929 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 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 1931 年入超升至 81641 万多元 20—30 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3]

[1]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农商部统计报告》，中华书局 1918 年版，第 365 页

[2]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13 页

[3]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3—124、127—128 页

从而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拼死竞争下才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1]谈到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不区别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把它们笼统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固然是不恰当的，但是在谈到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时，不结合外国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考察，恐怕也未必恰当。而一旦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那么，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格局，不仅不能像有的学者误解的那样代表中国"向上发展的因素"，相反，它正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半边缘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一个标志。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须政府的大力扶植，但由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维护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与新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制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1927年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在日益严重的中国半边缘化情势下，当时力量最为强大的国民党，在实施其最初的救国主张过程中，也蜕变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特别是国民党仿效德国的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农村和农业衰败，使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严重动摇，再加上阶级对抗的日益严重化，国民党政权只能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才能维持其统治。因此在整个国民党时期，中国仍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边缘，局部地区甚至被完全边缘化。

南京政府时期，由于国家主权不完整，没有关税自主权，中国企业竞争压力过大，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影响非常大。1935年，美国实施白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造成以银为货币本位的中国通货紧缩，经济发展受挫。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导向，如统制经济。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了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布和72.6%的棉布，一定程度上把资源的配置纳入到国家的轨道。这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政府支出的40%—48%被用于军事目的，本可用于经济和私营部分的投资或消费的经济资源，被南京政府作为军费花掉了。关税自主运动、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充实国库，而不是扶植国民经济。同

[1] 上海市工商局等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页。

时，受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限制，投资和需求不足，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只占5%，[1]国民经济很难步入起飞阶段。说明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尽管如此，代表现代化方向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仍增长迅速。从产业结构看，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从经济构成成分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由辛亥革命时期的2%，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增长到20%；而代表时代没落的封建经济，由辛亥革命时的90%，到1937年下降到70%左右；外国在华经济势力，在中国新经济成分中的产值比重，1911年占80%，1949年减少到不足20%。总的来说，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逐步纳入世界的发展潮流。封建经济和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势力在逐步消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并得到了发展。[2]尽管民族资本主义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向，但是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走上了畸形发展的轨道。

日本侵略中国是导致中国革命特定结局的最直接的外生变量。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打击，加紧了侵华步伐，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等，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日本在沦陷区，推行殖民地经济，进行野蛮掠夺；国民政府则实行统治经济政策，官僚资本乘机迅速膨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管在沦陷区还是在国统区，都受到政治力量的挤压。而从1937到1945年期间，受战争影响，民族工业企业大量内迁，敌占区的工业受战争破坏严重，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中断。抗日战争爆发，导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大颠簸，抗战后期官僚资本的膨胀，又造成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大窒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副黯淡的前景。

应该说，南京政府在20多年的存续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在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上，还是有一些成绩的，尽管这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早从1928年起，中国对列强各国展开了一个修订新约运动。1928年6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宣

[1]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46页。
[2] 转引自张福记：《中国近代社会演化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言，开始了修订新约运动。这一运动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置于首位，取得了一定成效，如自1929年起中国实行关税自主。

从全球化视角看，抗日战争是中国在全球化中重新定位的界标。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是其重要表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意、德三个法西斯国家与中国处于敌对国状态，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惯例单方宣布废除中国与三国之间所有条约及特权。为推促蒋介石坚持支撑中国战场并使中国在亚洲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在1942年10月10日宣布，将通过谈判废除美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有其他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罗斯福总统同时说服英国也这样做，即除香港问题外废除全部在华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同中国签订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及换文》（简称《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四三年废约"是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当时的《解放日报》在评述废约的意义时指出："百年来我国由于南京条约、辛丑条约而受到的桎梏，已一扫而光。"从全球化的视角看，抗日战争废除了一百年来列强强迫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恢复和实现了完整独立的国际主权，一时间，中国不仅从此结束了在全球化中的半边缘的历史，而且跻身于与美、英、苏并列的强国行列。"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1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1]

当然，我们必须更全面、更深入地看待这一问题。美国、英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采用多种有利于中国的政策，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仅出于利用中国人的生命阻挡日本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的疯狂扩张的需要，而且也有利用蒋介石抵制苏联战后向亚洲扩张势力的考虑。从本质上来说，中国虽然跻身于五大国之列，但是作为"主子"的一张牌的地位是没有变的。在国际上，中国的政治地位尚且如此，经济地位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确实在改变全球化的边缘地位进程中取得重大进步，但是蒋介石作为美国在华的代理

[1]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4页。

人没有改变，边缘化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改变。抗日战争结束不久，美国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客”，美国商品和美国资本涌进中国，百废待兴的中国民族经济又一次遇到外来经济的挤压和掣肘。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刚刚见到日出曙光，就遇到阴霾冰雹

第三章　曲折发展（1949—1978）：中国再度偏离全球化

每一时代都会面对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每一时代都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因为人们总是根据实践理性对未知的道路做出判断。如果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用革命来被动回应全球化”是时代的理性选择；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表征着中国已取得民族独立的形势下，如何认识与回应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却是崭新的时代课题。红色中国崛起于世界东方，恰似给“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覆盖了一层云影，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必然要给中国提出一个个难题。随着苏联霸权主义抬头，欲把中国纳入到它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轨道也日渐显露，因此对新中国的控制也必然会加强。我们不可能不面对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的挑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这一课题，是关系到能否胜利拓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问题。回首历史，那一腔探索的激情，那一路曲折的探索，使我们备加珍惜今天的改革成就。

第一节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表征

应该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前途。新

中国成立后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的，无可置疑的。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实践中改变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表？由原来设想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缩短为三年？一般把原因归结为两点：客观上存在着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贫困落后、追求富国强民的社会性冲动，主观上毛泽东的骄傲情绪造成判断的失误。但是问题的背后，必然有世界因素的影响。从全球化视角来看，我国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既有苏联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也有对西方强力打压的反弹。更重要的是，这里面包含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那个时代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未来命运的认识。

1. 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参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之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主权失去了完整性。这给中国参与全球化出了一道难题：是先参与全球化后解决主权问题，还是先争取国家独立后参与全球化？失去主权完整性的全球化只是一种殖民化的全球化，是被动的受奴役和掣肘的全球化，是没有民族尊严、没有摆脱依附地位的全球化。中国共产党人选取了一条先解决主权问题，后参与全球化的路径。这一路径是非评说，值得深入探讨。

新中国为全面参与全球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中国真正实现全面参与全球化却经历了几度波折——从“一边倒”外交、希望营造并参与社会主义全球化到“两个拳头打人”、陷入“光荣孤立”，再到“一条线一大片”、解冻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要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首先就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获得民族自决权。毛泽东把创建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重树民族的尊严与自信，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视为建立理想社会的先决条件。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毛泽东毕生都铭记着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他对轻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甚至试图控制和干涉中国的任何外来势

[1]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力，都保持着异常敏锐的警觉性。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他始终以大无畏的气概，顶住了国外的种种压力，从不示弱，坚决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应该说，毛泽东强调国家主权作为参与全球化的先决条件是必要的。“主权是在与民族国家体系的碰撞过程中产生的。”[1]主权对于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安全与独立，对于获得自主、平等、互利条件参与全球化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条最基本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眼里，主权问题关系到国家是否真正独立。毛泽东对国家主权问题的敏感性根源于他对中国近代史主权丧失的耻辱的激愤。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推翻清朝腐朽统治之后，希望很快得到外国的承认，把一切旧的外交条约全部继承下来，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自主权利，因而使中国人民继续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毛泽东特别防范国家主权不被外来力量侵犯，视其为国家是否获得真正独立的重要保证。建国之初，毛泽东指出，应当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侵略势力，以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在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外交政策与思想最重要的阐释者，相比之下，他的阐述更加具体和清晰："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的怀里。"[3]毛泽东强调中国在外交中必须尊重他国主权，中国的主权也必须得到尊重，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权是至高的和绝对的。

正是基于对国家主权原则特别敏感的认识，毛泽东才对独立自主原则给予特别的理解。有人认为，当时中国既没必要同美国搞针锋相对的“志气”斗争，也没有必要同苏联撕破脸皮，最终把独立自主变成“光荣孤立”，因为这并不影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322页。

响主权独立。那么，放弃独立自主原则，会不会影响主权独立呢？

独立自主原则上强调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基础上，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所以，并不排除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经济互助行为。这一点，我们党始终都有清醒认识，在实践中也曾做出积极行动，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原则性纰漏。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抗日战争问题时，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1]同年，他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2]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要发展中国的落后经济，必须利用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3]"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4]这里的问题是，一旦与外国发生经济联系，我们如何保证主权不被侵害？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理解"主权独立"这一概念的外延。因为正是由于对国家主权独立性、完整性存在理解上的反差，毛泽东才敏感地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而不惜中苏关系的破裂。

应当指出，在主权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前后是有变化的。总的来说，建国之前尤其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外国对华投资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并不

[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3] 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

认为凡是外国资本进入就是侵犯中国经济主权。而在建国之后，事关所有权的问题，毛泽东都认为是主权范围内的，是不容外国插手的。这一认识变化，从对待资本主义立场来看，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运行机制和历史趋势并不真正了解，态度有所保留。首先，他从根本上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反动的、没落的社会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1]他认为，属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宣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其次，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作一种过渡性形态，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并把“革命”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具有双重性。

如果仅立足中国内部看问题，从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上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上看，无疑，中国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发展阶段。但是，若立足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中国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有异议了。近百年来中国遭受的正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蹂躏，而中国为摆脱在全球化的边缘地位而进行的不断抗争所遭受的失败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蓬勃兴起形成了鲜明对比，难道中国还需要一个外国已经走过的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带来痛苦的历程吗？所以，从世界视角看，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这个新路径来迎接世界全球化的挑战。正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现实落后性决定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看法的双重性，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困惑。正是这一困惑造成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态度的前后变化。而对于苏联认识的变化，具体地、历史地去看，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联合方面的要求确实有对中国进行控制的企图，我们从苏联与东欧间的关系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对这些要求进行拒绝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毛泽东不是将这些问题具体化、个案化，无形之中将主权范围扩大了，也就意味着把独立自主原则绝对化了。

在毛泽东看来，贫穷的中国需要对外开放，但前提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严。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独立自主高于一切，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他十分强调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平等开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上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外援只有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解决。如果一味依赖外援，结果只能是变成附庸，处处受人摆布，或者人家一拆台，一卡脖子，便会大难临头。只有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不怕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坚持独立自主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避免成为他国附庸的必要前提。这无疑是对的。他使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对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坚持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没有任何奴颜婢膝的表现。这对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了深远影响。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2]“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3]

但应当指出，毛泽东把独立自主原则视为最高原则，实际上存在着极端化的倾向，这直接影响到我们敞开国门、笑迎四方宾客的胸襟和胆识。自力更生无疑是毛泽东毕生的经验总结。但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了自力更生，把自力更生当作“唯一”，把争取外援为辅当成可有可无。后来发展成为“任何外国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从而把自力更生绝对化了，最终陷入“光荣孤立”的境地。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解和在实践中的运用，并非没有历史积极作用，但是，新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偏离全球化，丧失了一个发展经济的黄金时代，这一主观上的失误是不能否认的，尽管西方的仇视和苏联的大国主义意识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同时应当指出，中国在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时，过去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出发，偏重交换关系、贸易关系背后的剥削关系和不平等关系，忽视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研究问题。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历史遗产的继承，更离不开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间的相互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由未知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才能创造更加光辉璀璨的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20 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不仅不会使民族的界限很快归于泯灭，恰恰相反，它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觉醒。尽管，落后国家的发展历程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同一步调，但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国家的经济力的持续发展，都是首先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市场发展的。而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的真正形成，需要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形成和保护本民族发展的国内市场，使本国国民享有同外国竞争者同样的发展权利，而且可以为他们创造出种种向外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获得自如进出世界市场的条件与可能。

因此，从全球化视角观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应该排斥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应该放弃独立自主原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参与全球化才能获得平等的机会、发展的空间，对外开放才能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避免沦为附庸。与坚持国家主权独立一样，坚持独立自主是参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新中国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偏颇，是由于毛泽东把独立自主绝对化，过分强调主权至上性。至于独立自主原则本身，直到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放弃。

如果有人把新中国逐渐偏离全球化的主要责任归结为党和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这实际上是背离历史看问题，混淆了问题的主次原因。如前所述，尽管毛泽东对国家主权、对独立自主原则存在认识上的偏颇，但是，他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一直在努力探索利用国际条件的可能性。新中国丧失利用全球化发展经济的先机，我们既不应该因为存在西方的仇视和苏联的霸气的原因而不承认自己的

失误，也不应该因为存在自身的失误而否定历史客观原因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事实上，毛泽东的失误，如果中国百年耻辱构成其历史原因，那么西方和苏联的压力，也是其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所以，伟人的悲剧往往是历史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因为那个历史环境、那个时代背景，是塑造伟人的基本元素。

2.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一种历史分析

过去我们通常是以新中国画线，新中国以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以后就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了。尽管这中间存在一个过渡期，但它没有上升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为什么不经过资本主义，一步就跃向社会主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逻辑困境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个正确命题，但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逻辑论证，则能够进一步证明是一个科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语境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意味社会主义是旧中国从战乱、贫弱两种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选择，这就需要把新中国诞生和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相互贯联的历史事件放置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来考察，看是否只有新中国诞生才能成为结束中国四分五裂的战乱状态、实现国家长久和平统一的转折点，看是否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完成把农业文明提升为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前途，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直接来逻辑证明，显然理由不是很充分。

首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旧中国经济相当落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以此论证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据不足。其次，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来看，中国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借助一个简短的过渡期跨越到社会主义的。对此，一般论证理由是，历史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实际上，列宁这段话只能说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兼容具体社会发展

[1]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58页

过程上的特殊性、多样性，但无论如何不能因其特殊性而用来证明其符合历史一般规律，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毛泽东主要是从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上分析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的。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1]问题是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本质上属于外因，不具有内在必然规定性，作为分析问题的一个方面，既可以是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根据，也可以是历史发展道路的统一性理由，所以只能用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作为事实必然性的根据，难以作为历史决定论语境中的历史必然性的理由。

从当时社会实践上看，中国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呢？

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在毛泽东的认知框架中，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事实上的条件使然，不是历史上的客观必然。另外，毛泽东也没有超越事实框架，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是纯粹的历史必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3]这就是说，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能动作用，以及国际环境的积极影响，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才具有极大可能性。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强调："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4]这说明，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9页。

如果没有我们党和人民的主观努力，中国未来走资本主义并非不可能，而新中国未必定然诞生。胡绳也曾认为："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也是得到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同情和支持的。[1]在胡绳看来，中国走资本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选择。

既然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不是直观意义上的历史客观决定性，它包含着只有通过人民发挥能动作用才可能得到的结果。然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也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并不否定人们历史活动的能动性，认为历史发展就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一。但为什么就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直接来逻辑证明呢？

事实上，历史决定论中所强调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并不是在同一视阈中说明问题。我们审视历史的角度不同，认知的结果就不同。越是近观历史图景、详析历史进程，历史事变的偶然性、历史发展的属人性就越清晰，受人的能动性影响的滚滚历史波涛就越表现出主观选择性、运动的不确定性。相反，越是从历史长河的制高点看问题，历史事变的偶然性、历史发展的属人性就越模糊，受生产力推动的涓涓历史泉流就越显露出客观物质性、运动的规律性。恩格斯曾指出：如果画出历史曲线的中轴线，对历史"所考察的时间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2]因此，历史发展规律性着眼于历史长河，透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审视历史发展统一性、必然性，这并不排斥具体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相反，以此为表现形式。这就说明，其中的客观必然性是基于抽象的历史理性视角，而历史选择性是基于具体的实践生活视角，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是逻辑环节上的思辨认知，而不是具体的、直接的实在性关系的表征。因此，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现成的理论直接用来解读历史事件。

但是，这不等于历史规律不内在地作用于历史事件，它在历史长河每一个地方都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关键是如何透过其缤纷复杂的属人特性认识它的存

[1]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在特征和作用方式

（2）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一种深度反思

历史规律是通过偶然性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来实现自己因此，历史事件能不能把历史必然性贯彻下来，首先在于当事人、尤其是主要当事人如何能动地把握事变

有的学者指出：“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实际上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最终地决定他们如何去创造历史和创造什么样的历史。”〔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似乎并没有这样绝对地看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批判唯心史观时反对“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观点，指出：“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2〕马克思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3〕恩格斯也曾强调：“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4〕的确，从我们身上可以找出我们的孩子的某些根据，但是，仅仅从我们身上能够直接归结出我们孩子的未来吗？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就历史事件本身来说，它绝不是主客观因素中的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既不能否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的客观制约性、国内外大趋势的规定性和历史发展对烙上的人的个性痕迹的淡化与修正，我们也不该否定历史事件存在着发生的偶然性、结果的意外性和对未来社会发展影响的属人性　社会时代背景、国内外大趋势只能影响或者规定着人们能动选择中的实践必然性，而不能替代人们的能动选择行为本身，所以不能规定历史事件发展是一个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外在必然性尺度的过程，也就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来衡量

我们必须换一个思维方式来认识问题。

〔1〕张奎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转换和统一机制》，载《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在中国两千年的王朝更替史中，重大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却都没有跳出封建主义一种社会形态框架中。也就是说，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业绩不过是在同一个历史必然性规定下的历史事件，即使把它们都看成纯粹的偶然产物，也不违反历史决定论基本原则。这就意味着历史决定论语境中的历史必然性不会轨道般规定具体历史事件如何发生发展，甚至不会规定历史事件本身。作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它只为历史舞台提供了主题，至于有多少历史剧本（历史事件）以什么方式用多长时间表现主题或者最终由哪个剧本成为主题转换的标志都遵循于那个时代的实践必然性。这就是说，历史事件在历史规律面前不是单纯被动的，相反，它们在实际运动过程中却决定着历史必然性贯彻和转折基本状况——它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可以如中国把封建主义贯彻了两千多年为止，也可以如欧洲使之封建主义还没有褪净奴隶制残物就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因为决定历史规律性发展的核心动因是生产力，而生产力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引起社会发展质的飞跃，不仅在于自身进步程度，而且还在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其解放程度。显然，这会有鲜明的历史选择性特征，从而容纳不确定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件的不确定性。不过，既然历史规律提供了历史主题，使得直接支配历史事件的实践必然性不可能超越这一历史主题，"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而"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这就规定了历史事件的运动中轴，使得历史事件又具有确定性。问题是，历史规律如何赋予具有不确定性的历史事件可确定性？

要具体研究历史规律对历史事件的作用，首先要依据对社会发展影响程度分清历史事件的层次性。通常分为重大历史事件和一般历史事件，而根据对生产方式的影响程度，重大历史事件又可以分为两层：一是引起生产方式根本性变化，生产力获得历史性飞跃；二是未触及生产方式的本质问题，只是导致上层建筑发生根本性变革，生产力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得到发展。这样历史事件可分为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层：第一层历史事件，由于引起生产方式的质变，成为社会形态更替的启动器，因此，运动的过程一般曲折而长久，会夹杂着许多大小具体事件错综复杂地表现这一主旨。期间跨度如此之长，或许有一代或几代人完全生活在这种历史性的急剧变革之中，对历史进程影响如此深刻，只有从历史长河的远镜头中才能看清这一伟大的历史嬗变。西方从封建主义农耕文明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转变就属于这一层面的历史事件。不管如何界定其起点和终点，都得需要百年时间，不管从生产力革新角度还是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认识它，都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具体事件。

由于这一层面的历史事件主旨是表现生产方式的质变，与生产力直接关联，尽管在具体运动过程中会存在历史反复性、夹杂在其中的大大小小具体事件会有多种可能性，但是它最终的运动结果必然推动历史进步，没有别的可能。正如资本主义一经确立，就把生产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注定了凡是走上工业文明道路的都要比徘徊在农业文明之中的表现出非常大的历史进步性。从这一点上看，它受到历史规律的直接制约，完全意义上贯彻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同时，它一经实现历史转折，将为未来整整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奠定根基，此后发生的不管是一般事件还是次一层次的重大事件，都将围绕它所规定的中轴线影响历史具体进程，直到下一次同一层次的事件引起新的历史重大转折。秦统一六国，标志着农耕文明由青铜器时代普遍进入到铁器时代，此后逐渐确立起来的地主—农民生产模式成为两千多年历史发展基本模式，期间发生的多少历史事件、经历过多少战争与和平，都是在这一中轴的制约下影响历史进程的。

第二层面历史事件，仍然属于重大历史事件，并且关系到新旧时代的交替，因此，会有一个错综复杂的新旧势力博弈的运动过程，往往也要通过系列一般历史事件演变后才有一个最终结果。这一层面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也会延续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对社会的影响是浅明的，所有经历其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给社会状况带来的转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历史中，任何统一大帝国的崩溃都意味着会有一个残酷的动荡历史时期，直至新王朝建国，这个过程就属于典型的第二层面历史事件的表现过程。

这一层面历史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局限于对生产方式调整而不是改变上，从而只影响到生产力的量变问题，不会改变第一层面历史事件造成的基本生产方式发展平台，与生产力直接关联度较低，因此，运动结果基本取向是带来生产力的解放还是造成经济发展波动徘徊都是有可能的，是不确定的。而唯一确定

性则是它最终造成的新时代不可能导致生产力沿着倒退的方向走下去。在世界史上都有较野蛮民族征服较文明民族的事例，最终结果就是如果不武力消灭被征服民族就会被它进步的生产方式同化，否则，必然会激起被征服民族持续不断的反抗而使这一层面历史事件继续下去。中国的元朝和清朝就属于类似的情况，它们都被迫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统治方式，才最终开辟了中国历史一个新时代。

第三层面历史事件，作为个性化的具体历史事件，是当事人直接表演的舞台，因此具有鲜明的属人性，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发展结果表现出多种不确定性、不可捉摸性。由于历史就在这一层面的事件中缓缓展开，因此，是我们认识历史演变最直接考察的对象。这是历史非决定论的例证源泉，也是历史决定论很难作出合理解释的脆弱之处。之所以马克思主义只能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辩证统一关系，就是因为充满主体选择性意味的第三层面历史事件难以直接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作出合理解释。它们的演变往往是偶然的、结局是意外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对它们的认识不可能不考察主要当事人主观特征。对此，传统苏联历史决定论者，如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直观地把社会物质、文化环境对事件当事人的制约作为历史规律发挥作用的理由，也就是"时势造英雄"，但他们完全解释不了的是悖逆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出现的，例如，希特勒在德国崛起、张勋在中国复辟等，若把它们解释为社会条件客观上需要这样一个插曲来表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显然是荒谬的。

尽管我们的生活会直接受到第三层面历史事件不确定性后果的影响，尽管第三层面历史事件会造成历史发展表现出波动曲折性，但是，它们局限在第一、二层面历史事件造成的社会发展大趋势中，对历史进程的深度影响力是有限的，不会改变历史运动基本方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三个层面历史事件不是天然固定的。所有历史事件发生时首先都属于第三层面，也就是充满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各种具体历史事件。它们自身的发展虽然不确定，但如果它们囿于第三层面，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完全制约于前期已经发生的第二层面、第一层面历史事件造成的社会发展基调，这是确定的。不过，它们有"机会"升格为新的第二层面、第一层面，从而可以深度改变历史进程，这既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否已经为生产方式重大变迁酝酿出成熟的客观态势，还取决于主要当事人如何能动把握事件的演变并成功地贯彻

这种客观态势。这就意味着一个历史事件对历史进程最终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层次上表现历史规律，主动权首先掌握在当事人手里。同时，也意味着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取决于历史事件对于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作用，而且还取决于对后来社会历史进程的长远影响效果。因为虽然在社会发展实际过程中，历史后期总是以相关联的前期状况为发展基础，但是，一个历史事件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对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性，若没有开辟新时代就意味着旧时代仍要延续下去，而历史事件本身也就等于没有把历史必然性彻底贯彻下来

所以，历史规律只规定了历史主题（社会发展的客观态势）必然要由历史事件表现出来，但是具体由哪个历史事件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拥有这份荣誉是不确定的　因此，历史规律语境中的历史必然性如何实现自己是通过偶然性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历史事件的偶然性　这就说明，历史事件受到当事人主观能动性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属人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客观存在丝毫不矛盾，而且后者正是借助前者的能动性贯彻表现出来。

总之，正是由于第一层面历史事件对生产力发展的确定性，可以解释人类历史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是由于第二层面历史事件对生产力发展的选择性，可以解释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历史发展的方式和速度是多种多样的；正是由于第三层面历史事件对生产力影响的复杂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历史演进暂时停滞、甚至倒退现象。而历史规律就是这样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制约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

（3）关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历史规律会赋予反映那个时代主题每一个具有进步性的历史事件贯彻历史必然性的机会，关键是哪一个历史事件当事人有能力把握住这个机会

如果把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事件放置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上，那么它是否必然成为第二层面历史事件，就要看它能否决定性地结束一个旧时代实现一个新时代，也就是成为结束中国四分五裂的战乱状态、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转折点；而它是否必然成为第一层面历史事件，就要看它能否在确定下来的新时代里持续完成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质的飞跃，也就是成为完成把农业文明提升为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的序幕　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

幕"[1]否则，它就和1928年蒋介石名义上完成中国统一这一普通历史事件没有多大差别，历史主题还要借助别一历史事件表现自己

考察这一问题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历史规律是否提供了历史嬗变的主题，也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是不是具备了伟大历史转变的条件；二是新中国诞生是不是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主题表演出来并贯彻下去　这就要求不仅分析新中国诞生前的社会状况，还要关注新中国诞生后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影响乃至未来可能的影响

首先从新中国诞生以前的视角来看，当时历史发展已经到了这一步，不仅存在着新旧时代交替的客观社会环境，而且生产力发展已经积累到需要生产方式作出彻底调整的历史转折期

树欲静而风不止，衰败的清王朝想通过闭关锁国方式努力维持僵化停滞的社会现状，却被不期而遇的鸦片战争带进了战乱不休的历史时期　当清朝做了几次挣扎无力摆脱愈演愈烈的内外战乱和革新风暴的时候，国家走向一个全新的和平统一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第二层面历史事件出现成为历史必然　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

当然，如果仅从这一方面看问题，历史规律只确定了一种不可能性：假如不能阻止新的封建王朝的循环更替，历史绝对不能退着走　但是，清朝末年的生产力积累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已经注定继续两千年来的封建王朝循环是不可能的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3]　恩格斯在1894年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　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　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4]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已经开始呼唤第一层面的历史事件发生　问题是，在这样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页

伟大的历史转折期，曾经发生那么多的历史事件，谁有机会赢得这一标志呢？

历史规律会赋予当时每一个具有进步性的历史事件贯彻历史主题的机会，关键是哪一个历史事件当事人有能力把握住这个机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先后登场，如果用“如果”来设定这些历史事件可能发生的别样结局，在理论上没有理由说它们必然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确，如果没有天京事变，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不是可能把太平天国带进资本主义时代呢？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新兴的洋务派会不会催生出一个勇于革新的清王朝呢？为什么相对较早的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而中国变法维新就注定会失败？辛亥革命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难道都是不可避免的吗？不管哪一个历史事件获得成功，中国近现代史都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并以一种新的路径演进开来。这一切都不该以既成的事实为根据宿命论地强调它们失败是历史规律客观规定的结果，因为在逻辑上这虽然可以反证出新中国诞生是历史规律客观使然，但却由于强调这一点而把历史伟人的能动作用悬置起来。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历史主题，这就是历史规律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客观规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客观条件是催生这些历史事件的客观动因，但是却不能由此轨道般规定它们的运动结果。事件当事人所有的行为选择（包括像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些逆历史潮流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基于那个时代主题，但如何贯彻那个时代主题就不是历史规律所能决定的了。正如无论从基因上还是从成长环境上，我们的孩子都会受到我们的客观影响从而不可避免地带上我们的气息，但这一切都不能作为他未来是否有出息的根据，最终还是取决于他对我们的期望的主观贯彻程度。

不过，经过曲折演进，历史最终把这一伟大责任置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之间的博弈中。

胡绳曾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五四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前途了。尽管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制，资本主义仍旧是中国当时条件下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并且是受到足以影响国共两党命运的广大中间势力的欢迎的。不仅如此，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也并不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了。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阶段，搞了“双十协定”和政协五项决议，共产党是准备付诸于实践的，当时在内部就明确讲过以后要准备用选票代替子弹了。“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

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在胡先生看来，两党博弈，并不是共产党先验性地注定胜利，这里存在很大变数。

我们往往把蒋介石失败归结为阶级局限性注定使然而把共产党的胜利归结为阶级进步性的历史规定，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因为阶级特性确定的是处于矛盾斗争反动方从维护自身阶级利益出发不可能采取正确的解决历史事件之道，但却不能保证处于矛盾斗争正义方定然采取正确的解决历史事件之道。蒋介石每一个重大战略选择都打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烙印，这必然注定他不可能看到解决广大农民土地问题居然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胜利之道。但是，谁又能确定中国共产党就定然领悟到这一革命真理呢？毛泽东率先发现这一真理有其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而中国共产党接受并付诸实践也需要主观选择性。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立场只不过为其接受这一选择提供了可行性平台，但却不能保证注定会做出这一正确选择。事实上，我们党曾经几次陷入到错误思想的指导困境中，其中，没有哪一次危机不是致命的，没有哪一次转败为胜不是党和人民主观努力的结果。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2]胡绳也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会失败，正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太过密切的联系，它只能在基本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不起来。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则恰恰是因为它坚持彻底反帝反封建，推倒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座大山，毛泽东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的中间势力。[3]

总之，历史规律只规定了近代中国定然要有一个历史事件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但是却不会注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来实现这一历史性标志。但是，鸦片战争后的其他具有进步性的历史事件先后失败了，使这一历史使命落到中国共产党肩上。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承担起来，历史发展还会出现其他

[1]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15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页。
[3]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34 页，第 45 页。

可能性。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理想鼓舞下，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和平统一新局面，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历史规律客观规定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旧中国的救世主，而是党和人民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成功地把历史必然性贯彻下来，而其他旗帜却在中途倒下了。

3.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全球化视角分析

（1）十月革命：开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历史

全球化时代开始产生质的变化，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历史，即"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历史。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社会，俄国社会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理论设想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多的不同之处。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运动较之以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有不同的特点。后者是建立在资本为动力的经济扩展运动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是一种感召力。对落后社会来讲，苏联是振兴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好榜样。对苏联的学习仿效，即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是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的。

如果说，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是由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而开启的，那么，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开启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一面——多极化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多极化的不断兴起，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当落后的边缘国家对它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企图找到一种向心力的框架，他们找到了社会主义的框架，用以平衡全球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感召力在于它的人道主义诉求：社会主义试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反对一切压迫和不平等，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民主的新社会。"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消灭阶级剥削和各种各样的差别、歧视、压迫，实现不同层次、领域中不同主体间的平等是对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纠正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清肃。它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提供了思想斗争的武器，并且在一些国家完成了从思想、价值观念向制度实现的转变。"[1]布热津斯基也承认："共产主义对于头

[1] 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

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一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一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1]社会主义者更加坚信，如果听任资本主义发展下去，“它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上是严重分裂的，而且，从长远看，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2]法国学者登霍夫也认为：“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挽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不可想象。”[3]

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对全球化的参与，使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到限制。从制度层面来看，全球化不再是资本主义一维的全球化，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和竞争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吸纳。就连教皇保罗二世也认为，当时“欧洲面临的许多社会或人道问题的部分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退化表现”，而“共产主义在本世纪的成功是对某种野蛮资本主义的反抗。”[4]前法国计划总署署长米歇尔·阿尔贝尔也承认：“如果资本主义有进展，那也是在其对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和政治压力下出现的某种倒退。”[5]

总之，20世纪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的确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飞跃，它极大地冲击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最初解构。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由于落后而产生变异是世界历史上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即当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并将被新社会制度淘汰之际，率先发生的转变，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块的社会，而是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动荡恰恰在外缘地区方兴未艾，而中心地区却仍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的突破中开始的。从全球化的视角看，我们不把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看作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孤零零的事件，而是把它们纳入到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导引的整个世界体系中来予以历史的考察。以研究第三世界发

[1]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3] 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 《教皇谈资本主义和教会》，《解放报》1993年11月2日。
[5] 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展问题而闻名于世的弗兰克曾经指出："不发达并不是由孤立于世界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1]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崛起的确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脱资本主义全球化、拟社会主义全球化"规律的体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围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极大地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开辟了非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道路、新路径，试图在非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现代化，以抵御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体现。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拟社会主义全球化的一种主动尝试。[2]就像阿瑞夫·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和北美，但它同绝大多数亚洲社会和非洲社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南美社会）一道经历了历史及其动力——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本国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异国霸权的产物。当中国历史和全球历史结合为一体时，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环境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而且也是一种要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选择，一种让第三世界社会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进入全球历史的选择。"[3]

（2）毛泽东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全球化

全球化时代开始产生质的变化，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此之前，世界历史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世界的征服史，也是资本主义观念与价值对世界的征服史。虽然资本主义远未实现全球化，但整个这一时期，全球性无疑是一元性的，即西方性。十月革命创立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没有形成新的一元化，虽然它在理论和实践中努力向一元化的方向努力。苏维埃俄国积极推动新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运动。列宁建立共产国际旨在组成"世界共产党"，协调指挥共产主义力量进行"世界革命"，以便在同世界资本主义"决战"中取胜。列宁不仅重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样重视引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民族运动，因

[1] 参见弗兰克：《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2]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认知中，资本主义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但从现在的视角看，它并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走向了尽头。
[3] 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转引自萧延中：《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为这种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与无产阶级同一阵营的重要力量。因此，列宁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关于列强本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理论帮助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帝国主义理论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主义全球化成绩不小，二战后更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东欧、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在内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新全球化运动分裂了资本主义的一元世界，对资本主义在价值与实践两个方面提出重大挑战。毛泽东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分析等全球化基本思想，正是在这个时代条件下形成的。

如果说，我们党拒绝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帝国主义的仇共和中国百年的半殖民地历史耻辱有关，那么，选择社会主义，确定"一边倒"外交方针，应该说，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判断有关。从全球化视角看，这里面也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尝试。一方面，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未来前途的判断，直接影响到他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视角分析，也反映出新中国拒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

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对世界的掠夺和控制，落后国家想通过资本主义化来实现本社会富强进步已经成为不可能。[1]

第一，帝国主义时期资本全球化是对世界的掠夺和控制。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全球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显现出资本的侵略和掠夺的本性，而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全球化已经成为持久的控制性的掠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两个后果，一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通过榨取掠夺和压迫控制，造成其贫穷和落后；二是对宗主国，通过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霸占殖民地的市场，造成其更为富裕和发达。二战之后，旧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新兴民族国家逐步产生，资本全球扩张也开始改变那种殖民化时期赤裸裸的剥削和控制。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变化了形式，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质。周恩来建国后对美国"世界主义"进行批判，很好地概括

[1] 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分析可参见徐艳玲等著：《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全球化》，大连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章。

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形式下的资本全球化的性质认识的坚定："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1]

第二，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无论哪个帝国主义、也无论其表现形式怎样，本质都是侵略和掠夺，认为存在"好的"帝国，可以依靠其帮助殖民地社会的独立，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提出应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自决权，因此得到当时相当多中国人的好感，认为美国不同于其他在华列强，当时身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有过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的著名感言。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近代中国人对在华列强本质的认识，在下层是民族主义主导，相当多的下层民众从感性出发盲目排外；在中间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占主流，他们虽然痛恨列强对中国的蹂躏，但一般不愿触及反帝问题，他们担心民众的反抗会引发列强干涉导致民族灾难。这就出现以往无论"反动派与革命派"都争相"尊重条约权利"，不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情形。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认为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因此总是把"澄清内政"、"变法自强"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甚至努力争取列强支持中国变革。远东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与激进民主主义没有太大分别：既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对在华列强本质看法含混。但莫斯科远东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完全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贫穷和落后的根源，只有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脱离对帝国主义的依附获得民族独立，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才有可能获得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远东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帝国主义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仅日本的扩张是中国的"绝大的危险"，而且美国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接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朋友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第三，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想通过资本主义化来实现本社会富强进步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落后国家还有通过资本主义化而振

[1]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1 页。

兴民族的希望的话，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希望已经不存在了 帝国主义不允许落后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对资本帝国是最有利的 因此，帝国主义总是同落后民族中最反动的力量勾结起来，反对殖民地社会的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具体到中国，按毛泽东的话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近代贫穷和落后的最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首先的原因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1]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而言，同国际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国家自强的唯一出路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阵双方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发展 造成这种形势判断的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毛泽东主观判断上的偏差 实际上，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发言人的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盲目乐观的估计，直接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两种制度斗争形势的认识 毛泽东和我们党的认识也必然受到影响

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存在 首先帝国主义的本性是霸权，其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使后起帝国主义强国必然为分割到更多的殖民地谋求更大范围的霸权而发起战争 关于世界战争原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也直接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建国之后，也仍然坚持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毛泽东坚信未来战争必然以帝国主义失败告终，这反映在他一个有名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一篇讲话的语录中得到全面阐释："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 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 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 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2]毛泽东在二战后既没有听信斯大林要中共不与蒋打内战的告诫，也没有理会美国有可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能直接出兵干涉的威胁，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当时，我们把一支强大的军队摆在沿海地区，就是为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作准备。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差不多主要靠一国之力打胜了这场战争。这些都印证了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蔑视，对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的预测。

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是导致人民革命并最终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发展。毛泽东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战争。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因为战争会带来眼前的灾难。但同时帝国主义战争是人民革命的良好契机，从长远看，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必定是对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有利的，对这一点毛泽东的信心从未动摇。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在战争方面的观点开始产生变化，认为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结果不再具有意识形态胜负的意义，因为核战争的结果是战争双方的共同失败。毛泽东反对这种观点，中苏论战中中方反击苏共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国家希望核冲突，然而，一旦帝国主义挑起核冲突，“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1]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美好的将来。毛泽东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东欧和中国一片社会主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失败和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2]

由此，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毛泽东坚定社会主义立场，不允许中国搞资本主义制度、绝不苟求乞颜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认识世界时代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界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参照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所写的论文《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中所阐述的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思想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及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曾对时代问题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

[1] 转引自哈利什·卡普尔：《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2页。

[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件大事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时代，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已告终结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从此开始了。新的世界革命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是这个革命的同盟军。因此，“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判断，毛泽东心目中的新中国应该是直接搞社会主义，而不必把一个已经落伍的资本主义制度搬到中国来作尝试。由此观之，新中国确立了“一边倒”外交方针，主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从国际角度看，应该与时代变迁有密切联系。既然新中国不可能钻进资本主义全球化，那么，融入社会主义全球化中，就是一个必然选择。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没有完全按着毛泽东预见的那样发展，中苏矛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现裂痕，60年代中前期急剧尖锐并公开化。这造成中国同时受到美苏夹击的国际态势，我国周边环境日益复杂，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时毛泽东对时代的认识也发生变化，对社会主义短暂时期内实现全球发展不再抱有巨大信心，他开始放弃意识形态划线的方法，转而将改变现实全球秩序的希望诉诸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不再谈社会主义的战胜，而着重于强调被压迫社会的民族意识觉醒，支持他们对“资本帝国主义”以及“社会帝国主义”的反抗。应该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并不彻底，新形势下，他仍然坚持整个时代处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总体判断。只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不再是短期的事情。毛泽东全球化视角开始转向第三世界，并以此为立足点，探索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应该说，尝试以苏联为核心建立社会主义全球化并未成功。毛泽东另辟蹊径，希望把中国社会主义与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甚至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融进除美国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辟一种新全球化模式，就是一个可能性选择。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如果我们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倡导新的全球化，在最初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后则主要是反对旧的国际秩序，争取经济落后国家的国际平等地位。此时社会主义全球化仍然是毛泽东的终极追求，但已经不再是近在眼前的事了。从毛泽东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新全球化不是如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样的经济扩张和一体化为基础的过程，而是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制度的全球扩张，其中并不包括经济方面的全球融合和一体化。毛泽东理想中的新全球性，应该是价值与目标相一致的独立自主国家的和平共处。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的主权完整与独立，它不否定国际间的兄弟般支持，但原则是互相帮助而不相互依赖。毛泽东倡导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即大国对弱小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行国际援助，这种援助绝不附以任何政治和经济的附加条件和要求。这是与资本主义大国侵略与掠夺的帝国主义品性根本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理想品格。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同美国、同西方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中美战略默契、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态势。然而，毛泽东并未因此放弃社会主义信念。他站在维护民族安全立场上，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抗苏联的威胁，却时刻没有放松对美国搞"和平演变"图谋的警惕。尽管如此，今天看来，毛泽东的"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主义全球化理想虽然还是遥远的未来，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

第二节　十年探索：追寻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梦想

新中国确定"一边倒"外交方针，意味着坚定社会主义原则，从根本上不惜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尽管我们党也曾努力在具体经济发展方面接触西方，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新中国没有向西方妥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最初确定"一边倒"外交方针并不意味着后来在实践中一定把独立自主原则绝对化，走"光荣孤立"之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曾一直追寻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梦想。如果说，搞"大跃进"是为了追英赶美，为了在两个全球化竞赛中占上风，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防止中国出现"和平演变"。

1. 确定“一边倒”外交方针：参与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尝试

新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千万志士仁人流血牺牲所追求的既定目标。但从国际视角来看，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密切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决策“一边倒”方针，这成为整个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方针。“一边倒”方针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作出的。美国操纵下形成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造成了中国对美国实施敌对政策的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存在，使得我们不可能做出骑墙的选择。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1]

“一边倒”的方针不仅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现实主义思考的产物。在“一边倒”方针决定之前，毛泽东并非没有考虑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物质支持。但美国政府内部支持蒋介石一派始终占上风，我们党的合作意愿被拒绝。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积极援蒋公开反共，我们党也对美国政策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提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在准备新的战争，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2]但即使如此，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仍然表达了在美国弃蒋的先决条件下，新中国愿与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意向。最终，新中国没有采取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决定完全倒向苏联一边，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一边倒”的选择最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中国基础过于落后，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新中国要巩固和发展都需要有大国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的支持和帮助。苏联与中共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立场，革命时期曾长期为中国革命提供物质支持。毛泽东从未怀疑新中国必须与苏联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问题是能否同时形成不与美国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做过尝试，但他的结论是，新中国如果采取一方面与苏联加深关系，一方面又与美国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那么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将会是苏联对中国存有戒心，援助不大，并将继续保持在东北、新疆的特权；而美国仍不会支持和援助中国，除非新中国接受其附加条件。因而这种外交上的中立政策，实际上只能是被孤立，是“对民族是不利的”[1]。基于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坚定地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政策，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做出“一边倒”的决策，应该说，还基于以下思考：他认为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保障中国的国防，同时可以获得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支持。之后，中国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表提前，原来打算至少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15年后再行改造，但随后毛泽东却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建立不到三年的1952年夏提出改造方针。我们通常用国内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阐述社会主义改造发生的客观性，但要说得通十分困难。事实上加快进入社会主义，是进一步的“一边倒”，是毛泽东基于对全球局势考察而做出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最符合民族利益、最利于中国发展的主动选择。虽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将“一边倒”与独立自主作为政治路线和民族立场两个问题提出，但事实上，二者统一于民族立场。“一边倒”定位为政治路线，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它对中国民族振兴起着全面的、重大的作用。加入社会主义的全球进程与民族的独立与振兴并行不悖，更准确地说，民族独立与振兴通过加入社会主义全球化进程而得以促进并实现。中国也确实由于加入社会主义全球化进程而获益匪浅。新中国确立“一边倒”外交方针，坚持列入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和中国建交，确立了经贸关系。中国由此也走上了特殊的全球化进程——社会主义全球化进程。

毛泽东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曾引起国内部分民主党派对新中国外交独立性的担忧，西方国家在与新中国外交接触中也有种种疑虑。对“一边倒”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与独立自主外交的关系，毛泽东有清晰的认识。1949年，民主人士陈铭枢曾一度负责与司徒雷登的接触，这时毛泽东已经公开确立“一边倒”方针。7月，毛泽东、周恩来接见陈铭枢，对“一边倒”政策做了说明。根据他们的指示，陈铭枢在提交司徒雷登的备忘录中对“一边倒”方针做了解释：“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绝不可能有依赖别人的问题。在当时，毛泽东将“一边倒”方针和独立自主分别作为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和民族立场，认为二者是不容混淆的。他解释说，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但又彼此不同[1]。中国共产党表明的态度是，决不会因政治路线而牺牲民族立场。如果我们回顾“一边倒”方针的确立则会注意到，在相当程度上，这条“政治路线”的确定不仅不牺牲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立场，反而是以服务民族立场为前提得以确立的。

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之前，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1949年春提出来的。同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1949年1、2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3]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

---

[1] 参见王俊彦：《开国外交》，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这两个方针都反映出我们党坚决从维护国家独立、主权根本利益出发来参与全球化进程，来搞现代化建设。

当然“一边倒”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政治上，由于明确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对外关系上就不可能不受该阵营的制约，所以在独立自主的行动上多少受到限制。在经济建设上，由于缺乏领导现代化生产的经验，也不得不主要依靠苏联的经验，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反映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上，在计划经济方面，基本上也还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从而导致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某些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稳定推进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总之，“一边倒”的模式在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在外交、外贸、经济、政治上倚重苏联的状况，苏联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基本样板。尽管后来我们党提出以苏为戒，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但是这个样板的基调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始终没有改变。

一年之后发生的美国入侵朝鲜，出兵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拼凑东南亚条约等等事实证明，毛泽东所作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它对新中国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赢得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获得苏联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援助，以及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开始步入国际舞台，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2. 社会主义改造：全球化面前的“焦虑症”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革命的收关之笔，是整个中国革命所要的最后的收获。“一化三改”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化的巨大进步，而且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然而，杰作未必没有遗憾之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急躁冒进的错误留下了一点不能修饰掉的败笔。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解放战争还在继续，解放区的土改工作还没有展开，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7页。

国家纷乱初定、百废待兴，而且很快就卷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经历一段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时期是必要的。但是，恢复时期结束之后应该如何，我们党的政策是有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不仅使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而且加快了，最终出现急躁冒进、简单粗糙的错误。如果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世界形势认识角度来寻找原因，那么，对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失误的评价就应该多一层意蕴。

（1）改造进度表的双重嬗变

按着毛泽东原来的构想，基本上要在建国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也就是说，至少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过当时我们党还没有考虑到改造本身的时间问题，在认识中，一般是“一步到位”的质变的改造过程。这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新中国时期制定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1]在此之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在多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估计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年或二十年。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指出：“那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这样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2]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又提出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完成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立即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间预计是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过渡就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3]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指出，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为毛泽东提出这种新的构想，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4]但是，由于三年奋斗使我国整个形势发生

[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
[2]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3] 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4]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深刻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使得改造的步骤明显提前了 关键问题是，伴随着改造步骤提前，改造步骤也逐渐加快了，结果，这双重嬗变就使得新中国没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就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很多问题也就凸显出来

这首先应该归因于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社会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这段时间，我们党的认识基本是肯定的，但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观念首先发生了转变 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 这就从原则上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只能算作过渡时期 从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经他（指毛泽东，编者注）这一指点，大家都重新进行思索，觉得基本事实确实是这样，于是都心悦诚服地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再坚持原来那种设想和说法了，即'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1]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判断，我们党在历史上是肯定的 但是，它直接导致另一个判断：既然不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独立阶段发展，那么，加快改造就是功绩表现，而不是错误表现 因为没有谁不会认为分娩过程越短越好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改变原来的设想，通过把"过渡时期"做历史性延伸，就等于相对缩短了改造的时间表 毛泽东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社会背景来看，是由于加快工业化建设需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但与他对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的认识关联密切

在毛泽东早期全球化视角看来，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和较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迟早要卷入进来 因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之间，建立纯粹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只能"一边倒"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苏之间的斗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战时的合作已经被火药味十足的对立冲突所替代 两大阵营的分割、分立已经十分清晰，这种分割分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这个时期的国家对外政策，不再是个别国家的政治决策，而带有清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晰的意识形态集团集体行为色彩；经济上，战后援助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国家还建立了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两大分割市场体系业已形成等等。面对如此局势，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只能在两大阵营之间作出选择，"骑墙"是不行的。所以，中国要么选择资本主义，要么选择社会主义。

基于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性质就是新资本主义，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就是走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谈话得到印证。1966年12月，毛泽东曾有一些谈话，其中谈到过解放初期共产党内在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存有分歧。他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还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题。"[1]不言而喻，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指走一段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建国初期在我们党内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歧，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

毛泽东这种判断影响到对充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意义的认识。他把政治路线问题与发展经济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旦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遇到矛盾、困难，就不是从经济视角看问题、解决问题，而是提升到政治立场来认识问题，这往往导致定性升级，出现政治高压。这种政治高压不仅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也体现在对小农经济的私有制改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改造办法，但是资产阶级私有制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轻松愉快地欢迎这次运动。他们接受改造尽管是自主做出的选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形势使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描述道：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为形势所迫，又于心不甘。由于我们党给他们

[1] 转引自王年：《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63页

充分的利益保障和政治出路，所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或者随大流的。[1]

而在改造后期，对小农经济私有制改造，政治压力起到很大作用，原因是对个体农业改造不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顺利。小农经济的多样性、分散性和自发性决定了对合作化运动有一个缓慢接受的过程，而我们党没有给足这个时间。

早在1953年春，针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就曾经明确指出："这个过渡（所指过渡时期总路线，作者注）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加快过渡的问题。既然如此，私有财产就不能再'确保'，不但不能'确保'，而且还要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对私有制的改造……现在既然明确提出了完成农业集体化的时间进度，就有必要考虑如何加快改造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问题。"[2]此时，毛泽东已经把改造小农经济私有性与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追求政治利益成为改造小农经济、完成农业集体化一个重要目标。当年，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谈话中，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3]"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4]毛泽东对小农经济性质认识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党对小农经济改造的进程。1955年10月4日至11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少奇、邓子恢、杜润生等对改造小农经济持谨慎态度的党的领导同志都被迫作了检讨，全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报告。报告确认：在新的革命阶段的农村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斗争的内容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解决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党曾一度认为"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显然，在报告中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带有封建小私有制性质的小农经济错误上升为两条政治道路斗争，在合作化运动中改造小农经济实际上变为和对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样

[1]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2] 转引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302页。

消灭小农经济，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要“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现在农村中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即将在全国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2]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指导原则上出现激进，急躁冒进的现象便难以避免了。

在改造后期，我们党为什么不能给足时间让农民缓慢接受合作化运动呢？从历史史实来看，这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有关联。合作化运动初期，我们党以刘少奇、薄一波等为代表对改造小农经济私有性持谨慎的、稳健态度。1952年7月25日华北局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认为目前的互助组织是以个体劳动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自愿两利的集体劳动组织，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直接发展到集体农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无法克服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但是，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提出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以及毛泽东对改造小农经济发展速度在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我们党开始把小农经济作为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直接对立物而紧密联系起来。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指出：“现在在供销方面所表现的紧张性，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3]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否则，允许个体农业存在，允许自由市场存在，粮食统购统销就没有稳定的粮源供给，自然很难贯彻实施。

党为什么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显然是由于粮食供给遇到困难，已经无法通过市场买卖满足社会需求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不是粮食生产上不去，而

〔1〕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是社会需求突然增大的结果。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0%以上，是土改后的大丰收年，但粮食供求关系未见缓和反而呈加剧趋势。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使销量大幅度增加；二是农民自己消费粮食增加了。如果说，农民自己消费粮食增加是由于土改后农民生活追求的水平提高了，那么，为什么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了呢？薄一波指出，是由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造成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迅速增加。这就是说，与工业化有关联。[1]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在"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展开的，因此，"三改"主要围绕"一化"需要——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需要进行的。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直接影响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党在1953年通过的另一份文件中也指出："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2]。1955年10月，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陈伯达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孤立地去进行的，因此，必须采取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我们不能够把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而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如果不争取五亿多的农业人口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不能够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3]

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如果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迅速增加，而农村粮食产量不减少，在总人口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粮食供求不会有问题。单纯的工业化不应该给粮食供求关系带来影响。在这里，之所以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党在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发展工业，靠农业支撑就是唯一选择。这就出现了农产品剪刀差。政府不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地投入到工业基本建设上，工人工资就会受到影响，而为了保障工人生活需要，就不得不压低粮食出售价格，从而不能随意抬高粮食收购价格。土改后的农民生活趋于稳定，对生活的要求提高，如果粮价上不来，就甘愿自己消费而不想卖粮了。而且国家要通过出口一定的粮食来换取基建物资，这样，就出现粮食供给紧张的局面，最终不得不实行统购统销的办法来支持工业建设。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257页。
[2]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312页。
[3] 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经济研究》1955年第5期。

那么，为什么在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下，我们党要靠牺牲农业急切地搞工业化呢？应该说，这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关注与把握有关联。

我们在建设条件相当简陋的情况下，想在苏联有限的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体系建设的。迅速实现工业化，走经济独立自主道路，应该说是经过100年被动挨打之后广大人民期盼国家独立富强的共同心声。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际形势严重性的估计，认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列举了5条理由说明适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性，其中第五条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战争的威胁并未消失。特别是国际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不能排除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而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参战国都有个恢复元气、发展经济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范围的工业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的矛盾日益加剧，短期内难以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我们必须争取有利时机，加快工业化的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国防，防患未然。”[1]

而在工业化建设中，我们几乎白手起家，但是，却优先发展投资量大、周期长的重工业。一般的解释是由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实现经济独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为发展轻工业、农业提供机器等设施。这是独立自主发展工业化的必要举措。这是从国内视角看问题。如果立足世界，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原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想通过迅速发展重工业，为发展军事工业创造条件，以防备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因为当时唯一的红色政权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新中国具有类似的国际环境，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美国拼凑的环太平洋战略同盟对中国构成包围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构成一个链条，对新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威慑。国民党退守台湾，“光复大陆”的图谋一直萦绕在蒋介石心中。而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的判断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未来世界大战，我们不仅要抵御住帝国主义的侵略，像朝鲜战场那样，而且还要战胜它们，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胜利。因此，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军工业生产，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了。薄一波指出：“当时美帝国主义实际上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亟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量……因此，‘一五’计划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1]

经过这样的逻辑推导，不难看出，毛泽东全球化视角影响到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把握，从而影响到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判断。在毛泽东心目中，两个全球化正在形成——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侧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正在冉冉升起。旧中国曾经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侵蚀和蹂躏，新中国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可怀疑，而且是不能迟疑的。所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程应该加快，而且越快越好，越快我们就能够获得主动，避免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失去机会。正是如此，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才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并且一再加快，进度表经历了两次嬗变，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了客观情况的要求，造成了很多问题。由于最后的胜利把这些问题掩盖起来，这里出现的“左”倾思想就为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其实，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原因外，另一重要的原因便是当时世界已处在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新时代。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全面开展，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人和物的潜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能够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后，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同时并举以及其他的方针、政策，几乎都体现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追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这一优越的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那么，在毛泽东的思维逻辑中，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无疑就是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正确选择。当然，也是由于毛泽东对两种制度共存与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发展前景的乐观估计，使得我们党最终改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间表，造成对社会主义改造粗糙、简单的弊端。总之，由于毛泽东过分注重国际形势的战争威胁，乐观估计帝国主义的危机，表现出对两种社会制度主导全球化斗争的“焦虑”，使得他在社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忽略了中国国情的客观制约因素，导致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3. 大跃进："赶超"战略的陷阱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跃进"运动公正地作出如下评价："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这是从国内视角来分析"大跃进"起因的 但若放置到全球化背景下予以考察，毛泽东和一些共产党的"骄傲自满、急于求成"情绪就还有另外的缘由

(1) 毛泽东决意发动"大跃进"的逻辑困惑

从实践上看，毛泽东如此热衷于"大跃进"的火热与壮观、甚至对很多方面明显的错误做法宽容放纵，是不是说明毛泽东不懂得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呢？如果我们研究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就会发现，其实他对这两个方面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冷静的 但是，他的理论认识与他的实践活动结果是矛盾的，这给历史研究留下一个很大的困惑，人们一直试图从多个角度给予解读

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相反，"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

---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大声疾呼：在中国，“如果没有广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曾作过多次论述。他指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有两条优点：一是中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压，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二是中国的革命是后进的，到1949年才取得革命胜利，比苏联十月革命晚了30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骄傲。在毛泽东看来，不骄傲，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点。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后来，他又明确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2]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国国情曾经有过清醒的认识。立足于“‘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这一考虑问题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社会主义需要长期奋斗的思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3]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要使全部干部和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4]

但是，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呢？显然，“大跃进”与这些理念背道而驰。一般认为是毛泽东在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面前骄傲起来，“左”倾思想严重，急于求成思想膨胀的结果。这一主观原因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它的不足之处就是毛泽东个人的骄傲与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薄弱的现实基础的认识是对立的，前者能否成为超越后者的理由有待证明。更重要的是，历史成就可以产生骄傲，但骄傲的结果为什么是要发动“大跃进”而不是“改革开放”？而“大跃进”为什么片面强调发展钢铁业而不是“全面开花、处处结果”？而面对1959年经济困境，毛泽东经过深刻反思后，为什么还要沿着“左”倾方

〔1〕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9页。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96页。

向发展下去呢？

在"大跃进"探索出现失误后，毛泽东总结说："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说明，毛泽东已从国情这一逻辑起点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结合上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没有在根本上吸取"大跃进"失败教训后把这些正确的观点坚持下去。

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一样出现反复和中断。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给经济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毛泽东在进行反思时，进一步研究中国国情，并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了大量的批注、笔记，并发表了大量的讲话，集中地表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见解。他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3]"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4]

毛泽东这些认识对"大跃进"以后实行经济调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些认识成果彻底地贯彻到实践中，对周恩来等人的经济调整工作也是既欢迎支持又有所限制。究其原因，应该是毛泽东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认识还局限在"资本主义法权"的定性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1999年版，第302页。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1999年版，第109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439页。
[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607、611页。

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并由此来解释“大跃进”合理性。1959年底到1960年初历时两个月，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深入分析原因，毛泽东之所以对商品经济、对价值规律既爱又恨，应与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偏差有关。在大跃进时代经常引证的理论和通俗文献莫过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著名的话了，在那段话里，马克思对未来作了极为罕见的一瞥，把共产主义社会看成这样一种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这种牧歌式的、田园诗式的共产主义憧憬同毛泽东当时的如下期待是完全一致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将很快造成一个“每个人同时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任何人都可以是哲学家、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的社会。实际上毛泽东只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的状况描写，没有认识到或者忽略了共产主义对生产力不可超越的前提要求。因此，他只认识到只要我们通过加快经济建设，共产主义就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因为实现人的自由择业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都是直接为着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产物。

问题是，这种局限性的认识最终也被毛泽东自身所否定。到“文化大革命”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时期，他开始用政治视角审视商品生产，否定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认为商品经济是旧社会的残余，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毛泽东在1974年10月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后来毛泽东强调："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在毛泽东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这些认识上的转变，旨在强调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作用的是计划，是"政治挂帅"。这样，价值规律的作用被人为地限制，造成我国长期固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有的生机与活力。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强调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政治属性，并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为代价呢？

如果说，毛泽东执意发动"大跃进"是由于对经济发展的经验不足，是头脑冲动造成的。但经过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之后，而且毛泽东也深刻认识到了并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什么毛泽东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中止在经济整顿过程中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的苗头呢？尽管在他的观念中存在计划与商品经济的矛盾对立，尽管在他主观上存在着一个片面追求生活自由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在逻辑上他都没有理由否定他自身所认识到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作用，因为毛泽东不会看不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果。我们常常把这一转变归结为政治上的变迁，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牺牲经济规律探索进程来突出政治导向呢？难道他没有发展经济的愿望？笔者认为，他不仅有，而且比任何人都迫切、都急切。"大跃进"之歌，他一直在内心深处唱响着，只不过在各种现实问题中表现得比较曲折而已。这不应该仅仅归结为他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作用认识的局限性，而应该从

[1]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535页。

当时的全球化视角找原因。同时，从全球化视角看，也能认识到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有局限性。

（2）“赶超”的陷阱

1957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极不寻常的年份。反右斗争扩大化本来是要扩大民主的，结果却以急剧地缩小民主而结束。对于这段历史——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鼓励“鸣放”开始，到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开门整风，再到反击右派，酿成了开国后第一次波及全国的政治悲剧。我们过去往往只注重过程的一般性描述，至于原因，一般只归结为“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借鸣放之机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迫使党不得不起而反击；同时也指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毛泽东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分严重，从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有人借口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这句话，认为这是毛泽东有计划有预谋地迫害知识分子的证明。以上种种看法，除了最后一种属于“偏见”外，其余两种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毛泽东为什么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分严重？其诱因是什么？表面的看法恐怕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笔者认为，要深入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全球化背景来审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原因。

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指出：“1956年秋，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不能不在我国发生影响，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这年下半年在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1]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活跃起来。于是，首先来自知识分子，接着其他党外人士，对党的工作中一些不妥之处提出了批评。显然我们党胸怀坦荡、虚怀若谷，对这些批评，不仅没有恶意反击，反而坦荡地实行开门整风运动，欢迎对党的工作多做批评建议。然而，由于少数人趁机恶意政治攻击，造成反右倾斗争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最终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在胡先生论述的过程里，必须厘清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少数右派分子的政治攻击只是我们党对形势估计过分严重的诱因、导火线，而不是充分的根据、理

[1]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由。我们党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应该与国际环境变化有关系。在毛泽东看来，波匈事件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阶级斗争，中国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正是基于这样的估计，才使得我们党把大多数人的善意批评、建议与少数人的恶意攻击混合起来，造成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乃至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处理这一问题。

反右倾运动与发动“大跃进”有何联系呢？一般的解释是：党认为反右倾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可以提高速度来进行建设。这促使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反右倾运动扩大化所带来的政治高压的确影响到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但是，反右倾运动毕竟属于政治运动，它对“大跃进”的因果联系必然存在政治因素，而不仅仅是单纯提高劳动热情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毛泽东视域中，中国反右倾斗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中国反击帝国主义的多样化进攻的胜利。中国要想彻底让帝国主义绝望，就必须通过赶超战略，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帝国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全球化弱势局面，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如果反右倾运动是对帝国主义的消极防御，那么，发动“大跃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事实上，毛泽东如此热情地发动“大跃进”，与他的全球化视角是分不开的。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为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农业的后进国家蛙跳式地跃进为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努力。一方面，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紧迫感，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进，必须有一个打破常规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毛泽东关于制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时，总是与“赶超情结”纠合在一起的。所谓“赶超情结”，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呈强势、社会主义全球化呈弱势的情势下产生的一种呼之即来、挥之不去的特定情结。

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时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

走弯路　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1]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如此之快，久蕴于毛泽东心底的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再一次被引燃，并迸发出了难以抑制的主观冲动。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指出："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　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么，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2]

1958 年，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毛泽东在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并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　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这标志着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毛泽东感到欣慰："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76 页。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57—758 页

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1]

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非正常发展，又刺激了“大跃进”运动的升级，“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蕴涵着“超苏”的动机。

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事实上，在应然和实然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在这里，这种距离指的是条件上的缺乏。如果具备了主客观条件，二者之间就差一个实践过程了。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似乎已经具备了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国内条件。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反“右”倾的胜利，使得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可能，而人民空前的劳动热情在主观能动性上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可能性。在国际上，苏联建设成就和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暗淡前景，使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的机会，这将是社会主义全球化走向强势的转折机会。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2]毛泽东想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即使是站在今天认识的高度，回头看这段历史，无论赞同还是不赞同“大跃进”运动这一举措，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举措是出于对“赶超”资本主义的考虑，力图通过赶超战略使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富强起来。这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351页。

〔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42页。

4. 只争朝夕：伴随“大跃进”的不了情结

国内建设成就导致毛泽东骄傲情绪和苏联乐观的国际战略构想，可以说明发动“大跃进”的原因，但是却不能说明毛泽东为什么会默许甚至鼓励“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所带来的荒诞现象。这应该与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建设紧迫感有关，而这种紧迫感又来自他对世界和平形势的估计。

（1）“超英赶美”战略

为了使中国尽快地发展和富强起来，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多次放弃了出国的机会。在其漫长的一生里，两次去苏联是他仅有的一点国外履历。他于1949年和1957年两次简短的莫斯科之行，时间加起来也只有约一个月，这是非同寻常的。他43岁时会见过埃德加·斯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从未熟练掌握任何一门外语。他对中国国家尊严的毕生关注也富有政治意味，引人注目。”[1]毛泽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视野和热情局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注意：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毛泽东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和经济贫困这两个孪生的历史灾祸，为中国人民创立一个以自由、平等（毛泽东把自由、平等看做是人类的两种基本价值）为基础的新的、公正的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泽东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化身，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他似乎在力图确立一种信念，那就是中国英雄式的诸种特质——宏伟的历史、辽阔的土地、庞大的人口和传奇的革命——使得他可以不受当代世界种种危险的威胁，不被人类种种存在性的局限束缚。”[2]

胥春友在其所著的《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一书中，在谈到邓小平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与“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时，对“大跃进”式的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一，“大跃进”是一种头脑发热的唯心主义的空想；第

[1] 萧延中：《思想的永生》，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2] 萧延中：《思想的永生》，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二、“大跃进”又是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行政命令来进行的，是完全违背了经济客观规律的运动；第三，“大跃进”的后果是严重伤害发展的机体，严重破坏发展的机制，因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灾难性的。屠春友对“抓住机遇，加速发展”是“新时期的大跃进”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与“大跃进”不同：第一，它是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的发展，是一种高速度并且出现若干个高速度发展阶段的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有节奏的高速发展；第二，这种发展本身是机体相互协调而产生的一种发展状态，它反过来又是不伤害机体、机制的发展；第三，这种发展又是抓住时机，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的发展。[1]“大跃进”是错误的，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完全正确的，这已被我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没有实现改革开放式的持续高速发展，而是导致“大跃进”失误？建设经验不足是其中重要原因，但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系。而后者是造成前者出现失误的诱因。

20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夹缝中，社会主义迅速崛起。但二战前，苏联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处于守势。“两制”关系总的态势是“资攻社守”、“资强社弱”。

但所谓盛极而衰落，辉煌散尽难免是暗淡，高处常常不胜寒。美、苏这两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天然的“领袖”和“家长”，在冷战开始以后，逐渐出现攻守态势互转的态势。在毛泽东的语境中，就是东风开始压倒西风。由于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被苏联成功发射到太空，给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巨大鼓舞，苏联也把它当作与美国竞争占据上风的重要标志而踌躇满志。这对毛泽东的全球化认识不可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1957年11月，毛泽东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会谈时，谈到了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

[1] 屠春友：《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页

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1]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2]

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各国共产党想把对资本主义某种可能的优势苗头直接转变为全面的胜势就不足为怪了。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苏联共产党明确表示用10年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而毛泽东也公开声明，用15年时间赶上并超过英国。不过毛泽东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赶上美国，把中国现代化发展推到世界前列。由于当时比较各国发展状况都是通过几个主要经济项目生产情况来计算的，因此，毛泽东就把“超英赶美”战略主要或者说是突出定在钢产量上，即“以钢为纲”。现在看来是如此荒诞的“全民大炼钢铁”举措，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则是服从着全球战略的需要。是想通过赶超战略，把社会主义全球化迅速推向强势，反过来形成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包围，“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这符合毛泽东早年的全球化视野。

我们知道，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陈云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建设方针的。因为当时他对国际和平形势估计是比较乐观的，认为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中国可以安安稳稳地搞建设。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八大开幕词（未完稿）手稿中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34页。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42页。

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三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相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1]

但是，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出现反右倾运动，这使得他在对国际和平的形势的估计中有了一种急迫感。这反映在他鼓动“大跃进”的进程中。在全球化话语中，“赶英超美”并不仅仅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还有抵御帝国主义霸权的深层意蕴在里面。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2]1958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9—530 页。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31 页。

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这种对世界和平形势估计的紧迫感在1959年他反思1958年的失误过程中直接反映出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估计，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和平时机，"只争朝夕"，加快发展，准备战争。而当时中国缺乏发展的物质条件，鼓足群众的干劲就是加快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毛泽东不愿意因为群众蛮干就"泼凉水"，他需要这种热情，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他认为，应该对"大跃进"错误给予纠正，但是不应该销蚀这种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是我们抓住和平机会、加快发展，为战争胜利创造条件的动力保障。

（2）只争朝夕——毛泽东的不了情结

当1959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不是没有意识到"大跃进"有问题，而且进行了纠"左"努力。走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然而，他却不能从根本上正视这些问题，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证明了这一点。究其原因，对世界和平形势估计的紧迫感和对赶超战略的乐观预计是其关键因素。195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写到，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1]然而，加快经济发展，防止被动挨打，一直萦绕在他的思想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3—1034 页。

境界里。20世纪50年代末及整个60年代，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和平形势是严峻的。美帝国主义依然卡着我们的脖子，而苏联又逐渐对我们形成威胁之势，这种不安的大气候必然影响毛泽东对部署国内经济发展的思想指导。他的紧迫感不会因为"大跃进"的失败而消除。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纠"左"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彭德怀，使会议变成"反右"斗争，尽管后来毛泽东有条件地支持周恩来、邓小平进行经济整顿。应该说，毛泽东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把它上升为政治斗争，决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他对彭德怀的斗争是如此激烈，甚至向全党威胁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如果仅仅从国内视角看问题就得不到合理解释。因为彭德怀并没有觊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所写的信只是给毛泽东本人反映的一种个人看法，不具有公开性，不管毛泽东是否接受，都是可以讨论的，不会伤害毛泽东的自尊心。而毛泽东反应如此强烈，一定要公开这个问题，对此能够解释清楚的就是他的世界视角。他从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安全出发，他所追求的高速发展经济，是为了对抗帝国主义侵略，因此，他认为，运动的失误只是方法不对头，而原则是对的，是不允许怀疑的，因为这是维护国家安全根本利益之基。

事实上，1960年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国民经济都在曲折的调整中，经济发展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两大运动的阴霾中缓慢走出来。但是，毛泽东"只争朝夕"的不了情结依然存在，这也是调整活动只能在一个限度内进行的原因。1963年，毛泽东在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做修改时，加了如下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

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这份党内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3]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　这些话，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毛泽东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思想意识

1964年12月，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手稿作了修改，其中加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4]在政府工作报告原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41、342页

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1]这反映出，毛泽东依然坚信“大跃进”的可行性，只不过从现实出发，开始在程度上至少在时间上有所松动。他如此热衷于“大跃进”，应该说，与他乐观向上的奋斗品格有关，与他晚年骄傲、自负情绪有关，而把这些因素串联起来的，就是他伴随“大跃进”兴起和沉浮的“只争朝夕”的情结。

毛泽东的大半生是在生死斗争的环境中度过的，新中国又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因此，毛泽东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常常会影响到他对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50年代末期世界局势的变化，使毛泽东认为通过依靠苏联的安全屏障安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破灭了，中国不得不单独面对世界强权势力的挑战，因此，迅速壮大自己的紧迫感便油然而生。“大跃进”运动刚好满足了毛泽东这种愿望，因此，他不愿意接受“大跃进”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彻底的错误。他希望通过一个奇迹，把中国放在一个相对优势或者说绝对安全的国际态势上，再来迎接一场世界大战，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所以，这是一个伟人犯的错误，人们不能原谅这个错误，但是人们原谅了伟人。

我们今天研究“大跃进”运动，就要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给我们今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揭示它是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对“大跃进”运动的痛定思痛，我们改革开放就不能如此健康地发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强调“防止‘左’警惕右”不能不说与“大跃进”运动提供的经验教训有关。“大跃进”运动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任何主观热情都必须认识并尊重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采取了逐步推进、稳步拓展的策略，既保证了社会稳定，又促进了经济发展，应该说，“大跃进”运动提供的教训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社会主义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全面取代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百年的世界经济史揭示：在后军事征服、后殖民统治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全球资源的流向（如20世纪最重要的是石油资源的流向，在21世纪的今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是决定未来生产力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

趋势的高智力人才和资金的流向），以及控制住全球经济产出的流向（如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品、对未来有重要主导作用的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流向），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用“真正的强大”来形容。在资源、产出双流向控制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经济产品标准规格的确定中，如果能够具有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导向力量，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贯彻，在经济竞争中“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将是经济中真正的强者，其利益也可以得到根本保障。毛泽东想通过几个经济指标的单纯产出量（不考虑成本投入）获得相对的比较优势，来“超英赶美”追寻社会主义全球化梦想，仅仅从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在发动“大跃进”中一个可能最“适合”的理由也是不合适的，即使我们在几个主要指标中（包括钢产量）真正达到了“超英赶美”的目标，也不是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强势已经到来，也不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不战而胜”或者“一战必胜”。

在今天的世界里，如果说，社会主义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全面取代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那么，资本主义要想利用全球化来消灭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经济运作过程中，将会形成新的国际分工，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应对得当也能够后来居上。全球化所造成的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为“两制”间出现新陈代谢、强弱移位的图景提供了新的契机。毛泽东曾经追寻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梦想虽然还是梦想，但并没有破灭，而是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闪烁着亮光

第三节　十年“文革”：反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尝试

十年“文革”，被毛泽东称为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文化大革命”呢？这不得不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上找原因然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冒着天下大乱的风险发动“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众说纷纭：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是现代中国最为奇特且最令人费解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四海翻腾”般地波及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而且用当时的语言表达，它也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更有趣的是，中国的十年“文革”的触角甚至穿洋过海，成为引发上个世纪60年代欧美各国“学生造反运动”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古往今来，很少有哪一段历史，像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成为一个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研究课题。从事件起因到事件造成的影响，学者们争论颇多、众说纷纭。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曾感慨地说道：“‘文化大革命’设置了许多道德困境和历史困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离奇复杂和充满矛盾，会使得一切历史的类比都陷于无效。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以及如此之多的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总之，‘文化大革命’一个如此多维的事件，从如此多的方面涉及到个人、国家和社会，因此，没有一个现成的分析方式能够容纳它的全部内容。”[1]研究“文化大革命”也是外国汉学家们真正“拿不到学位的一门课程”，他们辛勤耕耘，却很少收获；他们力图理解，却总是误解。这也难怪，对于置身局外且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外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国本来就有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更何况研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呢？

最令学者们困惑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此问题，西方学者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徐有渔在《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2]中列举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观点。例如，陈（Theodore His-en Chen）认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于修正主义的根子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务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改造群众思想，使之为革命而牺牲物质利益。第二，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三，改造知识分子。哈丁则认为“反修”

[1] 更详细的描述可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 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

的任务主要针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希望青年关心革命，关心国家大事。依斯美（Jean Esmein）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助手发动人民群众，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使党得到新生。富勒尔（Victor C. Funnel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完全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和经济有关。毛泽东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胡费尔（Richard M. Rfeffer）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以前革命的继续，“可以把‘文革’理解为一场更大、更雄心勃勃的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当中国社会出现等级化、特权化时，毛泽东希望恢复革命的活力，重申他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就像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主张的那样，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为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导致的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

对于西方学者的观点，王景伦在主编的《走进东方的梦》中简单概括分为三类：第一派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坚持他固有的社会政治理想的结果。理由是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社会等级及其政治特权化极其反感，对于由于现代化所引起的道德退化越来越表现出不满。所谓“文革”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已丧失了革命目标的“新阶段”。他企图通过全民性的“思想改造”，用民粹主义运动的方式，重新恢复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第二派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政治上层中一小部分人之间，在虚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的权力角逐。可能是受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政治评价模式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为避免大权旁落，清洗持不同意见的高层反对者，以此巩固自己的最高权力，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直接的真实目的。第三派观点则比较复杂，原则上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中共高层领导之间意识形态迥异、施政方针分歧以及权力分配失衡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用毛泽东的概括就是出现了“两个司令部”之间的“路线斗争”。尽管众多学者的立论角度和论证方式各有不同，但却都隐含着“体制冲突”的主题，认为毛泽东习惯并倾向于通过调动“群众”的本能冲动和道德感情，在无序中推动社会的超常发展，“通过大乱达到大治”；而刘少奇等则更强调通过党组织这一机器，依靠科层体制的秩序效率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的“体制模式”是导致

“文革”最终冲突的本质原因。另外，也有一派观点是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文革”现象。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一场规模宏大的宫廷革命，是从紫禁城到地方系统的一场巨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一个运动”，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毛试图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精英统治倾向之间的矛盾”。[1]

以上观点为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质料。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正如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大跃进”那样，没有毛泽东也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点燃了那场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使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是，虽然毛泽东不可能精确地预见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任何后果，但是他所走上的那条路所具有的危险性，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他为使中国的政体成为1966年春天那样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他为什么要毁掉它再来重建？[2]

国内学者研究大致可以归纳这样几点：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因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估计。二、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的紧张是导致毛泽东判断失误的主要诱因。苏联、美国的双重威胁，使毛泽东对中国的国际安全特别担忧，对国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关注，因此，对党内的所谓“修正主义”特别敏感，以至于认为“四清”、“五反”运动形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采取“爆发在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三、毛泽东晚年的骄傲情绪和长期革命斗争经验导致主观主义抬头，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四、少数有野心的分子的推波助澜。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断章取义的错误理解。

这里没有企及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对“修正主义”如此反感又如此敏感？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哈丁在《中国在危机中》指出：“在与滋生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作斗争的过程中，毛由于无法正视伴随着他所创造的制度而来的某些冷酷的事实，便虚构出了魔鬼来解释为什么总是出差错。最主要的幻想就是被夸大了60年剥削中国的阶级的

[1]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6页。
[2]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作用。他认定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出现是中国滑向修正主义道路的征兆，他要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寻找伪装起来的‘资本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源。……他宣称，资本主义正在复辟，所以必须进行一场思想领域里的战斗——文化大革命；否则，社会主义就会退回到资本主义。但是这样一种分析判断很可能是错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责任，公正地说，应归咎于毛对60年代初中期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判断失当。"[1]

作为“文化”的革命，它区别于民主革命，不是旨在用暴力推翻剥削制度的革命运动，而是要进行思想革命。但是，毛泽东沿着上述思路走下去，必然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修正主义为什么会产生，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会在其内部产生危及它的因素？玛丽·莱特在《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中认为，不能省事地把“文革”作为“失去的十年”而将这个时代发生的各种事件弃之于不顾。50年代初，中国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大跃进期间，中国放弃了苏联经济模式；60年代中期，毛完成了对苏联社会的分析，认为必须防止中国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党和国家需要重新建造。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进程中合乎认识运动逻辑的结果，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从上面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关联：苏联“修正主义”使毛泽东担心中国会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导致他对国内形势判断失误，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想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但是，苏联“修正”的是社会主义，“反修防修”就是“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化”。也就是说，毛泽东担心的是中国会像苏联那样，被一些打着马列旗号的阴谋家在暗中改变中国的颜色，使中国形式上坚持社会主义，事实上成为资本主义，因此，想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仅清除党内“走资派”，而且锻炼广大群众，使之在斗争实践中，彻底根除资本主义意识的萌生和认同。

但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的是“文化革命”，而不是“阶级革命”？既然他认为党内存在严重的“走资派”，为什么不提“阶级革命”？从历史背景看，毛泽东认为，苏联是在和平烟幕下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因此，在逻辑上，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1] 哈丁：《中国在危机中》，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134—220页。

动因：资本主义已经或者差不多已经“和平演变”了苏联，中国现在正遭受这一威胁，只有通过一场大规模思想文化运动，才能有效肃清党内的“演化”之物，教育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如果搞“阶级革命”，是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也就不能彻底掐灭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苗头。

这就是说，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内在动因。应该说，毛泽东有意发动这场大运动不可能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探讨直接原因背后的原因，造成毛泽东错误判断国内阶级形势的根源不能不说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是主要内因。1980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1]

2. 提防“和平演变”：“文革”的深层起因

我们通常认为，“文革”是中国内部爆发的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是中国人的一场噩梦。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文革”期间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未放弃过对中国潜力无穷的庞大市场的觊觎。“文革”十年虽然是非常的十年，但显然应视为中国近现代变革史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超出鸦片战争之后一个多世纪的变革趋势。因此，它在某些方面必然会涉及1840年以后很快在中国政治论坛上占主导地位的两大问题：即一方面要掌握西方技术以抗拒西方支配，另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以创造出中国新的文明。问题在于，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会陷入既要吸收西方文化实现西方化、又要抵制西方影响的矛盾境地。这就导致了中国变革的错综复杂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变革历程复杂性的反映。显然，这是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一次特别尝试。

毛泽东的伟大理想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环球同此凉热”。不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首先要防止被敌人同化是必需的。先巩固好根据地，才能打击敌人。“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1959年12月，毛泽东写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谈到了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问题。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战争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1]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中苏关系不断紧张的形势下，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对国际走“修正主义”的担忧明显地日益加重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已经明显地强化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味道：“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2页。

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这一段话，基本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1966年2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最明确的“理论根据”。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三年的困难时期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进行了经济上的大规模调整和整顿，全国经济紧张的局面很快获得缓解，经济发展开始出现新的生机。但是，国际紧张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缓和，中苏矛盾却日益加深，这使得毛泽东对防止修正主义的关注也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时，甚至向客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3]这个话，他又反复地向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讲过。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他认为，如果再搞类似“四清”运动、“社教”运动，显然不能触及党中央领导层，也就不能解决“修正主义”的危险。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654页。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8页。

毛泽东为什么要冒天下大乱的风险、要承担破坏经济发展后果执意发动“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1]正因为如此，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已经沸沸扬扬地发生了，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指出：“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2]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充当“文革”主力军的既不是工人、解放军，也不是农民、共产党员及其干部，而是青年学生。为什么毛泽东有意把学生推到斗争的前列？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想斗倒自己的政敌，利用了学生的天真和无知。这只是西方人惯用的逻辑思维的结论——人的行为总是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这样做，有深层的长远性反“和平演变”的思考——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3]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为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早在“文革”前，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

[1] 《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93—696页。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9页。
[3] 杜勒斯是较早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人之一。

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据吴冷西回忆，1964年，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1]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一定要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彻底破产。“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对青年人说：“这次运动（文化大革命——作者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2]这明显地反映出毛泽东想通过一次实战运动，与西方“和平演变”者争夺下一代，目的是把社会主义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得资本主义演变图谋彻底破产。

“文革”的“标的”是内向，是中国自身的政治运动，但其动机和旨向则是外向的，是为了阻止中国变成“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因此，它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进程而单独演进。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变化，就发生在“文革”进程之中，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必然深深打上“文革”时代的烙印。

3. “三个世界划分”：“文革”时代反“和平演变”的国际战略

从一个方面说，中国是在同大国外交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而从另一个方面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同大国外交关系更加紧张。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外交战略实行的是“两个拳头打人”——既反“美帝”也反“苏修”。这使得“文革”演绎得非常激进、孤奋和悲壮。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战

[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81页。
[2] 《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略态势上，中国、美国和苏联形成了战略大三角，出现中美共同牵制苏联扩张的局面。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关系发生了全面改善。按理说，在逻辑上，中国应该顺势完全倒向西方。但是，“文革”没有停止“反资”的口号，中国社会主义立场毫不动摇。那么，当时中国国际战略是什么？

1974年2月，毛泽东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的话，一般作为阐述“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引文：“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他的全球化思想新认识的表征，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1946年算起，到1974年止，历时28年。这28年是大量位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发展壮大、民族意识崛起、维护自身利益、同大国强权政治抗争的过程。

（1）“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毛泽东在战后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虽然代表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发展取向，但也不免受到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和局限。一是这个理论还是以苏美两极对抗的大格局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它不承认这种格局为世界格局的唯一定势，并提醒人们对位于美苏两极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给予应有的关注。它在以一个旧的既成事实为前提的同时，又在竭尽全力呼唤着一个新的不断变化着的时代。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谈论中间地带时，中国却置身其外。这种状况是历史造成的，但也因此使中间地带理论受到各种制约。

1963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

[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

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1]应该说，“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已经把美苏霸权主义同其他国家区分开，认识到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可以为我所用。这为当时中国实施的“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战略提供了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是把国际战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在中国外交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通过区分世界各国内在的矛盾来尽可能分化、孤立敌人争取盟友和中间者。当然，“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只是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关系中审视中国外交斗争的策略，还没有进一步从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审视中国外交斗争的策略。

（2）“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主要是分析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家力量，认为当时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种力量：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是全球中强权的压迫性力量；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是被压迫的也因此是革命性的力量；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是革命力量可争取的中间力量。“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分析当时世界形势，提出应对方针，体现出与以往毛泽东时代理论思维的重大不同。首先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认识到那个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反革命的矛盾，而是演变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第一，世界主要矛盾是美苏霸权与世界人民反霸权的矛盾。其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斗争，使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依然存在。两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是当前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问题，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都与美苏霸权主义有关。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是导致全球动乱和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两国的激烈争夺，是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危险存在的根源。其二，美苏两国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源于两个超级大国对第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344页。

三世界国家的控制、操纵和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压迫。基于这一形势判断，毛泽东认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成为全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亚非拉地区国家正在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

可以看出，毛泽东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分析，然而“革命”的主题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之前的帝国主义理论强调，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全球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革命”的总方向是“社会主义”。但“三个世界”的理论分析时代主要矛盾则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革命”的目标不再强调是否是“社会主义”，而强调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争取真正民族独立与解放。毛泽东相关思想的变化，主要从中苏对立开始。双方意识形态矛盾发展最终使得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变为修正主义，美苏之间的斗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而仅仅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后面的推论也就很自然：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当今时代主要的还不是社会主义战胜的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毛泽东坚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认为第三世界贫穷落后，必定不安于现状，它们深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干涉和掠夺，必定要革命要反抗。毛泽东将第三世界看作一支新兴的国际政治变革力量，是国际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对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不仅会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强倾向的发展，而且是保卫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进步的重要力量。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也帮助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他们的斗争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1]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亚非拉人民“是我们的同盟军”，是世界革命“主力军”，提出中国必须给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积极支持，而20世纪整个60年代则是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运动支持力度最大的时期。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毛泽东对第三世界革命的方向还是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毛泽东对他们的斗争在国际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可以对比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地位阐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阶级的“同盟军”，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1]。农民是中国革命的物质力量，但革命的主导力量，无疑是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族革命虽然是最大量的运动，但世界发展的方向是无产阶级主导的，主体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但在“三个世界”理论中，“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革命”主体已经不是以往社会主义阵营的无产阶级了，“革命”主体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理论变化的关键是，毛泽东认为苏联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美苏的斗争已经成为狗咬狗的斗争，两极之间的斗争成了两个大国现实国家利益之争，失去了推动世界进步的意义，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在毛泽东的眼中，苏联不再是进步的象征，进步力量已经完全转到落后的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上。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十分清楚地改变了他对全球化前景的期待：他依旧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对社会主义全球化，他已经不再认为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了。这也是我们理解的他能够与美国形成反苏联合的深层思想原因之一。

第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必须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将中国定位“第三世界国家”，是毛泽东帝国主义理论变化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上个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给中国的新定位主要有两个依据：一，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今天又面临着共同发展经济的历史任务；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世界进步力量。据此他确定，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第三世界上。事实上，新中国一直重视发展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关系，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将它们作为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力量来争取，目标首先是支持他们的反帝独立，之后是争取他们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在毛泽东的全球战略中，第三世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如果说原来它们是世界变革的主力军，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变革的排头兵了；原来它们是我们争取的对象，现在我们则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也是毛泽东全球化思想形成的标志。它从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出发，最大限度地联合可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页。

以联合的力量，打击最危险的敌人。同时，它把中国放在第三世界中间，使毛泽东全球化战略发生明显的改变——当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进步力量的代表时，中国找到了新的国际立足点。这样反“和平演变”就有了新的同盟力量，而不是孤军奋战。在“文革”时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原本是为了反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但结果却是和美国结成某种意义上的战略联盟。当然，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共同抗击苏联的威胁。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在极“左”思潮充斥社会的背景下，能够和“夙敌”握手并顺应了美国的战略需要，反映出战略的灵活性。但是，在逻辑上，这是不是与发动“文革”动因相悖呢？从本质上说，并不相悖。利用苏联的威胁，中美和解，中西缓和，西方“和平演变”攻势就会减弱，“文革”就容易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就有了国际条件。1962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次全会上回顾说：“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二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的

了”[1]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使得台湾问题朝向中国有利的方面转变，这就是战略转变的效果。

如果说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方式反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从长期来看，不可能获得预期效果，那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成功实践，对于反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所获得的效果是长期的和深远的。道理很简单，否极泰来，愈极端化愈易走向反面。相反，放弃敌对走向缓和，不仅敌人进攻减弱，而且自己的“抗药性”会逐渐增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使我们分清了朋友、敌人极其复杂的关联，使我们既把资本主义看作敌人而有所防备，又把资本主义区分开来为我利用，这样，我们既有战略空间抗击苏联威胁，又有战略空间对抗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不至于在一个极端化战略中失去周旋余地。可以说，在“文革”时期，“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全球化思想遗产。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立足第三世界，坚持世界多极化，抗击霸权主义，坚持世界多样性，抗击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第四节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贡献

在毛泽东一生中，我们主要看到他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抗争的耀眼光芒和种种过失，很少注意到他尝试走近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努力。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总体上偏离了全球化轨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孤独行走。不管毛泽东主观认识如何，在客观上，中国都不能远离全球化漩涡之外，只不过一直在边缘上傍走。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一些思想给新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不稳定性，但是，换一个长角，毛泽东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深远的，值得历史肯定的。

1. 在全球化边缘上的傍走：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艰难发展

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留给共产党的是大陆一片荒凉惨淡。新中国要迅速恢复经济，走上现代化发展的正轨，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和技术。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我们主要利用了当时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1950年2月14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7—1228页。

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援助的低利率贷款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为3亿美元，年息1%。五十年代苏联向中国贷款达14亿多美元，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6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价值约30—35亿卢布。后来建设项目扩至156项工程。此外，还同波兰，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些合资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

但是，中国对国外经济援助的依赖程度，比任何其他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都要低。而中国向苏联的贷款，很快就开始偿还，到1955年对苏联的偿还数字已超过新贷款的数字。1955—1965年中国是用贸易顺差的收入来偿还他们的借款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开始对苏联偿还债款的同时，还开始实行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共给予7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对一个发展水平还很低的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净资本外流，其中半数是作为经济援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之，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但极少依靠国外贷款，而且还承担了相当数量的外援的发展中国家。[1]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在渡过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之后，利用了外资、华侨资金，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外汇存款这一形式。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与周恩来抓住时机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后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国建交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基本上冲破了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了20多年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70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1975年达到147.51亿美元，比1969年40.29亿美元增长2.7倍，平均每年递增24.1%。1971年至1977年，中国再次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

[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馆1989年版，第351页

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1]1973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预计进口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43亿美元，实际对外签约成交额达39.6亿美元。"七十年代，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继续蓬勃发展，尤其是对拉美国家的贸易因起点较低，增长幅度更大。继中国对东欧国家的贸易于1965年开始回升之后，从1970年起中国对苏联的贸易也逐渐回升。"[2]

如何看待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呢？这里笔者借用珀金斯的话来说，叫"起飞"。珀金斯认为："起飞"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发现并开始将现代科技应用其经济的过程。"起飞"一词特别表明与昔日突然分开，即由"传统"经济和社会传统占支配地位的状态突然开始进入增长状态，并经历了结构的变化。依此分析，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处于"传统"的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起飞"。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不是典型的"起飞"，即不是在欧洲、日本和最近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所经历的"起飞"，毋宁说，它是共产党国家的"强制要求"增长的一个实例。[3]

整个"一五"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关于"一五"计划的结果，多数专家都承认，"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判断，50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但是像历史上所有的经济进步一样，它是建立在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剥削的基础上，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4]如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中，不平等表现得最为明显，城市的工业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以剥削农村为基础的。虽然城市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农村经济却几乎陷于停顿。这样，便加大了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5]

在1956—1980年期间，大多数采用苏联模式的国家都得到了较高的增长率。而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东欧国家的增长率。理由很简单，中国通过苏联经济模式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比其他相对来说更多地依靠自愿储蓄和投资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好地动员了国家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我国与苏联有相同的制度背景和鉴于苏联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成就，我国也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以重工业为建设重点的。同

[1][2] 沈觉人：《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3] 珀金斯：《20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载珀金斯编：《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第115页。

[4]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5]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时，毛泽东出于对苏联出现的问题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提出了不同于苏联的特殊的工业化道路。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这是“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所以走工业化道路来改变中国的落后，向现代化冲击是必要的。但建国后，毛泽东又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不发展，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工农联盟也会受到损害，人民民主专政就会不巩固，工业化进程也会必然受到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既要工业，又要农业。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把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放在首位，提出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7年，他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要求农、轻、重三者在国民经济中协调发展，互相促进。这时毛泽东已认识到所谓工业化道路绝不只是工业本身的问题。他在1957年10月《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实现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3]不久，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改变了以前先重后农的片面思想。1963年9月，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开创了一条既搞工业、又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在1952—1974年长达20多年的期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0页。
[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

左右。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取得这样高的增长率的国家是不多的。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到197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四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中国的战略和体制使中国脱离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到工业化的中等阶段，同时经历了重大的工业和技术变革。中国不仅具备了生产原子弹和氢弹的能力，而且还具备了包括一系列像载重汽车、火车头、重型机构和科学仪器等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生产能力。1949年，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异常的贫穷、落后为特征，到了70年代末，这个国家已经为它的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衣服和住房，医疗卫生有了保障，人人有工作，并显示出不断改善的巨大能量。[1]

如果从比较的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通常被专家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虽然没有中华民国时期或19世纪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料，但非常可能的估计是，当时经济的增长率在1%—2%之间。在1949年以前，中国虽然已有小块孤立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地区，但仅限于一些外国统治下的飞地，如上海和在日本占领统治下发展的东北。整个经济在1949年以前的一个世纪内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并没有任何的持续的发展。[2]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更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过程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可称为高速度。从这方面讲，中国可列入经济最迅速发展的国家，如美国、瑞典和日本之列，甚至超过这几个国家。19世纪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是：英国为2.5%，法国为2%，德国约低于3%，瑞典、美国和加拿大在3%—3.5%之间，日本约为4%。相比之下，中国6%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从当代的眼光来看显得有些逊色，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最快的一种速度。“4%的发展速度在1870—1940年间曾将日本转变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国。”[3]这个速度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比较抢眼的（见表）。

[1]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2]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最近经济情况与十年规划前景》，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卷·上），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3]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变革》，载《中国季刊》第54期（1973年）；《中国的经济革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25页。

净实物产值年平均增第率（%）

	1956—1970	1970—1975	1975—1980
苏联（GNP）	5.2	3.7	2.7
保加利亚	8.5	7.8	6.1
捷克斯洛伐克	6.8	7.8	6.1
东　德	5.2	5.4	4.2
匈牙利	6.8	6.3	3.6
波　兰	6.0	10.0	1.4
罗马尼亚	7.6	11.2	5.0
中　国	8.3	5.5	6.0
非苏联模式国家		1965—1973	1973—1984
印　度		3.9	4.1
低收入国家		3.7	4.1
中等收入国家		7.4	4.1
工业市场经济		4.7	2.4

资料来源：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延续与变化》，载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许多专家都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他们指出，40年代后期，印度是一个在人口密度、人均收入和耕地数量等方面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在1950年至70年代初期这段时期里，印度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只有1.1%，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很少，同时还拿出大约70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巴基斯坦稍好一些，但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大约也只是中国的二分之一略好一些。[1]

按照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工业化来看，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也是快的。中国在50年代的工业发展，可以同增长率非常高的苏联的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而在1928—1959年，苏联工业的年增长率约为10%。根据一般的标准，日本的工业化比较成功，而它在1890—1940年的增长率约为8%。与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例如，在1860—1959年期间，

[1]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5页

美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4.5%，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四五十年时间里的增长率也在4%左右，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0年间的增长率约为3%，1880—1940年的增长率为2%，英国在19世纪初期的年增长率低于5%，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则徘徊在3%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工业的增长率是相当快的。[1]

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例如，迈尔斯指出：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在中国导致了严酷的阶级斗争，长期无情的政治运动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度集权的经济模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缓慢，因此，中国的经济成就必须从它所付出的人的代价这个角度去看。[2] 郑竹园指出：从总体上看，30年的现代化与工业并没有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状态。而且，粗略估计，中国经济发展30年来各种浪费达12000亿美元。如果不发生这些浪费和损失，中国的国民收入可能比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的实际水平高出三倍，应列入准小康之列。[3] 中国1949年以来的发展经验还表明，高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成功的现代化。伴随着这种高增长率的是发明与技术变革的延缓、产品质量与品种的缺乏、要素生产率与效率的低下以及相应的生活水平的缓慢增长。德恩伯格和里斯金分别著文指出：1978—1980年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略低于1955—1957年的水平，地区性的贫困普遍存在，与此同时，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调配粮食的能力已不如50年代；在城市地区，1957年工资冻结以后，到1977年人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7%。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劳动力规模的扩大，1952年劳动力的就业率为36.1%，1985年为47.7%，同期的失业率从13.2%下降到1.8%，由此导致了在每个工人的年收入不变情况下人均收入上升了50%。但是，虽然1953—1978年人均收入每年提高6%，实际人均消费每年却只增加了2%。就食物供应而言，人均粮食和食油消费实际下降了，人均肉、糖和服装的消费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任何提高。每年人均产量（实际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4%，而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仅为1.3%。由于长期忽视非生产性投资，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1]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2] 拉曼·迈尔斯：《中国经济的过去与现状》，达克斯伯里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26页。
[3] 郑竹园：《台湾海两岸的经济发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10、126页

1952年的4.3平方米下降到1977年的3.6平方米，人均储蓄还不到100元。农村居民的居住面积略好一些，但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到10平方米，人均储蓄还不足10元。[1]

而且，从总的发展水平来看，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仍然相当落后，并且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8年大陆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30美元（1978年币值），在世界银行列入统计的126个国家及地区中占第104位，排名在巴基斯坦及坦桑尼亚之后，这与中国跻身五强的地位极不相称。不仅如此，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危机四伏，整个国民经济有步入崩溃的趋势。

2."维护安全"与"加快发展"的两难选择：新中国偏离全球化的原因分析

上述建国初期3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曲折探索历程是和毛泽东建国方略紧密相关的。毛泽东建国方略前后变化很大，有的地方甚至相互矛盾。对此原因分析，理论界研究的视角不同，认识也纷呈各异。大致可以归纳为：直接原因是毛泽东判断失误，内在原因是毛泽东主观上的骄傲思想，外在环境原因是美苏争霸对中国的影响，社会原因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点火，决策机制方面原因是党的民主体制不健全，历史原因是惯用战争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问题等等。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只适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够从整体上探查毛泽东思想变迁的内在动因。从全球化视角，纵观毛泽东建国方略的整个波动历程，实际上是围绕两个价值目标展开的——"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快经济发展"。在国家内部贫困落后、百废待兴而外部国际环境危机四伏、风云变幻情况下，正是由于对这两点缓急轻重的取舍抉择，才导致毛泽东建国方略急剧变迁，直接影响到党建国初期3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曲折探索历程。

第一，外交战略嬗变：从"一边倒"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立足第三世界"。

如前所述，"一边倒"方针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方针，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

[1] 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延续与变化》，载《中国的经济政策》第114页。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261—263页《中国的消费与生活水平：1978—1983》，载《中国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

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作出的。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由于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片面强调苏联利益至上性，致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摆脱苏联的控制，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开始重新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1]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逐步高涨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资本主义世界也处在逐步分化的过程中，美国与西欧、日本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益加剧，它们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一切为摆脱美国控制争取自主和独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可以成为革命势力反对美、苏两霸的朋友。1963年，毛泽东在中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2]应该说，“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已经把美苏霸权主义同其他国家区分开，认识到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可以为我所用，使我们在两大国际力量夹势中寻找到新的国际立足点。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标志着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毛泽东在晚年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使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一度面对的极度紧张的形势得到了缓和；使中国的对外方针突破了国际交往中的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为开创一个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奠定了基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从而，在放弃“一边倒”外交方针后，经过一段徘徊，找到了新的外交支点。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决不谋求霸权。这都成为日后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外交原则。

从“一边倒”外交方针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使中国由两大阵营外交视野拓展为多极化外交视野，是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上的一个巨大嬗变。在坚定社会主义立场前提下，中国能够同美国建立起既斗争又联合的战略关系，能

[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9页。

够立足众多坚持民族主义发展道路的第三世界，确实体现出“中国外交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指导的对外政策都要灵活”。[1]对此，要做出最合理的深层次解释，无疑是国家安全至上性。保卫国家安全，是毛泽东在建国理念中核心的要点之一。新中国外交方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一边倒”外交使新中国可以“背靠沙发”，获得广阔的北方边陲的安定，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铺开营造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局部的国际环境，增强了我们同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和游弋太平洋的美国的对抗的力量。但当感受到苏联霸权主义在北方的威胁日益严重，毛泽东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僵破冻，同西方、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谋求与美国、西方的战略同盟，缓解北方的安全压力。但是从长远的安全战略考虑，“三个世界”战略划分，确定中国的国际位置和外交立足点，使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对抗美苏霸权主义获得了最广泛、最善意的第三世界的支持。这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维护国家安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曾作这样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

第二、对待资本主义政策的反复性：从“发展—消灭”到“再发展—再消灭”

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是推进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的现代化。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党要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在现实性上，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建国前及建国初，毛泽东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中国需要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生产力太落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把生产力搞上来，再走向社会主义。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

〔1〕 戴维·S.G.古德曼等编著：《中国的挑战—调整与改革》，俞晓秋、尹铁钢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0页。

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和利用的政策。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节制资本”，尽量避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反复强调“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对私人资本限制的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观点。”[2]

但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很快做出了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的决定。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战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战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3]1955年毛泽东这一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瓦解”。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三大改造过急、过粗，使得苏联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探索和思考之后，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利用资本主义，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营、合营企业的不足，丰富市场需求，方便人民生活；又可以作为国营经济的对立面，通过适当竞争，刺激国营经济发展，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很快，毛泽东又否定了这个主张，用“人民公社化”的“一大二公”替代了经济上的“百家争鸣”。

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政策为什么这样反复不定呢？道理很简单，当毛泽东想要加快经济发展时，就会想到要利用资本主义；当毛泽东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往往就会决定排斥、否定资本主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压制，尤其是朝鲜战火烧至我国边境，使中国人民仇视资本主义的敌对情绪滋长。当然，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担心中国国内搞资本主义，会和世界敌视中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势力勾结起来，内外结合，颠覆人民政权。而新中国确定“一边倒”外交后，想通过苏联帮助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然会使毛泽东决定把中国迅速变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页。
[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页。

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因此，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彻底否定了国内保留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开始有所缓和，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中国的新经济政策。

但是，为什么"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是昙花一现，没能够全面付诸实施？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一方面，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频繁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印方又不断挑起事端；再一方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对中国的西南边陲造成威胁；第四方面是随着中苏论战升级，苏方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不能不迫使毛泽东用警惕的眼光，关注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家的安全，就谈不上国家的发展。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毛泽东最终还是否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价值性。

毛泽东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恰当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的同时，又把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做法也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给搞臭，把姓"社"姓"资"的方法论问题和原则问题混淆在一起了。尽管如此，毛泽东毕竟提出了利用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构想，其闪光点无疑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一构想本身就意味着只要有可能，是完全可以打开国门，欢迎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的，而且允许私人资本存在20年甚至100年。这为后来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外资提供了思想源泉。

第二，同西方经济交往政策的反复性：从"主张—限制"再到"学习—拒斥"

"一边倒"外交使新中国从原则上排拒国际资本主义阵营，但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也拒之千里，相反，毛泽东曾一度有过同西方搞经济合作的主张。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思想。他说："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1]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

[1]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27页。

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到全国解放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企业有1000多家，主要是属于英、美垄断集团的。只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才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在华财产。[2]

建国后，毛泽东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引进和利用外资，允许外国人来中国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资合作经营工矿。进入社会主义后（除上个世纪50年代向苏联贷款外），他不再主张引进、利用外资和合资合作经营，而只谈与外国人做生意，引进外国的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这不能不说，与毛泽东安全意识有关联。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更快地发展我国经济，毛泽东一方面提出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3]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事实，提出了要长期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时期他所倡导的对外开放，从主张来看，是全面开放，几乎没有开放的禁区。学习的范围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深度，不仅有艺术、技术也有西方管理制度甚至政治制度。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因此必须向外国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都要学。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

1960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〇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2] 马洪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1]

总揽毛泽东倡导向外国学习的思想，根本原因是他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太薄弱，中国要加快发展，就必须向外国学习先进的文明成果，避免走弯路。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学习资本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2]

为什么新中国经济上接触西方的尝试陷入困境呢？从客观看，西方的敌视态度是主要原因，但从主观来看，与毛泽东全球化语境中对维护国家主权的敏感性不无关联。在毛泽东的视域中，同西方经济交往、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无疑有利于新中国经济发展；但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就会影响到独立自主原则，影响到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毛泽东看到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就，并且认为中国可以借其一臂之力，但是却不能容忍它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不能释怀它给中国近代百年耻辱，认为这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正是这一矛盾，使得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态度始终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上的对立、认识与落实上的冲突。

毛泽东从国家安全考虑，在政治上始终与西方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很容易把国内的一些矛盾上升到国际阶级斗争的高度，从而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这必然使得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接触，不仅受到西方的刻薄、防范，而且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打不开，小心翼翼。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深处，借助西方发展中国经济与维护国家安全防范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两个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体现。二者较量的结果，导致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对立性：我们渴望资本主义的“肥肉”，但我们却看到“肥肉”上黏着可怕的瘟疫。因此，我们打着打倒帝国主义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的旗帜和帝国主义国家搞经济交往。最终，毛泽东对安全的考虑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把反右斗争扩大为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一时间，中国同西方的经济接触陷入低谷，"自力更生"发展经济被绝对化。

第四，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变迁：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

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顺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毛泽东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完成的又一杰作。然而，杰作未必没有遗憾之处，改造中后期出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初衷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表呢？在毛泽东的思维逻辑中，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无疑就是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正确选择。所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程应该加快，而且越快越好，越快我们就能够获得主动，避免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失去机会。毛泽东在批判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右倾保守思想时强调："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改造"。[1]正是如此，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才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并且一再加快，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了客观情况的要求，造成了很多问题。

然而，胜利的喜悦使我们党没能够从中深刻吸取教训，却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情绪。在毛泽东支持下，党的八大虽然提出了"反冒进"倾向，但对此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存在很大差别。毛泽东认为："前进不是突然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2]这说明毛泽东认为的"退"不过是为"更大的进"提供跳板，不可能作为一个基本政策贯彻下去。反映出利用国际和平机会加快经济建设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心目中。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到一年，"大跃进"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毛泽东如此热衷于"大跃进"的火热与壮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观，甚至对很多方面明显的荒唐做法宽容放纵，是不是说明毛泽东完全不懂得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呢？屠春友在其所著的《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一书中指出，"大跃进"是一种头脑发热的唯心主义的空想。[1]如果我们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就会发现，其实他对此认识是比较客观的。然而，他的理论认识与他的实践活动结果却是矛盾的。如果说1957年酝酿发动"大跃进"时，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全面胜势的渴望出现了紧迫感；而当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国民经济已经明显陷入困境客观上亟待调整时，则是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中国面临双重外力威胁情况下出现了新的紧迫感。他希望通过一个奇迹，把中国放在一个相对优势或者说绝对安全的国际态势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接受"大跃进"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彻底的错误，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致使庐山会议上造成了新的反右倾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跃进"带来的经济震荡逐渐平息了。但是好景不长，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却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现代中国最为奇特且最令人费解的历史事件之一。应该说，毛泽东有意发动这场大运动不可能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探讨直接原因背后的原因，造成毛泽东错误判断国内阶级形势的根源不能不说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是主要内因。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在和平烟幕下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中国现在正遭受这一威胁，只有通过一场大规模的触及内心深处的思想文化运动，不仅清除党内"走资派"，而且锻炼广大群众，使之在斗争实践中，彻底根除资本主义意识的萌生和认同，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显然，这是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一次特别尝试。

由此观之，抓住"安全"与"发展"两个价值要点，就抓住了毛泽东矛盾性建国指导思想的根源，这有助于我们深刻体会邓小平为什么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意见中强调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2]如果我们不深入理解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建国方略中的内在价值追求，不理解他所犯错误的内在动因，

---

[1] 屠春友：《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我们就不能深刻理解《决议》对毛泽东同志既“实事求是”又“恰如其分”的评价[1]——“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2]，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浅薄的历史学家往往把中国经济建设所走的弯路归咎于毛泽东本人治理国家的错误。他们认为，在打天下上毛泽东无疑是一位无可匹敌的大英雄，但他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导致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走了大弯路。不能这样简单看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在主观上确实存在着认识上的失误，但是，这种错误认识是存在动因的——那就是“加快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双重价值选择。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条件下进行实践活动和施展抱负的。毛泽东一生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他对新中国的安全利益关切和对民族迅速崛起的渴望，实在是中华民族长期受侵略受凌辱的历史命运的逻辑必然。而毛泽东的大半生是在极其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度过的，指导他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列宁的时代观和战争观，不能不对他的建国方略发生深刻的影响。这使得他在探索经济建设过程中难免存在阶级斗争惯常思维，“加快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很难统一起来，即通过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提升国力来维护国家安全。

另外，理解这一点，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老一辈革命家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增强我们保卫国家安全统一的忧患意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感，维护社会主义事业责任感。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核心点是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人们往往会渐渐淡化国家安全意识，认为世界到处都是和平友好的阳光地带。其实，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开”，“要抓住机会”，“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除了追求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价值目标外，还有一层意蕴就是“被动就会挨打”这一安全意识。在维护国际安全问题上，邓小平并不比毛泽东松懈怠慢，问题在于邓小平更强调通过迅速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来加强国家安全性。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就不仅在于对发展本身的意义，还包含着对安全的深远考虑。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但是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敌对势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
[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力依然制造事端，一直影响国家安全统一。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极端重要性，自觉投入到反对国际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

3. 毛泽东留下了什么——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世界评说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呢？历史总是因特定条件走它的必由之路——没有毛泽东选择的社会主义及其在行进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实现和平稳定是难以想象的。P. 梅德韦杰夫评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20世纪的一个伟大的事件。中国的统一和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家，这个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那时起中国结束了分裂局面，就像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结束分裂局面一样。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客观过程，是客观必然性的实现。但是正如德国的统一没有俾斯麦，意大利的统一没有加里波第难以想象一样，中国的统一没有毛泽东也难以想象。"[1]美国学者R. 特里尔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肖像的："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作为主宰人物，在20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3000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2]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幅员和多样性方面与整个欧洲相类似的国家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20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如孙中山遗憾地说过的，像一盘散沙——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为一体了。而毛泽东"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隋朝和明朝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以其壮举与他崇拜的英雄、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年就统一了中国。"[3]

那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呢？它既是真理，又没有结束真理；既给人们提出前进的方向，又为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正如世界著名的社会活

[1] 萧延中：《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2] R. 特里尔：《毛泽东的肖像》，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3] R. 特里尔：《毛泽东的肖像》，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动家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的，中国1980年之后能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放弃社会主义，从而步出“毛泽东时代的停滞”，这不仅是将事情武断地简单化，而且是蒙住眼睛，不愿洞悉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他说：“如果没有奉行毛泽东思想的30年间打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很难想象会有近15年的飞速发展。要强调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加速发展。在1957年到1975年间，中国就已经取得5.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都低于2%），从这段时间就已取得轻工业11.2%和重工业8.3%的创纪录增长率，已经建成一整套收入分配的社会体系（即公平），远远优于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1]美国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评价说：“虽然毛未能超越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对于作为一个20世纪的民族的中国的发展而作出的贡献仍然是给人深刻印象的。他充满着不妥协地献身于中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的精神，使她从一个衰弱、分裂、任凭外国干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的强大、受到尊敬的一员。虽然他先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威胁，而后又联美反苏，他从始至终都明白地表示，这些政策首先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更广泛地说，是服务于第三世界的利益。”[2]

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错误呢？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遗憾，也使得毛泽东传奇一生多了几分悲剧色彩。人们原谅了毛泽东，毕竟他是怀着美好的愿望犯的错误，但历史不会原谅毛泽东的错误，因为它造成的影响是不能“删掉”重写的。于是，就有人提出来，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历史的误会。[3]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社会历史发展出现错误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是不能假设应该走另一条道路。难道一条道路没有走好就注定另一条道路会走得畅吗？历史发展受到人的能动作用的影响，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会具有不确定性、可变性，即使在初始点上是完全理性的，也不能保证在演进过程中会陷入困境。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4]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

[1]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2] 斯图尔特·施拉姆：《简评毛泽东》，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3]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4] 马丁·加德纳：《灵巧的宇宙》，载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不管是成绩还是教训，不管是辉煌还是伤痕，既以成为历史，就不该假设重来，关键是，我们在这个起点上，把错误的纠正过来、把正确的坚持发扬下去，在开辟一个新天地邓小平就是这样开辟中国现代化新境界的。

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是弥足珍贵的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时代放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就会发现，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再造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 早在1963年，斯图尔特·施拉姆对毛泽东就做了这样的评价："不管毛泽东将来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毋庸置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毛泽东关于在不发达国家里如何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榜样将继续产生着影响 然而他能否为中国、亚洲的其它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指出一条道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是一片空白 人们将拭目以待 "[1]正像歌曲《春天的故事》所唱的，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 这一点，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自由并无敌人，但是，要自由，就先得有独立富强 反过来说，先自由本身不一定导致独立富强，而没有独立富强，这个自由是保不住的。这就是从严复到邓小平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的独立富强 这就是历史学上常说的，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是救亡（强国）压倒启蒙（自由民主）。焚烧圆明园的火，屠杀南京和平居民的刀，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口 当民族的生存本身都成了问题，发展还有什么意义，现代化又有什么价值

此外，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成就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经济遗产的基础上开始的 很难设想，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尽管社会发展不可以用实验室的手段进行模拟，但这种假设肯定是有道理的 江泽民在《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 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

[1] 参见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普莱格1963年版

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1]

过去，学术界往往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这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仅此尚不足以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历史上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条件下进行活动和施展抱负的。离开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大背景，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涵，更难以把握其思想的真谛。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侵略的痛苦回忆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不联系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全球化的屈辱史，就难以对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深刻理解。理解是批判的前提，舍弃现实的体验，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将变得僵硬而失去其应有的光泽。质言之，如果我们不真诚地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不真诚面对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全球化思想遗产，那么，考察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进程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本人没有使用过全球化这一术语而否认或忽视他的全球化思想遗产。尽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还不可能形成系统、成熟的全球化思想，但其全球化思想遗产是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的奠基，它不会因为其某些方面的缺失而暗淡其伟人的光彩。

[1]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3—344 页。

第四章 历史转折（1978—198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动融入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末，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开始了第一次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从此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并以自己特立独行的姿态，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倡议者和推动者，他立足全球化视角，把中国推向世界，把世界引进中国，开辟了中国新时代，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乎寻常地崛起，其“一枝独秀”的亮丽景观引人注目，为全球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全球化进程向着多元化、多纬度的方向发展。其世界意义在于：既保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精髓，又保持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全球化进程中尽情展示自己的特性。这两方面的结合，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第一节 呼唤改革：世界坐标下中国的历史选择

经过十年“文革”阵痛之后的中国，站在一个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沿着毛泽东未了之愿继续走下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探索现代化之路；要么有一个大动作，把中国引到全球化之中，开辟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成立起，就不断与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且依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总是在迷惑中找到正确道路，在挫折中走向胜利。痛定思痛，十年

“文革”的教训太深刻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不作出反思，不可能不探索新道路。

1. 走出国门：我们与世界的脚步相差多远？

如果说1976年中国在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中结束了一个风风火火的时代，那么，1978年则是在充满期许的一年中迎来了一个沸沸扬扬的时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两年的沉闷和徘徊，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纷纷走出长期封闭的国门，亲身领略外面世界的变化，感受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考察组”，前往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则率领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访问了西德等西欧国家。西欧和港澳繁荣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给考察团耳目一新的感觉。两个考察团在当年的5月、6月初先后回到北京。他们把在国门之外的所见所闻带回国内，增强了党的最高层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就有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共到达51个国家。这一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他先后4次出访8个国家：1月至2月，访问缅甸、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小平出访所造成的国际影响，被外国人称为“邓小平旋风”。国家领导人的频繁出访预示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悄悄酝酿。中国一改过去与西方世界对立敌视的态度，摆出了虚心向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学习的姿态。

二战的硝烟摧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神话，但是，就在战争的废墟上，30年弹指一挥间，资本主义现代化几经颠簸又呈现繁荣景像。在总结苏东剧变历史教训时，有人认为苏联在二战中承担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影响到其现代化的复苏，是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的历史原因。笔者认为，尽管以中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战争的创伤非常严重，经济恢复和起飞较为困难，但是，像日德这些战败的国家和同样受到战火焚烧的英法等国家，其社会经济基本状况比社会主义国家好不了多少。但是，30年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日德最为突出。战后，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相等的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恢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实现了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早在20世纪60年代，不仅愈合了战争的创伤，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相当于中国的四倍。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

二大经济强国，70年代又超过苏联，80年代成为世界头号金融大国。联邦德国在这段时间也取得骄人的经济成绩。经济发展总量已经超过英法，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经济发展也相当出色，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掀起了福利制高潮。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没有受到创伤却大发横财的美国，战后曾长期担负着西方经济恢复和振兴的救世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曾一度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经济霸主。只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才把它从绝对优势上拉下来，与日本、欧共体（现在的欧盟，当时还只是欧共体——笔者注）并称西方三大经济实体。但是，其经济优势仍然存在。

不仅这些强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获得斐然的成绩，就是一些弱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但具有一定民族主义特色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取得了刮目相看的发展效果。其中，亚洲"四小龙"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最为突出。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60年代开始起飞，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使它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1978年经合组织（OECD）第一次称它们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拉美一些国家依靠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经济转轨的机会，获得大量资本流入而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势头，尽管没有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不过，在当时，相对中国来说，也是相当可观了。

西方经济为什么会如此突飞猛进？给出的一般解释是：一是长期的和平环境使西方国家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二是得益于美国经济扶植和对西方经济秩序的规范；三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的升级与调整，带动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四是得到美国核安全保障，使得西方诸国能够主抓经济发展；五是利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运行，使得各国有效分工和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六是科技发展对经济的贡献。等等。总结这些解释，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原因与经济全球化有关联。西方诸国能够利用美国的帮助和国际产业升级的机会，在战后迅速医治创伤并走向经济繁荣，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彼此紧密联系起来的平台。为了对付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威胁，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中心，加强了政治、经济联系，把经济全球化推到一个新境界，从而有力地带动了各国的发展。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它们不仅把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用经济封锁来配合政治压制，而且把众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放置于全球化的边缘地位，使之长期处在被动的依附状态。这种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非常不公正

的。具有依附性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直接或者间接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富国富民的基础，成了转移经济危机的条件。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而被排除在外的或者处在边缘地位的国家则是相对的受害者，至少它们是付出很大代价却获得很少利益的国家，除了少数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之外。由此，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平台，逐渐把政治上取得独立而经济上却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甩在身后，形成了不断拉大的贫富鸿沟。

中国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排除在外的国家，间接地说，也是其中的受害者。我们采用苏联模式，片面重视重工业发展，不注意或者不重视经济综合稳定发展，虽然不能否定受苏联的影响，但是不能不说与资本主义经济封锁有联系。以美国为代表，阻止西方国家向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工业设备，而中苏关系破裂，来自苏联的援助又被切断，使得我们被迫独立自主地搞工业体系建设，这就不得不牺牲农业来优先发展工业。另外，对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影响较大的连续的政治运动，也深刻地隐含着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敌视性封锁的外在因素。如果当时我们能够融入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可能就会对西方有一个较为客观地认识，对西方的威胁就会有一个适度的判断和防范，对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所谓的搞“修正主义”就会有一个更恰当的定性，这样，国内反右倾斗争的规模和程度就可能会受到抑制，“文化大革命”也未必发生，而中国的赶超战略就不会走到荒诞的极端地步。虽然这只是主观臆测，但是，从逻辑上是合理的。

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全球化契机，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科技革命的浪潮。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尽管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势头有所减缓，但是，它依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迅速提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相比之下，中国科技发展却在政治动荡中“爬行”。应该说，我们的科技基础薄弱是一个天然的缺欠。但是，没有持久地重视科学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究与转化，则是一个不能推脱的过失。在发展科技方面，我们主要靠科学家的觉悟和奉献，在物质待遇上由于受到追求平均分配理念的影响而得不到相对的提高，而不断出现的政治运动则经常冲击科技的发展的稳定性。中国科技发展的滞后性越来越明显，这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1978年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扎伊贝克时说：“在工业方面，我们二十八年还是搞了些基础。但技术落后，管

理水平低，就现有设备能力来说，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六十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末近十多年则拉得很大。"[1]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谈话中指出："六十年代前期我们与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是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不止二十、三十年了，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2]

不管怎么说，十年"文革"以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大量消费"的市场经济时代，而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强烈的对比迫使中国不得不开始反思，中国该何去何从？传统的体制明显已走进死胡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斥了市场，结果并没有带来预想的"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而与市场相脱节的计划，又经常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扰乱因素。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一洪水猛兽，而被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已成为"僵化经济"。"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经济，没有给我们架起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却使生产者丧失了积极主动性。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没能带来共同的富裕，只使共同贫穷成了普遍现象。"关起门来搞建设"似乎避免了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却没有赶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潮。30年风风雨雨，严重的对外封闭使我们不能认识世界，世界也不能认识中国。而一旦这个封闭的窗户被打开之后，我们才知道，全球化列车已经把发达国家带向现代化旅途中很远的地方，而中国在政治和人口两大包袱压迫下还在蹒跚挺进。1978年，邓小平在视察日本汽车企业时发现，日产汽车工厂每名工人一年生产9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名工人却只能生产1辆汽车。邓小平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3]他在同日本经团联合会会长土光敏谈话中，坦率地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世界落后20年。他指出，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和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20年。邓小平自称是"实事求是派"，他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曾在视察

[1]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3] 于青采：《邓小平1978—1979系列出访：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8日。

东北时多次感慨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同错误作斗争中不断取得进步的历史，就是在教训中获得经验并不断成熟起来的历史。一旦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然会奋起直追，迎击挑战。

那么，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样走？经历建国将近30年风风雨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做出深刻反思。

2. 社会主义应该怎样走：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

中国高层领导人通过出访外国，了解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也看到中国落后的根源，纷纷利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放眼世界，反思过去，解放思想，畅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举措，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开渠引流。

从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谷牧等出访回来的领导人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国外发展经济的经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引用了列宁讲过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的名言，以此来说明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他们那一套。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1978年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明确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主张。他还指出：应该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师的邓小平，在这个历史大转折时期，在总结过去教训的基础上，多次表达了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邓小平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挥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

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更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学习外国，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1]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穷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同年9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指出：“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那才真是爬行主义。……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是要改良，不要缝缝补补。要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没有一点创造性不行，企业没有自己的权力和机动性不行。”[3]这一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谈话中感慨地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事什么面貌。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4]还是这一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在报告里，邓小平总结道：“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0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1]

除了邓小平外，当时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也纷纷作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客观的现实洞察和迫切的改革开放动议。李先念强调平稳发展的重要性，并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总结出四条建议，强调要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要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另外，李先念着眼于世界，还强调利用外资和学习先进技术的重要性。[2]陈云就计划与市场问题，深刻总结了历史教训，认为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3]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大冲荡、大解放的年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所奠定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基础依然意义非凡。十年“文革”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太多的历史教训，直面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繁荣畅旺的事实，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太多的镜鉴。中国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革命式的改革，需要重新开辟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普遍共识。但是，中国具体该如何走？在当时实际上主要有三条道路：一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框架，只是根据形势作适当的有限的调整，在不停止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发展经济。二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资本主义化，走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三是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走一条全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旦思想解放出来，新的路径选择就摆在共产党的面前。

那么，谁将指点迷津，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的春天？自然是邓小平。但是为什么邓小平要选择改革开放这一条道路呢？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始终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既要排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侵略，又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几经徘徊犹豫，最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参见《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375页。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终还是以放弃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为代价来抵制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选择第一条路或者第二条路，实际上还是在二难选择中走两个极端：要么排斥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要么承担资本主义化的风险。我们党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搞阶级斗争是不合时宜的。因此，通过改革开放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非常必要。但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如果一定要冒这个风险，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首先会遭到比“文革”更可怕的政治大动荡，这无疑是对中国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所以，看似可行，实际上根本行不通。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是一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最佳举措。邓小平本着务实精神，为中国选择了这一条道路。

第二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转折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政治对峙出现缓和迹象，战争阴云虽然依然密布，然而整个世界开始显现和平的态势。中国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实现一个历史转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聆听全球化时代的脚步，从解放思想到拨乱反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思想领域首先掀开了改革图新之一角，为迎接改革开放奠定着思想基础。

1.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

每一次重大历史转变之前，都会有一场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每一场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都会出现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显然，如果不是外敌入侵，只有首先实现社会化的思想转变，历史事件才会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而产生历史转变的效果。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开始从“文革”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为迎接改革开放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从更深刻意义上看，它的影响绝对不仅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为迎接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实际上它还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生。因为它一旦帮助重新树立起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实践中就必然呼唤新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生，实际上是人们首先涌动起

改革开放的浪潮，他只是代表人民的心意，助推一下，因为不管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举办特区，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人民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率先创新、探索新路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探索自然而然走出了"误区"、步上了正轨 实际上与此相反，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提出和贯彻的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其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拨乱反正工作虽然已经局部展开，但无法从根本上深入下去，政治形势乍暖还寒；国民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旋即又陷入"洋跃进"的境地，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仍在"左"的轨道上沿着错误的趋向滑行，改革开放的机器还没有发动起来。

当时"两个凡是"方针把人们的思想圈囿了起来，党依旧感觉到苦闷和彷徨、不知所措 今天来看，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方针不能不说与他的认识困境有关——如果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意味着动摇毛泽东伟大历史地位，那么，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就会受到置疑，党的历史合理性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贡献者、党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党的缔造者之一。当然，华国锋自身政治高位的历史合法性也会受到牵连 如果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无视毛泽东晚年错误，但却不能彻底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就不能畅快地得到平反，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会"拖泥带水"，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根据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后两年的徘徊期反映出这一认识困境的存在 显然，他所面对的国家政治发展形势和他自身的政治价值取向存在着矛盾 他希望中国走出"文革"的混乱局面，开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但是，他又不得不坚树毛泽东旗帜，从而不敢或者没有勇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还突出表现在他对邓小平政治态度的矛盾性上：一方面，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认为"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认为天安门事件"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另一方面，他又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对此，邓小

平曾不客气地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1]最终，还是邓小平睿智地化解了这一认识困境——通过把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既纠正了"文革"历史错误，放下包袱，探索新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又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定维护住党的历史合法性和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形象。这一点，恐怕不仅华国锋会自叹不如，而且苏联的赫鲁晓夫也未能做到。应该说，华国锋不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尽管他在认识困境中选择了"两个凡是"方针，但是，他不仅在事实上转变"文革"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稳定社会政治秩序，而且开始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尽管这其中问题不少　不管怎么说，激进、动荡"文革"之火在他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熄灭了，只不过它的阴影还在、政治氛围还在。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在中国历史转折关头，造成了一个重大思想障碍，如果不能化解这个症结，就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抉择改革开放崭新前途。

关于真理检验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爆发，从直接原因看，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积极反应。但是，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一方面，这是广大人民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始终存在与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向度的结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虽然被压了下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被抛弃和摧毁。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提出的一些正确观点，以及发生在1972年的纠"左"、1975年的整顿和1976年的"五四运动"，这些正确的取向不仅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局部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挑战作了准备。1977年5月，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在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并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1977年底，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提出"一个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办了《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刊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揭开了真理标准群众大讨论的序幕。

如何评价关于真理的大讨论的历史意义呢？邓小平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如此高地评价这次哲学理论性问题的大讨论呢？思想解放运动往往是历史转折的先导。文艺复兴掀起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曾有过激烈的新旧思想大论战。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爆发时期的群众思想大解放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地迎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那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基础。如果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就会一直笼罩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发动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受到阻碍，因为没有理论支持的和思想认同的政策决定是难以贯彻的。正是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导致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逐渐恢复和解放思想的热潮的出现，有力地推动着仍在"左"的迷途中徘徊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步入正轨。

2.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未来新局面的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开辟未来新局面的转折点。邓小平说，我们真正

[1]《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0页。
[2]《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新局面的转折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起点？

全会虽然只召开5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倾错误　这次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对于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理念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应该说得益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思想放开了，对待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活跃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就宽阔了。第二，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却一直没有完成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20年的“左”倾错误的误区，开始进入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　正是这一转变，使我们抓住了上个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出的末班车，比苏联早十年走上了通过改革发展经济的道路。结果苏联解体了，中国社会主义却兴旺发达起来。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解决了若干重大历史是非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开始了系统地拨乱反正，清理了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等。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有以阶级斗争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264页。
〔2〕《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

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封闭和半封闭转向开放和全方位的开放，由墨守成规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一切，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从全球化视角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面临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而这个转折点，从现在来看，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垮台来看，确实是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折点，是把中国引向现代化快车道、融入全球化、迎击全球化挑战的转折点。它的历史影响越是历时长久就越彰显。站在今天的历史视角上，我们很容易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仅仅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并以此强调它的历史地位。但若我们回到那个历史时期，就会发现，当时遭受十年“文革”风雨的中国人经历了太多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已经磨平了思想棱角。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我们党而不是党的对立面来冲破历史思想藩篱，选择一个全新的发展道路，这需要勇气和胆略。这等于由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次手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酝酿与召开，就是这次成功的手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勇于纠正历史错误探索正确道路的表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个时代——如果说遵义会议开辟了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开辟了我们党在全球化语境中第一次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可以遵循的情况下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时代！

3. 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之路。但是，要彻底结束“文革”造成的影响，让全国人民心情愉快地迎接改革开放，还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这就是全面系统地进行拨乱反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要彻底结束“文革”造成的影响，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认清历史是非，避免未来建设重蹈历史覆辙，有必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历史总结。这就是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动因。关于为什么要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在1981年5月一次讲话作了解释：“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

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1]也就是说，这个决议不仅关涉国内团结统一的问题，而且在国际上关涉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政策定位问题。国际上需要这个决议公开表明我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由此再搞改革开放，就会顺理成章了。如果没有一个理论定性，党在历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会使外国人怀疑这次改革开放能持续多久，从而会使中国改革开放陷入困境。

邓小平目光深远而宽阔。他深刻意识到评价毛泽东并不是仅仅评价他一个人的问题，而且影响到党的历史地位问题，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形象问题。这也是吸取了苏联教训的结果，真正做到既要保持好党的伟大历史形象，避免被抹黑而伤害党在人民、在世界的影响力；又要分清是非，有利于未来工作的展开，避免在错误的历史思想氛围中面对改革开放新境遇。所以，邓小平还强调："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建国以来三十二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指导意义，做了总结和评价。除此之外，还初步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从而为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上，在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3]这是我党历史中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使我们党获得了一面历史镜子，在开拓改革开放的新的征程中，不断得到鞭策，避免历史重演。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05—306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00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07页。

中国经过全面拨乱反正，不仅肃清了历史遗留问题，恢复正常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的发展进步。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做了很多实事，从各方面清除历史陈迹，为开辟改革开放的崭新未来扫清障碍。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一次历史大转折，由偏离全球化开始转向全球化，中国开始决定和世界的主旋律伴走放歌；那么经过全面的拨乱反正、各方面工作顺利展开，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把前进的列车整修改新，开始准备朝向全球化启程前进了。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回顾中国改革历史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2]这实际上是对拨乱反正历史价值的评定。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中国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迈入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出现了全球性的制度创新与扩散，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速度空前、规模巨大，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全球化进程受阻。社会主义各国由于其僵化的体制模式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的要求而停滞不前，陷入低谷。在全球化浪潮与社会主义发展低谷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却作出了历史性的战略抉择：改革开放。在这里，作为时代巨人的邓小平无疑对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有着深刻的体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国内的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甚至改革就是对内开放；对外开放也离不开改革，甚至开放就是对外改革。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其实已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改革

[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41页。

开放过程，就是渐进式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1.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点就是排除教条主义影响，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那么，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点就是排除“左”、右倾思想影响、吸取历史与世界各国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全球化视角来看，毛泽东思想是把视角从国际转向国内，立足中国农村来开辟革命道路；而邓小平理论则是从国内转向世界，从国际的坐标轴中定位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两个理论创新的前提不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际上是从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开始的，而且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曾长期发挥直接领导作用。所以，教条主义的要害是不了解中国实际国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开始的，但其要害是僵化，而僵化要害是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认识世界变化。所以，前者是立足中国农村探索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后者则是放眼世界，立足全球化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在历史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应当看到，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就是撇开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束缚，放眼世界，把握时代，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反对单纯的理论争论，认为囿于理论是非争论就会丧失实践机会。要探索新道路，就必须有新突破，而这种突破是否科学有效，就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正如 1987 年 3 月 27 日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6 页。

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一明灯指引下，逐渐铺开的。从农村放弃人民公社，搞土地家庭联产责任制，从搞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到深化对外开放，中国改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路子。

"走自己的路"还意味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经验，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为什么要坚持独立自主呢？1987年5月6日，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向客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明了原因："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3]显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改革开放时期，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别人卡脖子，就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要单纯寄希望哪一个国家帮助我们发展。只有这样，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时候，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才有自己的民族尊严和独立，才能保持一个大国的政治地位与其他国家平等友好交往，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这样高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搞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

---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406页。

党的十三大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什么我们经过8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已经有长足发展的情况下，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1987年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我们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一般解释是，它是我们国情的客观的真实的反映，是我们改革开放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依据。问题是在最初改革开放的8年期间，即使没有这一论断，我们还是红红火火地搞起了改革开放。而这一论断一经提出，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成就就会面临被质疑的危险，等于党自身为自身抹黑一样。

其实，从全球化视野看，做出这一论断的判定依据应该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对比的结果。生产力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才算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若只用一个“高度发达”来形容，显然无法作出量化界定。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找到一些可以量化界定的根据，主要就是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之上，也就是应该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发达。既然共产国际运动的实际结果是在几个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那就意味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与资本主义共存。在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比现存的资本主义有更快的生产力发展。正如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

那么，中国怎么样呢？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据算不算社会主义？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5页。

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他说：“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只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才能算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标准。那么，现在算什么？只能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从全球化视角看，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定位，是邓小平全球化认识的思想前提。他在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似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也是“退却”，但不是一退了之，而是该刹车时就刹车，设定退却的界限，即退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又包括社会主义的“量”，是社会主义社会质与量的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昭示，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仍然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曲折性和长期性，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持久战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正视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样，我们就不能躺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上睡大觉，而应学会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共处。

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一方面使我们改革开放实现理论突破得到了重要的根据——初级阶段本身决定了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据中国现有国情，不拘泥于已有的现成理论束缚，搞一些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多种经济运行方式等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可以成为改革深入发展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使我们以低姿态走向全球化，避免“树大招风”，避免过早地树立竞争上的敌人。我们是以学生的身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

份走进全球化，就容易获得朋友，减少阻力，避免国际敌人的恶意诋毁，从而有利于我们借助全球化航班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就是为我们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提供一个坐标点，避免盲目吹嘘，自欺欺人。1985年10月29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根舍。在谈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一九八〇年建成共产主义。一九八〇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一九九〇年，也还只剩下五年。他的大话吹破了。不过赫鲁晓夫的大话有他的根据，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你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我们不讲大话，讲大话没有用。中国底子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九七九年底我们决定花二十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将拥有十二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将有一个中等的变化。"还有一点就是对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鞭策。198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总理李根模时指出："十三大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讲了到建国一百年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将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还有六十二年。我们的路还很长。以后的六十二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且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1]

中国不回避中国现实，不忌讳吸取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教训，不放弃学习西方，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在一个务实的起点上走自己的改革创新之路！世界对中国选择的改革开放之路从伊始到现在一直争论不休，但不管赞扬有佳还是怀疑重重，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30年不辍。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改革巨大成就说明了一切。

2.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

从改革路径上看，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渐进式改革。

[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978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可视为要跟市场价值取向的“半球”开始互动，这是中国跟全球化的第一次接触。2001年，中国正式进入WTO，可视为是中国跟全球化的正式接轨。2007年1月，中国大陆入世的过渡期终止，这以后，中国经济就跟全球经济完全合轨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改革是渐次推进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面对全球化挑战，有人说，俄罗斯慌慌张张跑向西方，想要借助西方现代化列车把自己拖出发展的泥潭，结果，陷入了更大的泥潭，很长时间喘不过来气；而中国稳稳当当，摸索前进，稳中求快，不仅没有被甩到全球化的边缘，而且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创新，既没有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作借鉴，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实践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第一个阶段，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局部试验阶段——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和思想准备阶段，也是改革实践初步探索阶段。以此为基础，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和思想解放为鲜明特色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全面的改革探索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进展，因此称之为全面的改革探索阶段。如果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有关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首次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内在地结合起来，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那么，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则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内容和实施方案，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

第三阶段：总结经验，整顿调整时期——从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策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这一时期，从实践上看，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调整完善政策、为更健康地推动改革开放事业

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从理论上说，是总结十年改革经验的时期，以便确立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改革思路，使中国的改革事业更健康、更稳妥、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第四阶段：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以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阶段——困境与突破同在，风险与机遇共存。中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理论重大突破，把改革开放引入到市场经济领域。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是从思想转变到实践摸索试行再到全面展开推广这样试探着前进，再三试探着接近全球化。这是一个稳妥的渐进式改革，其利其弊，曾为长期争论的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改革的步骤一般采用两种方式：渐进式和激进式。中国和俄罗斯是采用两种方式的典型的国家。对于两种方式的改革，国外经济学家的评价颇具争议性。采用激进式市场经济改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因此，他们一般赞誉激进式改革，而对渐进式改革颇有微词。但是，实践总是不给他们脸面，事实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中国没有像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在"沉默中死去"，俄罗斯也没有像他们所估计的那样在"炼狱中升入天堂"。难道经济学家的理论错了吗？

这不是经济学家理论对错的问题，而是理论实用性的问题。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才能锦上添花，否则，理论的完美性的设计往往成为实践的陷阱。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其说有一个理论指导，还不如说有一个原则指导——因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而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慢慢累积出来的。而这个原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没有现成的理论，那就不需要现成的理论，而是到实践中去摸索"理论"。中国渐进式改革就是在不断适应性中走出来的。如果以全球化视角来审视这一方式，就会发现的它的合理性。

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尝试失败以后，实际上，全球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探讨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世界环境。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立场不谈，若当时中国采用激进式市场化改革，不仅体制跟不上，而且较长时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人们的思想也转变不过

来，自然会造成混乱。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强势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就面临着“西化”的风险，因为既有西方客观范例的效应，又有西方主观演变的影响。中国要改革开放，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呼声，但中国还要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因此，最好就是在改革开放中适应，在适应中改革开放。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任何一个重大举措都会产生巨大的波动效应，若经济搞不上去，社会稳定就面临极大危险。到那时，全球化浪潮稍稍冲击一下，中国社会主义就可能顷刻崩溃——运动的车子就怕横向外力干预。中国巧妙地采用了先易后难、先浅后深的方式把改革开放的探头逐步推进去，从局部试验到全面铺开，从小规模尝试到整体性冲浪，一层层拨开改革的神秘面纱，一点点适应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从而冲破了一个又一个阻碍，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着石头过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价值导向：以抓住老鼠作为评价猫好坏的基本标准，实际上就抓住了猫的功能本质，避免因皮毛黑白这些现象的东西混淆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主次判断。“猫论”抓住了生产力这个判断改革成败的最高标准，从而避免了无谓地纠缠在“资、社”理论的争论中而丧失改革的社会实践机会。“猫论”使我们在改革中抓住重点，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从而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新境界。“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在实践中探索。改革开放首先是一个实践过程，中国又是一个复杂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缺乏，这决定了只能从实践中摸索前进。但是如何摸索？紧不得慢不得，紧则急，急则躁，躁则虚，虚则误。反过来，也不能慢，慢则惰，惰则僵，僵则守，守则失。应该说，误与失都不好，但失比误更可怕，因为一旦失去机会很难再抓住，而走入误区一般还有机会补偿。所以，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原则，基本前提是改革必须要“过河”，要往前走。即在河中，退与进同样会有困难危险，而且退没有任何前途；又不能就此止步，这也是没有前途的危险选择。唯一的生路就是进，义无反顾地进，直到彼岸。同时，不要盲目自负或者简单照搬他国经验，而是“摸着石头”，看稳了再迈步。在河里，摸到石子就意味着触到实底，避免陷入淤泥或是踩到流沙，这是稳妥的改革步骤。激进式改革也许认为这样先通过实验再推广太慢了，但是只要不跌倒而不断地前进，就会稳中求快，避免在大起大落中动荡前进。

如果说“猫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走向胜利彼岸的界标，那么，“摸着

石子过河”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走向胜利彼岸的导航舵，二者的结合，就使中国改革开放就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　如果西方经济学家要学习中国特色的改革实践经验，其实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首先自负地构建一整套经济改革理论，把一个国家的复杂的改革命运置身于一个标准状态下的框架中削足适履　改革首先从实践出发，而指导改革的理论也要从实践出发，改革再发展，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中国特色改革的全部特色之处：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是按着这样的脉络展开的——坚持“走自己的路”，按着“猫论”权衡原则“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

第四节　邓小平的全球化理论视野

是谁启动了古老中国的改革开放按钮？自然是邓小平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呈强势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存在两难选择：作为一个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家，中国有必要吸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物质条件来加快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旦与发达国家搞经济往来，独立自主就会面临着挑战，社会主义就会面临着“西化”的威胁　这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安全与发展两大价值取向的两难困境　邓小平冲破阻力，选择了改革开放，把谋求发展放在第一位　在西方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国际背景下，拨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琴弦，就要注意掌握好“左”和右的分寸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必须改革开放，这是大势所趋，是世界时代的呼唤，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稳步前进的必要保障　这里的关键就是掌握好改革开放的“度”——如果过于激进，就有可能带来政治动荡和颠覆；如果过于保守，就有可能丧失机会　中国要发展，还要安全；中国要向资本主义学习，要与资本主义打交道，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　邓小平就是在这两个价值取向中努力推动着改革开放健康发展

邓小平具有灵活性、变通性、敏锐性的性格特点，使他能够看到世界的另一面、看到资本主义的另一面　这是一代伟人的目光，深邃、宽阔！他的全球化视野务实而宽广、包容而进取，这为中国在世界大环境中，乘风破浪，全面推进改

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坐标。应该说，在提法上，邓小平并没有阐释全球化概念，但是他的思想却在客观上置于全球化的坐标中，渗透着全球化的背景和影响，因此，以全球化视野给予解读，能够开阔我们的认识，深化我们的理解。概括地说，邓小平的全球化视野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邓小平的全球时代观、现代开放观、现代发展观、现代科技观、现代体制观

1. 全球时代观

邓小平对时代的把握，视野宽广、目光深邃，以全球化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审视、定位中国的社会发展坐标。

当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两个制度之间的生死较量不再是现实考虑的问题了，两个制度必须学会在斗争中共处。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时代定义的范畴，不断的改革已经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弊端，至少把它控制在不致命的限度里，它的生命力由此也延长起来。而全球化的兴起，使处于强势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转移各种矛盾的机会，这使它甚至获得中兴的势头。相反，年轻的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把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和模范形象保持下来。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主义和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它僵化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造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遭受重创。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苏联除了争霸以外，无法起到聚拢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模范作用了。当然，处于晚年的毛泽东依然坚定世界革命的信念，只不过由两种制度斗争转变为第三世界大联合并尽可能团结第二世界，反对世界霸权主义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冷静地观察了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认识到时代主题正在发生变化。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冷战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形势逐渐露出缓和的迹象。咄咄逼人的苏联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强硬的攻势外交开始缓和起来，而美国正在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经济恢复渐显，里根政府的外交也采取了一定进攻态势。这样，攻防转换，力量消长变化，暂时出现均势局面，逼近的核危机开始松缓了一些。美苏开始寻求外交谈判军控问题。正是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发现了时代主题转换的端倪。1983 年 11 月 23 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时指出，虽然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至少五年内打不起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如果争取到十年不发生战

争，那对我们是最有利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总是利用时间发展自己。[1]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国际政治视角，认为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大国，因此，要争取世界和平，还是有机会的。在核冬天的云雾里，在冷战的阴霾中，邓小平看到了争取世界和平已经是世界人民的呼声，在这方面，搞霸权主义的美苏越来越孤立。所以，他认为争取世界长期和平是可能的。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明确指出，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他告诫美国，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2]就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形成，并一经他阐述出来，立刻引起世界共鸣。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3]这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说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的力量合作。"[4]同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5]

和平问题是世界和平问题、发展问题是全球发展问题，两个主题交织存在，是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体现世界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世界战争从来没有停息过，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迫切呼唤和平。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依然生活

[1]《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页。
[2]《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5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8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96页。

在贫困、疾病之中，世界发展问题成为制约和平问题的最基本因素。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普遍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和平，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所以，世界需要和平，也需要发展，只有二者共进，才能带来世界的团结和繁荣，才能带来世界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休戚相关，是中国时代最强音。深谙世界环境的主要脉络，才能全面把握中国国内的关键点，才能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之中，避免“孤舟独钓”的境遇。邓小平把握住时代的主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修正了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的过高估计以及对战争引起革命的过于乐观的估计，理性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长期性。由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不再只是一个战术方针，而是一个需要长期执行的战略方针；埋葬资本主义也不再被看做是为期不远的目标，而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视为长期的战略任务。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有助于我们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作出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必要。苏联模式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采取这种模式的苏联曾经被当做后起而又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和追求理想社会的样板而发生广泛影响。苏联计划经济的尝试，还曾经对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起过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战后时代主题的转换，苏联模式发展战略的积极作用逐步弱化，其体制潜力也逐步耗尽，终于走向衰败。邓小平从全球化的高度，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正确的回应，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1]坚定不移地实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实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危机中兴起。所以说，苏东剧变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并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的全球化时代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它既是世界时代主旋律的客观反映，是世界人们的共同心声，也是在新的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提供了理论根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2. 现代开放观

邓小平的开放观的形成，是站在历史高度，从过去的教训中吸收营养，又站在世界高度，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获得启示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发展失去了很多机会。经过十年"文革"的教训，邓小平深切感受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旅行团正副团长时，坦率地指出，我们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1]这反映出一代伟人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现实主义精神！知耻近乎勇，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历史的教训中，感悟到中国亟待对外开放、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

面对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历史的巨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邓小平以全球化的视野观察世界，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根据"开放的世界"这一国际背景而提出来的。"开放的世界"这一论断事实上就是对全球化趋势的深刻揭示和科学预见。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概念，而且把对外开放提到国策的地位，把它作为长期的发展国家的大政策。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放。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吉布尼和加拿大客人林达光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3]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但是，

[1]《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1]

对外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因此，“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2]在邓小平看来，开放是全方位的，是对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3]这就指出了开放范围的世界性。邓小平认为，开放要分阶段、分地域地逐步推进 先建立经济特区，进而开放沿海城市，逐步形成沿海、沿边、沿江直至内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发、开放大格局，使我国能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努力发展自己。这就指出了开放的有序性问题。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提出多层次开放的思想。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走进历史的长廊，我们不难发现，从远古时代的血缘交往、战争交往和契约交往到近代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再到当代的科学交往、信息交往等，昭示出人类的交往过程不仅表现为“交往圈”的不断扩大，同时又体现为交往层次的不断增多 这一趋势要求中国的开放不仅应是全方位的，而且应是多层次的

邓小平全面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科学地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内涵，提出对外开放的步骤和发展格局，把对外开放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那么，如何理解邓小平的现代开放观？

第一，深刻总结我国社会发展和世界历史经验，把对外开放提升到规律性的高度，从而明确提出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权益之计，而是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封闭—落后，开放—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看，凡是主张对外开放、发展与世界交往的时代，就是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时代 反过来，国力衰退、经济停滞总是与闭关自守政策分不开 邓小平纵横古今，总结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

[1] 《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7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7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0 页。

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是一面镜子，闭关自守是保护落后的政策，落后必然要挨打。要避免中国再度陷入贫穷落后，必须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再一次从生产规律的高度，对吸引和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明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论述。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一是社会生产方式，就其本质来讲，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闭关自守不符合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和速度，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第二，阐明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指出对外开放是以独立自主为根据的对外开放，独立自主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强自力更生能力的独立自主。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的观点。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对外开放不是崇洋媚外，更不是搞全盘西化的科学论断。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决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既不指望依靠别人的恩惠施舍，也不接受任何他人的干预和摆布。舍此立足点，对外开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经验的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2]但我国的自力更生，是在对外开放中的自力更生，而不是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自力更生。我们决不能把自力更生理解为自己孤立，封闭起来、拒绝国际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外开放不是搞西化，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开放的原则应是有利于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对外开放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我们就采用　总之，立足于自力更生为主，又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原则，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关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思想，直接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实现了利用外资、发展自己，取得了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

第三，科学地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步骤，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首先，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我国的开放是对所有国家的开放，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分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的内容是"三个方面的开放　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从那里来　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着主要指同他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技术改造等　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2〕邓小平认为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走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可以使我们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其次，对外开放是多层次的开放　多层次是指对外开放的布局　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历史上的对外开放模式的研究，又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和经济贸易条件差异悬殊、不宜同时开放的具体国情，决定采取从沿海到沿江再到沿边、内地多层次逐步推进的步骤　再次，对外开放是宽领域的开放　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仅限于经济贸易，而且包括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合作都需要发展"〔3〕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揭示了多渠道、宽领域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可以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观，从广阔的世界背景中提示了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开放趋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世界文明发展必然产物的理论的权威，重新把社会主义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当然，邓小平的开放观，如果从全面意义上看，还包括对内开放　从解放思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3〕《人民日报》1978年10月12日

想到实施全面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内开放的过程。这种开放，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渐走向市场规律导向的商品经济的放开过程，是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到更能体现民主集中制精神的新型政治体制的转进过程，是从人治化逐渐走向法制化、制度化的完善过程。因此，1985 年 4 月 15 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指出："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

3. 现代发展观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的国度之一。但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2]在列强威逼、内政腐败的艰难时运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开始缓缓启动。从那时起，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国家当下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无怪乎 1989 年 7 月，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要制裁中国时，邓小平"马上就联想到一九 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3]因而，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发展。没有国家的发展，没有民族的振兴，中国就永远不能摆脱被侵略、受屈辱的命运。

中国经济落后、国力贫弱的局面，对邓小平来说，如毛泽东一样，也是不可容忍的。恢复均势的方法变了，从光荣的孤立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学习，但目标未变。中国已宣布，不仅仅是发展旧式重工业（西方一些观察家认为发展旧式重工业是浪费资源的错误方针），还要在高技术领域赶上世界水平，这是一个象征，反映出中国的远大抱负。由此观之，虽然老一套唯意志论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但始于五四运动的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如何适应现代世界潮流，仍然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4]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7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2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8 页。
〔4〕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5 页。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文革”历史错误，指出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对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性，指出发展符合人们的利益要求。1977 年 9 月 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指出，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群众反对“四人帮”，主要是反对他们不让劳动，不让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不让那些在艰苦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人多收入一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对外贸易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1]

中国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承并发扬光大，发展起来是首要的前提。否则，任何理由都无法证明社会主义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东西。邓小平在 1980 年 4 月 1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同年 5 月 5 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3]1981 年 3 月 24 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指出，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4]

[1] 《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4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1—312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4 页。
[4] 《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4 页。

如果说，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最早是基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挑战和压力而引发的对祖国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的结晶的话，那么，随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到来，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则更加坚定、更加深化和丰富。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由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敏锐地洞察上述变化，从全球战略和全人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认识问题，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经典格言，中国的发展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发展是应付世界上诸多国家已步入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所作出的重大选择。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压力和挑战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现在，周边国家的迅速崛起，对我们构成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1]"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2]邓小平这种致力于中华民族腾飞的雄心壮志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是他关于中国发展思想的活力源泉。

中国要在世界中挺胸屹立，发展壮大就不是一个简单地追求目标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中国致力于发展目标，绝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尽快地发展起来，不是一代人的使命，而是几代人的历史使命。1981年11月13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雅奈科维奇时强调，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至少要三四代人来干这件事。这个转折是我们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会实现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3]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4]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因此，“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2]邓小平深刻指明：“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3]因此，中国的发展则不仅能维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以发展为当代世界的战略问题、核心问题的情况下，邓小平以全球化眼光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统一起来，明确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中国应当与整个世界的潮流相吻合，中国出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机遇，中国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4]，中国越发展世界和平就越有基础，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如果中国实现了发展目标，就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指出了一条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5]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会见以五岛升为团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社会是否有利的问题：“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6]同年 4 月 17 日，邓小平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指出，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但也要靠朋友。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赢得朋友，来加速我们的发展。[7]这不单是中国自身的需要，我们不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7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8 页。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3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4 页。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9 页。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7] 《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7 页。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的发展将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当时，西方一些社会主义反对者弹冠相庆，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历史性大失败。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向世界展现出社会主义的希望之光，这一切对于当前处于逆境中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2]1991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强调，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3]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发展"的目标，邓小平还用全球化视野和世界眼光看待和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他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他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辟见解、他的造就"四有新人"的重要思想等，都表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问题设计的重点是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兼顾到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发展问题。唯有这样，才能在全球经济的大调整、大竞争、大发展的潮流中，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纵览邓小平现代发展观，体现出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没有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先进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单纯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获得稳定的政治环境、持续的动力支持和高端智力保证，从而经济就不会持续、平稳地健康发展，所以要两手抓。反过来，中国一切发展问题核心一点就是经济发展问题。物质基础是一切发展的先决条件。抓住经济发展，其他方面发展就有了保障，有了根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难题，最终能够顺利解决，最基本的保障就是拥有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王牌。另外，从世界视角来看，中国把经济搞上去，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有保障，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就会有底气。

当然，邓小平还有更广阔的发展视野，那就是探讨世界发展。邓小平认为，发展作为世界时代的最主要的主题关键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另一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方面发达国家应该给予积极的帮助，而不应该在国际贸易中只顾对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解决南北问题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1]但是，邓小平更强调自力更生原则，他在这次会见时特别强调，人越富，越吝啬，要他让一点，他不肯。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我们虽然很穷，但穷国之间的合作余地还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长处，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全球的发展视野，代表着中国对全球发展问题的根本看法。

4. 现代科技观

科技化是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一场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高新科技的运用推动着现代生产力飞速发展，使“世界历史”日益成为一部“全球村”、“地球村”的历史，“全球村”、“地球村”迎来了“光与电”的时代。如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并没有过去，以电子、信息、基因、核子、分子、太空、生态、系统、人工智能等概念为理论系统的新科技革命尚未完成，在世界各地，尤其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掀起更大的浪潮。正因为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并且科技的发展具有连续性、递进性的特点，又具有可超越性的特点，所以它对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既提出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不仅不发达国家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而且发达国家也要再发展。这就使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如果发展中国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利用科技进步优势，并与本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就可以使其产业结构、经济基础甚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较大的改变，就有可能在21世纪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强有力的地位。如果说发展是时代主题之一，那么，科技就是发展的主题之一，是发展之冠上的明珠。全球化时代是竞

[1]《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页。

争时代，竞争是以科技为基础的竞争。高科技已经成为综合国力中的核心要素

长期以来，我们都沉浸在“人多力量大”的氛围中，对人力的理解偏重于体力劳动，而有意无意贬低脑力劳动。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成为阶级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新型的社会主义特别注意提升体力劳动的价值认识 但是，物极必反。为了消灭阶级差别，仅仅从分配角度完成平等，就会在生产领域中造成新的不平等。由于看不到或者有意忽视脑力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潜在性和深远性，脑力劳动社会贡献往往被消解了 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够，科技转化物质生产的效率不高，科技工作者除了追求政府制定的科技任务外，没有积极性从事全面性的科技创新 所以即使是科技大国，也不过徒有虚名，因为科技与生产之间缺乏沟通的甬道。

作为改革开放设计师的邓小平，已经看到了一个科技竞争的时代、一个科技飞跃进步的时代、一个科技强国的时代，所以，他才特别关注中国科技的发展问题。1977 年 8 月 4 日—8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要统一规划。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1]

正是在深入揭示科技生产力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结合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2]在这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对此，有一些文章分析指出，马克思早就做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列宁、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 问题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58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7 页。

是，经典作家强调科学技术，主要还是从劳动生产力的角度出发的，他们认为生产力由三要素组成，其中最活跃的因素乃是劳动者，而劳动者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邓小平的贡献则在于把科学技术从生产力要素中突出出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它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而且发展了这一学说。

邓小平所以能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卓越思想，首先得之于他对新科技革命的深刻感悟。“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1]其次得之于邓小平对科技生产力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直到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他又一再提醒大家：“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特别是当代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起步，更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指出中国要“从长远利益着眼”，“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的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

另外，邓小平不仅把科技生产力当作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人们一般认为，是否抓住科技生产力仅仅涉及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快慢而不会危及社会制度。邓小平一反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超凡的洞察力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精辟地指出，事情绝非如此。苏东剧变后，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在所有的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机遇”，要不然难赶上世界的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279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经提出，就成为一个号角，传遍中国大地，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但是如何才能把科技抓起来？也就是说，仅仅看到科技重要性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落实，要在实践中贯彻下去。在邓小平现代科技观中，科技发展主要靠两个方面：从国内来看，主要靠教育发展，从国际方面看，还要看到科技成果和人才的国际交流。邓小平认识到，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土壤，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温床。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时着重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1977年在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邓小平也意识到引进科技成果、引进人才对于加速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性。1977年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肯定他提出的《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认为，科学领域，总是后来居上，否则人类不能进步。要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发现有前途的，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助他，早出成果。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2]1985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在谈到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时说，日本战后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为了掌握和发展技术。你们的这一宝贵经验我们还没学好。这与我们的教育不发达有关系，现在我们是知识不够，人才不够。今后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并在这些合作中真正学到你们的经验。我们也要同欧洲、美国进行合作。在所有的合作中，都要学习这一点。[3]1977年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韦尔纳，在回答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是什么时认为，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也就说，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但从根本上还是要通过自我的教育与科学的发展。[4]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2]《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2页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8页。
[4]《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展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也逐渐铺展开来，这无疑是促进中国科技进步的根本性举措。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科技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的推动下顺利开展起来。星火计划、863计划等一批科技发展蓝图先后出台，在不同的时期，为中国科技发展作出贡献。同时，涌现出一大批科技专家和杰出人才，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脊梁。这都为我们今天提出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时刻把握新科技革命的脉搏，大胆迎接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从中提炼出当代中国发展的契机，是邓小平全球化思想最鲜明的思维品格。邓小平是把中国的科技发展纳入到全球科技发展的潮流之中，借助全球的科技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动力，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这就为实现"跨越"但又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指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5. 现代体制观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化语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搞计划经济的国家，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僵滞局面，通过积极主动或被迫的改革，纷纷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加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资源配置、世界经济运行的秩序，几乎都是由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安排，这一切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改进版"：计划经济、中央集权、事实上的平均分配机制、重工业化优先等特点。这是实行赶超发展战略的基本体制，因为它可以迅速集中整个国力办一些重要的经济项目。客观地说，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起步阶段实行这种体制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它的优点另一面就是缺点——当它能够集中力量办重要经济项目时，就容易忽视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平衡性。在较短的发展时间里，这个问题不突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明显。但是，经济发展持续一段时间后，经济不平衡性加大，问题就突出出来，经济发展的平稳性就被打破了。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实行苏联模式的国家总是开

[1] 《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

始时发展势头喜人，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出现波动，最终陷入困境。这说明，这种体制不是一个永久的最佳模式，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

经过“文革”波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放弃僵化的旧体制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指出，我们正在搞体制改革 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消除。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当作一场革命，当然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人的革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算是第一个试验。[1]同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最近我有两次讲话，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2]就这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先后开展起来。当然，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直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体制改革，在当今世界，总的来说，只有两种基本体制——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两种选择：要么在计划体制中修修补补，小打小闹，震动小，风险小，但发展空间有限；要么搞市场取向改革，乘风破浪，风险大，发展空间也大

邓小平不但看到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所取得的肯定成果，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他以全球化的视野和实事求是的胆略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体制改革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指出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要突破

[1]《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3—40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通过以后，邓小平认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中国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虽然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全球化的节拍，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毕竟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首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格隆瓦尔德问："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

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取向的改革中，如何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本色？体现社会主义优势？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做了回答："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的，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

的确，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既是一次创新尝试，也是一次风险行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中国没有别的选择，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改革。1985年11月11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拜访邓小平时指出，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邓小平幽默地说，不说是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个重大的试验。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迎来了另一个转折点，就是着手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为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体制改革发展最终目标，是中国走向世界，与全球化全面接轨并完全融入全球化的关键一步。当然，经受苏东剧变和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或者说敢不敢迈出这一步，受到世人关注。中国共产党人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多次召集专家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又是关键时刻，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正是邓小平一句强音，中国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信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回答和解决了三个根本问题：一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解除了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范式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固定观点的束缚，设计了通过现代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关键要看哪种手段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消除了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人为对立，阐明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三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内涵的三个主要方面，打破了对计划经济的盲目崇拜，使我们从理想形态社会主义和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框架的束缚中走了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出来，并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且，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一般经济手段的抽象，而是把它提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提到“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高度来认识的。这就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不敢加以吸收和利用的思想观点的束缚，设计了一条通过现代市场经济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新路。

上述分析表明，邓小平虽然没有公开提到“全球化”，或对“全球化”的概念及其客观必然性作出明确的阐释，但是，他以特有的睿智和远见卓识，不仅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向世界经济互利发展的道路，而且为全球化趋势指明了发展方向，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全球化理论视野。邓小平的全球化视野显然秉承着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但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仍然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学者竹内实评价说：“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1]

作为一位时代的巨人，无论是在全球化的认识层面，还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层面，邓小平都显示了他独特的远程视野。他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敢于突破毛泽东既定的传统框架和思维惯性，因而迈出了毛泽东始终没有迈出的一步，从而使中国这个曾经沐浴强汉盛唐雄风的东方文明古国，终于以恢弘的全球化目光再度推开了尘封已久的门窗，以更加自觉的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这是由于时代变迁而引致的社会进步，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但现代人无论多么高明，都不过如牛顿所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如果说，毛泽东的全球化思想遗产是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的奠基，那么，邓小平的全球化理论视野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的形成。“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就是中国主动地、渐进地参与全球化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回应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一次颇有力度的理论提炼和升华。它不仅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地、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社会主

[1] 竹内实：《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17 页。

义，因而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同时，从世界范围看，全球化正面临着发展困境（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和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都是其突出表征）“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作为全球化困境下的一种理论“突围”，将通过各种传媒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世界人们的视线。

总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使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理念，又使社会主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正是这种生机和活力，为当代形态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必将成为当代形态的社会主义逐步走向成熟的伟大契机。

第五节　世界视界的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

1. 国外对邓小平的评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掌舵者，在实践中所起到的启动助推力和方向牵引力的双向作用，使邓小平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人！他带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一位名扬海外，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政治人物。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享有非常高的历史评价 其实，国外对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新中国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人的理论研究，比较多，评价也各有千秋。但相比较而言，对邓小平评价分歧较小、赞誉度较高；而对毛泽东评价的争议性较大，褒贬不一。这当然与两位伟人实际人生经历和对中国发展的作用的客观事实紧密联系着，评价结果的差异只不过是各自价值判断的侧重点不同造成的。毛泽东一生充满传奇经历和自相矛盾的做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贡献和误导的双重效果，使得评价复杂多样；而邓小平一生虽然一样传奇复杂，但他的政治作用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脉推进的、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条主脉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展开，那就是解放生产力，把中国尽快地推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所以，评价不可能大褒大贬，两极对立 长期以来，中国改革，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成功的典范。甚至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一枝独秀，几十

年持续前进，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使得世界非常关注邓小平。30多年来，国外舆论、新闻媒介和学者对邓小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报道。

第一，国外对邓小平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国外媒介和学术界已陆续开始了对邓小平的介绍研究，尽管较多地是作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的配角出现。70年代，随着“文革”后期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抬升，特别是他在“文革”中传奇般的经历，引起了国外媒介和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国外的报道和研究焦点逐渐聚焦在邓小平身上。80年代初，邓小平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新政策的主导者，中国未来走向已经倚重于邓小平的设计谋划和决策，这使得国外公众和社会舆论兴起“邓小平热”，对邓小平及其思想的研究开始增多起来。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的重大突破并带来经济巨大发展，国外对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1985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1985年新闻人物，并宣布，邓小平“今年当选是因为他在中国实行了十亿人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同年12月，美国《成功》月刊宣布，将邓小平选为1985年的成功者。1986年，《成功》杂志在第一期刊登了《纽约时报》前记者索尔兹伯里撰写的介绍邓小平的文章《中国的首席行政负责人》。1988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同当选为美国《世界报》评选的十年风云人物。这一时期，国外对邓小平生平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连续不断地发表评价邓小平的文章，一度有人提出要对邓小平进行重新评价。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了改变。1992年初，邓小平到中国的南方视察，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再次引起国外对邓小平的关注。1992年4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以《邓的复活》为标题，并以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部分照片为封面，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进行了专题报道。1992年12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宣布选出邓小平为“1992年风云人物”。这以后，国外邓小平研究再次兴起新的热潮，学者们开始从对邓小平和其思想的一般性介绍和解释转向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可以说，国外学者一般是通过研究、评价邓小平本人的社会实践，来研究邓小平的思想的。因此，研究邓小平与研究邓小平的思想的著作很难截然分开，很多研究邓小平思想的著作或多或少涉及对邓小平本人的记述和评价。这一点，与国内研究不同。我们对人物的研究与对其思想的研究，还是有较为清楚的界限

的。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及邓小平的著作是美国军人埃文斯·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该书于1940年在美国出版。卡尔逊在书中介绍了与邓小平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他说邓小平的头脑像"芥末一样辛辣"。此后，日本学者吉田东鎨所著《中国革命的一百零八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漫长的中国革命》等都对邓小平有或多或少的介绍。1977年，日本学者和田武司和田中信一共同出版了《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这是国外最早出版的邓小平传记。而较早一些比较详细介绍和描述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主要代表有：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英国记者那维亚《邓小平传》、法国记者诺拉·亚《邓小平：法国岁月》、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日本学者内藤雄三《"五尺巨人"邓小平》等。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对邓小平的生平实践活动，特别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活动作了详尽的描述。为此，作者曾专门到法国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为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随着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越来越为世人瞩目，国外对邓小平生平和邓小平社会实践的研究也增多起来，包括：美国学者杨中美《建立实用共产主义：邓小平早期生活1904—1949》、戴维·W.张《政治家邓小平》、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回忆邓小平》、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J.德雷尔《战士邓小平》、美国学者巴里·诺顿《经济学家邓小平》、卢西恩·派依《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马丁·金·怀特《社会改革家邓小平》；英国前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斯《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法国学者帕特里·萨巴蒂埃《邓小平传》；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等；俄罗斯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的革命生涯》、杰柳辛《邓小平—革命家、毛泽东主义者、改革家》、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所著《人们在议论他们——国外活动家政治肖像》和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波尔加克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等；日本学者本场康治的《邓小平的长征》、天儿慧的《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邓小平》、小川平四郎《父亲的中国和我的中国》；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明翰《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等。

第二，对邓小平风格特征与历史地位的评价。国外对邓小平评价主要集中两点：一是对他的领导风格和性格特征的评价，一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

（1）对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和性格特征的评价[1]。由于国外比较擅长对人物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的研究，对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和性格特征研究是一个侧重点 除了一些人进行所见所闻的简单描述性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进行比较研究。在他们看来，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强调用组织和制度来治国、治党、治军，避免人化政治 邹谠称邓小平为“典型的组织者”，巴拉奇·代内什称邓小平为“杰出的组织者”，戴维·W.张称邓的领导特征是“偏爱组织处理”，是“一位按制度办事的官员”，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泰韦斯和国分良成一致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还有一些学者强调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务实”是邓小平的典型特征，邓小平所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他现实主义的缩影。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到1986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 杰柳新认为：邓小平的思想不是来源于书本，他蔑视书本中的说教，在邓小平看来，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对他来说，知识的源泉就是不断变化的生活。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践哲学。有的通过比较来获得相类似的结论。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沉迷于诗行的空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戴维·W.张指出，像刘少奇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也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 不过，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邓小平的务实是一种实用主义，对此，施拉姆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他说，邓小平并非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种“实用主义” 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代学到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邓小平是一位敢于接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 内腾雄三认为，邓小平和周恩来代表了“刚”与“柔”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而且这两种

[1] 参见张文琳、马启民：《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风格个性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风格都是成功的，在邓小平身上充满了“反骨精神”。戴维·W.张通过比较得出，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另外，还有一些人注意到邓小平性格的另一个特征“忍耐”，这也许缘于邓小平三起三落的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芬兰前首相说道，我们芬兰语有个特别的词：忍耐，含义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邓小平丰富的人生阅历特别是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日后多次到国外出访经历，是另外一些国外学者在分析邓小平性格特征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因此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极有见识的人物，丰富广泛的阅历是他具有远见卓识的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奥克森伯格在他的《回忆邓小平》一文也写道：1989年底，邓已经上了年纪，受到悉心周到的护理，但他一直到最后依然是一位大胆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始终拥有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敏锐而求知若渴的才智。

（2）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1]。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世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此，国外学者非常有兴趣做出自己的判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5月、1993年3月，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东亚与非洲研究所和美国洛杉矶举行“邓小平业绩研讨会”。通过研究和探讨，国外学者得出了以下结论。

其一，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杰柳辛对邓小平的评价是：“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破坏他的这种信念。”[2]

其二，邓小平是当代成功的改革家。美国学者派依在为会议撰写的论文《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中写道：邓小平是位改革家，中国特色的行政专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

[1] 参见武市红：《国外邓小平研究综述》，《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
[2] 〔俄〕杰柳辛：《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

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还有的学者写道：邓小平是政府行政首脑、外交家；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他第三次复出后，成为伟大的经济改革家。

其三，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之父。还在邓小平生前，人们就曾这样称呼邓小平。1992年12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宣布选出邓小平为“1992年风云人物”。他们认为在全球经济连锁性衰退的过去一年中，能够作出杰出成就而又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只有邓小平一人。《金融时报》解释选邓小平为“风云人物”的原因时说，他在1978年使中国对外开放，1992年又使中国经济改革推向新高潮，中国的政治、经济、商业越来越受全球重视，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肯定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绩，激起新的市场经济改革热潮，使中国经济取得了12%的增长率，成为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邓小平逝世后，《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将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事件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之父亲》为题，盛赞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其四，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卓越领导人，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家。在冷战结束后，他为争取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威廉·奥弗霍尔特指出：邓小平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取得了成功。他不再促进非洲的革命和东南亚的叛乱活动，他从苏联的战争边缘后撤，退出了同日本和美国的对抗，他发起了同台湾的贸易、投资和旅游计划。邓小平发明了“一国两制”的概念，以此作为不通过军事对抗收回香港和台湾的手段。在干完这些之后，他把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5%削减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25%。

1997年2月20日，也就是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学术讨论会，会议的题目是“邓小平的逝世与评价”。与会者普遍认为，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以他的政治领导、智慧与影响，对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繁荣、和平、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从他的英明领导中受益，整个世界也从他

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努力中获益，邓小平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人类史册。

有“毛泽东研究权威”之称的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于1992年在日本《外交论坛》杂志撰文提出了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上引起震动的独特观点——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4号人物。他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竹内实对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但是就其历史地位的判定还有待商榷，因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各方面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人物比比皆是。如果说毛泽东最大的历史贡献是统一了中国，是中国获得了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条件，那么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就是使得中国逐渐找到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从而走向正轨。两个人都是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贡献的伟人，然而他们的历史地位有多高，是否排列到第三、第四的位置，这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1]

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作了多方面研究，观点分歧很大。如果用二分法来评价，国外的研究有新鲜的见解值得借鉴，而国内研究材料充分，论证充分。以全球化视野来审视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应该说，观点有相对的客观性和一定可信度。更确切地说，国外学者的研究表现出来的鲜

［1］参见武市红：《国外邓小平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

活的视角和富有创新性的评价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尽管因所用论证资料的偏颇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他们研究成果中存在很多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和对待资本主义外交立场的转变，以及十年改革带来的巨大成就，国外公众和社会舆论逐渐兴起"邓小平热"，学术界把对中国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专门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中国、台湾与香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谢伟思《"延安精神"与中国的改革》、新加坡学者林佳君《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前苏联学者雅科夫列夫《邓小平的政治肖像》、日本学者小岛朋之《中国的政治社会—探索邓小平以后》、《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与摩擦》、日本公立女子大学教授天儿慧《中国改革第一线—邓小平政治展望》等。其次，还有一些学者的专著和文章中涉及邓小平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与实践研究，如美国学者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马克·布莱彻《中国：一个反对偶像崇拜和厉行革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卫·巴克曼《对毛以后中国经济的不同看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鲍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和《1985年的中国：革命的青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员鲍大可《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的中国—新中国40年》和《毛以后的十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吉米·卡特《忠于信仰》、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加拿大学者福尔肯海姆《毛以后的中国民主、现代化和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调研员小林弘二的《现代中国历史1949—1985》、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冈部达味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再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等。再次，有些著作专门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做了研究。日本学者矢吹晋《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冈部达味和毛里和子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天儿慧的《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和《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伊藤诚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高原明生的《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国分良成的《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和《"邓小平时代"的成果》；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美国杜克大学历史教授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论"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杰柳辛的《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阿·布坚科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波尔加克夫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法国学者夏泰宁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观念的变化—写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等。另外，涉及邓小平个人思想的著作有：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的《中国未解决的问题：政治、发展和文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莫里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弗朗兹·米切尔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朱恩·丢弗尔·德莱耶的《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理查德·尼克松的《角斗场上》；日本学者小林弘二的《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与发展战略》等书。还有，就是与新中国其他重要领导人在治国方略上的比较研究。其中代表作有：戴维·W. 张的《中国领导接班人危机中的周恩来与邓小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贝·巴克曼的《陈云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泰韦斯的《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英国政治新闻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斯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英国学者约翰·加德纳《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德国外交官埃尔维因·魏克德的《1976—1980我在中国当大使》、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渡边利夫和小岛朋之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天儿慧的《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竹内实的《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等等。

从总体上说，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角度较活，因此观点和结论也比较有个性。由于历史观不同，国外学者更注重研究邓小平本人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这与国内从唯物史观出发，主要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客观要求出发研究邓小平对邓小平理论的贡献是不同的。

第一，关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和现实的横向比较得出了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几种看法。（1）邓小平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更强调效用原则和贯穿实用主义。新加坡的林佳君认为："邓小平在领导这场改革时，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

题。贯穿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1]日本的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中国经济搞活的一切试验都不是那种依靠某种口号动员群众，一举在全国实行的试验。完全相反，开始是在某个单位和地方进行初步试验，当这试验在其他的某个单位和地方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并且这种有效性被大家都承认时，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追认这些试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扩大。

（2）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和平的渐进的革命”，是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这场改革“与以前的革命相比”，其“特征不是革命的言辞和方法，而是渐进性的、阶段性的政策改变”。[2]邓小平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缘于他的“摸着石头过河”思想。一些学者给予了充分肯定。日本矢吹晋指出：“邓小平没有深奥的哲学和理论，但他的智慧却是非凡的。同那些具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的事实相比，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3]俄罗斯波尔加科夫甚至指出：“邓小平能够踏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认的领袖。”[4]

（3）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新加坡的林住君强调，无论从改革的类型、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因为经济的改革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政治改革。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意味着党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国家的直接控制也转为间接控制，控制的手段不再是政治思想，而是经济政策和渐趋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影响渐渐消退，法治的思想开始抬头。

关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剑桥中

〔1〕〔新加坡〕林住君：《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及国际影响》，《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2〕〔美〕格里特·龚：《中国的第四次革命》，刘海藩、杨春贵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五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997页。
〔3〕〔日〕矢吹晋：《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6期。
〔4〕〔俄〕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认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部分实行对外开放，但当时的开放只是“解决中国安全方面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而邓小平时代的开放，是一种全面的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通过开放，中国的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美国的鲍大可也认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为了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是国家经济利益问题。迈克尔·亚胡达认为：“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当中，邓小平是惟一一个既能坚持共产党专政，同时又领导他的国家成功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1]

第二，关于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的研究。邓小平被国外学者誉为“经济学家”，并不是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有什么杰出建树，作为中国政坛上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经济思想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他经济思想的实践性、现实性，在于他杰出的经济改革。这是任何学者型的经济学家都难以做到的事情。美国学者巴里·诺顿则强调，邓小平没有什么思想要强加给社会，因而，他愿意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让经济（不是政治）发展按其发展规律自然展开，党和政府不经常予以干涉。他本人表现出了任经济按自身规律发展的才能。但这些学者同时认为，邓小平并不是绝对的不干涉经济。诺顿指出，虽然邓小平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政策的判定，但这少数干预往往是关键性的。邓总是确定政策的总方向，在关键时刻把握航向。在15年里，邓亲自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四五次，但每次都是关键性的。

在经济发展战略中，邓小平第一个大手笔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优先发展工业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战略理念，而是强调农业和轻工业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部分发展的重要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写道：中共从1978年12月做出决定：调整整个工业发展的重心。这次转移同苏联的转移不同，苏联的计划往往要求人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配中仍占优先地位。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所谓调整时期，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分突出。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下降

[1]〔英〕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是出口的增长，增长速度是过去的几倍。在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主要是轻工用品。出口收入成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吸收资金，并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资助性贷款。日本学者小林弘二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农村发展战略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认为农业和农村问题重要，他们对国情的基本认识没有什么区别，但两人制定的农村发展战略不同。毛泽东的发展战略是建立集体农业，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重视粮食生产，实行城乡分割。邓小平主张实行家庭经营农业，尊重农民的自主权，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重视多种经营和农村城市化。显然，实践证明，邓小平的主张更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第三，关于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领域也发生了空前变化。国外一些学者对邓小平在改革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贡献也给予了极大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法制建设思想和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英国的理查德·伊文斯认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2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1982—1986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鼓励党内老党员集体退休。从1986年起，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提出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费正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依照伦理统治改变为依照法律统治。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司法体系。美国的弗朗兹·米切尔认为，邓小平强调法律规范的意图在于，无论是领导人变更，或不论是领导人怎样改变他们的观点、转变他们的注意力，都要确保制度和法律保持不变。邓小平着意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扩大矿山、工厂和其他企业以及生产队的自主权。另外，对邓小平主张建立的干部退休制度和邓小平的退休，日本的天儿慧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4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同一个人物，除死亡和政治上丧失地位之外，几乎都继续保持原有职位。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邓小平对这种老化的领导体制有着深刻认识。因此，他才有彻底变革的决定。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和戴维·W. 张也认

为，中共领导人虽更迭，但其基本国策不变。邓小平的成功引退，留下了颇尽其意的人和政策，他创造了一个巧妙的政治奇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从政治舞台退下来之前就已挑选了不同年龄段的人接班，这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历史是第一次。

第四，关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研究。邓小平是把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带向西方世界并努力争取与西方世界保持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的第一人。他虽然对西方保持着高度警惕，不遗余力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但他对西方没有敏感性的成见，实事求是地愿意通过学习西方、联系西方来促进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交表现出更大的灵活适应性、务实性和内敛性，真正实现了既保持和西方的合作往来，又保持自身政治独立性、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因此，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在中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日本的高原明生称邓小平是“外交掌舵人”。英国的迈克尔·亚胡达则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很可能是在外交政策的决策方面留下个人印记的最后一位中共领导人。自 1978 年以来，邓小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可以享有国务活动家的荣誉。邓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在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和定位，以及他再次使中国同世界连接起来。他领导他的同胞从长期阶级斗争的仇外破坏状态走向经济发展和繁荣兴盛的道路。作为国务活动家，邓小平的最重大的功绩就是领导中国走向新的时代，使倒退到封闭和不民主状态成为不可能。”[1]

关于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每位学者的具体解释虽然略有差异，如“全面实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全面外交”以及“不同任何国家保持同盟关系的‘全方位’外交”，但大部分人都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概括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并从多个侧面探讨了邓小平全方位外交战略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英国的迈克尔·亚胡达从中国内政变化来探讨中国外交的转变。他认为中国外交从毛泽东的“革命外交”向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内政有了重大变化，邓小平通过把中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创了中国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意义重大的转变。有人则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基于他对世界局势判断和时代主题的认识。美国的鲍大可强调，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中国领导人这样一种基本看法，即全球地缘政

[1] ［英］迈克尔·亚胡达：《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 年第 1 期。

治形势的改变，已经减少了外部对中国的战略性威胁和所造成的危险 美国的石池雨则指出，邓小平的外交着眼于维护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五，关于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的研究 对于邓小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是彻底修正，国外学者的认识曾经有一个观点转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外曾流传过中国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正在进行一场"非毛化"的运动的说法 1977年5月11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辞职书》，称中国是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拨乱反正的实践活动中坚定地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没有掀起大规模的批判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使得一批学者冷静地认为，毛泽东留下两种不同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正确和错误两个部分，因而肯定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

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看清方向的时候，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 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的轨道上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这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 他还写道：在我翻译《邓小平文选》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那部分 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这样，中国的团结与稳定得到了维护 英国的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 在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中国今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别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则是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作为他政策的中心 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保证人们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而邓小平则强调，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 日本学者大泽鍈也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人的相同点是两个人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不同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认为：在上层建

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精神作用，是“抓革命，促生产”；而邓小平认为，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让上层建筑革命化是不可能的，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日本学者天儿慧认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历史是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历史”。今天，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民主、统一、富强这一目标却未能完全实现。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只有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可能全面实施。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所以邓小平的战略方针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政策上也具备合理性。

从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是肯定的、赞誉的。应该说，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而随着邓小平所开辟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成功，则赞誉性评价更加明显。

应该说，国外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借鉴。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比较重视邓小平理论的独创性，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因而对邓小平观察事物的方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改革的步骤和经验等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在这一方面，相对国内来说，他们比较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既有同国内的比较，也有同国际的比较；既有纵向的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的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的比较。他们不仅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进行比较，而且将邓小平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比较。甚至把邓小平领导的时期同法国的柯贝尔时期、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执政时期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进行比较。通过比较，阐述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理解。还有一些学者运用了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例如日本学者天儿慧，于1986—1988年间，在中国进行了两年多的实地考察，回国后完成了《中国改革最前线》一书。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另外，数量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在研究中也经常被采用。

不过，最值得借鉴的是国外研究的理论创新性。由于国外学者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邓小平的思想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如果剔除政治立场上的偏

见，他们研究的理论观点具有独特性、客观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容易从全球化的整体框架中认识邓小平的思想。他们能够超越中国国内一隅，站在世界上，在同其他国家比较中，认识邓小平，解读邓小平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念，这样，研究的结论就比较容易定位。参照物是认识运动轨迹的必要前提。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如果仅从国内视角来看，唯一的参照物就是中国历史。这样，我们能确认中国在变化、在发展，但发展怎么样？变化速度如何？如果不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就很难确定。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很容易把美国、俄罗斯、日本等相对的历史时期发展状况拿过来作比较，以此来评价，就多了一个衡量的标尺，这样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价值就丰富许多。

相反，国内的研究习惯于依靠充分的资料和便利的学术积淀，喜欢梳理和归纳，重视论证和阐释，即使有评价，趋同性强，创新性少，无法象国外学者那样明晰透彻。这一点，应该向国外学习。总之，国外学者的研究是一个学术天地，他们那一套理论未必是我们接受的，但其中不乏具有启发性价值的东西。

不过，问题总是存在对立面，国外学者研究的优点的另一面就是缺点。我们看到，国外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从总体上看，由于国外研究邓小平的学者人数有限，掌握的资料有限，因而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缺少有一定理论深度、厚重的研究专著。当然，国外学者受到唯心史观的影响，偏激、主观的评论也比较多，容易出现错误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认识。他的评价从总体上看，是客观的、深刻的，对我们启发性很强，但是个别观点还是有失偏颇。他提出，邓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护，不至再受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运动那样的任意攻击？我们大概可以估量，中共的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人的人权。一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到皇朝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显然，他是把西方民主观点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民主化进程，评价不可避免地有些偏差。还有的学者把邓小平对实践的重视，看成是实用主义，把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看成是权力斗争、权力平衡和再分配等，这些都是站在西方利己主义立场上看待问题的评价结果。所以，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观点，必须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鸦片与人参共餐。

第六节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贡献

近年来，国内学术研究的重点是邓小平理论，而对邓小平的生平研究与历史地位评价较少在学术层次上展现，一般以人物传记、生平陈述的方式来展示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即使其中含着作者一些主观评价，也缺乏鲜活论证特性，而集中于观点阐述，具有浓郁的趋同味道。在外国人的眼中，邓小平的性格具有活力、忍耐、远见、坚定和务实，他善于用组织、制度来实现政治领导，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现代化之父。对这些赞誉，邓小平承之无愧。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1]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这本文集，收集了邓小平1956年到1979年的部分讲话，内容涉及政治、科学、教育、文艺等几个方面。《序言》中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讲话都属于这一时期。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到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

《序言》中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

[1]《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

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序言》指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我也许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1]

这应该是邓小平作的自我肖像的两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诠释了邓小平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我不是中国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人民才是中国的中心，才是世界的中心，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出来做工作，就是以人民中的一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认为邓小平的政治领导不像毛泽东那样强调个人的魅力，而是依靠组织、制度来完成集体领导。正因为邓小平拥有这样谦逊的心胸，他才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才善于兼听并蓄、辨明是非、作出明断，始终在改革开放路径选择中发挥正确导向作用。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作用，要评价邓小平，就得联系毛泽东。在追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邓小平强调共富，这与毛泽东是一致的。毛泽东并不反对个人生活富裕，并不是把贫穷作为社会主义象征，作为价值目标。即使在"文革"时提出"越穷越光荣"这样极端口号的时候，也只不过是直观理解毛泽东话语的结果。[2]但问题是，在如何富起来的问题上，毛泽东主观地认定先集

[1] 《邓小平思想年编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9—350 页。

[2] 毛泽东确实有过赞誉"穷"的言论。如果纵观其一生，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他辩证思维方式的表现。既有自嘲的味道，也有试图把不利条件变作有利条件的尝试的味道。但是，从本质上看，他绝对希望中国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即使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呢。相反，毛泽东类似的一些言论却被"文革"鼓噪者直观、教条地利用起来，提出了荒诞的口号，似乎"穷"就是毛泽东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

体后个人的富裕之路，并且通过运动，不断把集体范围扩大，最终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就成了这个大集体。这个结果，对个人来说，实际上只有看不到“边际”的所谓的集体，从而失去了个人富裕的“指望”。毛泽东先集体后个人的富裕思想一旦被政治圈定起来，教条地落实到地方，就会出现“个人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现象，尽管谁都知道“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放”的效率道理。邓小平的改革之法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灵活适应性。他并没有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来框定改革实践，也没有放纵改革尝试而失去框架束缚。他热情地鼓励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创新之路，但是在尚未获得实践检验之前却不忙于到全国推广；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表现出谨小慎微，但一旦遇到重大改革路径选择，他又是非常有魄力、有胆识。他的兼听风格使改革避免大是大非波动，他的坚定信念使改革避免中途折返。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比毛泽东要有能力，更胜一筹。毛泽东希望“八仙”在一盘棋上一论输赢，邓小平则让“八仙”在八盘棋上各显神通。毛泽东希望通过政治轨道推动经济发展，邓小平则依据经济效益原则推动经济发展。毛泽东想一步到位——富裕的结果与富裕的过程高度一致；邓小平在发展的结果和过程上则先后有别——先想办法富裕起来，然后再追求结果的公平性。显然，邓小平抓住了关键——先有馒头，才能考虑分配问题。马克思评价李嘉图和西斯蒙地的经济学观点时，也曾强调生产具有逻辑优先性。

评价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设中国没有邓小平，中国会如何呢？我们可以从竹内实教授评价中较为客观地认识到启动中国改革按钮的困难程度——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这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未必搞起来，即便搞起来，也未必成功。

邓小平站在全球化时代的视角，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国际相对和平的时机，静下心来搞改革开放。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外交环境发生了相对有利的变化。尽管苏联压力还存在，但由于中国与美国达成战略默契，中国面临的世界威胁大大分化了。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获得广

长足的进展，尤其中日关系的缓进和提升，这对于中国推行全面对外开放，尤其向西方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是中国一直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这个国际条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努力改变落后的局面。

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问题上，很多人想不通，邓小平依然站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视角上来审视这个问题。经过先辈们的浴血奋战，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走了，突然之间，我们打开国门，欢迎帝国主义夹着皮包进来了，这一巨大历史反差，会使很多人难以接受。的确，我们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奋斗目标就是要消灭剥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党得到人民普遍拥护的根源。但是，现在却要“引进资本主义、引进剥削”，很多人想不通是在情理之中的。邓小平站得高、看得远。他在1979年10月4日一次省委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得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1]显然，邓小平抓住了中国发展问题的主要矛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优势经济条件，从全局来看，从根本来看，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也是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维护民族尊严，坚持独立自主，但这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要通过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为物质保障的。利用外资，搞“三资”企业，这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抓住它，把经济搞起来，实现中国与世界接轨共融，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尽管利用外资有一定的剥削，但是，舍掉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效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2]

邓小平着眼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势现状，力主中国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到世界的潮流中。但是，这不是要向资本主义投降，把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因此，邓小平一刻也不忘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

[1]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则，努力把中国改革开放规束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文革”结束后，一些人还习惯于“文革”期间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发表言论，由于错误理解“解放思想”，开始把“文革”错误迁怒到党的执政地位上面，迁怒到社会主义制度上面，于是公开提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思想等口号。甚至一些非法组织贴出大字报，提出“要人权”、“要民主”，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还有组织提出“建立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极端思潮在党内也产生了思想混乱，一些人在“文革”时受到打击，有怨气，于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产生异议。他们虽然不赞成资本主义，更不赞成“接回”台湾的国民党搞两党执政，但也不赞成毛泽东思想旗帜，希望党决裂历史，选择全新的思想指导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一方面关注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酝酿中国改革开放这步举世大棋；另一方面也没有忽视中国政治稳定和方向健康问题。在 1979 年 3 月 16 日的高级干部大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维护毛主席这面旗帜。他说，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党的整个历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1]3 月 30 日，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他在批评怀疑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的同时，着重揭露和批判某些人以“社会改造”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他强调，绝对不能容忍少数人把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作为攻击和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借口。

在全党工作重心刚刚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对破坏安定团结的右的思潮的性质、危害的揭露，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意义的阐述，是非常及时的；是对正确理解和贯彻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方针的重要补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30 多年。回首这一路风雨，虽然有过不少波折，但改革大业

〔1〕 应该说，邓小平本人也在“文革”期间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就个人恩怨来说，他有理由放倒毛泽东这面旗帜。但是，邓小平坚持树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高举毛泽东这面旗帜，充分展示了他的宽广胸怀和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如果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历史问题有这样的胸怀和远见卓识，也许苏联的改革会有新的篇章。

继续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这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以后也毫不松懈地与"左"和右的倾向作斗争，从而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1]这段话反映出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双向努力——既要推动改革开放，又要保证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

可以说，在民主革命历史上，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何时基本完成统一大业，还是一个问号；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如果没有邓小平，能否像朝鲜那样把社会主义艰难地、痛苦地坚持到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因为苏联的崩溃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征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邓小平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具有同样的历史英雄作用，因此，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人，就不会不承认，邓小平开创了新中国第二个时代——在统一与和平的基础上，走向富裕与繁荣的时代。毛泽东把中国从世界的蹂躏中解脱出来，完成了自我，邓小平则把中国融进世界之中，实现了他我。毛泽东在世界霸权主义横行的空间中矗立起中国一根巨柱，邓小平在世界霸权主义狰狞的身躯上构筑一根中国锁链。毛泽东使中国不再受别人欺侮，邓小平则使别人不再敢欺侮中国。如果说，毛泽东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是带来了中国一场成功的革命，使中国人民站直腰杆、扬眉吐气；那么，邓小平最突出的历史功绩则是带来了中国第二次成功的革命，使中国人民充满信心、憧憬未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不仅接过了毛泽东手中的火炬，而且上了一个新台阶，铸就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第五章　时代跃迁（1989—200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融入全球化

通过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厉兵秣马，中国已经走到了融入全球化的门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来说，还会有更多的、更复杂的挑战，中国该不该接受这把双刃剑？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没有犹豫，决心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驶入全球化的大海深处，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迎接风雨、沐浴阳光。

第一节　全球化：中国该不该接受这把双刃剑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形势的巨大波动能否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时代课题。江泽民在一个充满期许的社会氛围中担负起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如果说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就是发动改革开放机器，把中国从经济徘徊的泥潭中拖出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那么，江泽民面临的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机器，跨越融入全球化的门槛。所以，邓小平虽然关注国际变化，但主要还是盯着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江泽民虽然密切关注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但却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对全球化本质的把握。全球化，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而对于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其两面性就不一般了。那么，在一个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中国全面融入进去，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党该如何认识、评估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呢？

1. 全球化的新语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

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1]这是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进程及趋势做出的科学判断。

首先，世界多极化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曾经面对苏东巨变之后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分析了两极格局走向瓦解的必然性，并对未来走向多极世界的大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进入90年代以来，江泽民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对世界政治格局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科学认识。第一，关于多极化的表征。他认为，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在多极化格局下，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世界各种力量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第二，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世界上一些军事大国都在进行广泛、深刻的军事战略调整，增强军事力量，谋求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占据优越地位，争夺在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益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各国人民要求平等互利，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多极化是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为基础的，也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因而它是不可阻抑的。多极化

[1]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趋势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第三，世界多极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世界多极化符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与利益，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四，当前世界格局中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加深，但是，“一超多强”、“一超”凌驾于“多强”之上的局面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江泽民指出，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单极世界”，既不符合当前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也不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相对均衡力量格局的共同愿望。他说：“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第五，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超多强”走向各战略力量相对均衡化的旅程将是长期和艰巨的。因为多极化格局的形成是世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重新组合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都会将自己的利益作为对外关系的出发点，这必将产生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如南北差距拉大、民族分裂、宗教纷争、国际恐怖主义等都会对多极化的发展产生各种干扰和冲击；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是当前多极化发展的最大阻力；多极化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因此，世界多极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复杂的演进过程。“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2]

总之，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与利益，联合世界各种力量，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平等竞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中国作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应有的作用。

其次，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早在 1997 年，江泽民

---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3 页。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9 页。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时就明确指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此后的多次谈话中，他对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全球贸易迅速增长。"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幅度"[1]全球贸易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贸易的种类不断增加国际贸易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技术贸易、劳务贸易、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在迅速发展。1970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只有710亿美元，到1999年，服务贸易总额为1.34万亿美元。[2]（2）全球贸易的范围和数量大幅度增长。据统计，195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仅为610亿美元，而到1997年全球贸易额为55000亿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前7年中，世界贸易额增长了86%，年均增速达9.3%。[3]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一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大气候，并越来越重视将自己的产品投入到国际市场，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从事着国际贸易，大部分国家国际贸易的增长超过了其整体经济的增长，这标志着世界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将有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二是金融全球化呈加速态势。江泽民指出："国际金融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近些年，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但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金融市场动荡不定。"[4]金融全球化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金融机构全球化、官方性国际机构增多，其影响作用日益扩大。全球金融集体决策是集中在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等几个城市而不是国家，然后靠电脑终端来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城市和地区。（2）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由于通讯卫星、自动转账支付机、互联网等电讯技术、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各国金融市场通过电脑网络而同国外金融市场连成一体，尽管跨国金融往来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但金融全球化在当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4小时全天候电子联网的世界金融市场已经形成。（3）金融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了资本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2] 参见陈海燕等：《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3] 王东、丰子义、聂锦芳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

在国内外的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从生产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以国际融资、银行国际借贷、跨国证券发行和买卖，以及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等投资行为为主的国际间接投资也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并作为有力的纽带将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和各有关国家的经济带来了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波及世界许多地区。

三是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跨国公司早就有之，但在国际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家垄断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演化、生产国际化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实行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战略，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现在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其经济实力巨大，有的跨国公司势力已经远远超过一个甚至几个中小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和主宰。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化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作用日渐突出。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9月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达6.3万家，它们遍布全球的子公司的附属企业达80万个，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着80%以上的国际直接投资，60%—70%的国际技术，50%—60%的国际贸易和46%以上的国际生产。[1]江泽民指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投资方式和国际分工的变化，加速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密切了国际经济关系，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2]

四是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不断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是"世界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经济市场化、贸易与投资国际化、区域经济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增加，合作增强，摩擦和竞争也在加剧。"[3]经济全球化浪潮带动了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发展，也带动了建立在地区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迅猛发展。目前全球已有一百多个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经济贸易组织和集团，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今已有

[1] 参见姜桂石、贾淑荣：《经济全球化进程及新阶段的特点》，《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页。
[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

184个成员国。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和地区有187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参加国达155多个。这类组织在发展中有新的突破，如逐渐淡化"排他性"、"边界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积极进行跨区、跨集团对话。这对世界金融贷款、汇率、贸易争端等起了调整、协调和监督的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迅猛发展起来。这些组织层次不同，规模不同，内容也各异。在众多的区域经济组织中，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最大，它们拥有世界4/5的GDP和4/5以上的国际贸易。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1]这就揭示了全球化形成与发展的根源。人类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表明，全球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伴随历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向前推进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国际间的商品流通，使国际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促成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国际化。第二次科技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促进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延伸。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推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最有力的经济工具，由此产生的资本国际化趋势，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科技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信息网络等方面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新一轮全球化的物质手段，直接推动着资本、商品、服务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加速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并正在向各行各业渗透。"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各国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2]如果说第一、二次科技革命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扩散，那么这次新一轮的科技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页。

进步也波及发展中国家。科技革命的迅速扩散，不仅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实现得益于科技进步：是科技进步提高了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效率，拓宽了人类生产活动的领域，并给人们的沟通和交往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全球化是在新科技革命影响下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2. 全球化：一朵带刺的红玫瑰

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全球化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全球化不是纯粹的自发性进程，它也渗透着人们的自觉意识，即全球化过程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为追求某一具体的战略目标而对全球化趋势进行人为推进的过程。正如马丁、舒曼在《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所说，“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1]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既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发展结果，同时也是欧洲各国政府、政治家、企业家、战略学家们多年来人为推动、苦心经营的结果。事实证明，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是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获益甚少，有的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2]其具体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借以发展的信息技术基础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的全球经济网络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世界金融中心集中在发达国家，全球金融网络也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在发达国家的把持下制定的，制订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这样，表面上公正、平等的规则，在本质上必然又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并由此直接造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造成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全球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因此，我们在观察全球化时必须头脑清醒，不能误认为全球化只是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必须把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主导、操纵的全球化同西方的“政治民主化”乃至“全球战略”联系起来。

正是由于全球化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为追求某一具体的战略目标而对

[1]〔德〕汉斯·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全球化趋势进行人为推进的过程，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必将在曲折中发展。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推动它们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有效而公正地配置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而造福各国人民。一种是，任凭它们按照不合理的规则运行，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扩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我们应选择并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1]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合作，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弘扬合作发展，大力加强经济技术合作，赋予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以互利合作的内涵，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那么，面对一个带刺的红玫瑰，发展中国家应该作出如何选择？江泽民指出：“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其符合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不断增加，知识和技术迅速传播，“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这不仅给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且“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3]由于地理区域差别、历史积淀、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了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任何国家或经济实体都不可能占尽全球的所有优势。从资源存量看，国家无论大小都有一个互补问题。美国号称经济大国，但其工业原料、纺织服装、能源消耗、高科技人才等严重依赖国外；欧佩克成员是一些小国，却决定着世界石油市场的供需。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产生了二者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廉价劳动力、商

[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2 页
[2]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2 页
[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9 页

品市场的双向依存性和优势产业的梯度转移。发展中国家虽然落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价格低廉，消耗掉的资源较少，存量相对丰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直接引进先进国家的已有资本、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并与本国富有资源相结合，发展自己，尽量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将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产业转移机会，加快本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后来居上提供了可能。因此，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

同时，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毕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各国各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是在旧的国际秩序下进行的，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江泽民在2000年11月20日APEC文莱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很不相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的艰巨任务，它们不仅要大力改造其传统产业，而且要努力发展新兴产业。否则，它们就难以实现自身经济的良性发展，也难以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给它们带来的严峻挑战。现在，“数字鸿沟”的出现和不断扩大，使得南北发展差距有增无减，世界经济有可能因此而出现新的失衡。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随着发展中国家面临困难的增多，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缩小南北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高于主权”旗号下推行新干涉主义。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向别国输出危机，或借金融全球化来掠夺其他国家的发展成

果。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非常痛惜地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许多年辛苦劳动取得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给一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威胁。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即使在发达国家里，由于采用高新技术形成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也使相当数量的劳工和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失，这是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同时，经济全球化还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健康发展，并将不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全面融入全球化？如果仅从经济角度审视全球化，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们都不应该长久地徘徊在全球化边缘。但是，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全球化还有巨大的政治风险。的确，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大潮中，全面融入全球化会不会丧失社会主义立场？我们会不会是下一个苏东剧变的翻版？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党必须作出回答。

第二节　苏东剧变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吗?

20 世纪末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与世界经济大潮、政治风云发生巨大碰撞。一方面，世界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加速形成，亚太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但另一方面，国际政局动荡不安，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一连串事件相继发生。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吗？若果真如此，我们还要不要市场化改革？还要不要加入 WTO？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以及接连的苏东剧变，使我们党内中的“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有些人认为苏东剧变是“改革引起”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多引进一份外资就是多一份资本主义，改革每向前迈一步就是向资本主义跨近一步，认为“和平演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凡事都应该先问问姓“资”姓“社”；还有人放出谣言“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一时议论纷纷，人心不定。当时，理论界上很多人写文章强调改革开放要划清“资社界限”，诘难一些改革措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倾向，其实质上是

要求党放慢或者停止改革、求稳应变，防止“西化”。

要解决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深入认识苏东剧变的发生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联。因为苏东剧变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从表面上看，苏联和东欧中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剧变的，它们确实在谋求对外开放中引进“资本主义”导致“西化”的，而朝鲜、古巴等则没有实行对外开放，也就没有“西化”。那么，以此为证，是否就可以认为“改革每向前迈一步就是向资本主义跨近一步”呢？当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现在回过头来再认识这个问题，也不乏现实意义。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存在着一个模糊认识：社会主义为着什么因素要与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应该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哪些方面？

1. 苏东剧变该不该归因于改革开放？

从全球化视角，解读苏东剧变，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需要不需要改革开放？第二，改革开放是不是造成苏东“西化”的原因？或者说，苏东剧变该不该归因于改革开放？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社会主义领航的全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取向。这就是说，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生产力推动的必然的历史发展结果，它本身不属于资本主义专有。但是，在现实上，全球化确实受着资本主义的主导。原因就是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占得先机，使之戴上了浓重的“西化”或者“美国化”特色。那么，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不需要改革开放？更准确一点表述，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不需要冒着引狼入室的危险向西方开放？

在斯大林时期，为了全面同资本主义对抗，斯大林搞了“两个世界市场”理论，坚持只同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开放，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开放，中断了列宁晚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活动。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提出这个理论既有主观因素，也存在客观因素，尽管未必是好的选择，但至少存在一定的历史缘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铁幕”政策下即使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也不可能平等地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市场，在当时，搞世界统一市场未必行得通。“两个世界市场”理论具有被迫提出的客观因素，但是，问题总具有两面性。如果像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一样，积极敞开国门，

受到利益导向，至少会吸引西方的民间经济组织进来。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得向西方开放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放就没有取得成功的机会吗？应该说，搞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不应该以此为根据拒绝同西方经济往来。相反，应该以此为基础，更好地同西方进行经贸往来。这里有两点理由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从世界形势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时代，世界贸易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现代市场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初露端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经济往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尽管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存在着赤裸裸的民族剥削、民族压迫，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看，无疑有利于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当时的殖民地人民中的觉醒者反对这种畸形的国际贸易，从根本上说，不是反对也不应该反对国际贸易本身，而是反对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剥削现象。他们希望通过国家独立，在拥有完全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再同西方建立平等的商贸往来。总之，当时已经处在这样的时代，不管愿意不愿意，国际间经济往来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再像封建社会那样局限在某一区域内发展民族经济已经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其次，无论在经济发展规模上，还是市场运行成熟度上，资本主义市场都远远强于社会主义市场，两个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经过百年风雨磨炼发展起来的。尽管仍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就促进经济发展动力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盛赞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不仅"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3]"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4]不管怎么说，当十月革命发生的时候，拥有先进生产力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客观事实。如果因为政治上的对立，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就自信地关起门来搞经济，实际上就类似于放弃坐车而用两条腿走路，永远都处在被动追赶的境地。

以上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响应全球化进军的时代号角，必须敞开胸襟，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经济，才能有机会超越资本主义，至少不会在全球化竞争中被边缘化。

当然，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百分之百的好。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曾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相比之下，新兴的苏联社会主义却蒸蒸日上，展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为了克服困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精英们不仅用尽了各种办法，通过改革谋求解决途径，而且非常谦逊地跑到苏联学习经验，吸取教训。尽管资本主义最终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通过二战淹没这次大萧条带来的阴影，但是，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在改革调整中，都相继采用了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办法，全面提升了工人的工资待遇，加强了社会保障，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制国家。这在很大意义上，是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学习苏联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资本主义”，倡导把资本主义注重效率的优势与社会主义注重公平的优势结合起来，提出所谓的混合社会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学习、吸收社会主义积极因素的结果。但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却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表现出极大的僵化、保守的劣根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经济已经处在相对停滞的状态，面对西方新一波科技浪潮的冲击，苏联领导人固守一隅城池，放弃改革动议，拒绝向西方搞经济开放，结果陷入经济的严重困境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大的苏联在一夜之间从内部崩溃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应对全球化冲击所采取的不同策略表明，任何企图用脱离全球化办法来规避风险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要么融入进去，在适应性旋转中求生存，要么被动席卷进去，最终被冲击到边缘地带，缓慢自杀。因此，从根本上说，苏东剧变不是因为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错过了顺应全球化脉动而进行主动改革开放的机会，造成了僵化和停滞，在同西方竞争中陷入全面危机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改革开放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改革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一个处在火山边沿中的社会怎样能够静下心来进行大规模的制度调整呢？这需要首先保持政局稳定，然后进行渐进式改革才能有机会走过困境。但是苏东在调整中受到西方的诱惑，一般被迫采取了

激进式改革，加重了社会动荡，结果造成了苏东剧变。

2. 改革开放究竟会不会导致“西化”？

现在，必须把问题推进一步，改革开放能不能造成“西化”呢？改革开放能不能造成“西化”的关键点不是讨论是否实施改革开放行为本身，而是讨论具体如何改革开放。正如讨论被毒死的人的关键点不是受害者该不该吃东西，而是吃了什么。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弄清哪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专有的，哪些东西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我们以前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误认为凡是资本主义拥有的东西就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如果学习它们、引入它们，就是在渗透资本主义的因素。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的思想认识才逐渐突破这一定势。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惯性的存在，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彻底弄明白这个问题。回到问题的焦点——改革开放是不是造成资本主义化的原因呢？如果我们分清哪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专有的，哪些东西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学习吸收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本质上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东西，那不仅不会“西化”，反而为抵制“西化”增添力量。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顶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不能不归功于10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对于哪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专有的，哪些东西是人类社会共有这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我们党的认识总体来说是清醒的、是有原则的。我们党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实际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给予原则性的规定。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2]他认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3]“中

---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2]在邓小平的语境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我们反过来分析，就可以得出：规定资产阶级专政的、体现着资本主义国体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专有的，是界定姓"资"不姓"资"的根据。除此之外，即便是纯粹依附资本主义成熟起来的东西，拨开资本主义外罩，也包含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是我们改革开放可以学习和吸收的。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会有更复杂更隐晦的东西需要鉴别、辨识，但这并不是放弃改革开放的理由。任何因噎废食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正如一名演员，只要演出，就会有"砸锅"的风险，但是，怕"砸锅"而不敢登台，那么，演员的职业生命力就会枯竭。因为失去了舞台，表演是没有动力的。

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退后一步，不是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是全面减弱改革开放力度，甚至重新关起国门来，不要说发展经济，就是政治上的孤立，就足以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苏联存在的时候，苏联还有东欧社会主义主义国家和相当数量的第三世界相互帮衬、经贸往来。当苏东剧变的时候，两极对立结束了，资本主义取得暂时的全面优势，中间的灰色地带暴露在西方矛盾斗争的前哨，而能够和中国为伍的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中国若在这个时候走回头路，坚持冷战思维，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全面对抗，那必然成为"出头的椽子"。所以，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党，中国决不当头，决不称霸。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3]显然，时代已经把中国推到了这样的地步——必须把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使之有更宽广的心胸，能够包容下世界所有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使之有更高雅的气度，能够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平相处。唯有此，社会主义才有生命力、才有远大前途。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当然，在西方强势的国际形势下，和西方打交道是存在被"西化"的风险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中的两个极点——要么规避全球化浪潮，钻到社会主义大厦的壁垒中闭门造车；要么深化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敞开胸怀，迎击全球化的挑战。前者似乎暂时没有被"西化"的风险，但是无异于缓慢自杀，就像苏东剧变那样，最终必然会被西方的"和平演变"拿下。后者似乎在大风大浪中颠簸前进，危机四伏，但是却是一条有希望把社会主义大旗举向世界的道路。

苏东剧变表明，将自己置于全球化进程之外，遏止改革开放，走孤立封闭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虽然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但这只是一个阶段上的表现，全球化未来的发展最终还应该由社会主义领航。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当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利用全球化大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时候，那种因为痛恨资本主义而放弃融入全球化中发展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极不明智的，是狭隘的，是局限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短见表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不发达是基本国情。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科技生产力的可传递性、交通通讯的快捷简便，这些为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文明成果，实现加速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才能在全球化漩涡中，把握住自己，发展壮大自己，使社会主义事业生机盎然。

综上所述，苏东剧变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不要排斥全球化冲击，而应该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进去，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给社会主义铺开一条充满活力的道路。但是，苏东剧变还给我们另一个深刻的教训——这是不能忽视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反对全盘西化。如果融入全球化，为了从处于科技、经济发展优势的资本主义那里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机会，那么，在全球化的斗转星移中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克服全球化存在的弊端，避免出现邯郸学步的后果。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要不要全面融入全球化：基于苏东剧变的反思

既然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世界，中国必然要融入全球化。但全球化的两面性"决定了我们在全球化进程

中既要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利益，积极参与，置身其中，又不盲目追从、为全球化所害。尽管从眼前来看，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但是我们别无选择。"[1]那么，在新的世纪，面对全球竞争，中国就不能简单地"顺应"或"适应"全球化，而应是积极主动地应对全球化挑战，并全面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力争有所作为。

1. 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一个"坎儿"

以苏东剧变为转折点，全球化脉动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具有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在经济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世界就逐渐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平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经济。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但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后，由于内外原因，与资本主义世界分割为两个经济世界，因此，二战以后，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市场经济虽然发展迅猛，但由于有相当数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包含在其中，所谓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在地域上和制度上都不完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渐融入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这就使"全球化"具有制度层次上完全的意义，但还不具有地域范围上的完全意义；当苏东剧变以后，以彻底倒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标志，由此不管在制度层面上，还是在地域范围层面上，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特点，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加紧向世界、尤其向社会主义国家扩散"西化"思潮，使政治全球化带上浓重的"西化"色彩。苏东剧变，国际共运陷入低潮，国际敌视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弹冠相庆，预言全球化将以唯一的资本主义引领前进。日裔美籍人士弗兰西斯·福山认为，苏东剧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面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表明资本主义必将在全球取得胜利，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历史行将结束，历史在竞争中只留下"最后一个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将一统天下。他还认为，西方文明是最高形式的理想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终将被资本主义文明所取

[1] 陈光泉：《全球化与价值冲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代。但是，政治多极化、世界多样性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两极对立的消失，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世界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潮起潮落，使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降温，西方阴谋没有得逞

第三个特点，在文化上，出现“混杂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交融在一起”，“文化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十分明显，无论从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层面来看，还是从文艺、传媒等精神文化层面来看，全球化的冲击早已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在一系列差异显示得最为清晰之处，又是相互联系最为密切之处。”[1]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认为，文化全球化趋势表现出“各国文化既保留自己独有的特点，又是全球意识支配的世界文化单元”的特点来。从上个世纪末流行起来的语言“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精炼地体现出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但是，文化全球化并不和谐，“美国化”正在侵蚀世界文化多样性，不仅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是欧洲中很多发达国家，也都遭受到“美国化”的入侵。文化霸权主义已经借助全球化“东风”四处蔓延，到处渗透。它给各民族国家带来的最大威胁是价值观念冲突和意识形态纷争，成为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理论，在某一方面就说明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世界多样化文明的挑战。

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主要是资本主义鼓噪的全球化政治风云。在这场山雨欲来的风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遭遇西方“和平演变”的显性矛盾冲突。同时，在苏东剧变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着一个“坎儿”——要么跃上一个新台阶；要么退回去。我们党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果断地采取举措，积极回应挑战，抓住机遇，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境界。

2. 假如我们也放弃了社会主义：一个批判性假设

社会发展总会体现出辩证法精神。经历挫折总是痛苦的，但经历挫折之后，从中获得经验教训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发挥深远的

[1] 参见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影响。经历十年"文革"的挫折，催生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十年，又遭遇一场全球化政治风云，但雨过天晴后，中国却全面融入全球化中了。每一次波动，我们党都会吸取教训、励精图治，从而实现一次飞跃。

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政治大气候风云突变，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全面改革又举步维艰，西方国家加紧了推进"和平演变"进程。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面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作了无原则性的大退步——抛出《改革与新思维》，为其展示亲西方化的"民主"意向。在具体改革过程中，政治上放弃共产党一党执政原则，人为培植反对派，搞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经济上搞全面私有制改革，迎合西方市场化要求；意识形态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搞多元化，制造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理论配合西方"和平演变"一些思潮，对中国学生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彻底弃除，新的商品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新旧体制中的某些机制并存，相互制约，调控能力十分薄弱，经济秩序较为混乱。因此，党中央决定放慢经济发展脚步，实施三年治理整顿。这必然会影响到某些投机分子既得利益，也会对社会上部分人的短期利益产生消极影响，引起他们的不满；同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我们只专注于经济发展，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又由于制度不健全，社会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泛起，导致社会风气恶化，这些都促成了宣泄不满的杂音在社会上的兴起和泛滥。终于在1989年春夏之交，受到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风波。

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即兴奋起来，感觉到"和平演变"图谋有机可乘，以所谓的"人权"为借口，多方施加压力，干涉中国内政，希望以压促变，以变取胜。美国总统布什公开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并宣布对中国采取五项制裁措施，积极充当制裁中国的领头羊。西方七国首脑和欧共体主席则在巴黎举行会议，发表谴责中国的"政治宣言"，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想以此逼迫中国政府就犯。西方列强的联合"制裁"，不仅使我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外交形势，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非常需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国际形势却急转直下，就像翻倒的多米诺骨牌，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内形势相继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跌入低

谷 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范围之广，令人震惊。西方真是喜出望外，感觉历史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代不远了。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确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当时，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第一，国际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活动猖獗，内联外动，以压促变；第二，国际共运出现空前危机，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将面临孤立无援境地；第三，国内怀有种种不满情绪的各类分子狂妄叫嚣，鼓噪“西化”，在社会上，人们的思想也动荡不安；第四，经济改革出现困难，急需治理整顿。显然，在那个特别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可以作出两种选择：一个是放弃社会主义立场，倒向西方怀抱；另一个是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顶住西方压力。当时有一些人不管动机如何，都主张顺应国际大形势，把改革开放引向西化之路。他们认为嫁接西方的民主制度既可以停止意识形态纷争，实现世界大和平，而且还可以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获得双赢。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倒向西方，就会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就会成为泡影。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虽然那场全球规模的政治波动已经过去，人们的茶余饭后已经不再谈论那个历史时期的事情，但是尘封的思想问题还需要得到解决，否则，我们今天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旦遇到暂时挫折，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假如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了资本主义，就会如何如何。

邓小平曾指出，“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1]那么，如果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真的会有动乱吗？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经历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虽然也曾在中国传播，但始终未成为社会普遍性的深入人心的价值原则。蒋介石搞来搞去，也只是在军政和党政中兜圈子，各民主党派推动的宪政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也是经历几代领导人后才慢慢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选政府”。尽管如此，在议会上议员们经常像帮会那样拳脚相向，为了自身党派利益，根本不在乎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制度成了党派斗争的平台。如果中国大陆也实行这样的民主制度，后果决不会像台湾一岛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那样简单，因为台湾没有大陆这样复杂的民族关系、多重的国际关系和众多交错的社会问题。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其次，如果通过一场彻底的大规模革命运动建立起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和平路径的选择，人们也许会容易接受，因为一张白纸，涂什么就是什么。但是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意识形态上，想一夜之间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必然造成一个长时间的思想混乱，继而就是社会动乱。应该说明的是，当时鼓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只是少数“精明分子”，有相当多的人虽然不反对他们的言论，但并不等于就在思想上接受了资本主义化。就算把这些人都加起来，也不过是湖面上投下一个石子，看着涟漪面很大，但水底是静的，因为社会主体——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参与进来。如果定要湖面波涛涌动，除了荡起混浊之物外，还会有清泉喷涌吗？

再次，历来都是以诋毁旧社会制度来树立新社会制度的威信。如果中国现代化进程半路出岔，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4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就会成为共产党执政的“罪证”弃而不用，实际上就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厦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大厦，原本生产力就落后的现代化，就更落后了。苏联已经聚集起70多年的社会财富，但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后，人们把这些财富化整为零，一番讨价还价后，变成“破烂儿”归为私有，然后再拼装起来搞经济建设，自然要浪费一代人的发展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比新建更好，因为分赃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制造社会矛盾。中国需要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吗？

假如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我们就会是昨天苏联的命运，假如我们选择资本主义，我们就会遭遇今天俄罗斯的境遇。

如果从经济发展基础上看，苏联远未到崩溃的地步，如果不是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出了问题，苏联政治也没有到四面楚歌的地步。苏联人民对共产党的失望不等于仇视共产党，总体上还是寄希望于在稳定的政治格局下进行改革。但是，追求片面的民主，纵容右翼反对势力的膨胀，改变了这一切。任何执政党经历过一段执政后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误点、污点，在与成绩比较中，人们往往更容易看到这些污点、误点，因为人们总是期望当局者有更好的表现。因此放开言论，自然批判多于称赞。[1]共产党执政时间越久，问题积累的就越多，人们的

[1] 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政党从来不会比社会主义中的共产党好，但它们可以通过轮流执政方式把那些积累的政治污物在换届民主选举中冲刷掉，保证新一届政府在人们心目中“干干净净”。

抱怨就越多 如果放开言论，右翼势力一鼓动，社会抱怨声变成了“主旋律”，建设成就便被淹没了——人们会认为手中的卢比是理所应当得到的，而社会问题是不可原谅的。苏联在崩溃前，透过社会的言论中，似乎苏联共产党没干什么好事，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当今天的俄罗斯陷入美国外交打压局面的时候，俄罗斯人民开始怀念昔日苏联的辉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励精图治，当年的苏联怎么会如此强大呢？一个强大的苏联在放弃现有道路后竟会有如此下场，中国会逃此厄运吗？

苏联分裂后，不仅使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复杂的民族、边界、能源、军事基地、军事设备等交叉矛盾，而且还产生民族独立、分裂国家的局面。俄罗斯出现“车臣叛乱事件”、格鲁吉亚存在南奥塞第等地方独立现象、俄乌存在能源利益、军事基地等矛盾等等。俄罗斯是苏联主体继承者，当初它是分解苏联的主要政治力量，最终它是分解苏联的最大受害者。美欧不仅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只要苏联实现全面“西化”，就会给巨额经济援助，帮助其迅速摆脱困境，一步踏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反而在车臣事件上，对俄罗斯指指点点。直到现在，美国仍把俄罗斯看作“半个朋友”，欧盟、北约不断东扩，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并在原来的独联体国家中搞“天鹅绒革命”，分化俄国与其他独联体一些国家的关系，使俄罗斯陷入美国的“软包围圈”中。美国在科索沃民族问题上和在南奥塞第民族问题上持针锋相对的双重标准，矛头对准俄罗斯，甚至于2008年在黑海出现了美俄军舰对峙的紧张局面。现在双方在黑海上的战略较量依然存在。显然，资本主义大家庭不是一片和谐，只要你有威胁的潜力，不管你走什么道路，都不可能换得西方真诚帮助一个大国复兴。如果有人把西方对中国的制裁或是经济上设置门槛归因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是幼稚的想法——狼要想吃羊不会因为羊是否接受狼的条件。

如果姑且不论意识形态优劣，假定资本主义在中国也能够行得通，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是否可以顺势滑向资本主义呢？不可以！第一，任何谋求通过急骤变革的方式建立新政治制度必然引起巨大的政治动荡。因为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权力要重新分配，而权力重新分配需要制度作保障，但在急骤变革中只有权力分配后才能使新制度得到建设并获得巩固，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没有新制度作保障，权力就不能和平分配，而权力分配不能确定下来，新制度就不能建立获得不能巩固，结果非得一番权力争斗才能建立起新制度。那么，经济上改革开放的

10年成果自然一夜化为乌有。苏联崩溃，俄罗斯丧失了一代人的发展时间，就是例证 第二，某些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台湾、西藏、新疆等地方鼓噪、图谋独立已久，中央政府一变乱内战就会打起来，很多想不到的矛盾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宁，中国人民就又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就会受到威胁 到那个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会站出来出动百万维和部队帮助中国维护和平。第三，除非中国被肢解为若干小国并心甘情愿地仆从西方大国，否则，不管中国实行什么制度，西方对你的警惕、防范、压制甚至威慑就不会停止。现在的俄罗斯在欧盟东扩、北约东扩和美国的天鹅绒革命风暴中的处境就是很好的写照。

如果中国在这场国际政治风云中束手就擒，仿效苏联搞“西化”式改革，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换一个角度看，假定当时中国共产党妥协了，全面放弃执政地位，引进“三权分立”、引进“休克疗法”，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发展，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苏联分裂后消失了，中国不会分裂吗？在共产党留下的政府权力真空面前，谁能保证中国肯定会有华盛顿式的人物贯彻民主而不会有袁世凯式的人物强奸民主？中国需要推进民主建设，中国需要惩治腐败，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一些人的鼓噪和外国敌对势力的诱导能做到的。所以，邓小平看得清楚：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1]更可怕的是，中国的西藏、新疆、台湾、甚至南海问题都有可能在“自由、民主”风暴中分裂出去，中国会陷入内战之中，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人们又得经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烽烟战火，为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充当炮灰。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谁能来收拾中国这一盘散沙呢？中国需要民主、中国也需要人权，但必须在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在一个有相当发展的经济环境中稳步实现。所以，我们党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1]

所以，我们只有坚定社会主义立场，抵制西方的压力，稳定社会局势，才能把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继续下去，这是唯一可行的决策，不是两种可能性中的博弈选择。

首先，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及时推动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地实现新老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使党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应对各种复杂形势，开创新局面。其次，在外交上坚决回应国际挑战，站稳立场，处变不惊。针对西方的打压，邓小平给年轻的新一任领导班子提出了24字外交战略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有所作为。"他告诫党中央，我们要先办好国内的事情，只有把我们自己稳定下来，经济搞上去，才有机会打开外交局面，打开西方的封锁。因此，针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共运形势，中国决不当头，而是韬光养晦，埋头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利用敌人的一切矛盾，划开制裁的网络，争取外交主动，有所作为。再次，进行全面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十年最大失误在教育，并强调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他强调："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2]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实践证明，党中央的措施是正确和有效的。我国在国际上很快就赢得主动，在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前提下，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继续确立并进一步巩固大国地位，为在经济上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场可能的危机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大规模内乱消除了，我国内政迅速获得稳定，人民的思想得到统一、党的组织得到纯化，腐败现象初步得到遏制、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健康、祥和的发展轨道，党赢得了人民，人民支持党继续搞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36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第四节　从市场化改革到抗击金融危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中国要实现全面融入全球化，必须完成两个关键性步骤：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际上积极申请加入WTO。而这两个环节又是紧密相连的：不实行市场化改革，就不能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自然难以加入WTO；而不加入WTO，就不能推动中国国际贸易全面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会受到“瓶颈”限制。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成功地完成了这两个步骤，并在此期间，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考验，在世贸组织总部的大楼旁，终于飘扬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

1. 从什么角度看，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今天看来，我们如此自然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似乎波澜不惊，但在当初，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决策的时候，这却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发展命运的关键所在。

（1）关于市场化改革争论

面对着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国际政治形势以及我国改革遭遇到的实际困境，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个抉择：若立足于国内立足于现实，我们应该求稳，以稳应变；但若立足于世界着眼长远，我们必须求变，以变求稳。我们党认识到越是在关键时刻越不能退缩不前，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前途。但是，如何深入改革？是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大？还是更上一层楼，搞市场经济？

受到国际政治大气候斗争的影响，当时在思想理论界，坚持市场取向论的观点，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反“和平演变”的声浪中受到严厉批评，很多人认为若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必然滑入资本主义的泥淖。不过，当时一些学者尽管遭受到批驳，但仍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发表多篇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只有突破计划经济限制，大胆地搞市场经济才有出路。正是由于他们对科学探索的敬业精神，才使市

场取向的声音没有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淹没下去。1990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请一些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会上，持两种观点的学者各自提出自己的理由，争论非常激烈。主张改革“计划取向”的人认为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认为 1988 年的通货膨胀和 1989 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改革”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主张“市场取向”的人则强调必须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一种倒退，它将使改革退缩不前，不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发展。会后，薛暮桥还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信，指出东欧剧变主要原因是未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以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1]

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反映了我国改革未来方向定位的关键问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能否敢于突破计划经济传统理论限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学说根据，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主要是因为它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等基本理论原则，所以，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的典范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既可以作为媒介用于商品交换，也可以代表财富累积起来。一旦累积起来的货币财富充当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根据，货币就存在增值的可能，它就变成了资本。资本主义剥削就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资本家就是利用资本发财致富的。私有制和继承权的存在，使得以资本剥削为背景的阶级分化成为可以一代人一代人传承的社会现象。资本家的儿子天然就是资本家，工人的儿子天然就是工人，这样凭借货币财富的可累积性与可继承性，一旦一代人跃升为资本家，他的后代就具有天然的剥削地位，因此，这造成了人一出生就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宣扬的人人平等只是给人们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但

[1] 吴敬琏：《20 年改革理论的发展》，载张卓元主编：《20 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年版。

人出生时物质基础的不平等决定了这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实际上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这就是说，私有制的存在，货币的存在，商品市场的存在，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公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平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问题，不仅废除私有制、继承法，而且还要废除货币基础上的商品市场，代之以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以及个人劳动券基础上的消费产品市场。由于劳动券只能用来购买消费品，不具有购买生产资料能力，也不能作为财富累积起来，所以就不能变成剥削别人的手段。人们一旦消费掉劳动券，就需要继续劳动，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剥削阶级的孕育滋生。因此，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应该与公有制、集体劳动、产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而与商品、货币、市场、竞争不相联系。

那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不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呢？这要看马克思提出的集体主义产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的观点是建立在两个假定条件基础上的：一是生产力足够发达，生产关系足够完善，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到可以协调为统一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经济循环系统，不再需要商品交换市场这一平台来实现产品的流通；二是人们的基本素质、劳动觉悟足够高，愿意以社会主人公的身份参加劳动，把满足个人价值与实现社会整体价值统一起来。这两个条件显然不是在推翻资本主义政权之后就立即实现的，相反，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保留大量封建残余思想遗毒基础上的，这两个条件根本不具备，如果依然按着马克思的设想来建立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以苏联为代表，搞了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由于在实践上无法废除国家机器，不可能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联合体，结果在经济领域中培植出庞大的官僚系统管理经济，计划建立在统制基础之上，人为制造产业间的不平等，而且劳动者的觉悟也没有达到超越个人利益的水平，这就严重削弱了经济活力，最终陷入困境。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般认为，主要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应该追求公平正义，但是这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在生产力总体水平落后且发展不平衡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客观上决定了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公平、不平等的具体社会现象，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能避免的代价，只是如何限定其影响程度而已，这与最终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目标是辩

证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强调竞争意识，必然会产生先富后富的现象，而肯定先富后富的适度差别，也就维护了竞争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把发展生产力放到了优先地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当然，它所隐含的贫富差别、社会发展不公平问题需要社会强有力的调节，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具备了这一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种解释从理论基础上找到了充分理由，具有说服力，但从时代性、现实性看，还可以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原因。

人们总是以实践理性分析、决策问题，我们党抉择市场经济取向改革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发展大形势的影响。反过来，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经济大形势客观上也要求中国要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就必须实行市场取向改革

我们搞市场取向改革实际上走了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的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从解放生产力这一客观要求出发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拓展，必然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同一个时期内取得世界性的胜利，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要有一个长期的合作与竞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要取得比较优势就不应该闭关锁国，而应该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个道理在前文已经作了阐述。这里要说明的是，对外开放若仅局限在简单的进出口商品贸易上，社会主义就无法获得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精髓，只有实现全面接轨才能更好地利用世界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尽管搞计划经济也可以对外开放，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对外开放，但只有搞市场经济才能获得对外开放的最好平台

苏东剧变以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遭受重创，而市场经济模式成了“香饽饽”，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迅速改变经济体制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市场化阶段。客观地说，市场经济体制也存在调节失灵的弊端，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作过多次调换改革，由于社会基本结构有问题，不管采用哪种模式都没有获得成功，但它们仍不遗余力追随世界潮流，主要是由于不想被主流经济排挤在外，希望在这股潮流中获得顺风发展。所以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必须实行市场化改革。如果不适应全球化新潮流，势必受到经济孤立，这与西方政治上孤立我们相得益彰，中国的处境有可能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局面。反过来，我们主

动搞市场经济，谋求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这不仅有利于发展我们自己，也是世界欢迎的，更重要的是，经济上密切联系就会推动政治上的缓和，避免中国出现被全面孤立的局面。在两种制度斗争中，虽然政治上谋求缓和有利于经济合作，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经济合作推动政治缓和。所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改革动议，在客观上是对世界大环境作出的积极反应，正由于这一顺应世界潮流的举措，奠定了我国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基础。更进一步看，当我们在经济上全面融入全球化后，就彻底避免了政治上被长期孤立的可能性。事实上，西方仇华势力一直抱着冷战思维企图利用制裁、封锁等惯用手段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但他们阴谋始终没有得逞，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采取了得力的外交措施，争取到众多国际朋友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与世界建立起密切的市场化经济联系，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合作局面，造成他们投鼠忌器，不再敢像以前那样肆意拿起制裁大棒吓唬人了。所以，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不仅在经济上跟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在政治上也营造了较为安全的国际环境。

（2）实施市场化改革

如上所述，我们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冲破传统理论框架。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传统理论影响，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反过来，就是搞计划的是社会主义，搞市场的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对这一理论观点给予突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将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背叛，至少在理论界会陷入混乱。对此，其关键作用的还是邓小平。1991 年，邓小平在上海谈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发表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意义。邓小平就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7 页。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邓小平南方谈话立足于世界发展大局，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关头，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许多极富创见性的观点。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理论界又展开新一轮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大讨论。尽管改革市场导向已经成为定局，但就具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逐渐形成三种有代表性的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究竟哪一种提法更符合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更符合中国改革实际需要？第一种提法实际上是把改革框定在商品经济体制中，强调计划作用而限定市场作用，是保守性的表现。第二种提法突破了商品经济框架，实现了市场取向，但是却企图保留计划性，给市场经济加上一个制约因素——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防止纯粹市场调节失灵的安全帽，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束缚市场改革进程的绳套。不过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可能成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大家庭的障碍，因为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不可能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种提法非常彻底，改革目标非常明确，但风险也就会随之增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最终，我们党接受了这个挑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其困难程度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说：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如同把一个炒熟的鸡蛋恢复为生鸡蛋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党在刚刚度过困难时期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因为搞市场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中难与不难的问题，而且是政治领域中险与不险的问题。理论上突破需要的是智慧，但实践上的突破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胆识。法律建设、思想转变、制度准备都需要齐头并进，配套进行，搞不好将面临经济下滑甚至崩溃或者"全盘西化"、社会动乱的危险。但是，新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党必须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新时代，在这样的充满竞争与博弈的时代，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任何沉舟的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2—373 页。

侧畔，都会有千帆竞相跃进。我们必须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只有走这步险棋，才有机会从对资本主义博弈中获得比较优势，而不是坐以待毙。

走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子，从国际上看，是我们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积极做出回应的一个大手笔。建立市场经济，加入 WTO，积极融入世界，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这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实现经济与政治互动双赢。中美、中俄、中欧等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双边经贸往来作为纽带推进的。

不过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看问题。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投机倒把、假冒伪劣、贪污腐化等经济犯罪现象也随之增加，贫富分化问题也日益严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受到挑战，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对此，我们党虽然不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稍有疏忽，它们就会滋生蔓延，于是有人指责当初选择市场化改革取向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邓小平曾经强调，对于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首先发展起来，其他问题才会获得解决的物质条件。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发展，这是它的最大成绩，也是肯定它的最大理由。至于它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够健全的表现，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不断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解决问题，而不该回头指责当初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得失

当然，要辩证地看问题，还必须看到市场经济还存在自身调节失灵的瑕疵。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否定市场化改革取向的理由呢？如果有车能代步，谁会因为车子具有出现重大事故的可能性而放弃建造和使用新的交通工具呢？那岂不成了因噎废食吗？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因为它是完美无瑕的碧玉，我们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因为它是糠糟不如的垃圾，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更需要二者中的哪个更优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带来发展的动力，能够盘活经济运行，这就是我们选择它的理由。而它自身存在的缺欠是我们驾驭市场运行过程中需要非常注意的，需要加强调控的，但不能因此抵消它的优点，至少从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亟待提高的国情来看是如此。

假如当初我们没有选择这一发展道路，或许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存在了，市场调节失灵的风险也不存在了，但是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就不存在了

吗？如果因此而没有发展起来，那么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关涉到社会的基本稳定、关涉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前途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有社会问题的"富"与没有社会问题的"穷"之间，我们情愿选择有社会问题的"富"，因为"穷"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没有破坏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标，就应该是历史所肯定的决策选择。

2. 为什么中国错过了正面邂逅两次国际金融危机?

1997年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被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不经意地错过"了正面遭遇的机会，致使中国成为抵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破坏性蔓延的中流砥柱，以及扭转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发展颓势最有可能的领头羊。有人说，中国没有深陷两次金融危机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因为没赶上而"错过"了金融危机。果真如此吗？如果说1997年中国金融改革刚刚展开，因为赶不上而错过了金融危机似乎还说得过去，但2008年的中国金融市场已经是完全加入WTO之后的事情了，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客观上绝对应该"赶得上"金融危机，但为什么中国金融市场还是没有直身陷美国华尔街陷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差异上找到答案

全球化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其中，突出表现就是东南亚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利用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转轨、大量传统产业移植海外的机遇，实现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市场化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最初的亚洲"四小龙"和后来东南亚的"四小虎"。但是，盛极则衰，亚洲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骄傲，结果却遭受了一场暴风雪般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开始爆发于泰国的金融风暴，先后席卷大部分东亚、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以及经济大国日本。其来势之猛、肆虐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 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一次会议上，指名道姓咒骂暗中操纵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美国人乔治·索洛斯："这个家伙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 随着这场金融危机向世界蔓延，欧美发达国家都感到了"大火烘烤"，纷

纷采取措施保护本国金融体系安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严重动荡

有人分析，1997年，中国市场化改革还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金融市场化自由运作还不够成熟，国家行政干预较大，结果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世界金融投机分子无法利用金融行为规则搅动中国金融市场，从而避免了遭受大规模直接金融投机的袭击 应该说，这有一定道理 在环中国整个东南边陲的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能够避免正面邂逅，确实存在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全自由性运作使得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受限 但这是不是应该归结为不成熟呢？成熟又意味着什么呢？

还有人认为，造成这次金融风波的原因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开放的程度过大，经济联系过于紧密，使得一家失火烧毁全村。而中国金融市场没有过分对外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不紧密，所以逃过了惹火烧身的劫难。这个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是上一个理由的延伸，但其实不然。因为对外开放程度、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程度只是不完全自由性运作中的一种不成熟性表现形式，而不完全自由性运作不一定都跟源于不成熟性，不成熟性也不仅仅表现于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程度。这个理由只能说明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外开放程度高，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程度高的国家较为容易“殃及鱼池”，但是作为金融危机发生地理由就不充分了。这个理由有一种倾向，就是否定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进步性。金融系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液，它不成熟、运转不畅就会造成实体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而中国经济越发展与世界联系就越紧密，这就要求中国金融体系必然与世界发生联系，所以，企图保持与世界之间距离，实施适度开放来规避市场金融风险是因噎废食的做法。中国要发展经济，中国与世界之间金融联系更加密切是一种刚性趋势，不是主观选择的事情。这就是说，要防止金融危机发生，不是开放不开放以及开放程度的问题，而是建构金融安全体系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泰国之所以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策源地，是因为它片面吸收国际资本过度开发房地产业造成融资困境，为国际金融投机分子炒作制造了机会

中国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袭击，根本原因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实的公有制经济物质基础使政府拥有强大的金融调节能力，面对金融风暴，可以作出积极有力的回应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当时中国政府拥有数千亿国家外汇储备，这对外汇炒作分子是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中国大陆不仅自己免于金融大鳄的袭击，而且成功地帮助香港战胜了大鳄的

吞咬，稳住了港元汇率的稳定性，这显然不是北京政府发表一通支援香港外汇市场的声明就能做到的。这里的关键是中国政府当时手中握有数千亿外汇储备做后盾，说话才有分量。

中国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实际上是在追求两极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一极是完全自由化，另一极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国家宏观控制力。这里的问题是，自由是如何自由，是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私有化基础上的自由；宏观控制力是如何宏观控制力，是不是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主导的宏观控制力。显然都不是。自由必须是有国家安全监管、宏观调控的自由，国家控制力必须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控制力。我们党从那次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积极构建应对金融危机防御体系。1997 年 11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要求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大体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角度来说，这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但是，相对于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来说，这却具有“未雨绸缪”的作用。

美国是世界上金融市场运作最成熟的国家之一。在经历 1929 年大萧条之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反金融危机体制，在对付金融危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为什么还是不能阻止金融危机发生呢？美国属于空心经济，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高度国际化，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市场彼此关联越来越曲折模糊，很难通过金融市场看清具体实体经济的运行风险，这为金融投资冒险埋下了隐患。尽管美国有较为完备的价值体系保障机制，但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刺激金融投机行为无孔不入，容易导致监控体制失灵。这次被美国次贷危机揭开伤疤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根源于房地产的贷款冒险和华尔街投资冒险。当然，把世界金融市场拖入困境的还是华尔街金融风暴。美国华尔街是世界性的金融投资场所，高回报率和美国完备的金融市场运行与监管机制吸引所有的西方大国银行疯狂投资。而美国自然乐此不疲，因为它可以拉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这使得金融监管机制“不愿意”成为美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制动力”，也就是在向世界发出金融风险警报方面采取了不作为。这种“人人为我”的自私行为最终埋葬了美国投机发展的美梦。因此，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并不是存在价值体系制度上的缺欠，而恰恰是自由主义特征注定要追求发展动力强势，人为使价值体系保障机制失灵的结果。

这次金融危机使美国和所有西方大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陷入金融市场困境之中。有人认为其严重程度一下子跨越近80年直接与1929年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这当然有些耸人听闻，但这场金融危机由于发生在世界金融中心，使得影响力、破坏力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要大得多。

为什么中国没有直接遭受重创？中国并不是被动享受幸运女神的光顾，1997年后我们从亚洲一些市场化新兴工业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发展困境吸取教训，没有把自由主义市场化作为首选改革取向目标，而是强调政府对金融控制与监管力度，加强构建金融安全体系，却不想十年后，变成了未雨绸缪，成为逃脱金融危机魔掌的法宝。当其他市场化国家的大小银行陶醉于华尔街投资高额回报的美梦时，中国政府却把风险放到了第一位，利用金融监管机构，严格控制国有银行大规模注资华尔街搞商业投机。当危机爆发时，中国各类银行只有相对较少的资金被套住，是直接受到冲击较小的国家之一。灾难未必都是祸，如果从中吸取教训，积极未雨绸缪，则有利于规避更大灾难的挑战。历史总是以耐人寻味的一面展示出来。一直被西方指责政府操纵市场的中国，继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又一次扮演冀望者角色，这是不是对西方市场模式的巨大讽刺呢？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探索过程中遇到问题，善于吸取教训，亡羊补牢，这在下一次类似问题出现时就变成了未雨绸缪，成为战胜挑战的有力保证。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国扮演了非常有意味的角色。美国一直倡导法制框架中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并以此自诩为标准的资本主义。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认为亚洲国家必须继续推进市场自由化程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一夜之间把美国从标准的资本主义世界“颠覆到”社会主义世界中。美国的小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一出炉，就被人戏称“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英国《泰晤士报》经济专栏作家安纳图·凯尔斯盖（Anatole Kaletsky）称，“曾经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国家的最资本主义化的政府，已经决定铲除这个国家最大、最重要的私人金融企业的老板，以政府任命的官僚取代之。”欧元太平洋资本（Euro Pacific Capital）总裁施夫（Peter Schiff）说：“这项行动代表着这个国家迈向社会主义最大的步伐，标志着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1]

---

[1]《外媒称美国大步迈向美国特色社会主义》，《环球时报》2008年9月24日。

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对此也评论说，正如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样，美国也在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苏东剧变以后，西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念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突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资本论》也变成了世界畅销书。美国虽然不会变成社会主义，但是却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片面追求自由主义市场倾向，加大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力度，这与罗斯福新政挽救大萧条中的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的做法是类似的。美国曾一直不能理解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什么中国始终不放弃社会主义。事实证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

中国市场化改革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来说有一个深远意义就是彰显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责任意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分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致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承诺10亿美元贷款，用来稳定泰国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金融震荡加剧，欧美国家也陷入进来。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稳定，会不会也像周边国家货币一样大幅贬值，这不仅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情，也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将可能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局面，国际社会把支持亚洲金融局势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币不贬值上。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是否该贬值问题有过争论。主管外贸的领导人认为，既然亚洲重要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已经下跌，为保持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人民币汇率必须跟着下跌。但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部门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目前正在推进金融等改革，若让人民币汇率贬值，不仅将使1994年汇率改革的成果付之东流，而且由此造成的心理负面效果将是无法估计的，因此主张人民币汇率不贬值。两种观点都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前者主要从维护中国经济当前发展势头上看问题，认为采取跟随战略，把金融震荡对实体经济发展直接影响降为最小，后者则从改革大局出发，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出发，认为采取稳定战略，可以保持金融改革的连续性和信誉度。中央最终作出人民币汇率三年内不贬值的重大决策。应该说这不仅是从国内的改革需要看问题，还存在中国是从担负稳定世界金融局面的责任的角度看问题。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会上说，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中国向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要付出巨大牺牲的，因为

当时整个国际经济环境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全球经济特别是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第二，当时很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知识经济迅猛发展，传统产品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美国在以高科技竞争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已抢先占据制高点，其能量还在不断释放中。第三，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加。面对日益加剧的亚洲金融危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担心本国竞争力会受到削弱，纷纷采取措施，不同程度加强贸易保护，强化非关税壁垒。第四，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影响着未来的走势。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际，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之时，而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国内需求市场尚未全面建立起来，主要靠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所以，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党积极承担作为一个大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减弱金融危机的影响、稳定周边国家经济衰退态势，从全局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

历史惊人相似的是，十余年后又一场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又将面临抗击世界经济颓势深度蔓延的先锋军角色。中国在遭遇外汇实际购买价值严重缩水的情况下，从维护世界金融市场稳定性出发，没有大量抛售国际金融证券，没有给处在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制造新的不稳定性。甚至应美国请求，适当地加大购买相对比较稳定的美国政府国际债券，为美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为世界）稳定金融市场。为了应付这场金融危机，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都像美国一样忙着给本国的金融市场注资，填补窟窿，稳定局面，而中国则以4万亿元投资基础设施及其他重要产业来刺激经济、“保增长”，通过扩大内需来弥补国际贸易的持续疲软问题，全力维持经济发展速度，这在客观上无疑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连带效应。

当然，要全面地看问题，中国没有受到这场世界金融风暴的正面冲击，并不意味着可以在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动荡中能够独善其身，虽然我们比欧美遭受的金融洗礼要弱许多，但由于我们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化中，经济上已经并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1997年那场金融风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征途中经受住了考验，变阻力为动力，保持住了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那么在这次经济发展困境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能不能彰显出它的优越性呢？实践正在给出这一答案。不过，当人们承受经济困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时，必然会引起一个

历史反思——当初，我们有必要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化吗？

第五节 加入WT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融入全球化

WTO全称是世界贸易组织[1]，它囊括了实行市场经济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客观反映。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2001年11月加入WTO是其中最显著的标志。不管中国着手对外开放积极走近全球化，还是谋求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化，都是对党决策的重大考验，因为世界对中国来说既是施展才能、展示形象的大舞台，也是与竞争者展开角逐的斗技场。

1. 为什么一定要加入WTO？

如果说，1978年中国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是第一次对外开放的话；那么，经过15年漫长的谈判，中国在2001年加入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则是第二次对外开放。从战略用语来看，第一次开放算外向化，第二次算全球化，两者内涵不同。外向化只是对外开放，比封锁前进了一步，并且主要是单向的，允许别人“走进来”；全球化才是与世界经济的沟通进而融入，具有双向的特征，既让人家“走进来”，自己又“走出去”。正是这个意义上，只有加入WTO，才是从外向化推进到全球化，才是以自由贸易为取向，撤除种种壁垒首先是关税壁垒，允许和鼓励多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从而把中国与世界有机联系起来。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了全球经济之中，也标志着中国对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现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加入WTO，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在“入世”之前及“入世”过渡期，关于中国“入世”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的争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种是反对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屋子还没有打扫好，国门敞开将给工农业和服务业带来巨大冲击，在许多领域可能顶不住舶来品，会

[1]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准国际贸易体系，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成为调节世界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全球化多边贸易组织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1950年3月，台湾当局非法以中国名义“退出”关贸总协定。几十年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始终徘徊在“关外”，中国为“入关”作了不懈努力。

使得不少企业破产，会造成大规模失业，会使社会动荡不安。具体来说，“入世”会使农业萧条、农民大量破产，一般民族产业发展受阻、甚至停滞，新兴工业萌而不生、胎死腹中，高科技产业被跨国公司、失去核心技术自主性等等在中国刚刚入世之际，有学者指出中国入世将面临三大不利因素：第一，由于某些贸易保护措施的取消，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将削弱，而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削弱，将束缚经济上的自立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本国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下降。第二，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与中国的市场开放是双向的，中国的产品流入外国市场的同时，外国的产品与企业也将涌入中国，因此机会和风险也是双重的，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中国的比较劣势产业，影响支柱产业的发展。第三，“入世”与经济改革同期进行，将削弱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产业的优化重组导致企业的兼并破产，会给经济建设带来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在这个时候“入世”，会放大不稳定因素的消极性，中国社会和经济承受力将面临严峻考验。还有的学者从国家之间依赖性角度分析入世利弊，认为加入WTO后，国家主权必须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让渡，国与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波及与其有密切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区域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例证。”[1]同时，国际游资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通过经济全球化，这种超越国界的巨大金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称是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总之，我们积极融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以拓展商贸领域，可为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好条件，但在获得利益同时，也要让渡利益、承担风险。当我们被迫以准发达国家身份加入WTO的时候，又有人提出质疑：我们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入世”？为什么不等到强大起来之后再“入世”？

另一种是支持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必须与国际接轨才能冲破一些藩篱取得进展的阶段。而且20年的对外开放的经验也已经说明加入WTO是好事，优胜劣汰的机制无疑将淘汰一批企业，但也会使好企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同时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阻挡，在这场博弈中如果我们不加入WTO，

[1] 王宪磊：《加入WTO后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在制定游戏规则时我们成为局外人，就会使自己越来越被动[1]有学者分析，经济上，我们"入世"，可以促动加速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使之成为改革一个巨大外推力；政治上，我们融入世界经济圈中，可以避免被孤立，让死抱着冷战思维的国际右翼势力阴谋不能得逞 在民间层面上，还流传着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要傍美国这个大款 当然，中国不可能傍大款[2]因为中国如此之大，没有哪一个大款愿意让中国来傍

其实，这是个利弊对比分析的问题，问题还有另外一面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国坚定不移地加入WTO，即是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这不是要不要加入，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而是必须加入，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都得直面这一不可逆的发展态势 经济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融入世界主流经济圈，孤立起来或者有限地对外开放搞发展都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中国加入WTO是必然的、不可选择的 对于发达国家，主要是机遇，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政策得法，措施得力，会变挑战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中国虽然是以准发达国家的入世条件挤进WTO的，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利益与风险同在，关键是我们如何实现趋利避害 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 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 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3]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加入WTO有着清醒的认识：加入WTO后，既不能夸大对我国的冲击，也不能低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2000年11月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对世纪之初全球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源的揭示，做了集中说明："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的，南北差距不断扩大 我们应该全面审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加强对这种进程的正确引导和管理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1] 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2] 幸福有两种：一种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到别人手中，作为交换的幸福 马克思在早年的文稿中提到的"野猪的自由"就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幸福 家猪虽然能消受现代化文明成果，但它的命运却掌握在主人的手里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人追求的是什么幸福？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幸福

[3] 《人民日报》1998年3月10日.

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众多的创业机会，但也伴随着更快的技术创新、更短的产品寿命周期、更快捷的资本流动和更激烈的人才竞争。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应对资本的跨国流动加强有效监管和合理规范，并制定和实施适应市场迅速变化的新的经济技术国际规则，也要求人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经济全球化，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使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和水平进一步出现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发展更趋困难，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1]这实际上已经概括出中国为什么要加入 WTO 以及“入世”后中国面临的挑战和责任。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中国只有“入世”融入全球化中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不容置疑的前提条件。问题关键是我们加入 WTO 以后，必须认清各种不利形势，认清要担负的国际责任。

另外，所谓中国强大之后再入世的观点就只不过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开放是一个获得发展机会的前提，开放是一个国家强盛壮大的必由之路，既然没有开放就不可能强大。所以，所谓中国强大之后再入世的观点其前提条件并不成立，该观点也就无从谈起。世界各国各民族是在互相开放中共同发展的，其他国家不可能“等”着中国强大起来。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静态的眼光看待 WTO 成员国，即假定它们不发展，等到我国发展到与它们水平差不多再来“入世”这样荒唐的观点。全球化不是专车而是列车，不会专门等待中国赶过来上车。即使现在中国不参与世界性的竞争存在明显的好处，这种暂时的好处也只会成为阻碍发展的麻醉剂。

事实证明，我们加入 WTO，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它给我们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在5年过渡期过程中，我们一直信守承诺，积极兑现入世协议的各项规定。同时，我们也加紧配套改革，在金融、农业、汽车等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加大调整力度，为适应入世带来的竞争冲击做好准备。另外，中国纺织业、家电制造业等相对优势产业利用入世带来的市场机会，不断扩大出口规模，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由于我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变不利为有利，在加入

[1] 江泽民在 2000 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00 年 11 月 16 日

WTO后的几年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抑制我国出口贸易，抓住我国出口的优势商品——纺织品经常大做文章，制造贸易摩擦。我国在实践中不断熟悉规则，学习经验，经受住了最初考验，日渐成熟起来。从战略上讲，我国加入WTO后，已经完全成为国际经济社会中相互链接起来的一员，标志着已经融入世界之中，避免了出现被孤立的局面。而且由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正逐步抬升，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新WTO规则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同时，参照国际通用规则制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国内的有关法律法规，对于提高体制改革的效率和质量，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意义。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WTO成员国，人们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凸现出来，外国商品和外国企业没有像海潮一样洗刷掉中国民族产业，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中国依然社会保持稳定、经济保持健康发展，这应该是对当初作出加入WTO决策历史功过的最好判定。

总之，加入WTO是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决策，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对我国今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后，中国就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其他所有成员国和地区在经济、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并可以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与世界经济的充分结合，从而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开拓新的空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运行，这对于促进和加速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系列规则享受到作为一般贸易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当自身利益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则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获得了国际竞争规则的制定权，就可参加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使中国的合法权益得到必要的反映，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到合理保障，从而大大增强中国在国际经贸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

当然，“入世”后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中国面临的风险确实加大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虽然没有把中国卷到风暴中心，但是由于出口受困，对中国经济影响还是比较强烈的。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搭上列车要比步行

快，但是同时就要共同承担列车行进时的意外风险——没有因为有撞车事故放弃列车而情愿选择步行旅行。

2. 全面融入全球化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再经历5年过渡期，中国利用了近30年才真正全面融入全球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台阶式飞跃的过程，是在量的连续积累基础上经历多次局部质的飞跃发展的结果。这一演进历程，是改革开放深入拓展，经济与社会不断取得进步的写照。

第一次质的飞跃：把“引进来”做得有声有色。

要和世界全面接轨，就必须首先铺平中国自身与世界接轨的通道，逐步而稳健地拓展、拓深对外开放的格局，就为全面融入世界、融入全球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我国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上，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方针，实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分层次、有重点的全面开放。首先是举办经济特区，为对外开放展示窗口、树立形象、积累经验。接着，扩大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建立对外开放区，出现环渤海经济圈、山东半岛沿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在沿海地区、沿江地区对外开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向沿边、内陆省区逐步推进，对外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迅速的发展。1992年3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4个北部边境城市开放，扩大陆地边境的对外开放，以促进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与交流。后来又宣布对外开放一些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内陆地区省会城市以及长江沿岸城市。从对外开放的领域看，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以经济领域为重点，包括文化、科技、教育、艺术等其他领域的开放，而且目前对外开放的领域还在进一步拓宽。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领域也要开放，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开放步伐加快。从对外开放的对象看，我们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应该说，邓小平时代对外开放的视野，主要是着眼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外资、引进外国智力和吸取一切先进的东西等等，其突出的特点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进程来看，我国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从“引进来”起步的。譬如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沿海开放城市等，都是为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以及引进技术、管理等一揽子经济资源。经过

10年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从沿海、沿边到内陆的梯次对外开放格局，在全球化的平台上，中国已经铺出一条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立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表现出是对前期开放工作的推进，使得中国市场更具有吸纳空间和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为走向世界、全面融入全球化奠定基础。实践证明，“引进来”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但是光“引进来”而不“走出去”，就会丧失大好的发展机遇，中国也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在全球化新一轮发展浪潮时期，我们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争取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次质的飞跃：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二是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即按承诺的时间表开放；三是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我国将根据对外承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但是，在国际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要让我国立于不败之地，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仅仅敞开胸怀、等待外国走进来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走出去，实现双向互动机制，才能抓住机遇，掌握主动权。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一个“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时代，那么，江泽民时代就是一个建立在“引进来”基础上的“走出去”时代。前者利用外国发展经济的优势因素激活了中国发展动力系统，后者则通过把中国相对优势经济因素输送到国外，实现国内外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双向互动，实现了全面意义上的经济交流，中国对外开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什么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呢？改革开放20多年里，中国通过“引进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总体来说，我们主要是利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和市场潜力，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重组中国的生产要素，使中国进入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并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采购、定牌生产、来料加工等形式，使中国的产业、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这期间，我们

吸引外商投资总量与对外投资总量比例在14:1左右，"引进来"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我们基本处于外商投资整合中国企业和资源而形成的一种被动式的国际化过程。从长期来看，单纯"引进来"战略不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依附地位，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尤为不利。上个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国际竞争激烈。面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尽享全球化好处的现状，发展中国家必须利用后发优势，抓住全球化产业结构重新调整的机遇，争取和扩大自己的权益。跨国公司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已经将中国市场纳入其全球化战略，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已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国要改变被动局面，就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因此，实施"走出去"战略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分析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一是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多样化的技术基础，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配套与协调发展能力，拥有大量适用技术和中间技术，而且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出现买方市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技术创新和升级的要求日益迫切；三是总体资源丰富而人均资源贫乏，客观上已处在国际资源竞争的强大漩涡之中。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是我们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必由之路"[1]对此，江泽民强调，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从1997年起，我们党在重要会议上多次提出"走出去"战略方针，特别是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专门对该战略的实施作了详细部署。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2]

为了贯彻"走出去"战略，除了政策导向外，集中体现在对企业的扶持和

[1] 江泽民在参加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3月8日。

[2]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8页。

推动上。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市场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素质、国际竞争力决定"走出去"战略的成败。而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难以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因此，为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政府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通过积极申请加入WTO，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国际宏观条件，使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有国际通用规则和双边规则作保障，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压力。其次，我国政府创造体制框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对其进行宏观管理、搞好服务。再次，在搞好政府的宏观管理同时，进一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推动境外投资活力。另外，积极扶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跨国公司，培育跨国公司试点，帮助中国跨国企业发展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是我们在参与国际全球化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必由之路。"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全球化攻略的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的全球化理论内涵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新的提升和拓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全球化发展跃上新台阶的背景下，这一战略部署意义重大。第一，通过对外投资，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到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可以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二，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地位。第三，通过对外投资可以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源、技术、市场等经济发展条件，获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尤其是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保障中国对能源、资源的多渠道供给。从长远来看，这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有利于缓和国内资源供给压力，维护生态平衡。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通过"走出去"，可以把竞争的战场向国际化转移，避免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同时争夺国内市场，造成两败俱伤。第五，"走出去"战略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必经途径。另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以一种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单向度冲击的终结，而代之以不同制度文明多向度互动、博弈和竞争。

第三次质的飞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们不结盟，不等于排斥朋友，孤立独行。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经济区域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现侧面。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区域经济组织已达100多个，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其中，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发展最快、影响最大，而且最具活力，它们在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增强地区经济抗御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冲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经济区域化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兴未艾的趋势。在亚太地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无疑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目前，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贸组织的前面。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于1991年10月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这对于我国发展同亚太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大有好处。自我国加入该组织以来，一直积极参与该组织的一系列重要活动。2001年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我国上海成功举办，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影响，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象。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活动，可以向亚太地区和世界展示开放中国的崭新面貌，并在相互尊重、循序渐进、平等互利、共同繁荣基础上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合作的良好愿望；可以为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提供新的机制和活动空间，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企业巨头到中国考察、投资；可以发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特别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除中国以外的几乎整个东亚地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拿出40亿美元参加国际援助计划，此外还加强与东亚有关国家的金融协调和合作，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地区和国际金融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和尊重

与此同时，我国还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周边邻国举行了“10+3”首脑会谈，并于2001年11月与东盟就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2004年11月29日，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协议的全面启动。按照协议，到2010年，有关各方将逐步取消大部分双边贸易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届时，一个人口超过17亿、经济总值达24000亿美元、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正式形成，这对于中国和东盟各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除官方活动外，民间机制也已运作起来，建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版图上唯一没有建立制度化经济合作空白点的东北亚地区（包括中、日、韩、朝、蒙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合作进程也在加快。这些地区在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产品和市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要合理利用，就能为经济要素的相互流动创造条件，形成一种促进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合力。近年来，中国还加强了与南亚国家、大洋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加强了金融之间的密切联系，推动国际金融市场多元化，增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的话语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并把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与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南非共同体等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共同面临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任务。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空间还会更加广阔，这也必将给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更多的机遇。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在客观上推动全球化进程，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六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球化视角的分析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我国健步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国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更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首先，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技的、军事的手段，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次，网络

文化的冲击愈加明显和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提供着世界上大多数的高科技产品，而且把持着大多数的现代信息手段和信息内容。他们通过因特网、多媒体等技术手段，使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观点和文艺作品长驱直入，不断渗透，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冲击。这就是被一些人称之为的“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世界发展形势的大气候对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新挑战。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却处于低潮，对党和国家提出了新课题。社会主义事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事业。20世纪社会主义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但同时，20世纪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也给我们留下了兴衰成败的丰富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作出认真的梳理。纵观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三次重大事件曾经震撼了全世界。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世界资本主义相抗衡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胜利大进军的年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春天，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全世界进步人士欢呼雀跃。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事业从高潮转向低潮，特别是最后十余年，仿佛鬼使神差一般，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东欧社会主义一个个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历来视社会主义为“眼中钉”的资产阶级弹冠相庆，庆贺社会主义终于红场成空，世界上赞成或同情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第三次，也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中迅速兴起，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一枝独秀”的奇观，为处于隧道中的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隧道尽头的希望之光。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思想文化的冲击以及国际共运的低潮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关键在于怎样回应挑战。而能否正确地回应，归根到底取决于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回应一系列重大而又严肃的时代课题：面对充满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的21世纪，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怎样抓住机遇，回应挑战，迎头赶上时代的潮流，在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中站稳脚跟？面对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我们怎样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各种复杂的形势下坚定不移，发展自己？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严峻现实，我们党怎样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保持和增强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和吸引力？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的“西化”、“分化”政治图谋，我们党怎样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不

断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中国大发展中走在时代的前列。

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国际原因。理论界主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平台进行背景性、条件性、时代性生成原因分析，存在多视角特点。这样看问题，虽然体现出全面性，但缺乏内在逻辑一致性。从全球化视角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原因，可以把各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在全面性基础上更进一步，体现出深刻性。因为从全球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深入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一，经济全球化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经济实力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我们党更要坚持不懈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第二，文化全球化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各种思想文化既相互渗透和融合，也相互碰撞和冲突。特别是西方网络文化的冲击愈加明显和扩大，使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观点和文艺作品长驱直入，不断渗透，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冲击。因而，我们必须正视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的挑战，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的先进性，使民族的先进文化逐步成为世界性的先进文化。

第三，政治全球化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波及文化领域，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政治领域，推动着当代国际政治向着更具有全球纬度的方向发展，呈现出政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政治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压力和挑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时期，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顶住压力，最终战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归根到底要看人民是否支持共产党，这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层意蕴所在。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都会发现：在深入回应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苏东剧变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异乎寻常地崛起，其"一枝独秀"的亮丽景观更加引人注目，为全球化

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多元化、多纬度的方向发展其全球化意义在于：既保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精髓，又保持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全球化进程中尽情展示自己的特性。这两方面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总之，从全球化视角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发挥的指导作用，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为这一进程夯实了根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把这一进程从孕育的土壤中催生为茁壮的小苗。如果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作用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它起到了一个伟大历史转折作用——邓小平理论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实现了转变，引领中国实现了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转折，而科学发展观则在此基础上，使中国更加成熟地在全球化中行走，使之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烙印。

第六章 胜利拓进（2002—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开始在人类文明主轨道上行走，是不是从此遍地鲜花、一路果香了呢？当然不是。中国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融入全球化的，世界上抱着冷战思维的政治势力会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时时处处为难中国；而愈演愈烈的国际经贸竞争也会使中国遭受越来越多的经济摩擦；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不担负国际责任；而融入全球化就要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发展风险，中国不可能在世界经济震荡中“毫发无损”。总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与全球化互动中，不仅微笑迎接曙光从容化解寒流，而且彰显出社会主义价值底蕴。

第一节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有人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在21世纪，中国将重现盛唐辉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真的会如此吗？中国并不想以经济为基础争霸世界，但是实现民富国强却是一直追求的目标。要创造中国的21世纪就是要在本世纪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彻底摆脱上个世纪民族被动社会发展的局面。这需要雄心壮志，但更需要理性的实践行动，面对

21世纪伊始全球化新发展态势，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1. 新世纪全球化发展大趋势

苏东剧变后，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较为普遍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两极格局被打破，全球化发展高歌猛进，一片欣欣向荣。但多极化政治格局处在变动之中，新的交叉性的不确定因素[1]替代了两个意识形态互相争斗的主体地位，使得全球化发展在本世纪初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强硬的布什政府逞唯一超级大国之雄威，在政治上表现出咄咄逼人的霸权态势。但世界经济上的衰退和文化上的交融以及大国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客观局面，使得全球化发展表现出如此曲折动荡、复杂错综、丰富多彩和难以捉摸。

第一、经济上，面临很多困难，波动性大，复苏迟缓，前景不乐观。2001年，受“9·11”事件冲击、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发展矛盾爆发出来，世界经济经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又遭受沉重打击，美、日、欧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一度同时陷入衰退境地，世界贸易出现了负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40%以上。在这以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进入缓慢增长时期。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一场金融海啸从美国席卷世界，世界经济又陷入困境中，经济发展前景又比较严峻。世界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出现复苏乏力与经济波动双重困境的特征。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有几个新变化：（1）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提升本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大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使很多国际间的经济贸易规则很难得到通行。WTO成员国之间新一轮多哈回合迟迟达不成一揽子协议，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2）国际投资环境十分脆弱。国际资本市场结构性矛盾更趋明显，国际资本流动不公正性不减反增，市场竞争加剧，同时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等因素影响，国际投资环境十分脆弱、抑制国际投资的增长。当前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资本外流现象，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又雪上加霜，

[1] 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结束之后，由于中国早已经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基准划分国际敌友关系，“资”“社”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国际矛盾主体地位了。但是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牵扯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多问题也成为影响全球化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投资规模普遍骤减，经济发展活力不足。（3）能源安全问题突出。自从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后，石油价格在波动中一直居高不下，能源问题越来越显示出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瓶颈"。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这样的新兴次发达国家都在开拓渠道，保卫自身的能源供给安全。世界能源竞争日益突出，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 年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石油从高位价格猛落下来，并不意味着能源危机从根本上解除，实际上这只是削足适履——脚小了，鞋才显得大，一旦经济从疲软中恢复，这一客观问题还会凸显出来。

如果与 20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对比，21 世纪最初几年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作为一个新世纪发展的起点，这并不乐观。显然，如果不做较大的结构性调整，经济波动性还会持续，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好兆头。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科技的发展、国际经济协调性增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增强等因素，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利的，但从中国自身绝对发展来看，却是谨慎的乐观。首先世界经济发展波动对中国必然产生消极影响，其次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也会有一个爆发、凸显的过程，再次发展规模越大发展速度越减缓是一个客观现象，而对中国由于面临人口老化现象，劳动力不足将会影响经济增长后劲，最后就是能源、资源的制约，对中国经济增长将是一个严峻考验。

第二，在政治上，大国关系处在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发展与美国全球霸权主义较量还在进行中，新的政治格局还没有形成，要形成稳定的政治格局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渡期。20 世纪末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两极格局，世界进入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政治格局过渡期。由于美国综合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大国，出现了大国之间政治不平衡现象，这使得 21 世纪初国际政治新走向存在很多变数：美国虽没有能力单独主宰世界，但却不甘心放弃霸权主义，一定要置自身于其他大国之上；其他大国虽没有能力单独与美国对抗，但却不甘心接受美国的领导，一定要争取平等的国际话语权，这就造成多极与单极之间的较量。这其中又存在盟国合作与控制反控制斗争、全球合作与强权政治以及在第三世界方面的利益冲突，使得这种较量复杂嬗变，很难预测。"9·11"事件后，美国借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很快就出台了"布什主义"，日益显示出国际霸权主义倾向。"布什主义"把美国安全凌驾于联合国基本宗旨之上，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和核报复性打击，对世界政治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与此相呼应，西方出现了新干涉主义，新干

涉主义者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等极端论调，任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它们通过经济全球化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凭借经济和军事优势，干预弱小国家，助长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造成国内问题国际化，地区问题扩大化，甚至越过联合国，公开对主权国家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破坏了地区安全与稳定。美国甚至提出“无赖国家论”、“邪恶轴心论”，为打击其宿敌国家制造舆论。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好战政治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却使之向世界各地扩散，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和袭击。从整个国际态势上看，美国和西欧一方面继续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提防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另一方面彼此也出现利益冲突，西欧反对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态势，开始酝酿摆脱美国控制的局面；而德日印巴等国则想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抬升其国际地位，使政治多极化发展出现新趋向。另外，美国在“改造”阿富汗、伊拉克之时，又把矛头对准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大做文章。总之，受美国“挟‘恐怖’以令各国”影响、政治全球化中的“美国化因素”活跃、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势力，不同程度、不同目的抵制“美国化”的因素也跟着活跃起来。另外，一直沉寂的俄欧矛盾又悄悄升温。俄罗斯日益感受到来自美欧的地域空间威胁，尽管国内经济发展只是谨慎的乐观，但为了保持其战略地位，还是在海上和空中向欧美展示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俄罗斯军方表现出更激进的维护民族利益的姿态，对俄周边安全做出更积极的防御反应。当然，俄与欧美的矛盾不会激化到敌我状态，不可能回到冷战时期的对抗状态，因为双方力量是不对等的。但是，双方暗中较劲反映出一股新的世界政治波动暗流正在酝酿。

无疑，牵引政治嬗变的主要因素是美国。但不管现任的奥巴马政府是否有更好的国际政治合作意识，美国霸权主义基本路线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因此与多极化的冲突是不会停止的。显然，中国要想获得更好的国际政治环境，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

第三，在文化上，一方面，在整体上，依然保持相互激荡、相互交融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以抵制“美国化”为标志，出现多元性特点，二者统一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必须看到，在传媒手段日益发达、在人们交往日益便利的时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学习、相互交融是不可遏止的主流态势，这是全球化客观推动的结果。但是，当西方的强势文化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的时候，当美

国文化逐渐显示出它的霸权本性的时候，当各国盲目引进外国模式进行改革遭遇困境的时候，当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今保护环境主旨相矛盾的时候，文化的民族性取向就会成长起来，文化多元性就会像点点繁星一样显现在文化全球化的夜空中。因为只有以民族特色为构成元素，才能使五彩斑斓的文化全球化在民主基础上健康发展，才会有远大前途。从保护世界环境出发，世界上活跃着一股强大的民间组织性质的力量，反对美国放纵式的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在欧洲，以法国为代表，一方面，加强中欧文化交往，另一方面，向世界努力推广本国文化，这在客观上弱化了美国文化的影响；拉美一些国家虽然依旧笼罩在美国文化的云雾中，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失败，对美国模式的崇拜有所降温，对美国文化的渗透有所淡化；俄罗斯曾一度崇拜西方文化，但近年来通过举办中俄文化年等活动，开始提升俄、中文化的影响力，有意淡化西方文化的影响；阿拉伯一些保持王权制的国家一直小心谨慎地提防包含着民主思想的美国文化在民间的影响力，提倡传统文化，反对完全“美国化”。中国在文化上一直存在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的双向运动，外来文化曾一度侵蚀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但是，近年来，在很多方面，例如，新儒家文化、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节日等都在升温，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振作起来。总之，“美国化”正在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抵制和弱化，文化的多样性取向有所发展。当然，民族文化的复兴、世界文化多元性兴起，并不是对文化全球化的浸蚀，相反，它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平台上，借助这股全球化的风力兴盛起来的，它是在抵制文化霸权、促使文化全球化更加公平民主的动向中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文化全球化进步的表现和必然趋势。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是总的大趋势，在没有新的决定性因素注入之前，不可能发生根本转变。20 世纪绝大多数时间是美国的世纪，21 世纪在相当长的时间依然是美国的世纪，因为美国所积攒的社会财富和综合实力如此之巨，任何国家在短期内都无法单独超越或者达到。根据国家大小规模，具备达到或超越美国之潜在能力的国家并不多，而且它们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离美国发展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理由说，中国是其中之一，但仅仅是理论上的其中之一，而不是唯一。断然宣称 21 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若是从发展效果来说还说得过去，若是从发展壮大后的绝对实力来说，就有些盲目乐观了。即便是发展总量有机会达到美国规模的程度，仍然算不得富裕国家，因为对于 13 亿庞大的人口来说，人均收入不会很高。总之，中国既没有野心、也

没有能力，更确切地说也没有必要争当“老大”。中国要创造自己的世纪不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而是与自己落后的起步基础对比，也就是要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民族复兴使命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真正实现有充裕物质作基础的独立自主，在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实力保证不再遭受别人的威胁和欺辱。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人民要创造的新世纪只是给我们的人民自己营造一个安全而幸福的港湾，而不是要争霸世界——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2. 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全球化发展出现的上述新变化，必然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持续快速发展，也必然会引起世界的反应，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21 世纪能否属于中国，国际条件的变化是重要的，但自身的准备是更重要的，因为外因是以内因为变化根据的。

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从国内来看，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存在影响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改革方面，中国是通过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方式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所以，前期改革带来的发展成绩不能够预示着将来一定会顺畅发展下去，相反，改革阻力会越来越大，改革的困难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发展任重道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困难更大。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同时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也是关键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对政治体制的要求越来越大，虽然党的执政理念不断更新，但党的执政机制显然有些滞后，很多方面都需要作出特别重大的调整，而政治体制的变动最容易触动社会稳定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因此既要小心谨慎又要大胆创新，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是中国当前比较棘手的社会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失业问题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不仅浪费人力资源，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另外，社会风险性加大，重大生产事故频繁发生，屡禁不止，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给国家经济发展计划造成严重障碍。在文化方面，当前社会风气出现对立性波动：一方面创业价值观念盛行，另一方面享受价值观泛滥，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双重影响。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成为文化走向的中

轴，从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容易造成思想颓废，诱发犯罪现象败坏社会秩序，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深刻的。在经济自身层面上看，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经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别、能源与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生态环境的恶化、科技自主能力的薄弱等都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健康持续性。从自然灾害角度来看，由于大气变暖，气候性灾害频繁发生，破坏力巨大，对经济发展也非常不利。在经济发展动力层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是比较低的。科技经费、科技人才、核心技术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不高。中国现有实体经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还有待于全面升级。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作为一个正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一揽子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健康可持续性。

从国际上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态势客观上存在着对我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美国推行所谓的稳定的单极世界不仅没有带来世界稳定，却使多极化曲折发展，大国关系正进行着微妙地调整，国际政治前景不明朗。世界经济发展动荡曲折，南北贫富差距拉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长的成本普遍提升，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普遍不足。文化之间的交融也暗含着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文化冲突也是导致国际动荡的一个诱因。从对中国直接影响来看，也存在很多不利因素。世界存在着各种敌视中国的势力，伺机而动，不仅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中国经发展也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由于中国发展壮大冲击到世界一些人的固有观念，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从单方面利益要求出发，抛出了"中国威胁论"，集经济、粮食、能源、气候、军事、就业等各方面都提出了理由，认为中国正在"威胁"他们的生存。虽然在表现形式上，这只是观念层面的东西，但是它影响到国家间的战略合作选择，对中国争取国际主动发展地位非常不利。中国地缘政治也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都悬而未决，小则因其外交争议，大则引发边疆安全危机，甚至引起军备竞赛，这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另外，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问题原本属于中国内政，但是西方却横手插进来，干涉我国内政，制造事端，影响我国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深远的

其次，必须看到，国内外也存在着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从国内来

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较为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较为充分；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已经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发展经验，抗风险能力得到较大提高。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先后贯彻实施，促进了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一定厚度的人才资源和科技实力，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虽然横向比较是发展劣势，但若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纵向比较来看，就是发展的优势。另外，党对“三农”问题的突出关注、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长期滞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获得生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获得较大进展；党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以及其他区域性发展计划，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改善。配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完善，大力发展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全面升级，努力实现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轨，全面提高产品竞争力。与此相适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阻力不小，但还是大有进展，法制建设、民主建设、制度建设都获得很大成绩，党的执政能力获得普遍提高。在对外开放方面，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把对外开放做大做活。加入WTO以后，市场大幅度拓宽，经济发展的空间扩大，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外汇积累，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外汇储备资金，这对于推动经济腾飞是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总之，经济发展赖以持续推进的基础层面相对过去来说获得较大改善，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从国际上看，有利的因素也不少。首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尽管国际经济与政治发展遇到很多困难、障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是，国际和平的大局势没有变，发展的大目标没有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中国发展经济的良好国际环境基本层面没有变。这是从全局看问题所得到的基本结论。其次，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有力措施，趋利避害，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以此为平台，中国加强了与各国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国际联动机制，从而提升了经济地位，获得了极大的经济话语权。在全球化运动中，这对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有利的，对于维护中国经济利益也是有利的。再次，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坚决维护

第三世界国家利益，而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也在国际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榜样效应，使中国软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发展的空间增大了。还有，经过长期交往，互相推动，中国已经参与建立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与东盟十国关系、亚欧关系、亚非关系等发展，使得中国与国际经济交流有更多的平台和保障机制。

从这些有利和不利因素分析来看，中国能否抓住本世纪实现腾飞，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来看，经过起飞阶段的快速发展之后，往往存在两个发展可能性：一是由于积累了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力基础、科技基础、制度基础和发展经验，存在加快发展的可能性；二是由于积累了发展矛盾、消耗了资源储备、提高了发展成本、恶化了发展环境、激发起竞争对手等，存在减缓发展的可能性。两种发展的可能性往往是交错作用发展的基本状态，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总是波动的、曲折的。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起步阶段，已经慢慢地走近这一发展介点，两种可能性正在成为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选择。尽管不可能彻底排除第二种可能性的作用力，但是可以在时间上缩短、在程度上减轻它的显性影响而延长、强化第一种可能性的显性作用。中国就是要努力做到这一点，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加强党的建设，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保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础、一个连续的发展战略，防止出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造成发展波动、高起高落的局面。其次，必须把短期发展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走科学发展之路、和平发展之路。在改革开放前期，我们重视长期发展目标而忽视短期发展目标，工业上去了，农业相对落后了，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失调，影响到整个经济协调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重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全面进步。但是，受到市场经济运行特点的影响，很多地方偏重于短期的、有形的经济效益，而忽视长期的、潜在的经济效益，出现经济发展"近视眼"现象。这样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看到了经济增长数字，却看不到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益，反而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重视长期发展目标，走科学发展之路、和平发展之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再次，要把外向型经济发展与内源型经济发展相结合起来，实现"两条腿走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只走内源型经济发展这"一条腿"，结果吃了很大的亏，改

革开放以后，我们通过对外开放，逐渐迈开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另一条腿”，形成了“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局面。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并加入WTO以后，中国在进入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偏爱外向型经济这“一条腿走路”，内源型经济发展受到冷落。应该说，抓住国际发展战略机遇，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打开国际市场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我们投向国际市场的商品主要是高资源投入而附加值较低的日用品，因此，这“一条腿”不仅走得很辛苦，也造成国内资源高消耗、经济循环困难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一旦国际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受到严重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警示我们必须重视“两条腿走路”，内源型经济发展对于稳定经济发展基本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就是要下决心、下力气解决二元经济格局问题。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庞大的农村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跨越的一个瓶颈。21世纪之初，我们党已经采取很多措施在逐步提升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但是任重道远，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上不来依然是一个难点，还需要更有力的办法改善城乡经济发展差别问题。最后，就是要发展新兴产业，顺利实现产业升级。未来，在国际上能否有竞争力，主要是靠新兴产业的支持。中国已经在传统产业上“做足了文章”，只有发展新兴产业才能立足长远、着眼未来，以免被时代淘汰。产业能否顺利升级换代，是一个国家跨越“拉美陷阱”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根据。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不确定性还存在，还需要“做文章”。

庞大的中国社会经济是一列火车，是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火车头带动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火车尾前进，还是相反，首先是我们党和人民做出什么样的准备，关键是我们党和人民做出什么样的努力。21世纪未必一定是中国的世纪，但一定不是中国的“滑铁卢”。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和平发展之路

人们的思维总是存在惯性，从大英帝国主宰天下到美利坚合众国独步世界，人们已经形成了西方主宰东方的思维定势，一旦有新的变化趋势就开始觉得不舒服、感觉受到了威胁。实际却是，中国遭受了近百年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一直处在民族生存危机之中，现在刚刚获得发展的主动性，西方和周边的一些国家便

纷纷抛出“中国威胁论”，似乎中国13亿人口天然就应该在温饱线上挣扎才符合他们的思维逻辑，否则，就是对他们的威胁。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坚定自己的和平发展之路、民族复兴之路。但是对那些有敌意的滥调或是有误解的言论，我们必须给予有力回击，否则就会对中国发展不利。

1. 是“中国威胁论”还是“威胁中国论”？

自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我国就坚定地走上了谋和平、促发展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政府以多种形式明确地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因为这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的道路。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国势渐盛，世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过去人们担心中国，是担心中国由于贫困落后可能造成世界性的人道救济灾难，现在担心中国，则是担心中国强大后可能会对世界现有秩序提出挑战，引起世界大震荡。于是，“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了。

“中国威胁论”[1]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当代世界由两极格局逐步走向多极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多极”中的“一极”，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凸显。苏联垮台，中国自然容易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1992年以后，国际社会突然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热潮。国际上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报刊和著名政治家、学者就中国的发展前景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其中就有肆意散布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演变，目前在西方流传着一套“中国威胁”理论——什么军事的威胁、经济的威胁、粮食的威胁、能源的威胁、环境的威胁、文明的威胁、气候的威胁等等，不一而足，似乎中国在各方面都会对世界产生威胁。最初鼓噪“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尽管曲调喧哗内容空泛，但这只算民间看法或是学术争鸣，不久以后，它就成了一些西方政府官员、甚至领导人使用的政治性词汇，“中国威胁论”堂而皇之地成为官方认可的事实。这就为美国“建立亚太安全机制”又增添了一个托词。1995年12月，美国克莱蒙特研究所和台湾国际关系研究所

[1] 参见刘小彪：《“唱衰”中国的背后：从“威胁论”到“崩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曾共同在美国洛杉矶举办一次研究会，主题是“中国威胁：理论与现实”。其主要论点是：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略多于美国。中国将拥有经济能力购买军事技术领域革命所造就的先进武器和武器系统，而美国在这方面无法同中国匹敌。到那时，台湾海峡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将成为东亚潜在的最重要的政治热点，中国将一定会采取积极行动改变现状。1995年前后，美国传统基金会曾组织过多次座谈会，集中讨论关于“下一个千年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各种挑战”，得出的共同结论之一是：中国的发展将会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1997年美国的理查德·伯恩施坦和罗斯·芒罗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甚至把美中各自拥有的盟国都划分好了，似乎又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即将由中国点燃。这进一步加重了西方人们对中国发展的恐惧心理。同年5月，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近几年的《国防报告》不厌其烦地喧嚣：“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这一评估则给人民心理埋下了新的冷战或者新的大规模战争的阴影。

“中国威胁论”给中国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首先，严重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直接伤害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威胁论”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但是，在具体内容上，涉及能源、资源、市场、粮食、贸易等经济问题，似乎中国经济发展，会把整个世界经济基础都吞没，似乎中国人一旦富有，就会引起世界上更多的人贫穷。更有甚者，有人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似乎中国发展经济，就是要谋求政治利益；似乎中国政府是一个野心家，发展经济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而且直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增加了世界各国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心理障碍。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贸易壁垒、人才限制等等无不与此有关联。其次，它对中国融入世界，实现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局面产生消极影响。西方国家的担忧、周边国家的怀疑，会在无形之中助长世界极右势力把矛头对准中国，重新建起意识形态对峙堡垒，反华排华，孤立中国。这会使中国积极融入世界、争取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国际和平共处的外交努力失去效果。再次，它破坏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美国民众营造了恐惧中国、仇视中国的舆论氛围，助长了反华势力的气焰。这不仅不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台政策，不利于我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所有中国威胁论者，都是把中国社会发展总量作为理论根据，而不考虑中国人口平均值问题，这实际上就等于把中国人民对幸福的追求限定在一个低水平上才符合他们的安全价值要求。因此，“中国威胁论”是对中国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的一种“不习惯”、“不舒服”、“不适应”，更具有“威胁中国论”的味道。其中一个重要佐证就是与“中国威胁论”针锋相对而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崩溃论”。

2001年以来，“中国崩溃论”又粉墨登场，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宣扬耸人听闻之内容，唯恐中国经济发展良好，政治秩序稳定不乱。2001年7月底，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在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华裔章家敦。他认为中国四大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可维持的地步”。中国一旦加入WTO，关税将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必然，经济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无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银行系统的坏账，总共占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7%。因此，他公开叫嚣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的强大冲击下，中国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章家敦书中的惊人观点使其在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一夜成名，立即引起普遍关注。“中国崩溃论”论调在美国引起的震动如此之大，甚至美国国会还为此专门举行听证会，非常“严肃地”考察了一下这一荒诞的观点。与此具有类似影响的，还有美国罗斯基教授2000年发表《中国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认为1997年至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正负2.2%之间，远低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GDP统计数据存在严重上偏误差。结论就是中国经济是虚假繁荣，是中国政府操纵的肥皂泡。

“中国崩溃论”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视为另一个极端走向，认为中国是一个毫无希望、危机四伏的国家，从而对外商到中国投资、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等产生不利影响，并且给中国国内民众制造不稳定心理，唯恐天下不乱。

不管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都会引起世人对中国的担忧。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世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不管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还是突然崩溃，都会给世界带来震动，带来影响，但是，问题是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当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时，别国往往对之存宽容之心，一旦这个国家强大了，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别国要么对它存有畏惧之心，要么有妒忌之意，还有的国家则会将它看成是威胁，要加以防范，甚至企图阻止、延缓它的发展；而崛起的国家绝不会甘心受制于人，如此，世界就不得安宁。一个大国崛

起，即使是和平地崛起，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会冲击现存的国际秩序和格局，进而会引起周边国家的畏惧和现存大国的担忧。另外，大国崛起，还会带来经济、能源、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竞争与摩擦。因此，引起世人忧虑与不安有其客观根源。但是，显然有人故意夸大事实，扰乱视听，敌视中国发展壮大，企图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同样，中国可能发生的“崩溃”也会引起世人的担忧。像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一旦经济全面崩溃，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强大震动，“崩溃”后所带来的“麻烦”和“负担”将是空前巨大的。它们怕“中国崩溃”后会带来难民潮，会增加它们的援助负担等等，所以，“中国崩溃论”不仅不会抵消“中国威胁论”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且还制造了新的心理混乱，让世界人民看不清中国何去何从。

另外，还有许多奇谈怪论评论中国：如美国的日籍教授大前研一的“中国经济黑洞论”、台湾政客炮制的“磁吸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输出通缩论”等等。这些从不同的角度都把中国经济发展描绘成是一个贪婪的吸血鬼，会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不祥之兆。总之，对他们来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是一件好事，虽然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像中国这样有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来带动。

尽管中国外交政策一直倡导和平，并为世界和平事业尽职尽责，但是要解除世界人们的顾虑，消除两种论调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对此必须做出正面回答。在两种论调中，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显然是“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长期保持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崩溃论”是荒谬之言。现在，章家敦那本“惊世之作”所预测的 5 年时间早已过去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在适应 WTO 运行规则，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崩溃迹象，反而越来越好，时间已经用事实逐渐打消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稳定性问题的顾虑。然而，中国发展得越好，“中国威胁论”底气就会越足，就会越发耸人听闻。所以，积极回应“中国威胁论”是首要问题。

2. 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逆境出人才”。它旨在强调在主观能动作用下，可以变逆境为动力，变不利为有利，同样能够取得成功。我们融入全球化，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帮助，我们加入 WTO，没有西方大国呵护；在合作中，我们感受到的

是竞争；在友好往来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压制和障碍。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中国走向成功的脚步。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时起，走和平发展之路就是党和人民一贯奉行的基本原则。如果说毛泽东年代对外交往中具有一定的对抗特征，那只是因为中国从长期被欺辱状态中独立出来，要争取国际平等地位，要维护自身安全，具有强烈的被动性。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奉行全方位无敌国外交政策，主动放弃以意识形态为界线划分敌友的冷战思维，积极与各国谋求建立、保持友好外交关系，这实际上是把和平发展之路由隐性价值追求变为显性的价值追求。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时，外国却鼓噪起“中国威胁论”，通过妖魔化中国达到抑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基于这样的国际背景，中国不得不把一直在实际中奉行的和平发展路线作为一种回应挑战的思想武器明确地提出来，并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向世界阐释。

从2003年底开始，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在对外谈话中多次谈到“和平崛起”[1]，公开表明中国走和平发展的决心。2003年12月，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公开提出了“和平崛起”思路。2004年3月，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系统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2004年4月24日，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

[1] 针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我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理论，强调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复兴。“和平崛起”这个词语一度在中国媒体上暴热之后，突然冷却下来，并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中争议之一是有人认为“崛起”这个词有悖韬光养晦精神，容易为“中国威胁论”找到理论根据。鉴于“崛起”一词确实有点不合中国人谦虚、低姿态的传统，后来我们党又提出了“和平发展”概念。“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强调的都是“和平”，“崛起”或“发展”是目标，是客观进程，而“和平”既是崛起或发展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主观意愿。但从表达情感上，“和平发展”较为温和一些，而且更偏重强调发展的过程性。现在，我们一般用“和平发展”一词。但是，“和平崛起”作为党在一个时期的提法也并不是不能用的概念。

为《中国的发展 亚洲的机遇》的演讲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同亚洲各国共创亚洲振兴的新局面，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同年4月26日，曾庆红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60届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走和平发展道路，谋亚太共同繁荣”。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频频提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理念，其用意就是根据中国“正在崛起”这个现实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走向的担忧，向世界提供两个信息：一是表明中国不是已经崛起了，而是正在崛起，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二是强调运用和平手段，追求和平的发展目的，不是为了霸权、为了扩张而谋求发展。

中国向世界传达出来的和平善意，立即引起产生极大反响。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说，“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并将规范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路向。文章认为，“和平崛起”的提出，首先是相对于“霸权主义”而言。作者说，中国新领导层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观点，是在试图以全球化作为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北京多次向亚洲邻国和世界展示，中国并不想寻求霸权，同时也不再坚守过去在国际舞台上洁身自好的形象。相反，中国正在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国为求持续成长，不但必须依赖国内经济，且要依赖国际市场。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明白标示和平，回避霸权主义，强调其在亚洲的稳定角色，消除外界戒心的意图非常明显。这对消除“中国威胁论”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平崛起”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威胁论”顿然疲软无力。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博鳌论坛2004年会的主题午餐会上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亚洲非常重要。布什说：“我已经注意到（胡锦涛主席）和（中国的）现任领导集体正在致力于我们称之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98页。

为和平崛起的事业。这使亚洲其他国家非常放心，对亚洲的整个面貌都非常重要。”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研究员伊万·梅代罗斯博士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中国人在外交上更娴熟、聪明了。他们更会通过外交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外交官当然要尽其所能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我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是你输我赢的游戏。”[1]中国周边国家领导人也都发出积极响应。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等都表示相信中国具有和平发展的善意。更具影响力的是，中国倡导和平发展的呼声导致西方对华战略性政策发生了微调。一向与中国保持相对融洽关系的欧盟表示欢迎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美国的战略界，也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以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向何处去”演讲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5年10月访华为标志，美国战略界基本上达成共识：要同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拉姆斯菲尔德是美国鹰派代表人物，他访华本身就具有标志性意义。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座谈会上的演讲中提出：“美国非常高兴能同中国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而且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一个对国际进步作出贡献的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美国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佐利克强调：“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21世纪初的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也不同于19世纪欧洲均势政治中的大国，中国已经融入国际体系，与美国有许多共同利益，美国与中国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不仅如此，佐利克还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表述：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

走和平发展战略，不仅是为了回应“中国威胁论”，也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近1/4世纪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得益于抓住了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全球化时代的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当今的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提高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就是发展，所以，发展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要发展，就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外不稳则内不安，在国际战争威胁中是不可能安心于发展经济的，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个原则目标。一个民族只有选择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之路，才有振兴的可能。在当今时

[1] 《外刊观点：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外交》，《羊城晚报》2004年1月22日

代，走战争崛起之路是行不通的，最终要失败。正如胡锦涛所说的：“一切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本国利益的行为，一切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1]而全球化给我们走和平发展之路提供了机遇。首先，全球化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深，互依则互利，互防则两伤。就像一些美国战略专家所说，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零和游戏，如果美国同中国冲突，美国自己也会受伤害，这是两败俱伤的游戏；若美国同中国合作，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发展，但美国自己也受益，这是互利双赢的游戏。这就使得现存大国很难用传统的封锁、禁运等办法来阻挠、遏制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次，全球化导致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例如、国际资源能源危机、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国际流行性疾病传播、国际环境破坏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显然有利于融入世界，展开全方位国际合作，共同解决国际问题。最后，全球化促进了科技进步、贸易发展、信息发达与交通便利，这使得人类活动空间相对扩大，出现所谓的地球村　一方面经济发展竞争加剧，另一方面也出现经济发展互补现象，　国经济发展往往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而不是使其他国家在竞争中伤掉元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未以周边地区的萧条为代价，反倒成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全球化的这种作用，客观上也促使现存大国更能够容纳新兴大国的发展与崛起。总之，走和平发展之路是热爱和平而又饱受战祸之苦的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同时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中国积极倡导走和平发展之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身体力行，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形象。例如，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国在六国会谈中，积极斡旋，为稳定东亚和平局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美国、韩国还是朝鲜，都对中国的努力表示感谢；在南亚遭受地震与海啸袭击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本着国际道义精神，慷慨解囊，积极援助，在世界各国中做出表率；在世界很多热点地方，中国派出维和部队担当世界维和任务；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遭受战争洗劫的国家，中国在国际贷款、建设援助等上都做出积极努力　2008 年

[1]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4 日。

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更是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友好、和平的声音，彰显出社会主义价值本色。一个古老的国度，正在把自己的文明向世界扩散，这与西方文明有冲突的一面，但是，通过奥运会，似乎相互和谐共处、共同取长补短，更是一种趋向。这次奥运会使世界走进中国，也更加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经历了一次具有国际包容性的“扩胸”运动。

中国和平发展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第一，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平衡性。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有美国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北美经济中心、有欧盟为载体的欧洲经济中心，相比之下，今天的亚洲尚不足以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中国的崛起及10+1、10+3等经济合作机制的启动与发展，将促进整个亚洲的崛起，带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中心化。第二，中国和平发展，将推动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在当今世界，单极势力与多极势力激烈角逐。中国是霸权主义的反对者、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提倡者和多极格局的促进者，所以，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将有利于世界的均衡与稳定。第三，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中国发展的手段是和平的，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发展壮大，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

中国要发展壮大，但中国也要和平稳定，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是从民族自身利益出发的内在选择，不具有任何权宜色彩，而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也顺应了国际潮流，反映了世界人民普遍心声，不管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如何造谣滋事，歪曲这一政治主张的现实意义，中国都必将把这双赢战略坚持下去。但是，中国不是打着和平旗号把安全保险系在他人腰带上的宠物，中国没有争霸野心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没有积极防御的战略准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要维护世界和平首先必须有能力维护自身和平，或者说有能力维护自身和平才有力量推进世界和平。显然，中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并没有和平的气候。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北约不仅没有消解，而且日益强化，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军事力量。东欧剧变后，北约加紧东扩，蚕食俄罗斯战略空间。在北约东扩面前，俄罗斯一方面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为自身安全需要也开始强调军事发展的重要性。经过近几年北约的扩张，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美国在欧洲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在亚太地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签订，把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扩大

到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美国强化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同盟，拼凑军事联防体系，使亚洲出现了“北约化”的危险倾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世界并不平静，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和平受到极大威胁。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及未来战争的客观需要，许多国家纷纷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步伐，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军为主要标志的竞争趋势，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长足的大发展。尽管这不是显性的军备竞赛，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任何一个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都在悄悄以内涵为主要基础提升军事力量，争取在战略上获得主动。

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大象要比梅花鹿安全？因为它有足够的能力对付其它猛兽袭击。邓小平指出，被动就会挨打！换一句话说，要不挨打就得争取主动——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更直接地表现在国防建设上。面对新军事革命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广泛运用引起的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理论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变革，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如何积极应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根据中国装备落后的现实，提出“人民战争”思想，通过兵民结合构筑防御体系。这在常规武器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高科技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就显得落伍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倡导维护世界和平，身体力行，先后两次自发地大规模裁军，把常备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面对这样的国际军备形势和国内国防现状，中国只有走科技强军的现代化国防道路才能争取战略主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党开始用现代化的新理念建设人民军队。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强调，对于军队装备现代化问题，“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1] 因此，实现国防现代化是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重要步骤。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制定了军队和国防建设跨世纪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同时，为了实现了科技强军，开始在普通高校选取优秀大学生作为国防生输送到军队中，全面提升军队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了实现军事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争取在未来高科技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寓军于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有效地推动了国防科技建设和技术跨越的现代化步伐，使得中国维护自身安全、推动世界和平的能力提高了 21世纪初以来，中国本着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义务，积极参与联合国行动，在世界很多地区担任维和与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严格的军纪，中国派出的联合国部队多次圆满完成任务，受到联合国表彰，反映出中国在军队建设方面已经对世界和平产生了最直接的积极影响

3. 倡导共建“和谐世界”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果说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还不足以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那么，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就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价值理念 而对于“中国威胁论”，如果说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还只是一个防御性的反击，那么，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就是一个进攻性的回击了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思想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首次明确提出“和谐世界”这一思想。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为世界描绘了一个美好蓝图，也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指明了努力方向 2006年的新年前夕，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又一次表达了中国人民殷切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加强团结，密切合作，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强烈愿望[1]。

我们党倡导“共建和谐世界”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 其中，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与和平，是“和谐世界”思想的核心；坚持互利合作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是“和谐世界”思想的基础；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是“和谐世界”思想的奋斗目标；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和谐世界”思想实现的根本途径 建设和谐世界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的一个新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倡导“世界和谐”的立意要高于倡导“世界和平” 和谐世界一定是和平的，但和平

[1] 胡锦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6年1月1日

的世界不一定是和谐的。二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未爆发，世界总体上是和平的，但却是不和谐的。世界不和谐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发展不平衡，其中发展问题是导致其他不和谐现象的重要根源。所以，要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就必须促进共同发展。和平是发展与和谐的前提。

“和谐世界”思想，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正确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时至今日，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无论是和平问题，抑或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单单靠用一种价值思想理念或一种模式去同化别的国家和民族，是行不通的；靠强权的力量去强行制造“和平”最终将导致更大的动乱和战争。要维护世界和平，创造安宁、幸福的环境，必须靠人类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党提出“和谐世界”思想，正是这一智慧的具体体现，通过构建“和谐世界”，把和平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去向往、需求和实践的一种理念。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当今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正义呼声。对此我国领导人就多次作出表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1]“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的并存和互补，是促进世界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条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当成为相互疏远和对抗的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动力。”[3]“和谐世界”思想则把世界多样性理念推进一步。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也有不同于别国的宗教思想、价值思想以及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各国也有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这些多样性的存在，是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党提出“和谐世界”思想，充分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精神，能够进一步推动不同国家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　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日。
〔3〕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提出的新的世界发展观。中国在对内倡导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对外发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呼唤。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是崛起的中国应对外部世界反应的姿态选择。这意味着中国是从本国利益与世界利益相统一的高度，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一部分，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关注世界的共同发展，并在世界共同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不但没有给世界带来"危害"，相反它还要造福于世界，实现中国与世界双赢的结局。"和谐世界"思想首次把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奋斗目标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它既代表着中国人民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期望，也是向全世界各国发表了一份共同的宣言，体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具有很强的国际意义。"和谐世界"思想是对"和平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升华，这一思想是站在全人类发展和整个世界的高度，关切世界的发展和安全，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对世界负起应有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是要把世界引向和平与和谐，而不是引向战争与灾难。它将进一步巩固中国负责任、可预期、建设性的国际形象。它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国内发展不平衡与国际影响不平衡结合起来思考，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战略的中间点，从而为谋划中国发展战略提供思想指导。和谐世界思想符合世界转型的预期，符合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长远目标，对中国近长期国际战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谐世界"思想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因此，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和赞许。

提出"共建和谐世界"思想是对"中国威胁论"的进一步积极回应。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这些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威胁论"进攻的单纯防御；但是提出"和谐世界"思想就是一种进攻，是在告诫那些舆论制造者，我们中国不仅是和平的遵守者，而且是和平的倡议者，是和平的守护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不仅是和平发展之路，而且是推动世界和平进步之路！中国不是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和平参与者；中国把道义上反对霸权主义和事实上并不挑战美国的霸权严格区别开来，这就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让自己感到稳妥、让世界感到放心的路。当然，其深层意蕴，不仅仅是为了回应"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更是为了探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全面、深入、审慎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加快自己的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指针。

更重要的是，提出“共建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运动中向世界灌输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理念的外向输出，使世界在良莠不齐的价值丛林中多了一份包容、温馨的人性关爱。苏联曾试图向世界输出革命，希望通过武力推动社会主义全球化，而中国却向世界输出理念，期许通过价值认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一个社会主义一直为之奋斗的和谐共生的未来理想世界。到底哪一条路是最终可行的姑且不论，但至少后者是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从实践出发的理想选择。它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定然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而是推动世界达到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在资本主义处于强势的世界里，这种充满社会主义价值关怀的倡议一旦超越“资”“社”纷争就成为人类进步的一面旗帜，一面社会主义引领全球化运动的旗帜！有人指出，在“资”“社”两种制度共存的状态下，提出“和谐世界”命题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只能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而不能和谐共处，因为和谐状态具有互利的性质。而我们认为，“资”“社”能不能和谐共处不是提出这一命题的必要条件，尽管这一命题的立足点是当今世界现状，但是它追求的价值目标则是超越现状，探寻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党首先提出来，在国际战略上就会争取主动，因为这将意味着制造“资”“社”矛盾的根源在“资”方，是它们阻碍我们对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追求。事实上，在重庆谈判时，我们党已经预料到蒋介石不会诚意和平建国，但是毛泽东还是飞往重庆，并高举和平建国大旗，最终逼迫蒋介石露出战争嘴脸。当今我们党提出“共建和谐世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以及多少可能发挥时效作用，不是能够预测的，但是它已经表明社会主义不是单纯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存在，而是有着更高的姿态、更高的人类普适性价值追求，这在西方打着人权、民主干预他国内政的时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基于道义上的斗争。所以，其价值不在于现实条件是否充要，而在于我们能够获得战略主动权、把社会主义价值推向更高境地。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民生经济安全策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部门既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又影响到社会的基本稳定，也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苏联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解决好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问题是其中一

个最直接的原因。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厦中感受不到社会主义蓝天白云，终将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没有人民的支持，一个"大厦"坍塌是早晚的事。中国要在全球化运动中保持竞争活力，维护民生经济安全是基本前提条件，因为固本护源才能清水流长、生命力持久。

1. 谁来养活中国——透视中国粮食安全

2008年初，一场世界性的粮食危机蔓延开来，面对国际市场粮价飞涨，一些传统产粮国不仅没有趁机大捞一把，而是一个接一个地宣布限量出口粮食，造成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出现粮荒，积累的社会工业财富被高价粮食进口挤兑得缩水不少。[1]中国在这次国际粮食危机中以其庞大的粮食储备力量稳定了国内市场，没有引起社会恐慌和经济大动荡。但是不是中国就不存在粮食安全隐患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推理："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400万，收入也在迅速增加。随着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肉食消费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大量农田转为非农业利用，粮食生产能力预计将缩小。"[2]从这一逻辑预期上看，中国粮食肯定不能保障自我供给，需要大规模进口粮食来满足庞大人口的日常需求。据此，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R. 布朗博士（Lester. R. Brown）发表《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不仅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乃至震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反响强烈。

要辩证地看待这本书，它里面的逻辑分析确实揭开了中国未来粮食供求中的安全隐患问题。在需求方面：他认为，中国对粮食需求增加不能单一地根据人口增加的数量来计算，随着消费结构的改变，会进一步加剧对粮食的需求。他从三个方面指出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粮食需求的影响。第一，中国人口增加，收入也迅速增加，人们的饮食消费正由大米淀粉等主食转向肉类、牛奶和禽蛋。畜产品需求的增加直接导致对粮食需求的额外增加。他指出："很清楚，中国扩大对动物

[1] 在以工业化发达程度为现代化发展主要标志的20世纪，由于主要粮食生产国经常面临粮食出口困难问题，除了战争特殊情况和关注非洲贫困国家外，人们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在国际粮食市场，人们最关心的是价格问题，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粮食实物供给问题，因为这种可再生资源似乎永远不会对有钱人说"不"。于是在不可再生工业能源即将面临绝对意义上枯竭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用粮食加工成生物能源替代天然能源，粮食不再仅仅用于食品，而且也用于其他消费。这场粮食危机反映出粮食始终存在绝对供给不足问题。

[2] 〔美〕莱斯特·R.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未来与发展》1995年第2期。

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除非能找到家畜代用品”[1]第二，中国对海产食物的爱好也在增加，这就必须发展水产养殖。1993年中国使用1200万吨粮食进行水产养殖。第三，“中国人对啤酒的需求也在增加。每个成年人啤酒消费量增加一瓶，就另需37万吨粮食。”[2]在供给方面：他揭示了另一番景像——第一，耕地在减少。“中国大部分陆地为干旱不毛之地，粮食生产能力集中在相对小的地区——沿着东部和南部海岸约占国土面积的1/3的河谷地带，这也是人口集中地区。随着人口和工业经济的同时增长，工厂、住房、道路、公路以及农作物在争夺土地，结果是当中国最需扩大农田面积时，农田面积却在缩小”。[3]布朗指出，今后40年中国工业化进程需占用大量农田，不仅是工厂和仓库，也为了增加的4.9亿人建造住房。中国即使实施保护农田的协调工作，是否能比日本有更好收效仍成问题。长期以来日本有比任何国家都严格的农业土地保护法，土地价格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但土地还是大量被侵占。第二，生产率在下降。随着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中国养活自己的能力目前全部依靠其提高农田的生产率。中国已开始稳定在每公顷4吨粮食左右，进一步提高产量的潜力有限。到目前为止，水稻技术新突破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小麦的增产开始减缓，1975至1984年期间小麦产量增加了83%，随后9年仅增加了16%。靠进一步增施化肥来提高产量前景不大，甚至会像日本那样停止增产。第三，环境因素造成的减产。中国非水浇地土壤侵蚀普遍。洪涝和盐碱化估计使中国水浇地减产15%。大量烧煤使空气污染和酸雨日益严重，其结果使中国作物减产和降低了森林的生产率。美国在这方面粮食收成至少减少5%，中国的损失肯定会更大。气候转暖将会使中国南方水稻减产。第四，未来的减产。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并假设中国仍将继续迅速工业化，1990—203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至少下降20%（年均下降0.5%），而且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其根据在于：日本从1960年高峰值以后下降33%（年均下降1%），韩国从1977年高峰值以后下降31%（年均下降1.9%）、台湾地区从1977年高峰值以后下降19%（年均下降1.2%）。

不过，布朗进行的逻辑推导可不仅仅限于中国国内粮食问题。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粮食需求增加与供给恶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决定了21世纪中国必将出现巨额粮食短缺。这一短缺如此之巨，乃至世界都无法满足中国粮食

[1][2][3]〔美〕莱斯特·R.布朗：《谁来养活中国?》，《未来与发展》1995年第2期。

需求。[1]布朗的分析，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估，而这种评估给世界带来不安，无疑成为“中国粮食威胁论”的基本理由。在他看来，中国的粮食供需状况，不仅是世界粮食供需状况的一个缩影，而且矛盾尖锐，对世界粮食供给安全将产生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不足意味着就是世界的粮食不足。一旦中国在粮食需求不断扩展的基础上转向国际市场并大规模购买粮食，中国的食物短缺就将成为世界每一个人的食物短缺。他甚至把其产生的副作用推理到威胁全球的稳定与繁荣——粮食短缺的恶化，将导致政治秩序失衡。而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中途夭折。如果中国失去对人口的控制将立即影响全球的稳定和繁荣。[2]自 2006 年 9 月始，世界主要粮食品种价格飙涨。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近 1/3，创 1845 年以来最高值。于是，国外就有人鼓噪：“世界粮价飙涨是由于中国大量进口粮食造成的”。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粮食安全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粮食不仅仅是商品，一旦出现绝对短缺，将会对整个经济基础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关心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从而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2008 年世界粮食危机爆发时，当时有些人提议我们国家可以趁机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但我们国家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密切关注中国自身粮食实际储备现状，积极维护粮食安全。原因就是不应该把粮食看作有钱就能买到的商品。作为大众生活的必需品，国内市场粮食供给一旦短缺，价格上升，普通大众就会支付不起而买不到或买不足，基本生活就

[1] 布朗分析，未来中国粮食的缺口将数倍于日本，替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在 1990 年，中国粮食产量3 29 亿吨，消费 3. 35 亿吨，净进口 600 万吨。仅考虑到预期的人口增加，拥有 16 亿人口的中国在 2030 年的粮食需求将增加到 4 79 亿吨。换言之，即使对肉、蛋和啤酒的需求并不因经济繁荣而扩大，粮食产量下降 20%到 2 63 亿吨，也将出现 2 16 亿吨的缺口，超过 1993 年全世界 2 亿吨的出口量。而上述不变的假定一定会变，如果人均粮食消费量上升到 400 公斤（相当于目前台湾地区的水平，或美国水平的 1/2），总消费量将达到 6 41 亿吨，从而使进口的净量达到 3 78 亿吨。这就是说，中国必须进口相应数量的粮食或其替代品，否则，中国就会挨饿。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将会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粮食，但是世界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供给。1980 年以来，世界粮食每年出口平均约 2 亿吨，其中一半来自美国。美国也面临着农田损失和灌溉用水转为非农业利用。预计今后 40 年美国人口将增加 9500 万，因此，美国可供给的粮食不会增加得太多。与此同时，预计世界其他地区也大量缺粮，突出的是非洲，到 2030 年预计需要 2 5 亿吨，是目前进口量的 10 倍。1990—2030 年期间，埃及进口粮食预计将从 800 万吨增加到 2100 万吨，墨西哥将从 600 万吨增加到 1990 万吨 印度次大陆的缺口也将成倍增长。伊朗、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 100 多个国家也将随着人口增长面临粮食大量短缺。在这种条件下，即使用高价刺激粮食生产，也无法满足中国的巨额缺口。

[2] [美] 莱斯特 · R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世界观察》1994 年第 9、10 期。

会受影响，作为13亿人口粮食消费大国，普通的商品消费危机就会变成人道危机、社会危机、甚至国家安全危机。

针对国际上关于“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的争论，为了消除世界人民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恐慌，中国迅速发表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指出未来中国粮食需求量为：2010年人口近14亿，按人均占有390公斤粮食计算，总需求量5.15亿吨；2030年人口增加到16亿峰值，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总需求达到6.14亿吨。按过去20年的人口增长和粮食消费情况推算，我国土地可负载人口17亿。也就是说，我国粮食的生产能力基本能自给，不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危机。其实，布朗的理论外推也是没有根据的，他把一个国家可能会出现的困境理解为会导致整个世界的困境，简直耸人听闻。世界粮食总产量上不去原因是多方面的，[1]但是依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如果粮食持续高价位一定会刺激世界粮食生产潜力。目前世界粮食价格虽然上涨很快，但与工业品价格比较，总的来说，还是不高，人们还是不愿意用大比例外汇购买粮食，依靠农业出口的国家一直富不起来就说明这个道理。

保卫中国粮食安全，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积极行动面对现实问题。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一方面水土流失严重，可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异常，极度干旱与暴风骤雨等灾难性天气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粮食矛盾日益积累起来。这些问题，在中国都存在，莱斯特·布朗的担忧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必须承认，布朗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的分析是值得重视的，对中国未来粮食供求矛盾的严重性和对世界影响的判断也值得注意，布朗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必须站在一个相当高的立足点上，进行认真冷静的思索，客观公正的评价，从中梳理出一些富于规律性的东西，这对于重新认识并科学解决中国未来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粮食问题，我们不该悲观慌乱，也不该乐观轻视。事实上，我们国家的粮

[1] 由于空气污染和大气变暖，导致极端天气对世界粮食产量产生极大影响，而世界现代化发展对地表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耕地减少迅速，限制世界粮食产量的增加；即使世界粮食总产量不断增加，世界人口的膨胀和发达国家进行的粮食变能源的工业发展，使得粮食需求大大超过了粮食供给；在世界贸易中，农产品价格始终处在相对低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中的农业出口大国努力发展工业，导致农业投入不足，增产有限，有的甚至变成粮食进口国。这些都会造成世界粮荒。

食安全[1]问题，确实不容轻视。单从粮食年产量上看，我们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自从1998年我国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12995亿吨以后，粮食产量呈逐年减少趋势，一直减少到2002年的4.57亿吨，减少10.8%。从2000年至2002年粮食年平均产量为4.573亿吨，同期粮食年平均消费为4.800亿吨，年产量小于年需求量的0.227亿吨。2003由于播种面积减少4.3%和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等原因，粮食总产量只有4.307亿吨，比上年减产约为5.8%，供求缺口进一步拉大。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粮食市场面临巨大冲击[2]，粮食生产与消费缺口很难弥合，粮食安全问题更加严峻。

但"布朗命题"与我国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它用日本作为主要比较对象就忽略了中日存在一个重要差别——相对于13至16亿人口来说，中国并不缺乏绝对意义上的国土资源条件，问题是如何利用现代化技术把戈壁、沙滩、荒原、工矿业废墟等非耕地区域变成绿洲、耕地。布朗只看到在中国现有耕地上如何难以支撑不断扩张的粮食消费问题，却不能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扩充新耕地的物质潜力。还有一点是"布朗命题"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我国在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广大农民的住房方式正在改变，传统的村落分散式平房住宅正在被城镇集中式楼房取代，使得人均住房面积增加的同时却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减少，造成新占的宅基地要小于退出的宅基地面积，出现土地"剩余"。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的绝对多数，随着小城镇建设工程不断进展，将有数量巨大的耕地面积在传统村落周边"冒"出来。而这项工程的久远性与"布朗命题"的预期刚好相当，是其较为恰当的反命题。

同时，我国政府通过政策导向不断加大农业资金、技术投入，提高粮食单产。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袁隆平的新水稻品种带来了水稻亩产量的飞跃，为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同时，随着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展开，我国开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生物妨害技术、机械化生产作业等，为保持农业稳产高产奠定基础。还有就是加快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立法工作，努力实现粮食安全的制度保障，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和约束，保障政

[1] 尽管很多人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了探讨，但被广泛接受的还是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中对粮食安全所作的阐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2] 我国粮食安全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外粮食产销形势的影响。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对粮食出口给予巨额补贴，国际粮食市场竞争激烈，粮价波动较大，这势必影响我国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府、企业和公民依法行使国家粮食安全的权利和义务，不仅保护农民利益，而且在国际农业贸易中，减少摩擦，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另外，在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方面、在建立国家粮食信息系统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方面、在粮食出口贸易方面，也都采取积极措施，建立国家粮食安全网络。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粮食问题依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在工业生产、服务业生产有升不降的情况下，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是容易被忽视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党和人民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识。粮食安全就像水安全一样，在它不发生危机时，人们往往忽视它的重要性，一旦绝对意义上的有效供给出了问题，作为日常消费必需品，人们一天也无法安静地等待危机的解除，所以，没有问题时没问题，有了问题时就是大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不是风头，不会给发展的数值上锦上添花，但是它是基础，是支撑整个经济发展大树的主根系——根系很难成为树高的一部分，但是失去根系支撑，大树不管多高都会轰然倒地。2008 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不过是暂短的小试牛刀，就使很多新兴工业国家把多年依靠工业商品出口积攒的外汇一扫而光。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没有自身的粮食安全保障，确实会威胁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原因是仅中国自身就意味着世界十几亿人口会出现食品供给困难。所以，我们党与广大农民一道保卫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粮食安全起到动态保障的是我们党不断加大力度的惠农政策。我们党一直把农业发展放在首位，给予高度重视。自邓小平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接下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党的总书记都十分重视农业，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从 1982 年到 1986 年先后发布了 5 个“一号文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发展，粮食总产量迅速提高。1998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进一步加强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购买力，有利于扩大内需、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增加我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回旋余地。”全国粮食获得巨大丰收。但随着 1998 年达到一个峰值后，全国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供求缺口增加。为此，从 2004 年到 2008 年，我们党又连续下发 5 个“一号文件”，从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入手，为保卫粮食安全问题实施了全面的大手笔。原计划 5 年内取消农业税，实际上不到 3 年就全部兑现了。农民获得实惠并有了长效机制，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自然提高起

来。近几年来，粮食产量取得历史性突破，一直稳定增产，从2004年的46946.9万吨递增到2007年的50150.0万吨，这大大增强了粮食自给率，提高了保卫粮食安全的信心。有人预计，从中长期看，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可平均保持在不低于90%的水平上。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没有在中国掀起波澜，中国市场粮食供给充足价格稳定，市场秩序井然有序，这不能不归功于党和政府的粮食安全战略。

2. 谁来转动中国的车轮子——透视中国能源安全

国际上有一种舆论指责中国能源需求的提高，特别是石油进口的激增，与粮食威胁论一样，给世界各国基本生存带来威胁。他们认为，中国过快地消耗了全球的共同的不可再生资源，不仅加快了世界能源储备的消耗，威胁着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正在成为排污大国，成为威胁世界环境的最重要国家。[1] 2007年11月，国际能源署（IEA）在一份世界能源展望的报告中说，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能源消费方面将超过美国。报告预计，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将在20年内增长一倍，并且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中国的能源消费日益增加，最终将使中国成为导致气候变暖的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响应，"中国能源威胁论"洋洋自得地亮相出来。

在"中国威胁论"一整套理论体系中，"中国能源威胁论"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量迅速扩大，能源供给越来越紧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有人比喻为"阿喀琉斯的脚踵"——意味着最薄弱的地方。为了解决能源供给困境，中国不得不增加石油等重要能源的进口量。这时候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就显得分外刺耳，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耐人寻味，这对中国保卫国家能源安全非常不利。"中国威胁论"主要从预期角度出发，对中国能源消费和需求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做出悲观性判断，并表

[1] 根据世界能源统计资料，中国石油进口量在世界总体进口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不高。2004年，美国原油进口高达5亿吨，日本2亿吨，欧洲为5亿吨，中国仅为1.2亿吨，仅为世界各国原油进口量的6.6%。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人均石油消费只是美国的7.5%，是世界平均人均石油消费的40%。没有谁生来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石油消费权，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格获得平均的石油消费权力呢？当然，石油是不可再生能源，长期而言，有人消费多就意味着有人消费少了，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说，威胁世界石油消费的，也不能仅仅算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人均石油消费现在远低于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不可再生性决定了石油消费是互为威胁的，为什么不说中国的石油消费受到威胁呢？

现出担忧、惶恐。而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也主要体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预期上。对我国能源消费和需求预期可体现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的能源自身储备的人均占有量。从总量上看，我国能源储备还可以，但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使得我国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消耗能源上升，存在一个长远性的进口能源扩张的刚性预期。二是我国现时人口众多（约为美国的4.4倍）和人均能耗很低（不到世界平均值的50%，约为美国的10%），这存在着高能源需求的预期空间。只要中国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25%，中国能源总需求就会超过美国，变成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三是我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属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状态、经济增长与能源的开发利用存在正比例发展态势。正因为如此，“中国能源威胁论”对于维护我国能源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从深层次来看，影响我国顺利实施、调整能源安全战略。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会招使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以及能源消费的影响、并在针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尤其在增加石油储备和海外石油开发方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造成我国实施、调整国际能源安全战略面临巨大舆论压力。但直接影响是我国海外石油资源的开发。西方国家石油商在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已经占据了世界各地重要的石油资源与市场，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所有较好的资源与市场。我国企业现在要参与开发海外石油资源，拥有海外石油产量，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价。尽管在石油开采问题上，国家干预是很正常的，因为能源问题是从国家安全，而不是企业个人的角度来考虑的，但是，“中国能源威胁论”对于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会产生不利影响。还有一点会受到直接影响，会提高我国国际石油交易成本。任何对我国的石油消费与进口增长的炒作和夸大，都可能转为高石油价格预期，从而加快石油价格上涨。这种高石油价格预期还会促使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增加其石油战略储备，从而在实际中加大油价上涨压力，使得中国进行石油战略储备更为困难，交易成本提升。另外，“中国能源威胁论”对我国国民的正常能源消费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一论调有一个前提假设——现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状态都是公平的，我国人均能源消费比美国低、美国是最大能源消费国是理所当然的，任何对天然现状的改变，自然都是“威胁”。从人均消费来说，我国有权力成为最大石油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为从公平的角度看，显然不应该以国家为单位来计算，而应该以人口为单位来计算，因为能源消费对象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但是，

“中国能源威胁论”并不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否定了我国国民获得世界平均能源消费权力，而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能源高消费视为天然的权力。这一思维定势会对我国随着国民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而出现的国民人均能源消费上升的正常现象进行无理刁难，从而使我国国民比发达国家担负更大的能源消费责任。

但我国本身确实面对世界能源挑战。从根本上说，像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早晚会有开发完的那一天，世界人们总会面临能源危机时刻。但是，全球化使这一时刻逼近得如此之快，在科学家还没有找到类似的经济实惠的替代能源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一危机的到来。据有关资料，2010 年前后石油产量的高峰期已经到来，而根据石油产量钟形曲线规律之后的石油产量将迅速下降。“石油高峰”不仅指石油储量和开采产量将从高峰快速下降，还指的是石油消费需求增长日益提高。石油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额在日益扩大，一旦石油产量急剧下滑，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世界石油的相对短缺，大国的石油利益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石油争夺战早已经在大国之间拉开帷幕。中国南海危机、大国在中东地区的积极介入、海洋能源的归属争论、对能源的关注及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谨慎签字等，这些无不体现各国对能源的高度依赖性和对能源紧缺所感到的巨大压力。随着各国对石油需求的攀升，争夺世界石油产出控制权，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生活和地缘政治走向。美国尽管在国内的石油资源可以满足其一定的石油供应，但石油消费仍主要通过外购来满足。美国的资源量并不少，但其国产原油只满足本国 40% 左右的石油供应，其余 60% 都由国外供应。为此，美国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影响和军事政治控制力，正在着手控制国外石油资源。许多国际事务评论家认为，2003 年美伊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油源。事实上，美国通过战争已经初步达到了控制中东石油的目的。小布什政府所谓的“邪恶的轴心”所指的国家都沿着一条弧线分布。这条弧线事实上已经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石油输送的战略要塞和海上通道。美国一方面对拥有世界上最大石油储盆控制着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耿耿于怀，在马六甲海峡调整海军和兵力部署，另一方面却以人道主义为名插手苏丹达富尔地区事务，并悄悄推动中亚石油产区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把军事势力扩展到黑海地区，这些都暴露了美国意图控制世界能源战略区域。日本是另一个能源需求大国，为了保卫自身能源供给安全，也悄悄

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日本因本国不产油，所以很早就开始参与国外资源的勘探开发，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大量低价采购中国的优质煤，填海储存，应对未来之需。据美国能源部预测，至 2015 年国际煤炭总贸易量保持增长，日本将保持世界最大进口国的地位，进口量将占世界煤炭贸易量的 25%。中国拟投资建造自安加尔斯克（Angarsk）油田至大庆的输油管，日本则以 75 亿美元高价去争取油管抵达霍德克（Nakhod-ka）港口，石油争夺的白热化由此可见一斑。日韩独岛领属争夺、日中东海海域边界分歧、日中钓鱼岛领属争夺、日本对中国南海归属的歧义等等都包含着控制能源储备地的因素。表面上看，这是边界之争，但实际上更关注的是这些海域中蕴含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备。俄罗斯是能源主要出口国之一，俄罗斯正在运用能源外交同欧洲、日本、中国等争取国际影响力。2008 年俄格战争期间，欧盟没有采取过激的政治策略对付俄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盟很多国家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给。

那么，中国如何做，才能一方面回应“中国能源威胁论”，另一方面保卫能源安全，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了回击“中国能源威胁论”，2007 年 12 月 2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名义发布能源文件，详细介绍我国能源发展现状、能源发展战略和目标、全面推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供给能力、促进能源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

消除“中国能源威胁论”，保卫能源安全，核心的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首先应当管好自己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避免大起大落，由此而增加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还需要确定合理可行的节能目标，以避免给人以“橱窗效应”之嫌。由于历史发展时期和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不同的国家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也不同，采取的具体措施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在能源安全的对策上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其一，大力发展低耗能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减少对外部能源的需求。其二，建立强大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其三，积极开发诸如地热、风能、核能等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其四，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能源来源途径和运输方式的多源化，保障能源供应的多极化。其五，开展广泛的国际能源合作，加紧实施市场化、通过市场规避和转嫁风险。发达国家的国际能源安全战略可以为我国实施能源安全战略提供借

鉴。

另外，我们党为保卫能源安全，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一、正在谋求建立和健全我国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二、利用外交途径，积极加强国际安全合作，保障海外能源运输线路的安全。近几年来，我国积极建立和扩展同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尤其是我国在南亚国家遭受海啸地震自然灾害以后，慷慨相助，得到该地区很多国家的赞许。这为我国建立南太平洋资源供给基地和运输线路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三、建立较为稳固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实现长远发展。当前的国际能源呈现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的态势。这是由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处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中，“双赢”是一种最好地选择。从战略角度看，我国一方面努力开拓世界四大能源供给区市场：中东、俄罗斯、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努力改善与石油出口国，特别是中东、中亚、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与美国、西欧、日本等能源消耗大国在竞争中谋求合作，积极建立互惠互信机制，防止过度竞争、两败俱伤的不利后果。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中国能源威胁论”，我们一方面开源节流，把拓展世界能源供给与挖掘本国能源潜力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尽可能地减少依赖进口过日子；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加大了新能源替代开发力度，大幅度投资进行科研试验，寻求新型可再生能源供给。在这方面我们的科技队伍与国际合作，与高校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当然，在这方面要取得决定性进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以目前情况看来，我们还不能寄希望于寻找到石油的替代品，一劳永逸地解决石油问题。总之，在能源危机压力面前，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开拓视野，拓宽渠道，积极备战，坚决保卫能源安全，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3. 为了生存环境——中国迟滞气候变暖的努力

长期的工业化带来的二氧化碳等高排污导致全球温度升高，灾难性天气加剧，严重威胁人们生活环境安全，甚至造成大规模生命财产损失，使得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原本是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责任的世界性问题，但与“中国能源威胁论”配套，西方又抛出“中国气候威胁论”（又称“中国环境威胁论”）。其理由是：中国高速崛起，很

快会成为世界头号污染排放国，而且再过2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总和。因此，中国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中国气候威胁论”是伴随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的大环境下制造出来的，而它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迅速上升联系起来，不仅把中国推到导致气候变化的“祸首”上，掩盖住真正“罪魁”——工业发达国家，而且给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带来很多不利影响。

针对世界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我们党有深刻认识。2007年11月21日第三届东亚峰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讲话，阐述了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5点看法和主张：第一，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第二，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统筹协调起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第四，技术进步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五，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应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增强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2008年7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综合解决。针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胡锦涛强调，中国是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观察中国排放问题，要注意以下3个因素：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二是中国人均排放较低，人均累积排放更低，而且排放总量里很大一部分是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生存排放；三是由于国际分工变化和制造业转移，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转移排放压力。

显然，我们党的认识是深刻而全面的，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要害。环境与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人类的生存问题，二者是密切联系起来的统一体。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解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实际的。发达国家已经发展起来，大规模气体排放已成为历史，反过来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埋单，实际上是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替发达国家历史

责任买单，不仅有失公允，也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的。"中国气候威胁论"立足点仍是中国未来发展预期，但事实是造成今天世界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今天各个国家排放二氧化碳量达到多少，而是有一个历史累积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达国家在先期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二氧化碳量是今天大气气温上升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当中，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就更少了。国家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若以国家为单位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不公平的，按人均计算更合适一些。在这方面，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OECD国家的33%。还有一组数据，就是1950年到2002年的50年间，世界平均排位来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占到第92位。还有，应该比较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大小问题，因为它反映出国家在谋求发展过程中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程度。尽管中国节能环保工作刚刚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一直很小。也就是说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从1990年到2004年，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是中国仅仅增长0.38%。[1]从这些数据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水平相比都是偏低的。而今天的全球变暖问题，从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起就已埋下伏笔，正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约束地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才造成了今天全球变暖的困境。炒作中国的"环境威胁"，要求中国为发达国家过去的"错误"埋单，显然是不公平的。

再有，外贸进出口商品的内涵能源问题往往都被忽略，依据产品生产来讨论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义务是不对的，应该按照产品消费。今后某一个时点，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在比较不同国家之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中国的排放量中就包括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在中国出口钢材、焦炭和大量的机械产品中，都包含了相当权重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这就相应的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减少

[1] 参见张毅等：《"中国环境威胁论"既不客观也不公正》，《中国改革报》2007年6月5日

了进口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些国家将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减少自己的排放量。这样，虽然单个国家达到了排放目标，但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却增加了。在中国净出口的“内涵能源”及其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04年，美国进口产品所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18亿吨，相当于该国2004年碳排放量的30%。这些产品中有许多来自中国。研究结果显示，在2004年，中国净出口产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11亿吨。尽管从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能够吸收发达国家的专业技术，满足快速工业化的需求，但长期下去，将导致能源供给安全、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贸易产品出口的“内涵能源”问题，并出台了限制高耗能产品出口的外贸政策，显示了我们国家适当牺牲贸易利益换取环境利益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我国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积极努力，担负起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第一，我们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始终给予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就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又于2007年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在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规定出污染物减排10%的目标[1]和提出在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目标，并首次明确了“十一五”期间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投入的资金规模和用途。这次规划提出，环保投入要占同期GDP总收入的1.35%。这个投资数额如果按照每年7.5%GDP增长的情况计算，共需要15300亿元的投入，其中大气污染治理约需6000亿元。另外，“十一五”规划还特别新增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内容，首次把“严格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写进了规划中。第二，我们国家积极推进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国际合作。为加强对《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有效管理，我们国家政府发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办法》。截至2007年12月31日，我们国家共批准了1023个项目，其中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成功的项目有151个，预计年减排量约9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约

〔1〕 这个目标实现预计将减排二氧化碳15亿吨，大致相当于2004年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0%。而节能和提高能效对于减少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首选措施。

占全球年减排量的48%。第三，我们国家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近年来，我们国家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6月，我们国家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家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具体目标、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是“十一五”时期指导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行动计划。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对外公开宣布我们国家将采取一系列法律、经济、行政及技术等手段，[1]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一方案，不仅仅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部国家方案。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必将对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

第四节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迎接全球化新挑战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相伴随的则是产生一系列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如资源短缺、生态恶化、恐怖活动、人口爆炸、毒品走私、难民潮等，给人类生存与发展、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战后以来，过量的能源消耗导致了能源紧张和危机的出现。冷战结束以来的一系列战争表明，争夺和控制石油资源已成为局部战争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近2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债务、人口、环境、饥荒、动乱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另外，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生态不平衡，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物种减少、酸雨肆虐、臭氧层日益稀薄、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发生、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危机、地震海啸时有发生，这些威胁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环境条件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它们没有能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为世界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如

[1] 在节能减排上，我们国家不仅强调运用行政措施，更重视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在法律手段方面，中国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对于促进节能减排落实到每一个单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经济手段方面，比如正在逐步理顺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使它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程度，一方面可以鼓励能源生产，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耗。同时，在财税政策方面，对于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且正在落实之中。

果全世界不能统一起来，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扭转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人类很难实现经济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经历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开始反思和总结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问题和矛盾，探索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社会和人的持续发展，提出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适时提出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在全球化风云变幻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境界。

1. 新型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化新时代呼声

21世纪之初，全球化进程出现了一种逆动现象：反全球化运动和思潮——一些人从过去对全球化的热情鼓吹和盲目崇拜进入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反思阶段。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后，本来就怀疑全球化的人更把这个悲剧当作是全球化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认为连恐怖主义也全球化了，这个全球化更值得怀疑。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两大对比显明却相反相成的现象：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示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全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综观全球化发展的历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现代化生产力带动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为各个国家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也造就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重困境。从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效应看，全球财富的增量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流向少数群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大多数群体并未分享到应有的成果。全球化的政治效应，表现为霸权政治与协商政治、单极政治与多极政治的矛盾加剧。全球化的社会效应，表现为社会生活“同质化”趋势与贫富拉大的同时并存。而全球化的文化效应，则造成了物质生活的富裕与人们的精神生活贫乏、个人至上、生命意义空虚化之间的鲜明反差。资本主义主导的矛盾与困境特别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涌现，推动着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创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胡锦涛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则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做了系统的阐述，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

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全球化的视角看，科学发展观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在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各种复杂效应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了理性的回应，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坚持理想社会的价值、立足东方文明的传统、借鉴人类文明的经验、倡导和平与和谐的发展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越走越宽广。

首先，全球化背景的矗立，使中国的发展被整合到世界发展体系之中，并作为全球化世界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浓缩着西方社会自然发展的整个心路历程。这是中国发展问题的全部矛盾根源之所在。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预示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原本意义上的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产生了“发展性危机”，西方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作为一种“后发式”，中国发展的特殊问题就在于，它既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又要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内所实现的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原来意义上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转化为共时性矛盾。中国要发展，中国必须发展，中国的发展又必须同时尽量避免西方发达社会所业已出现的发展性危机，因而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发展观。同时，21 世纪的中国发展，正朝着信息一体化的趋势发展，高节奏高速度的社会缩短了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距离，于是任何滞后的理论只能被越抛越远。社会和时代本身已不允许我们沿用西方近代、现代、后现代那种单向度的线性的两极互斥的思维方式，应在共时态意义上对它们作出选择，确立一种多元互补、有机整合的新思路。在这种复合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这既是中国当下发展实践所提出来的迫切要求，也决定了中国的发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真正具有合理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吸取了全球化时代人类进步文明的新成果。严格意义上的发展观，形成于二战后对于经济增长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之中。在早期“发展即增长”的发展观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所谓“有增长无发展”、“恶的增长”现象。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于发展来说，经济增长固然带有基础和前提的意义，但毕竟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和唯一规定。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除了经济尺度外，还应包括各项社会指标，即反映生活质量的“非经济尺度”。1969—1973 年，美国人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极大地冲击

着单一、简约化的发展目标观。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阿尔蒙德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四个变量支配的积极向前的运动。其中，两个经济变量为经济的增长（财富）和分配（福利），两个政治变量为政府能力和人民参政情况。亨廷顿和阿尔蒙德又进一步指出：发展诸目标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但又不可能所有目标一起达到。这就要求人们善于合理安排各目标的发展顺序，使之得到合理平衡。1985 年，由 E. 拉兹洛主持的一个国际性的一般进化论研究小组对发展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的发展主题。这种综合发展观要求把发展看作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过程。综合发展观拓展了人们对发展内涵的理解，实现了由狭隘的“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向广义的综合发展观的整体转换，是有史以来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充分考虑人的多方面发展需求的发展观。但综合发展观仍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注重的是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发展的相互关系，没有进一步揭示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它关注的重点是发展的当前状态，它没有考虑代际问题，即没有考虑发展的后劲，没有把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同满足后代人发展需求恰当结合起来。二战以后，环境问题的愈益严重，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现实背影。可持续发展观反对把社会进步仅仅视为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主张应当以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的决策为基本点，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运作中，思考发展战略；认为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重新探讨衡量进步与发展的方式，建立一种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存文明，从而走向更高级的、生态化的大发展，都体现了人类对发展问题的最新认识。很显然，这些新认识都被科学发展观所吸纳，并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再次，科学发展观在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回应对全球化发展中的多重困境。历史地看，正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了当下的全球化困境，带来了价值理想失落、环境危机等一系列矛盾。诚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言：在现代化过程中，“功利主义有一种先天的局限道德格局并有强调纯认知判断的趋向。事实与价值由此彻底分离

所以，中产阶级功利文化天然地倾向于道德破产与'孤僻失落'的倾向"[1]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建设、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发展滞后、社会动荡加剧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科学发展观在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强调创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目前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如何协调各种矛盾、理顺各种关系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挑战。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在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某种程度上不啻为全球化困境下的理论突围。

第四，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营造了与世界其他文明模式进行对话互动的有利空间。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首先反映了我们党具有宏阔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时，经济全球化还向我国提供了两个"前所未有"，一是实现现代化的挑战前所未有。当前的全球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推进的，由此而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等方面的规则和机制，主要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规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掉入"国际分工陷阱"的危险。二是经济全球化也向我国展示了实现现代化的机遇前所未有。世界经济发展又正经历着一场百年一遇的经济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资本、技术和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各国经济实行优势互补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条件。因而，抓住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既回应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又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融入而不融化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指明了方向。

最后，科学发展观也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性灾难，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深层的原因，则是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忽略，以至落

[1]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后于时代，落后于人民的要求，最后也不得不为人民所抛弃。众所周知，前苏联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杀之中进行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带有强烈备战色彩的斯大林模式应运而生。这一模式在落后国家工业化初期，确实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局限性也日渐明显起来。例如，这一模式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利用过分集权的体制，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竭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终于使苏共失去凝聚力；这一模式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主政治的缺失，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不能维护、个人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在肃反扩大化时期，大批干部被误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监禁、拷打和处理，使“冤狱遍于国中”，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模式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结果自行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使这一制度失去了吸引力和向心力。这表明，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导致苏联由盛转衰、以至最后解体的最为深层的根源。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借鉴。

2. 继承与创新：从邓小平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进

与任何思想一样，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有着深厚的思想源泉，其中重要的思想源泉就是邓小平的发展观。从邓小平的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们党在发展观问题上实现了新的飞跃。

第一，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发展诸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而确定、安排不同目标之间的主次关系和先后顺序，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后发展大国，中国发展的重点是经济。强调经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发展观的鲜明特色，也是发展观的逻辑前提。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针对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实状况，邓小平就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大无畏的求实精神，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基础意义。他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富裕，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国防力量的增强，甚而民主政治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三大差别的最终消灭等等，都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才能为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基础条件，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因而，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他还把这些思想凝聚为一句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经典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几乎是家喻户晓的。

但是，正确的理论并不总是正确地落实到实践上。在实践中，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对立起来，也正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稍不注意，就容易忽视和放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片面发展。例如，有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为"以GDP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发展是硬道理"扭曲为"GDP增长是硬道理"，把"发展是第一要务"扭曲为"GDP增长是第一要务"，GDP被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为只要GDP上去了，其他方面也就自然而然上去了。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一俊遮百丑"、"经济好，一好百好"、"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等现象。这种单纯追求GDP，一切为了GDP，把GDP增长作为唯一追求，甚至不惜以破坏资源、损害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和思路，是有很大问题的。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很显然，这是针对过去的片面发展而言的。

当下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等于没有重点，等于平均发展，甚至等于对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否定。这就从一种片面性走向了新的片面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并不意味着发展无重点。由于经济发展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地位所决定，经济发展这一重点是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的；但有些方面过去可能不是重点，比如"三农"问题、扩大社会就业问题等，随着社会发展走上了新的台阶，其重要性日渐突出，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如果不予以足够的重视，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发展　因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全面发展仍然是有轻重缓急的发展，是重点中的全面。同时，科学发展观强调“不唯GDP”是还GDP以本来面目　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经济指标中，还没有哪个指标能完全替代GDP　即使以后有了比GDP更全面的新的指标体系，GDP也只是从“总分成绩”变成“单科成绩”，而且是最重要的“单科成绩”　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更重要的是，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由于种种条件约束，人类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也只能是一个过程，全面发展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是旨在说明，我们过去的一些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已越来越不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实践反复地启示我们，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发展的全面内涵，却是发展的核心内涵。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与邓小平的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必须是一种全面协调的运动，这里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和谐地实现现代化。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与邓小平的发展观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

（1）科学发展观内蕴着邓小平的全面发展思想

针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所引发的各种变化，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这一段话是他对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概括，体现了社会发展全面性的要求。此后，邓小平又反复地论述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内涵日渐清晰。邓小平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而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优秀的人才”[2]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重申这一观点：“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邓小平不仅在民主政治方面作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的断言，还设计了"两手抓、两手硬"方针：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等等；这些多角表述，高瞻远瞩，通贯全局，体现了他对中国全面发展规律的熟练驾驭。可见，邓小平的发展观重点是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兼顾到了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脉络是相一致的。

在新世纪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后，我国改革也进入了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攻坚阶段，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任务，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各类社会重大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2003年的抗击"非典"更是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作为一次特殊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它暴露了我们在社会事务领域管理意识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的现实。据联合国统计，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第104位，公共卫生方面的综合评估还要靠后。这与我们从总体小康走向全面小康的进程是不合拍的。因为全面小康贵在"全面"，其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很显然，如果发展观不"科学"，我们的小康就很难"全面"。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要求而提出来的。

（2）科学发展观昭示着邓小平的"两大大局"的理念

由于历史、地理、资源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大局来看，主要是东部与中西部的地区差距。因而，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到1988年，邓小平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按照梯度转移理论，“最有潜力者优先”。国家在发展的某一阶段，都会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以形成“增长极效应”。而当这些增长极达到高度发展阶段时，就会产生“扩散效应”，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是，“扩散效应”不会自发地产生。当这种不平衡已经发展到严重失衡的状态时，如果仍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控，就会自发形成“马太效应”，反而会制约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据有的学者的保守估计，我国地区间差距东中西是1:0.7:0.4。数字是抽象的，但所表达的含义却是严峻的。西部地区落后的趋势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可见，科学发展观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提出来的，同时，又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部分先富论已经过时。比如，在西部大开发中，还要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离开共同富裕谈部分先富是错误的，但否认部分先富是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也是不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正确协调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

（3）科学发展观也包含着邓小平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变化，指出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但同时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就业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他强调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搞得好，有可能为今后五十年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2]这其中就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含义。

当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是一种陷阱：发达国家让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是为了把资源省下来供发达国家使用。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可持续发展对当今中国来说不是一个虚拟的问题，而是一个真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都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本来就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由于重物质财富获取、轻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缺口日益扩大，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等等。据测算，从充分就业角度考虑，我国的经济适度人口约8亿人左右；按照土地资源生产力看，我国目前合理的资源承载人口是9亿多人。我国现有13亿人口，已经远远超过经济供给和资源承载的临界点。

鉴于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这不仅显示了我们党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向国际社会显示了"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21世纪的战略选择。

（4）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人的发展思想

如果说，富强、民主、文明是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话，那么，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追求。人是发展的主体，同时构成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发展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的过程，而且发展总是历史地、具体地体现在人自身的发展上。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自身的发展是发展的核心内涵。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标模式。

邓小平既依据"人的发展"目标，又依据人在社会中的实际状况，反复强调：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起点。但物质文明和共同富裕，只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它本身绝不等于实现了人的发展。显然，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人。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1]到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一靠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理想 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造就“四有新人”，是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实现人的发展的最直接任务 这与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在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凸显出来的 小康是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阶段 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转折 如果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还没有提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日程上来；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其对基本生存资料的需求增长趋于稳定，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日益凸显出来。人民的生活消费进入了以提高自身素质为主的新阶段 2001年，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为47.7% 而用于提高人的素质方面的消费，近年来明显加快。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已从真理的神圣殿堂上走下来，走进了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造就利益分割的、片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奢谈什么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提高了人的发展水平，而是降低了人的发展水平 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仍然存在着片面发展的个人，但是，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人们普遍的联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 事实上，个人能力的全面性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人类总体能力的全面性，因为个人能力的发展终究是极其有限的，每个人也不可能在一切活动领域（特别是体育、艺术之类的活动）内都达到极高的造诣 而且人类迄今为止，人的全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人类总体能力的全面性，而不是以人类个体能力的全面性来表征的 但是，只有每个个人的独创而有限的全面发展，才能构成人类能力无限的全面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发展”只是一个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相对的概念，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当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尚不具备，不应奢谈人的发展问题。其实不然 “以人为本”不仅是一种执政理念和要求和工作原则，而且是一种价值趋向，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以人为本”相对于以物为本和以官为本，强调人是主体，既是权利主体，也是责任主体；相对于把人作为手段，强调把人作为目的 “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含义更丰富，不仅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也包括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从当下来说，以人为本，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以人民的基本权利为本，同时以个人价值为本，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的新款。由于人权的基础是财产权，有人说，这是为富人张目，是保护富人的私有财产。其实，财产权对穷人更加重要。早在18世纪，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如今已成为财产权的经典格言。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民生问题，如贫苦问题、失业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等，其症结在于人权问题。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在当前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落实胡锦涛所讲的“三民精神”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利、民生、民权和民富”问题，切实维护民利，解决民生、落实民权，实现民富。

总之，如果说，30多年前，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飞跃；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又实现了从经济发展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新飞跃。

科学发展观首先确认当代中国发展在空间范围内所应该具备的状态，这就是全面而协调的发展。

——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应整体发展。从宏观方面主要是指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里的生态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谐和；经济发展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所达到的水平；社会发展就其广义来说包括生态和经济发展在内，这里把它与生态

发展、经济发展并列起来，主要是考虑用语的方便，对其作狭义的理解，用它来概括除生态和经济发展之外的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社会制度、教育、科技、文化等等。所谓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是指在保持良好生态环境、谐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社会其他非经济方面的发展，以达到使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几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和谐有序、共同发展的目的。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必须是一种全面协调的运动，这里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诸因素和谐地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中的各要素（各子系统）、各环节、各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只有统筹考虑、协同运作、协调配套、才能达到系统整体的最优化。特别是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日益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整合趋势。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突进或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发展是全面协调的推进，任何追求单方面现代化的努力，都可能延滞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科学发展观还确认当代中国发展在时间范围所应该具备的状态，这就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追求“天人调谐”，谋求一种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同时提高人类生存质量，依靠科技进步对资源进行保育，增强资源再生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确保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获得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观”最本质的创新，是改变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为谐和关系，改变人与人的对抗关系为合作关系，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永续发展为最终目标。在时间上，它体现着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它是世世代代延续不绝的发展，不是短期行为的发展，不是人类以今天的利益牺牲明天的利益，不是以当代人的需求牺牲后代人的需求，不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在空间上，它体现着整体和局部的统一，不是以一部分人的发展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不是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它一方面肯定了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意义，同时从人类社会发展日益严峻的现实出发，站在人类未来发展的高视角上要求避免举措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减少短期行为、扩大可持续行为。由此也可看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文明观。

——同传统发展观相比，“可持续发展观”至少实现了以下三大转变：一是由生活数量向生活质量转变。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迫于生存压力，温饱问题成了人们的第一追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生存质量、享受和发展问题被提上日程。“可持续发展观”对生活质量的关注，恰恰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二是由发展内容向发展能力转变。以往对发展程度的评价，主要侧重于业已取得的发展成果，而忽视以往发展对未来发展能力和机会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观则把现在和未来有机统一起来加以考量，着眼于未来发展的潜在能力及其预先培养和提高，从而使发展获得了永续性；三是单因素还原转向整体转换。传统发展观往往把社会发展还原为某一单项因素的突破，认为只要抓住了经济因素，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持续发展观则把经济、社会、生态统一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发展则意味着这个整体的转换。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全面提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使人类文明发生根本性的质的飞跃。

科学发展观归根结底要确认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导引的最终价值形态，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任何发展都是由人来操作和运行的。人类要实现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自身行动进行控制和约束，使其符合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而，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既要满足当代人改变物质贫困的需求，又要自觉地善待生态自然系统，决不能给后人留下“环境赤字”。另外，要从考虑满足少数特权者的需要过渡到考虑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并努力使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追求成为全社会成员的自觉努力。

——我们的发展方向必须从考虑单纯的经济增长过渡到考虑人的全面发展。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济增长只不过是为实现人的发展创造一种更好的物质前提。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努力实现现代化，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发展，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F. 佩鲁说得好：“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使在经济学方面，它也应该依据以人为中心的战略。”[1]

[1] F. 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和目标。为了使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生存质量得以提高，潜能得到开发，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开发人才资源、智力资源和一切社会资源，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不息的推动力。

由上述可以推断，社会发展从最高目标和最终价值导向上来说，并非人类社会的目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唯物史观指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一方面，人的发展程度受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的发展，既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无条件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种条件是靠社会发展提供的。社会发展的水平越高，人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多，人的发展程度也就随之提高。另一方面，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人的发展程度越大，也就表示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进步的性质，社会发展也就处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现代社会发展充分证明，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越来越依赖于对自身的掌握，也就是说，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如果把社会发展看做是人性在实践中的全面展开，那么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都不过是围绕人的发展的全面展开。

然而，问题在于，社会全面发展固然为人的发展创造各种社会条件，但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人的全面发展。例如，经济发展倾向于把人作为发展的工具，强调"利用人"，或注重人的技术层面；社会发展（狭义）倾向于人对发展成果的分享，强调"为了人"；文化发展、生态发展更加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可见，谋求人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自身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各种能力增强。具体说来，人的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的需要；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三是人的潜力和能力的发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这既是人的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由此，使我们有可能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良性发展模式，这就是"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实际上解决了怎样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追求，实际上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如果说，全面、协调发展主要侧重于从空间范围内探求社会大系统当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主要侧重于从时间范围内探求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而人的全面发展则侧重于描述由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导引的最终价值形态。这"三位一体"的目标，创新了发展的观念，丰富了发展的内涵，拓展了发展的思路，为发展注入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涵，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思想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从理念到模式

自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关于"和谐社会"的命题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自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中倡导建设"和谐世界"以来，关于"和谐世界"的命题又一次在社会各界产生强烈反响，在国际上也掀起波澜。"双和"是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是一种互生互存、共生共长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一种流行的观点进行厘清。这种观点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中轴"、是基础和核心，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建"和谐世界"是"外围"、是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在保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确切。与资本主义外交上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一样，"和谐世界"也即放大了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同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共建"和谐世界"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外交表现，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适应世界发展客观现状在国际关系上的外扩与延展。从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价值目的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普遍幸福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发展状态，就是要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发展状态。所以，"双和"在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过程之中，只有内外之分，没有主辅之别。

今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双和"，使之由隐性引导上升到显性规

定，实现了从理念到模式的升华。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理念已构成了"一体两翼"的理论架构："一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翼"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深刻体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对外共建"和谐世界"，对外共建"和谐世界"也离不开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对外共建"和谐世界"其实已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是，"双和"不是一个为了政治动员而提出来的抽象的口号，它深深植根于时代挑战和实践的土壤中，是为应对国内国际现实问题而来，是为中国开拓社会主义新前途而来，因此，它决不会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上，而是在实践中构建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模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模式"，就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对内谋求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建设"和谐世界"，二者相辅相成，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自觉地、全面地奠定基础。至此，"双和"就不仅仅是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更是实践层面上的东西。它早已融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并内在地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期的路径选择，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第一，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土壤之中，深深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的烙印。"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在中国，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和谐当成社会的终极目标。儒家主张的和合、中庸、大同思想，道家主张的天地人神合一思想，都包含着追求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光辉。甚至历史上一些封建王朝的开明君主，也都从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强调君民"和谐"共治天下的理念，唐朝的李世民提出"民水君舟"思想即为典型表征。在中国哲学中，"合二为一"、"执两用中"、"和而不同"、"相形相生"、"物生有两"、"过犹不及"等哲学观点，也都体现出"和谐"内涵。在中国的文学中，追求故事结果的喜庆和大团圆是一个传统主流模式，一般并不喜欢"蓝色基调"、"冷结局"。人们从文学价值感悟中，更愿意或者希望获得美好的结局，而不是痛苦的反思。而中国传统美学也把"和谐"作为美的构成要素，从建筑风格到绘画艺

术，"方正"、"规矩"、"四平八稳"等等都强调追求协调统一、追求和谐完美。总之，"和谐"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性和社会普遍性。应该说，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积淀为"双和"模式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它成长于党的改革开放探索过程之中，具有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双和"模式不是应时之作，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遵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既防"左"又反右，既防止西化又反对改革"裹足不前"甚至保守倒退，坚持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我们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结合起来，强调鱼和熊掌兼得的必要性；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结合起来，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指出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又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放在同样重要地位；在制定发展战略问题上，既有发展的综合指标，又有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指标，既有长期战略，又有具体要求；在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上，既重视把市场经济的高效资源配置发挥出来，又注意保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处理港澳台问题上，奉行"一国两制"原则，既保持港澳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又追求祖国的统一完整性；在对外政策中，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不搞对抗，推动合作、谋求共赢等等。新世纪以来，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紧密联系起来；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把实现人民普遍幸福的价值目标具体化、系统化；而江泽民关于世界多样性与相互依存性的观点，已经体现出"和谐世界"的精神来。所以说，社会主义"双和"模式，是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是一个由隐性升华到显性的飞跃过程。

第三，它孕育于时代挑战的背景之中，是对挑战进行主动回应的产物。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如一些地方的城乡、地区、阶层之间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社会关系紧张等，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同时，当前国际环境呈现新的复杂性，一方面世界普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唱衰中国的论调又在干扰中国与世界的良好关系，败坏中国形象，两个新理念就

是针对这些不和谐现象和这些时代问题提出的。[1]特别是“和谐世界”这一命题，不仅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外交表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理论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和平参与者；中国把道义上反对霸权主义和事实上并不挑战美国的霸权严格区别开来，这就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让自己感到稳妥、让世界感到放心的路。其深层意蕴，不仅仅是为了回应“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论调，更是为了探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全面、深入、审慎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加快自己的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指针。

第四，它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长远未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长期和根本意义。对于“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问题，学者们已经提出很多可行性方案。透过其中的语境，很多学者的观点似乎是只要实现所列举的某些条件，“和谐社会”就实现了。其实不然，严格地说，“和谐社会”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在社会主义阶段，只是一个构建过程，一个不断趋近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社会矛盾的社会，也不是社会矛盾绝对地、不可逆地消减的社会，随着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不断解决，它必然在动态中、在波动中发展，在变化中成长。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和谐世界”实现途径的认识还是相当谨慎的，因为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共建“和谐世界”任重道远。我们认为，“双和”实现的过程，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建设的实践中，在与国际各种制造矛盾的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党和人民的努力，通过世界人们的努力，和谐因子不断积累，和谐成分不断增多，而不和谐现象出现的次数和程度不断减小，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像大海的涨潮，总是在一涨一落的交替中慢慢攀涨起来。所以，“双和”不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性的问题，不是一个针对社会现实不和谐问题应变的策略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指导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长期规范、指导意义。

由此观之，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双和”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内，为我们党处理各项工作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既长远又现实的原则性价值取向和判定是非的价值标度；对外，则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树立起我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新高

[1] 张尧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点综述》，《理论导刊》2005年第12期

度、新境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双和"模式具有价值普适性，为其他国家、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健康稳定的现代化发展，探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范式，树立了一个榜样，正在对世界众多国家产生积极影响。正如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谈到："与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不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眼下，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国是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典范。"[1]当然，西方学者未必认识到：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道德典范，从根本原因来说，是我们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提出并实践"双和"模式。

4. 面向未来的全球化：中国争取发展主动权

有限在无限面前，终要趋近于最小；静态在动态面前，终要趋近于过时。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所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会不断摆在我们党面前，因此，任何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既然我们已经走出国门，既然我们已经徜徉在世界"大街"之上，我们就必须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以新的观念、新的方针政策，来迎接新的挑战、新的困难。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所经历的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改革与创新同在，腾飞与进取同行。当前的国际局势仍在变动之中，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仍在演化之中，我们所作的回应、所采取的措施也在进展之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奋进。

面向未来的全球化，中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小人常凄凄，君子坦荡荡。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我们只要坚定自己正确的发展道路，只要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来自世界上的任何挑战都能够被战胜，任何阴谋都能够被化解。

在这里，我们不妨预测一下全球化未来的走向。首先这其中存在两个力：一个是推动全球化的力，一个是反全球化的力，二者交互斗争的结果就是全球化运动的结果。应该说，推动全球化的力既有发达国家等参与国的主观推动，也有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客观推动，因此全球化只有进展是否曲折问题，不会有倒退甚至消失问题。相反，反全球化的力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动

---

[1] 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全球化进程中注入了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造成了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所以它有维护正义的一面，但从根本上来说，因为它把全球化运动本身与全球化附带不合理性因素等同起来一并反对，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力。这就是说，它的价值只是鞭策而不是也不可能实现它所追求的具体目标。这样我们就能看清未来全球化发展趋势。应该说，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必须通过继续推动全球化来解决，而不应该通过彻底否定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通过参与其中来注入社会主义价值观，推动全球化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或者影响全球化避免滑向更坏的方向，这是解决全球化存在的问题的理性选择、科学选择。任何国家要谋求发展，都必然融入全球化大潮中，而全球化要获得健康发展，就必须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并发挥进步性的影响作用。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即使没有人主观上反全球化，全球化自身发展在客观上也正遭遇空前的挑战。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仍；能源、资源枯竭，发展动力减缓；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战争连年，地区冲突不断；人口激增，粮食供给困难，人类健康威胁加重；生态破坏，人居环境恶化……这些都是现存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强暴了地球，地球正在反抗！的确，全球化是在前进，但是前进的动力越来越弱，前进的障碍越来越强。

尽管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审视这一时代的宠儿，但都不得不直面他带来的一切——把生产力推向一个空前高度，把风险推向一个空前高度，把全球性问题推到一个空前高度。

不可否认，上个世纪尽管革命风起云涌、政治动荡不安，但最终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并走向新世纪。那么，在资本主义强势的全球化环境里，坚定社会主义价值信念的中国该如何辗转于其中呢？那就是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以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来参与全球化。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管居何用心，不管用何手段，对中国耸人听闻的攻击诽谤都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只要中国坚定自己既定的原则，西方的偏见和少数人的肆意鼓噪终会烟消云散。毕竟，别有用心敌视中国的是少数，世界上对中国有看法的大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不信任中国。

但是，中国不是为了树立形象而树立形象，不是为了参与全球化而参与全球化。全球化是大家拾柴燃起的熊熊烈火，大家也都有资格、有理由围上前来取暖御寒。中国参与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会也不应

该因为受到各种挑战而放弃自身发展这一历史责任。不管未来在全球化互动中，中国还会面临多么残酷的挑战，谋求自身的发展，是不可改变的目标。"被动就会挨打"，这是邓小平从中国近代悲惨的历程中悟出的道理。中国必须首先发展起来，壮大起来，才能在未来全球化中争得话语权，中国利益才能得到维护，中国才有能力为世界人民伸张正义。否则，一个过河的泥菩萨，不可能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多大贡献。的确，只有把自己变成猎人，他们才不会成为野兽！因此，中国在全球化未来发展中，必须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第一，高科技是未来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心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彰显出真理光辉。在未来综合国力较量中，经济发展是核心，而其中的科学技术则是这个内核中的心点。处于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是靠工业生产力而是靠科技水平排定国家发达程度的位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号称"世界工厂"，但是却没有18世纪的英国和19、20世纪的美国那样辉煌无比，原因就是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之国，而是加工之国——我们只为产品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场地、原材料和一定的市场，而产品的灵魂（核心技术）却往往不在我们这里。所以当"中国制造"走遍全球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老板，而是"在为世界打工"！实践证明，面向未来的全球化，中国要争取发展主动权，只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必然是经济发展"坐镇"、科技创新领军的时代！当前的世界科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科技发展已经并不囿于单一技术或单一产业而是表现为新的技术群与产业群多头并进的态势。信息技术还未达到发展的顶峰，又迎来了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挑战。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历史条件下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战略的强国之道。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从二战后期就开始通过实施一系列科技创新工程，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除美国之外，欧盟、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盟国家也都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纷纷提出自己的科技创新战略、筹划调整技术经济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环境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本身的巨大突变，国际科技战略联盟新趋势不断发展，已呈现出发展加速化、合作主体多元化、基础研究（特别是大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国际科技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生产和经营为主要推动力，因

此，新趋势所引起的国际科技结构的新变化也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联盟的初期，联盟多发生在科学技术先进的美国本土和欧洲。随着世界环境的变化，目前国际科技战略联盟已经不再限于美欧发达国家，而更多地向亚太地区扩展。如日美企业之间的技术战略联盟，其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生物工程、汽车制造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日本索尼公司与荷兰公司在盘技术领域的联盟，目的就是协调和建立国际技术标准。微软与英特尔的联盟，则在微软技术方面独领风骚。这种国际科技创新联盟的新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势必面临巨大的挑战。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往往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优势，通过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共振系统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使全球竞争出现了非对称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实施的越来越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及控制科学知识输出的种种措施，使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应用上处于不利地位，在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面临巨大困难。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不能根据全球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与开发出新的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国力竞争中必然以受制于发达国家而告终。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就是有力的明证。

在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谁抓住了高科技，谁就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命脉，谁的发展就拥有了主动权，谁就有能力保护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1]国家的竞争优势，蕴藏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推广应用程度之中；而一个国家能不能长久地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已越来越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在世界高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面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不断加剧面前，在发达国家对我们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面前，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在科学技术领域初步具备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较

[1]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4 页。

强实力。但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相当多的企业和产业正面临知识产权问题，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世界未来的发展态势已经向我们发起警告：我们要发展，要在未来全球化博弈中保持主动权，就必须促进科技发展，加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中国当下参与全球化竞争的现状分析。在世界级商品大品牌中，中国所占数量很少，不要说跟美日德英法等国相比较，就是与其他较小的发达国家比较，在很多领域方面都很逊色。但是有一个“品牌”却在改革开放以后悄悄风靡世界各个角落，家喻户晓，那就是“中国制造”。尽管“中国制造”商品系列中也不乏高精尖产品，但留给世界人们总的印象就是低技术含量高手工投入和价廉物美。“价廉物美”一直是“中国制造”进军世界市场的王牌。当人们津津乐道进出口总额迅速攀升、不断超越其他国家、正在成长为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却指出——中国不应该为世界打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正在为世界品牌企业“无偿地”赚取几倍利润。另外，“中国制造”还给世界消费者节省了大量开支。按照美国官方的统计，过去十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让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不仅是在美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制造”，意味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尽管中国贸易所铸就的辉煌是以不等价的付出为代价的，得了便宜的外国人却似乎并不买中国人的账，不仅借此为根据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而且还指责中国正在制造世界性的失业大军。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商品生产链条中，中国搞商品倾销，抢夺了他们国家工人的饭碗。对世界来说，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确实给一些国家的某些行业产生竞争上的负面影响，但从根本说，这是世界福祉。因为“中国制造”一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这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对发达国家的主要行业竞争是交错的，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发达国家一般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指责“中国制造”抢了某些国家工人的饭碗言过其实。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对于价廉的“中国制造”，中国和外国受到的都是双面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起步时期，无疑，价廉物美是打开国际贸易的武器，这是我们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一大法宝。但是，物极必反。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例如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之后，再靠“打工”挣钱就不合算了，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中国制造”之所以经常遭

受西方的反倾销调查就是因为“价廉”，而价廉的根源在于技术附加值低，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管对世界还是对中国本身来说，只有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因为只有我们掌握核心技术，我们的产品才会有自己的品牌，才会有高附加值，才会有能力提高工人工资而不会伤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样，我们才不会给世界打工；“价廉”的“中国制造”也就不会成为商品倾销最重的“嫌疑犯”。

而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瓶颈制约。就我国目前状况，高新科技人才匮乏、科研基础设施落后、自主创新能力欠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足3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60%至70%的水平。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技术和设备引进上“重引进、轻消化”，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基本依赖国外进口，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甚至形成了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偏重引进技术的使用，忽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1999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为0.6%，而世界500强企业一般占5%—10%以上。由于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不良”，使自主创新能力“发育”迟缓，难以培育起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产业技术空心化现象严重。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例如，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8%，欧盟的16.8%和日本的10.3%。[1]。当前，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变革，面对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对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激烈国际竞争，由于产业技术水平低，新技术扩散慢，在重要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使我国主要产业难以实现经济规模，产品附加价值低，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延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造成对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环境和生态也形成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使我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能力，国际依存度较大，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中国要结束为世界“打工”状态，在经济发展中争取主动，就必须放眼高远，在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

[1] 马凯：《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求是》2004年第7期。

第二，建设创新型国家，争夺未来竞争制高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老一辈领导集体虽然非常重视科技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只能在简陋的条件下自己独立摸索前进 因为遭遇长年战火，高校教育和科研机构长期处在半瘫痪状态，国内的科研人才奇缺，在当时一批满怀爱国热忱的科学家千里迢迢从国外赶回来，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支撑骨干。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在航天和核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获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但是，由于缺乏人才、物力等科研沃土，而计划经济体制既不利于科技成果向生产实践转化，也不利于为科学研究融资、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在其他很多领域中的科研发展非常迟缓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迎来了科技发展的春天 但是十年一挥间，中国科技发展，虽然同历史纵向比较获得长足进步，很多领域取得瞩目成就，有的甚至是世界性突破，但是与国际发展速度、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就会意识到我们科技发展还需要跃进 改革开放十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一枝独秀”，但是主要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能源消耗产业作支撑，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发展潜力有限，不利于进一步推动国际市场扩展 曾经成为中国经济骄傲的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技术老化，连年亏损，不堪重负；而新兴的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兴旺发达，但除了外资经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传统作坊式的生产，没有多少技术要素，成为低效循环的高市场风险经济，这使得“中国制造”一直成为初级产品、手工艺品、低层次低品位产品的代名词 发展外资经济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但是不是自己掌握的技术就意味着需要支付高额利润来购买技术垄断下的使用权 据计算，中国为此每年要花掉几亿美元来支付技术使用权 十年后的改革正在全面深入展开，科技发展也应该从希望的春天走向收获的夏天。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等西方国家依靠高科技的优势，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4月15日，江泽民在重庆视察时，连夜给李瑞环等人写信，指出高科技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郑重强调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意义，他指出：“鉴于当前世界发展的形势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展望，深感科技工作亟须进一步抓起来”[1]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速科技进步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指出：科教兴国战略，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教育和科学技术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面临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新挑战，党的“十五大”再次就科教兴国战略作出总体部署，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接下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也都重申了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并根据新形势作了新的战略部署，保证了这一宏伟战略在落实上的持续性、在实践中的适应性。改革开放又历经近20年，中国科技在有利政策支持下获得长足进步。但是，出口产品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依赖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局面。这不仅使我国的出口存在大量的利益损失，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始终处在国际经济风险之中，稍有经济波动，西方国家只需要转移资本和核心技术，就可以规避风险，但中国企业必须承担巨大经济损失。

21世纪前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全球化发展不确定性风险多发期。在本世纪初，我们党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问题等提到战略高度，决非偶然，它们实际上是应对全球化在农业、工业和科技三大领域中突出问题的典型化反映。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前提之一；能源、资源供给则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发展的大动脉；科技创新能力问题则是在国际高科技竞争中取得主动权的前提条件，是赢得全球化竞争胜利的桥头堡。全球化造成的社会风险加大，其中在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性加大，一石便可激起千层浪。我们降低风险的最好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分化风险，实现多元化、多渠道、多空间、多选择供给，把鸡蛋分散放在几个篮子里，这样即使失之东隅，还可收之桑麻；二是增强独立自主能力，尽可能地把对外依赖性降到最小，一旦风险降临，我们就有能力承担损失，赢得主动。只有未雨绸缪，才能避免“屋外下雨屋里流”的被动局面。显然，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其中规避风险的基本前提。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全球化竞争中，要从根本上规避风险，只有掌握主动权，而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就是争夺未来竞争制高点，就是掌握竞争主动权。

由此，近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争夺未来竞争制高点，把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效结合起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框架。2006年初，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们党组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了全面规划。要求经过15年努力，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展望未来，《规划纲要》规划的目标概括了我国主要经济和社会领域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届时将全面提升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从现实角度看，说明我们党顺应时代，把握住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努力争夺发展的制高点。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发展计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伸向远方，未来全球化一定风雨兼程，但是，前进着的中国一定在和平发展旅程中一路走好

第七章　理论反思：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比分析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二者孰优孰劣？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优越，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危机？为什么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会诞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优越，为什么发生苏东剧变？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走不通？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劫后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越走越宽广？要解决这一问题，视阈极为宽广，如果不缩窄研究的着眼点，在一个有限的篇幅中，很难得出科学结论。如果借助一个视角和一对分析工具，对比两种制度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是非得失，就存在一个全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第一节　衡量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

评价历史的二重尺度，具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但是运用两个尺度衡量的结果常常是相悖的——符合历史尺度的不符合价值尺度，符合价值尺度的却不符合历史尺度。似乎历史一直以泯灭人性的方式来前进，似乎人性道德的价值追求不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之中，而是在纯粹的观念之中，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价值尺度必须服从历史尺度的客观发展过程，这是

一个只能同情却不能更改的客观规律性的发展过程。社会历史就是人能动作用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历史，衡量社会历史发展进步性必然存在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这一重要因素。尽管站在不同人的位置上，人的价值是不同的，有的甚至是对立的，但从根本上说，符合历史尺度的评价，必然包含着有利于人的需要的满足的一面。否则，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价值需求的历史进步性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但是，用二重尺度评价历史，为什么结论常常是相悖的呢？这里需要我们重新确立衡量社会发展的二重尺度。

1. 评价历史的二重尺度逻辑困境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基本方法。但有一些典型的例子：马克思的“异化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对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经济理论的褒贬评价、恩格斯的“‘恶’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奴隶制度的肯定评价等等，二重尺度评价表现出对立性。对此困惑，通常的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尺度统摄价值尺度原则。这样虽然使解释工具与解释对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解释工具与解释对象却各自陷入逻辑困境中。

对此，可以提出三点反驳理由：

第一，既然“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1]，那么，价值尺度如何体现出自己相对于历史尺度的独立性存在呢？如果只有意见一致时，丈夫才说了算，而意见不一致时，妻子说了算，那么，丈夫还有发言权吗？有人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来说明这种悖论体现辩证法精神。在两点论中谈论重点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只有量上的程度差别，没有质上的对立冲突。因为在是非真伪之间是无法分出主次轻重的。但在上面的例证中，两个尺度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肯定一点，另一点实际上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对于这些例子，如果按着“只有符合历史尺度的，才是符合价值尺

[1] 丰子义：《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

度的"[1]原则逻辑推导开来，会有什么结论呢？

正因为资本家的无耻的贪婪（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所以，"恶"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有人甚至指出："从感情上讲，被剥削的人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剥削在一定时期又具有历史的正当性。"[2]从这一观点，正因为侵略者带给殖民地走上现代化的机会，所以，侵略是有功的，被侵略者所遭受的痛苦是实现社会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价值支付。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客观上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论断的解析，可以说，是展示二重尺度研究功底的试金石。由于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着眼于印度发展未来，明确提出了感情上的同情让位于历史理性的表层话语逻辑，从而体现出"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3]味道，但由此推定的结论却是"侵略有功"，这不仅与马克思人道主义原则相悖，也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全文主旨——揭批英国在印度殖民侵略的罪恶——格格不入。

既然异化劳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的历史过程，那么，劳动阶级企图摆脱异化劳动的反抗是逆历史而动的，除了"认命"外，难道还要改变历史规则吗？当有人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关于对异化的历史必要性和相对的合理性的评价的时候，也同样会找到对其历史阶段性、暂时必然性的论述。这种反映历史尺度自身的前后不一致性，若仅以既定的观点来解读，争论在所难免。

既然"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才能最终"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4]那么，在现实上，如果谁不幸沦为被"牺牲的个人"，就只能接受这个"历史选择"了。如此说来，革命还有必要么？

当有人为了论证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的优先性"，引用《资本论》第四卷中的一段话："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我也可以引用马克思曾在《关于自由贸易

[1] 江丹林：《马克思历史评价理论辨析》，《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
[2] 曹玉涛：《剥削与正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歧及问题辨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 江丹林：《马克思历史评价理论辨析》，《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问题的演说》中批判了包令博士类似的观点：“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1]那么，是马克思搞错了呢？还是我们解读错了呢？难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这样明显的价值评价对抗中实现所谓的“两个尺度辩证统一”的吗？

尽管没有人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弱化价值尺度的重要性，但由于确立“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基本原则，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这种逻辑态势，任何不做科学论证的观点声明都掩盖不了这个阴影的存在。

第三，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制度能否跨越“卡夫丁大峡谷”问题所体现的两个尺度关系，不仅没有体现出“历史尺度优先性”，反而却有“价值尺度优先性”味道。当然，“价值尺度优先性”又会有历史目的论的嫌疑，这与唯物史观原则是相抵触的。显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制度能否跨越“卡夫丁大峡谷”问题研究结论看作历史尺度的反映，也就意味着历史发展具有唯一性了，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中。另外，从价值取向上来说，马克思自然希望俄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大峡谷”，但是，这不是一个情感、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客观、理性问题。强调“价值尺度优先性”，实际上伤害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精神。

根据证伪原则，在这三点理由中，只要有一点成立，这个命题就不是真命题，至少不是一个普适性的命题。

首先，从两个尺度生成的理论根据来看，这是一个有纰漏的逻辑推导过程。

一般的理由是：人及人所存在的社会一方面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依存于自在自然，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具有自然规律的特征。但是，不同于纯粹的自然规律，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结果，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所以，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又打上人的本质力量的烙印。因此，考察社会历史，既需要反映历史客观必然性的理性尺度、历史尺度，也需要反映历史主体目的性的道德尺度、价值尺度。“犹如自然界对人类拥有‘优先地位’一样，历史规律对人也有优先性。”[2]相应的，历史尺度对价值尺度也具有优先性。这也印证了具有客观特性的生产力是社

[1] 马克思曾批判的包令博士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5页

[2] 李高真：《从历史评价的二重尺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会发展决定力量或者说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这个论证有一个逻辑纰漏。当我们用传统的二分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两个特性——规律性和主体性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读：似乎历史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力量置身于人之外，并支配着人的主观选择。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体性应该是什么关系呢？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论及历史规律的成因，而当代哲学"对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关系问题，迄今为止的理论上的解决是极难令人满意的"，[1]所以，我们只能在二者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层面上而不能在二者直接的逻辑环节层面上谈论彼此关系。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功能考察过程中，由于把历史规律存在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所以，它就自然取得了外在于人的地位。而历史规律又具有内在的、必然的功能属性，相应的历史尺度在两个尺度中就理所当然地处于支配地位。以为这是唯物史观的反映，显然是错了。因为，严格地说，这不是二者关系的反映，只能说是二者功能的反映。以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差异为根据判断彼此优先地位，是不严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两个特性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从根源上看，历史规律不具有优先性。尽管还不能解读历史规律是如何形成的，但在逻辑上它应该是从人的相互能动作用中产生的。因为人是社会存在的理由，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痕迹，而历史规律不可能是超越社会历史之外的"自在"。另外，从运动环节的因果联系上看，历史规律也不具有优先性。二者不是"并存"的，而是"序存"的，历史规律就存在人的能动性之中并发挥着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更确切地说，没有人的能动活动，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正如没有炒股者投机行为，就没有"买高不买低"规律的作用一样。历史规律制约人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外在性，是相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而其成因与存在的属人性，是相对于社会整体的人来说。

有人强调"因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进步。"[2]如果说，在考察推动社会进步动力问题上，生产力[3]、生产方式起主导性或决定性作用，是可以的，但是由此肯定"价值尺度

[1] 王南湜：《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学术月刊》2006 年第 5 期。

[2] 丰子义：《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2007 年第 12 期。

[3] 王锐生在《论社会进步的尺度》（《哲学研究》1987 年第 10 期）指出：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

服从历史尺度”，是不可以的 前者是功能表现，后者是关系要求，二者并非总是一致的 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方式，它们外在于人的特性只表现在推动社会进的功能层面上，而不是它们生成与存在方式上

人的能动作用表现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其中，确定性具有客观特征，起到内在的必然性作用，这就是历史规律（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等客观因素）存在和作用的根据；而不确定性具有主观特征，起到外在的偶然性作用 为什么会有确定性呢？就是因为人的活动是能动的、有目的性的 当十几位长跑运动员在环形跑道上进行赛跑时，每一个运动员都会尽可能地贴近底线奔跑，使得运动员们的运动轨迹存在趋同性——可确定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在运动员能动选择中，越贴近底线跑，奔跑的无效路程越短。

由于人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为不确定性——确定性渗透在不确定性中，所以，我们习惯上把人的能动作用包含的不确定性功能理解为人的能动作用本身的功能，这就造成了人的能动作用与历史规律或生产力、生产方式直接对比的现象 显然，在人的能动作用中，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属于其确定性功能范畴，这与唯心史观片面强调其不确定性功能（人的主观选择性）起决定作用是对立的 所以，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并不是超越于人的能动作用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超越于人的能动作用之不确定性功能的表现

如果把人的需要理解为价值尺度的标尺，历史规律（或生产力、生产方式）是历史尺度的标尺，那么，价值尺度反而具有优先地位，因为人的需要是人发挥能动作用的内源动力，而人的能动作用是历史规律存在的前提条件 正是由于人为了目的性的需要而从事实践活动，才使得这种活动不是盲目的、没有理性的，才使得这种活动在不确定性中有确定性，规律才得以存在

有人在推论中强调“即便是价值评价本身，最后也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即从历史看，所坚持的究竟是何种价值？”[1]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即便是历史评价本身，最后也有一个价值性的问题，即从价值看，所坚持的究竟是何种历史观？”既然是历史评价，就必然要站在所确定的人的立场上评价 不管是站在某一阶级还是站在某一社会、某一时代整体的人的立场，都涉及价值取向问题，因为社会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超越于人的需要的纯粹的历史自我道出，不

[1] 丰子义：《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

是一个评价问题，不是一个尺度衡量问题。

总之，在这个逻辑推导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的根据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是否坚持历史尺度至上性与是否坚持唯物史观是两码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意味着定然历史尺度统摄价值尺度 社会存在之所以能够决定社会意识，是因为社会意识总要以社会存在为反映内容 历史尺度尽管具有侧重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属性，但它存在形式与价值尺度一样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为它只是一种评价功能 把历史尺度上升为社会存在的地位，这是把存在形式与反映内容、反映原则混为一体

其次，从两个尺度的内涵与外延来分析，二者也存在逻辑困境

确立两个尺度的范畴以及对范畴的解释虽然多种多样，但基本要点却是：历史尺度（客体尺度、理性尺度等）主要是根据历史规律审视其历史进步性；价值尺度（人的尺度、主体尺度、道德尺度等）则是以人性伦理道德原则审视社会发展对人的需求产生的积极效应 由此来看，历史尺度从客观角度评价历史发展，注重的是合规律性；价值尺度则以人性为根据，从主观角度评价历史发展，强调的是主观需要的合理性、合目的性，结果，前者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为根据，以是否符合社会进步准绳，具有衡量标准的唯一性，而后者却根据不同的人的需要、不同人的道德标准，有不同的标准 这就出现了问题：衡量同一个对象，用到同一个历史尺度，如果不对有着差异性的价值尺度加以区分，怎么能保证两个尺度衡量标准是统一的呢？

既然历史尺度是以社会进步概念为前提，"但进步的概念就包含着价值的评价"[1]，也就是说，历史尺度也应该有自身的价值评价主体，尽管它可以置其于内涵摄取范围之外。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必然要站在所确定的人的利益立场上来审视社会历史进步性。在历史尺度中，能够做出符合历史进步结论的评价主体，依据其内在主体受益者特性，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即时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这就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只能是社会分配中直接获益者——统治阶级 而被统治阶级，除了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因束缚在自身枷锁有所松动而相对感觉到社会进步外，作为社会分配的直接受损者，不可能认可社会进步性，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否定整个社会现存秩序的 二是历时代的所有后代人 因为所

[1] 王锐生：《论社会进步的尺度》，《哲学研究》1987 年第 10 期

有后代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前代社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显然，对于阶级社会历史评价，历史尺度在逻辑上要求必须基于两点评价才是一致的：一是基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道德立场；二是基于历时的后者的价值取向——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上，审视历史进步性

再看看价值尺度特点 价值尺度是以人性道德为出发点做出的评价 尽管有普适性道德原则，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所有道德原则都必然会打上阶级利益烙印 因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分裂性、异化性的社会，在这里，"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1]"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2]这种阶级利益对抗性决定了道德观、价值观上的冲突与对立 恩格斯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3]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从现实出发，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只要创造社会财富就是社会进步

这就意味着，如果以统治阶级利益要求或以历时所有后代人的利益取向作为价值尺度的根据，那么、与历史尺度的衡量标尺是一致的，两个尺度评价的结果是不矛盾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管是从历史当事人的视角还是从后代人的视角、常常会站在被剥削阶级的价值立场上或者剥削阶级道德对立面上、来评价历史 这就会与历史尺度的标尺相冲突，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两个尺度相提并论的话 这不仅表现在结论上——因为现时上的被剥削阶级价值观不会认可社会进步性，而且也表现在时空逻辑上——历史尺度的视野是要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整体发展图景，而基于被剥削阶级利益要求的价值尺度不具有这一空间视野 当然，若从统治阶级价值视角出发，则不存在这一问题 因为统治阶级扮演着社会"共同利益"的虚假身份，"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4]而被剥削阶级只能展示自身的利益视角空间 另外，两个尺度的时间视角也常常不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一般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历史进步性（这包容着自身的已经转换的价值尺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度——历时后者的价值尺度)，却常以当时时代或者以写作所处时代的批判者的角度进行价值评价。

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从历史运动脉络的取势上看，两个尺度才有统一起来的根据。而在历史发展的取势上，价值尺度只有从历时后者的角度才能看到历时前者的历史进步性，所以，两个尺度不可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具备“合题”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达到社会客观发展与人的主观自身发展的统一。但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尺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现实条件，我们不过是在价值尺度的视野中，表达了二者在历史发展的取势上能够统一起来的观点而已。

另外，有必要对马克思一句话，“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1]做出解释。

对历史尺度范畴规定来说，既不要等同于应然性历史规律要求，视其为理性主义标尺，从而违反了它的客观性原则；也不要等同于实然性历史规律要求，认为凡是历史必然的就是合理的，就符合历史尺度。它要同时具备两个原则要求，既要符合实然性历史规律原则，又要符合社会进步性原则。显然，符合实然性历史规律的未必一定符合社会历史进步性，因为在实然历史规律中，一方面存在历史进步性的主脉，另一方面也存在非历史进步性的支脉。在马克思上面的话中，只符合实然性历史规律原则，却不符合社会进步性原则，所以，它不是历史尺度的反映。

现实社会中，对人的主观需要的价值反映与对社会客观进步程度的反映，不能直截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削足适履，片面地使人的主观需要必须服从于社会进步程度的要求，如果那样，所谓的“社会进步”也就无意义了。唯物史观并非只见物不见人。

在历史尺度视野中，有自己的价值底线，这本不具有道德倾向性。而人的欲望一旦超越促进社会生产的内源动力所要求的范域，就存在道德评价的导向问题。历史尺度视野内在的价值要求，不管是“不及”还是“过分”，道德评价所给予张扬和贬抑都是必要的，不仅会促使社会发展受到理性鞭策，而且使社会充满人性化色彩。尽管二者在“源点”上统一在社会发展的大树上，但是，它们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的"端点"却在各自的枝丫中竞相攀长。所以，当毛泽东按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批判所提出的理想道德要求构建"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是扩张了价值尺度视野，伤害到了历史尺度视野的价值底线，把价值尺度中的至善标尺视为历史尺度视野的价值底线，造成二者界域的混乱。实际上用经济视野中的价值标准很难准确衡量道德视野中的价值原则——多劳多得，这是一个经济视野中的公正原则，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客观条件差异性，容易造成贫富不均的道德公正问题；搞平均主义则克服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道德公正原则，但是它实际上包含着少劳者对多劳者剥削的经济视野中的公正问题。邓小平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把两个界域区分开来——当我们论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尺度视野中的问题，它的价值底线是追求共同富裕，这不能用道德的至善刚性原则来考察。而当我们论及社会公平问题时，这是一个价值尺度视野中的问题，它的道德限度是保持一定的社会发展效率，这不能用经济的至强刚性原则来要求。但是，区分开两个界域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联系——它们既在两个领域中，又密切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正如手和脚，只有分工合作，人的运动才自如灵活。效率与公平是两个界域中的功能反映，但二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在两个界域中，我们谈论二者的对立性，在推动社会发展这一平台上，我们谈论二者统一性。

这样来看，二者优先性问题，不是固定的。因为二者本没有可以比较主次的内在统一标尺，谈论二者关系，就像谈论社会发展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关系一样，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功能层面上。如果不是跨越历史时空的对比评价，对于一个正处在上升时代的社会历史评价，确立历史尺度优先性是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处在没落时代的社会历史评价，确立价值尺度优先性也可以是理解的。当然，二重尺度主从关系问题并不一定遵循特定的规律性，但是，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服务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应该是客观的一致的内在要求。

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二重尺度评价社会发展问题不具有前提条件内在规定的一致性，所以评价的结论服务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而不是标定客观发展状况的尺度的需要，所以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进步状况。由于历史尺度既反映社会发展规律性，又反映社会进步性，既有自己的发展要求，又有自己的价值要求，因此，它本身对于评价社会发展状况是非常适合的。而传统的价值尺度历史评价功能不在于客观理论论证，而在于价值导向鞭策，因此，作为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进步状

况的尺度是不适合的，而且它受到道德原则多样性影响，以此为根据评价社会发展状况，主观倾向性较强，缺乏客观性、一致性，也不能与历史尺度很好地“合拍”。所以，必须重新定义历史尺度，从中衍生出新的评价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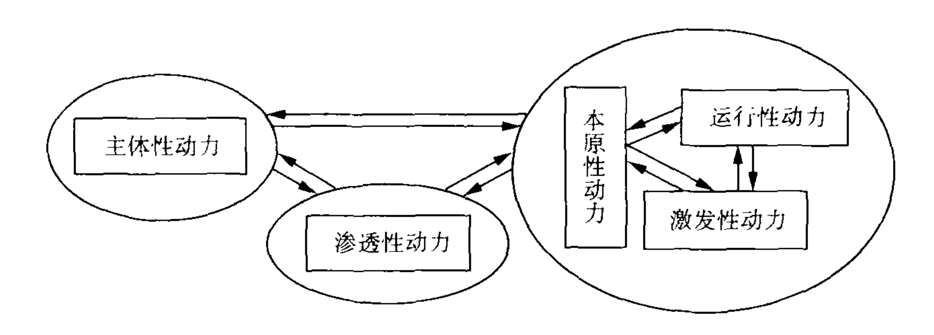
2. 运用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评价社会发展

如果高度概括社会运动，可以认为就是人创造财富和享受财富的过程。但关键是如何创造财富和如何分配财富。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完成创造、分配财富过程的。显然，创造财富的过程需要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这既需要释放人的生产能力又需要有效地分工合作，这就会形成一个动力体系。与此对应的是，人创造财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享受财富，但是由谁来享受则涉及如何分配问题，这就会形成一个分配机制。而实现分配机制有效运转的根据是人们对财富的价值原则、规范、取向等的规定。也就是说，透过分配现象，本质上起作用的是一个价值体系。如果不考虑复杂的中间环节，那么，这两个联动的体系——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就可以用来评价社会运动基本状况。在现实社会，财富首先表现为物质财富，因此，这里主要是从经济视角来考察两个体系以及它们对社会发展状况评价的。

（1）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及其相互关系

动力体系主要立足于经济生产领域。但是，在社会大系统中，有很多主客体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经济生产，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产生动态影响。这样自身就构成一个系统，相应的关联到一些文化、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前面已经谈到动力体系是一个双向闭合的系统动力网。整个动力系统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人的方面、物的方面和环境方面。其中，人的方面主要指主体性动力，包括现实的人（以人民群众为核心）、人的需要（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等。主体性动力主要特点是形成了原始性动因，其对社会产生实质性推动要通过实践活动向物的因素转化才能实现。物的方面包括本原性动力（以生产力为核心）、运行性动力（以制度为基础、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核心）和激发性动力（阶级斗争、改革、创新、市场竞争、对外开放、科学管理、精神驱动等），它们相互联动构成一个物质化的动力系统。另外，动力系统在运转过程中，还要受到社会软环境影响，比如，观念信仰、道德风俗、文化教育、社会文明、安全稳定、国际背景等，这些属于渗透性动力，它们既可以影响也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其他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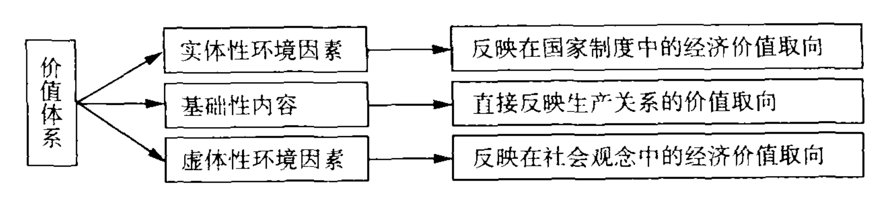
系统。这样就形成了五大动力子系统：主体性动力、本原性动力、运行性动力、激发性动力、渗透性动力。这五大子系统按着一定的方式运转着，推动社会前进，如下图：



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示意图

价值体系要解决的是发展的目的性问题，集中体现的是为谁生产、由谁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而主要立足于分配领域。但是，经济运转是一个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的动态系统，这些环节密切相连、相互影响。因此，它贯穿于整个经济系统中，从生产资料占有到劳动力分工配置再到生产成果分配等等，都体现出价值原则要求。在这里，不要把“价值体系”理解为单纯的价值观念集合，它应该是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社会价值观念间接影响社会经济领域，而是社会经济领域中自身所具有的或者经济领域之外反映到经济关系的价值性原则、价值性规范以及人们在各种经济关系中的价值取向等。所以，它融入于具体的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和经济观念中，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实效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社会大系统中，很多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价值体系”的构成也就不能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而应包含经济领域之外的一些价值因素。按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由谁来占有生产资料、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如何以及产品如何分配。因此，价值体系的核心构成就集中于所有制形式所体现的平等、公正程度，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平等性、自由性如何以及产品分配的公正性、合理性等。但是，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等等也影响着经济发展，这其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所以，也应该列入价值体系之中。由于其自身不属于经济领

域，但具有明确系统化的存在形式，发挥着硬性作用，所以这部分内容应属于核心内容之外的实体性环境构成。社会上的伦理道德观念、习俗传统、信仰追求、人生观念等等这些观念领域中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在处理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中也会发挥着实效作用，自然也应该属于价值体系之中。这部分内容以纯粹的观念的形式存在，也不属于经济领域，而且没有系统化的明文规定——即使被国家明文规定并积极倡导，也只是起到外在的引导作用，不一定就直接转化为人们内心普遍接受的观念东西，而真正发挥实际作用的必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取向，所以，这部分内容应属于核心内容之外的虚体性环境构成。这样，价值体系就由三部分构成：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直接反映生产关系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基础内容，而反映在国家制度中的经济价值取向构成了实体性环境内容，反映在社会观念中的经济价值取向构成了虚体性环境内容。



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示意图

在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平台上，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既各侧重于一点，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发生作用。如何比较二者之间关系呢？主要是比较二者之间功能方面和状态方面的相对态势关系。所谓功能态势，是指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程度——功能强势一方，在自然状态上表现为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处在控制性地位上，在改革状态上表现为处于不断被主动调整的活跃状态之中，对经济运行产生积极动态的、可变的影响；而功能弱势一方，在自然状态上表现为对经济运行影响处在适应性地位上，在改革状态上则是指没有受到主动性调整、变动，处在被动的反映状态，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是适应性的变化影响。所谓“状态”态势，是指在经济体制构成中二者所处的基本状态对比。这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体制构成关系上，状态强势一方表现出具有相对的本源性和基础性，而状态弱势一方则具有相对的次生性和依附性；在二者之间对比关系上，状态强势一方处在相对的支配地位和主体地位，而状态弱势一方则处在相对的从属地位和次要地位；在基本运行态势上，状态强势一方一般会表现出稳态，是社会经济改革

保持社会稳定的根基；相反，状态弱势一方一般会表现出动态，是社会经济改革主要调整对象。原因是处在状态强势的一方是这一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然具有保持稳定的客观倾向，而处在状态弱势的一方常常会影响处在状态强势的一方的正常状态，自然容易受到主观调整、改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一旦出现由于二者强弱态势差距较大，从根本上影响到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改革和革命都有可能把状态强势的一方作为主要调整对象。在两个方面关系中，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反映。一般来说，二者的强弱态势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功能态势表现在经济运行中，“状态”态势表现在经济构成中，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二者往往表现出不一致性。正如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从基本状态来看，无疑母亲属于状态强势一方，孩子作为管教对象，属于状态弱势一方，在一般情况下，孩子受到母亲管教。但是在具体行为实践中，孩子往往会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并最终迫使母亲妥协来平息矛盾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就表现出功能强势，尽管从根本上，他仍然属于状态弱势。所以，运用这新的二重尺度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应该区分出功能与状态之间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社会发展，从广义上来说，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与社会的全面的系统化的进步。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工程，任何理论都很难把其全部囊括起来研究，都必须侧重于一点才容易说清楚。显然，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根本上讲，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推动，都必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所以，从狭义上来说，社会发展主要指经济发展，或者说，可以以经济发展为平台研究社会发展。用新的二重尺度评价历史发展问题，就是立足于经济发展，并融入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在一定的历史、国际和社会条件下，把两个体系作为衡量尺度，来给予具体考察。

（2）两个体系和“公平与效率”的联系与区别

在经济领域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人把公平单纯地理解为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有人则将其理解为“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1]但不管怎样，公平的获得取决于分配（机会均等也可以说通过分配实现，即机会分配），效率的高低立足于生产，二者既对立

---

〔1〕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 页。

义统一。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二者存在着对立性——强调公平就得需要付出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反之，强调效率，公平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因此，必然出现何者优先性问题。但是，从全局来看，从长期来看，原则上说，效率与公平应该是一致的。没有公平作保障，效率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反过来，没有效率为基础，公平是没有意义的，也终究要被打破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公平与效率呈正相关系：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没有效率，这里没有优先性问题。那么，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关系是不是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之间关系问题的外在表现，前者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实际上是后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关联的向度表现。

动力体系强调发展手段、发展方式，目标取向是发展的效率。但是，动力体系功能的强弱不能直接等同于效率的好坏。效率好，一定需要动力体系功能强，但是，动力体系功能强，未必是效率好，因为动力体系功能强弱主要标志是对生产力的“动能”释放的程度而不考虑由此支出的“成本”问题。同样道理，价值体系强调的是发展目的，目标取向是发展公平、公正。但是，价值体系功能的强弱不能直接等同于公平程度的高低。价值体系功能越强，未必就越公平。因为价值体系功能的强弱主要标志是经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主动程度和深度。显然，即使不公平的价值体系，也可以对经济产生主动性的、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说，公平与效率是价值体系和动力体系取向较好效果的功能表现，但不是功能自身强弱的直接表现。因此，价值体系与动力体系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通过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但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展现价值体系和动力体系之间的全部关系。总之，当积极调整动力体系时，动力体系会表现出功能强势，但调整的结果，效率未必提高；同样，当积极调整价值体系时，价值体系会表现出功能强势，但未必变得越加公平。当然，效率的提高与公平的增强，必然以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强化为基础。

（3）运用两个体系评价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上文已经详细地说明了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态势变化，给我们运用这新的衡量尺度提供了必要的根据。但是，若要应用到实践中，还需要详细说明二者辩证关系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社会经济发展平台上，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若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二者共生

共存。社会经济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目的性，总会有人来享受发展成果的，所以，确立起任何动力体系，就必然会有相应的价值体系表现出来。反过来，任何价值体系都是建立在某一动力体系之上的，失去动力体系的支持，价值体系是没有意义的。其次，二者相辅相成。若动力体系出现问题，不管价值体系多么完善，社会经济体系最终会崩溃；若价值体系出现问题，不管动力体系多么强劲，社会经济运转最终会一蹶不振。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要达到某种特定的状态，从绝对意义上看，必须同时调节两个体系。虽然在改革实践中，存在保持其中一个体系相对稳定而调节另一个体系的现象，但这是暂时的，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调节那个相对稳定的体系，二者关系就会失去平衡，改革就会遭遇困境。

但是，若从二者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的侧重点来看，动力体系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速度，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平稳性。若忽视动力体系作用，发展就会缺乏前进动力的强劲支持；若淡化价值体系作用，发展就易波动起伏，只有实现二者辩证统一，发展才是健康的、良性的和可持续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经济发展中选择不同的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构成模式，会影响现代化发展进程，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历史进程。

新的二重尺度要比传统的二重尺度较为科学合理，原因是：第一，价值体系跳出纯粹的道德、人性伦理的范畴之囿，而是直接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就是说，这里的价值体系具有直接的、现实的物质性，不是指单纯的观念问题，它直接体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并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尽管一些非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因素也可以影响到经济发展，但只有在它们影响到经济实际运行情况下才可以成为这里的价值体系的内容。这就赋予了价值体系与动力体系两个概念的同一层次性，使二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了传统二重尺度中价值尺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缺乏直接联系性问题。第二，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不存在最终谁服从谁的问题，避免了运用传统二重尺度存在的合二为一的矛盾现象——表面上是在运用二重尺度评价问题，最终却是归结为运用历史尺度单一评价历史问题，而价值尺度则失去了评价的意义，成为一个虚饰因素。第三，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都立足于经济发展这一平台上，具有评价的统一性，避免了评价同一个问题运用双重标准的问题。

阶级社会历史发展存在一个重要特点：社会发展动荡而快速，相对原始社会，波动较大、运动强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阶级社会属于动力体系状态强

势价值体系状态弱势。动力体系状态强势，使社会发展强劲，历史轨迹曲度小，社会变化显著，绝对推进较快。但是，价值体系状态弱势，使得社会矛盾复杂激化，社会发展动荡，在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生产力破坏力大，历史轨迹波动大。正是基于对阶级社会具有的动力体系状态强势价值体系状态弱势这种特点，经典作家才对奴隶社会做出这样的对立评价：一方面指出"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另一方面却斥责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则表现着一种退化和堕落，原始社会"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2]

为什么阶级社会具有动力体系状态强势价值体系状态弱势的特点呢？社会向前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实现动力体系有效运转。只有动力强大，社会进步才具备了首要的条件，尽管它不是独立起作用的。阶级社会的出现就是生产力推动的结果。但是，阶级社会是依靠什么主体性力量来启动生产力机车，使之载着人类脱离原始社会的蒙昧而进入阶级社会的文明的呢？是"恶"，是个人的贪婪的私欲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就是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恶"欲，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残酷地驱使奴隶、农民和工人，一刻不停地劳动生产、创造财富，从而在客观上推动社会发展。

正是因为以"恶"为内在动力，才使得动力体系状态由原始社会的弱势逐渐变为阶级社会的强势，生产力获得解放、发展；同时，也正是因为以"恶"为内在动力，才使得价值体系状态由原始社会的强势逐渐变为阶级社会的弱势，社会表现出一种退化和堕落，社会才处在动荡的阶级矛盾对抗之中。阶级社会把"恶"既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源泉，又自然地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这是私有制社会形态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在阶级社会，私有制使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有"上帝"才关心大家的长远和全局利益。从生产资料所有者角度来看，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是高度统一的，"恶"的最终满足者就是"恶"的最初支配者，也就是说，谁操纵着"恶"的动力谁就是发展结果的占有者，这是所有私有制社会形态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根据。但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则是完全背离的，劳动者的劳动推动着社会发展，劳动者却不能充分地享受到社会发展成果。这样，价值体系就处在与动力体系对立状态而表现为弱势。由此，社会矛盾加剧，冲突增强，历史波动性大，每一次重大历史变革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反过来削弱动力体系强势。

总之，阶级社会虽然开动了生产力发展机器，但是，私有制的存在，使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不能够从本质上统一起来，价值体系处在被动的适应状态——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能够通过有效改革，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强化价值体系，但是，价值体系处在被动的适应状态的地位没有改变，二者不统一、不协调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矛盾对抗性、历史轨迹的波动性依然存在。要实现真正的理想社会发展状态，就必须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平稳而快速，社会发展路径平滑、推进强劲。也就是把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的优点统一起来，实现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双强的社会发展态势。而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使这一趋势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后的具体社会形态的表现。

所以，根据两个体系强弱互动，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进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考察社会发展状况，不仅反映客观、深刻，而且不会有概念上的逻辑矛盾。

在两个体系视野下，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状况，逻辑起点不是现实社会在时序上发展的原真起点，而是把某一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作为一个逻辑起点来研究。因为通过两个体系来评价社会历史发展，是对社会发展状态变迁的研究，考察的是内因问题，不是对社会发展时序变迁的研究，不是考察现象变化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大致从15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困境的整个发展历史阶段。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的重点不是要揭示已成为历史的资本主义步入困境时的昨日伤疤，而是要寻找资本主义走出困境时的今日亮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逻辑起点大致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这段时间。这一时期，苏联模式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我们研究的重点就是分析苏联模式是如何在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上逐渐滑入困境而不能自拔的。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逻辑起点大致应该在新中国成立到实行"大跃进"之前这段时间。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说过："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

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1]当然，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还经历一个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它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党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序起点。因为总的来看，在这之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没有发生巨大的波动变化，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发展状态。

第二节　两个体系下资本主义现代化[2]的历史演变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曾经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其自身逐渐陷入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困境中，在外忧内患的打击下，甚至走到毁灭的边缘。然而，资本主义却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在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竞争中，还曾一度刮起一股强劲的西风。我们从中获取经验教训，尤为必要。

1. 资本主义是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人世间的

资本主义制度是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希冀建立一个永恒的平等、自由、正义的理性王国，“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3]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不管是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都积极倡导平等、自由、博爱、民主、追求幸福等价值理念，似乎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将会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理性王国。然而，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罪恶，把这一切价值理念都淹没在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极端的贫富分化的浪潮中。对于这种现象，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有良知的西方学者们都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却在社会实践中以残酷、野蛮的剥削方式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2]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否从时间序列上大致分为传统现代化模式和新兴现代化模式，尚无定论。但是这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指的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早期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而对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则不包括在内。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体现出来？对于这一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做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分析。我在这里仅以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在以"恶"为主要动力源的动力体系支配下，价值体系完全服从动力体系需要，资本主义同时扮演了理性的天使和非理性的魔鬼双重角色，造成劳动异化现象，使得劳动阶级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又落入到"资本专制"的陷阱中。

上文已经指出，追求不断膨胀的"恶"欲，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由此形成的剥削关系，在客观上推动着社会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私有制社会形态的最高阶段，把这一内在驱动力的优点和缺点都发挥到极点：一方面使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使它与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进一步发展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恶"充分发挥动力性作用提供了三个有利条件：第一，经过资本主义革命，劳动者变为在法律上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劳动力出卖者，这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了商品生产、市场贸易和等价交换等经济原则，这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场制度在私有制条件下如同给资本家戴上了理性和非理性双重加速器，使其在生产运动中同时追求理性化和非理性化两个对立的极限。一方面市场上的生死竞争使资本家努力追求理性化生产——为了击败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并尽可能多地、尽可能长久地获得剩余价值，在客观上促使资本家不断采用先进机器、科学技术和运用有效的管理手段，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基于同样的目的，资本家也极力追求非理性化生产——这既表现为不顾工人死活，榨取血汗劳动；又表现为盲目扩大再生产，使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的生产状态。"恶"把这两个对立方面统一起来，使资本家同时扮演理性化的上帝和非理性化的魔鬼双重角色。第三，资本主义广泛实行机器大工业生产，这提供了有效的生产手段。机器生产使科技开始发挥巨大动力作用，自然能源被空前地应用到生产中来，大工业使劳动分工更加彻底有效，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由于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1]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4页

的动力"[1]大工业生产使资本家比以往任何剥削者有更大能力去满足"恶"欲，甚至在"恶"诱导下，把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罪恶一起推向世界角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恶"的驱动下迅速繁荣起来

但是整个社会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改变，"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 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3]于是，"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另一面——"恶"不仅使资本主义的繁荣带上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且也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无限的麻烦，成为其不可治愈的内在痼疾

财富原本是出资者和出力者"合作"的结果，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应该是资本家和工人共同拥有的权利，但是工人一旦出卖完劳动力之后走出流通领域，劳动的使用就不再归工人自己所有，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成了资本家的专有权利，"恶"只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工人成了它的对立面、它的牺牲品

在资本家眼里，一旦把工人和资本一起看作生产资料，工人就成了资本家追求利益的手段之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较低，生产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之一是改进机器运转速度，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4]这样，资本家非理性化对待雇用工人，就体现在追求生产经营理性化的过程之中，资本家越追求理性化生产，就会越非理性化对待工人，只要工人不反抗，二者存在成正比的发展倾向 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愤怒地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它就还不如一头役畜……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页。

境地"[1]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样的利益追求、同样的商品生产，给资本家的一切，都是理性的；给工人的一切，却都是非理性的。这就导致了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剖析了这一现象："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2]由于劳动极端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奇特的自相矛盾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作了这样的揭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地和毋庸争辩的事实。"[3]

这样，文明就以野蛮的方式成长起来。今天，当徜徉在某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的大街上，一定会有人感叹、羡慕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程度。但是，若看一看垫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大厦最底层的基石，就会发现那实际上是一个埋葬着罪恶历史的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言辞有些过于激烈，忽略了或者埋没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基于历史视角的纯粹的主观臆断。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资本主义时代与他们笔下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形象是一致的，这可以从其他不具有敌视资本主义的作家笔下得到验证。所有具有人性道德感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样的制度是理性的、永恒的，马克思、恩格斯与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运用历史发展规律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其是其非姑且不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的立场，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视角做出脱离历史的评价。

2. 资本主义现代化遭遇困境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摧毁人性的方式来开动生产力机车的，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会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激化。终于在19世纪爆发了经济危机。自从英国首先发生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就像患有癫痫病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跌进可怕的梦魇中。其中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

经济危机带给人民的不仅是贫困和苦难，而且还有战争和死亡。近代史上很多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发生都有经济危机背景。1929年大萧条直接导致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走向法西斯道路，试图通过军备扩张和对外战争来化解经济危机。而具有民主传统的美国也未能通过新政完全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尽管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很多应变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最终还是通过卷入战争才彻底摆脱大萧条阴影的“纠缠”：“新政留下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引起一些麻烦的新问题。它不曾证实它能在和平时期实现繁荣。迟至1941年，失业人数仍有600万，而且直到战争期间的1943年，失业大军才最后消失。”[1]“美国资本主义，这一资本积累的庞大机构，并不能用‘新政’而重新崛起。只有战争才能完成这一任务。”[2]

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痼疾，曾经把资本主义推到即将崩溃的境地。莱斯特·瑟罗指出：“当1941年12月8日美国参加二战时，实际上地球上只剩下美、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了，而英国已濒临军事失败的边缘。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要么是法西斯国家，要么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的封建殖民地。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30年代的大萧条把资本主义制度带上灭绝的边缘。如今看来好似势不可挡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只要再错几步就会消亡”[3]

---

[1] [美] 威廉·爱·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朱鸿恩、刘绪贻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94页。

[2] [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

[3] [美]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直到今天，当人们回忆爆发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大萧条还是不寒而栗。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不得不由此发生巨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如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与昔日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的话，那么导致这种转变的主要社会背景就是这次大危机。也就是说，它是旧的资本主义从一个辉煌时代走向死亡的标志，也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获得重生的开始。

对于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了详尽的解释。我们从两个体系的视角来分析，目的是想以此为基础深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在风雨飘摇的灭绝边缘中劫后逢生。

前面已经分析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社会，把“恶”既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源泉，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价值体系的建立完全服从动力体系发挥最大功能的需要，无疑动力体系处在状态强势，价值体系则处在状态弱势。由于资本家是为了满足“恶”欲的不断膨胀而进行的理性化商品生产，所以“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1]而对个人利益无限的追求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而是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因此，当生产扩大到在另一个前提下还显得远为不足的程度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2]这种被片面追求市场利润扭曲的生产方式造成了这样的分配结果：资本家手里集聚了大量的商品需要出售来获得预期利润，而工人们却依然保持着贫困，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没有随着生产的扩大而相应的提高，这样，资本主义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越多，产销矛盾就越容易激化，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这就会出现上面列举的奇特的现象。马克思指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3]

“恶”既是私有制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内在发动者，也是私有制社会弊端的制造者，是价值体系功能弱化的元凶，二者统一在同一过程之中。美国的威廉·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28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E. 哈拉尔指出：这一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主要应归功于‘旧资本主义’的巨大威力……大生产的技术成功地战胜了生活的物质需要，以至于这一时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最光辉的成就奖不是伟大的纪念碑或艺术杰作，而是工人、汽车和超级市场——历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称之为‘史诗般的唯物主义’的象征……当然，上述成就的取得并非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工业资本主义的恶劣本性造成大萧条、激烈的工人斗争和野蛮的垄断〔1〕

但是，资本主义不甘心坐以待毙，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冲突，也是为了抵制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开始逐渐进行自我调节，在改革的实践中，客观上“修补”价值体系漏洞，从而平缓了两个体系之间的差距，在垂死的边缘又活了过来。

3. 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将首先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列宁所期盼的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西方世界很快就会出现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发生？斯大林所设想的世界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新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传统解释是：经典作家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可允许的空间中的自我调节能力，没有看到它利用科技发展以及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机会来转移、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手段等等。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既成事实即为理论根据”的解释方式，缺乏说服力。资本主义能够从最初的汹涌澎湃的革命中逃脱，从内部原因说，可以归结为它的自我调节。但是，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实行自我调节？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做出了正确的自我调节？若用两个体系来解释：即认为它得益于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微妙变化而在经济政策上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化价值体系弱势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与强势的动力体系的反差。尽管资本主义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增强了抗击经济危机的袭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伴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深化调整、逐步加强转化价值体系弱势状态的发展过程。

（1）二战以前资本主义进行的自我调整

在确立商品经济初期，资本主义世界一般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当时的经济学

〔1〕〔美〕威廉·E. 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 页。

家们相信，通过市场规律的客观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帮助社会自行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因此，追求"恶"欲的膨胀不仅能够带来经济发展，也会在客观上促进社会和谐。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1]在亚当·斯密看来，唤起利己心，在客观上会满足社会上对利他的需要。自由市场竞争是利用自私自利发展公共福利的。大卫·休谟指出："人民并不一定要受规章和管理机构的约束，而是受他们自身利益的支配——他们的贪婪一定不能得到满足，他们的野心必然超出限度，而他们全部的恶习必定会有利于社会公益。处于牛顿万有引力的观点之内，他们精心想出的主张为：由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种各样的个人利己主义的吸引，能够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和谐。"[2]因此，他们认为干预经济发展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主张经济自由发展。这实际上就是为保持和发挥动力体系功能强势而默许维持价值体系完全处在动力体系支配之下的弱势状态，他们认为市场规律会自动弥补这一缺位。

但遭受经济危机以及工人运动的持续不断的打击后，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明智的企业主认识到市场自动调节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开始强调必须转变发财理念、必须采取积极行动。福特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说："首先我认为，除去其他的一切考虑之外，本公司销路一部分就得取决于我们支付的工资。如果我们分发高工资，那么这笔钱就会被花掉，而且这笔钱还会用来使得其他行业中的商店主、批发商、制造商和工人们更加兴旺，而他们的兴旺还会在我们的销售中反映出来。"[3]这段话以浅显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全新的经营理念：资本家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利益分配上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他们在生产和销售的统一性上同时扮演着不可分割的角色。过分强调利己心，为降低成本而肆意压低工人的工资，直接伤害的是工人，但是在经济系统的产销循环中，反过来也会伤害资本家自己的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新理念，资本主义生产逐步采取了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是提高劳动效率，以确保资本家既得利益。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举措是推广实施科学管理作业（泰罗制）及

[1]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第 1972 年版，第 14 页。
[2] [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1 页。
[3] [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5 页。

装配件作业（福特制）。另一个方面就是适当地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实际上统一在同一个过程之中，那就是高效率的强化劳动伴随着高工资待遇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福特制是一种大规模机械批量生产，降低单位成本的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的一种新模式（通过对一部分工人阶级给予相对的高工资，以及由于大规模生产和实行合理化而大为提高生产率），还是实现因此创造价值的一种新模式（随着大量消费的发展，影响到一部分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接近中产阶层）”[1]这虽然没有改变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但剥削方式却带上了人性化的色彩，不仅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新的繁荣，而且在客观上改善了工人劳动和生活待遇，减缓了价值体系严重弱化的状态。法国的米歇尔·博德在《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论述美国20世纪20年代实现经济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当时还存在着采用1914年以前的办法来剥削部分工人阶级的现象（低工资、管理与辖制的蛮横办法、工厂制与血汗制）；可是也存在着大规模生产、合理组织作业、及在工人中间的某一定部分实行高工资政策，以及因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达到了大量消费的水平。”[2]而在法国，1919年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法律，直接导致了1920年和1921年工人工作日长度的显著缩减。同时，四十小时工作周和每年一周休假仍促使出现另一次缩减。同时，工人的生活也获得改善，“在1930年时，各个不同类型工人的购买力已经比起1914年来提高了14%—50%。”[3]

显然，用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方式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并没有降低剥削程度，而商品产销之间矛盾只能在短期内获得表面上的暂时缓和，从长期来看，这一矛盾反而更容易被激化。因为工人劳动效率和劳动强度提高所带来的商品生产数量的骤增远远大于并快于工人消费能力的提高，所以经济危机仍然发生，并且在1929年出现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这次大萧条显然是片面重视经济发展动力的强劲而忽略或者不够重视社会价值体系正相功能有效发挥的结果。“人们对大萧条的感受，是把它看成是对一个离开正道的国家的发怒的上帝的惩罚。”[4]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这次拯救危机的运动中开始全面派上

[1]〔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203页
[2]〔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3]〔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4]〔美〕威廉·爱·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90页

用场。这不仅表现在政府动用行政权力积极计划、控制、管理、疏导已经被滞缓的经济运行系统，而且还表现在通过立法开始建立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采取积极措施减震由市场经济运行动荡带给人民失业、破产、贫困等困苦，舒缓阶级矛盾，稳定社会局势。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具有代表性的“罗斯福新政”是否属于凯恩斯主义并不重要，关键是美国政府确实是放弃了“无为而治”的传统经济管理理念，而通过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扑灭这场经济危机大火，尽管在这过程中，一直压制某些干预经济自由运行的过激主张。这场持久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经济危机在各个方面都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实施一系列维护劳动人民权利法案，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积极缓和经济发展种价值体系弱势状态。美国新政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

为拯救大萧条中美国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不寻常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劳动和生活境况。例如：实施富有想象力的大规模救济计划并先后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民用工程管理局以及组织实施政府雇工计划，扩大社会公共工程事业，努力缓和社会严重的失业问题等，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稳定社会局势。另外，制定“全国工业复兴法”，缓解劳资矛盾，要求禁止童工、限定周工作小时数、确定最低工资、保证工人自由组织起来和推选自己代表的权利，并建立由联邦政府授权强制执行集体谈判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同时，制定实施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人民抵制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等。

在这些措施中，对于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价值体系弱势状态产生较深远影响的是制定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保障法，首次提出福利保障社会化并由联邦政府承担起责任的主张。当年，罗斯福在一篇国情咨文中说：“对于我国国民生活中不测风云的深谋远虑，要求我们建立起健全的手段，为美国人民提供未来的更长远的经济保障，谁也不能担保我们不再出现萧条的危险。”[1]罗斯福签署的社会保障法奠定了现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基础，开创了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新时期。在当时，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保障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并通过政府福利开支的干预和调整影响经济的发

[1]《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8页。

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法起到了“安全阀”、“调节器”作用。

这些改革措施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从本质来说，新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充当“资本主义的救星”。但是，新政只信奉实用主义，不相信各种终极解决办法。所以，新政制定的一系列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政策是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被迫采取的，其中有很多部分只是应急性措施，经济危机缓和后，很多措施就会被取消或者被变通。例如，当罗斯福“看到民用工程管理局花费太大”，就开始“设法尽可能快地结束这个机构，他担心他是在制造一个永久性的受救济者阶级，也许永远不能把他们从政府的工资名单上清除去。”[1]这对缓解社会经济价值体系弱势状态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

对美国新政的评价反映出二战以前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自我调控的实际影响程度。资本主义采取的积极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反差带来的经济发展波动性，但是，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些坚持民主、自由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积极措施，而一些法西斯国家则走上了全面扩军备战的道路，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扭曲，最终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虽然存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其生产力还未发展到足以从内部摧毁它的地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只能根据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反动、顽固表现来推测资本主义发展到自我生存困境这一地步时的表现，由此做出了比较乐观的推测：“资本主义如果仍然像过去那样发展，就必然要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灭亡。”[2]列宁有机会认识到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措施对于挽救它生存危机的积极效果，并且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中反映出来，但是，他过早的逝世使其没有能够明显表现出来。斯大林则在主观上规避了对资本主义变化的审慎认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这种新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被动式渐进的结果，对资本主义未来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很清晰，不容易进行预测性认识。另外，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政治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这种新变化的客观认识。

---

〔1〕〔美〕威廉·爱·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朱鸿恩、刘绪贻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2页。
〔2〕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二战以后，面对着社会主义强有力的竞争压力，资本主义的调节措施发生了明显变化，福利制开始成为显著标志。

（2）二战以后资本主义进行的深入调整

二战以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历史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依然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但是，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禁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且经济上获得了较快发展，在全球化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对此，学术上的一般解释是：第一，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第二，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相互协调的加强，有利于减缓经济贸易摩擦，协调经济发展。第四，利用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五，利用国际旧经济秩序，进行不平等贸易，掠夺第三世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第六，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刺激”和竞争的推动。第七，利用全球化这个平台，把广大的第三世界作为商品倾销市场、转移经济危机，从而泛化了经济危机的破坏力。

这样分析较为全面，但只是从直接的、表层的原因上说明问题，未能更深入地做出解释。的确，是什么因素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呢？应该说，这些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差不多算是同样的机会，但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够抓住呢？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更深入分析：例如，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机制有利于其根据形势做出相应政策调整，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的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较长期的发展史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经济发展优先性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等等，这些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用两个体系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与它在努力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强势状态同时，继续推进转变价值体系弱势状态改革有重要关联。这一视角可以从经济运行内在功能层面上逻辑推导出缘由出来，而不是仅限于外在的事实论证。

二战后结束后，资本主义曾经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出现了一次“大跃进”。在1948—1970年近四分之一世纪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工业生产为5.6%，商业贸易为7.3%，比以前都高。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增长显然主要不是靠劳动力投入，“而是大大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生产率提高的本身取决于是施加给每一位工人处理的生产资料的增加，这就要求强化各个单

位劳动”[1] 米歇尔·博德在《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写道：总是更多，总是更快，整天地干，整个星期都在干，整年在干，干上好多年。工人作为整体从他们被促使提供的额外产品中得到部分好处。日本在1955年到1975年间人均每小时工资每年递增7.9%，西德在五十年代间每年递增6%，英国在1949年至1971年每年递增2.8%，而美国在1948年至1970年间每小时实际工资每年递增2.5%。在法国1949年至1973年间每周实际工资每年平均增长4%，而在以往最“顺利的”时代（1870年至1895年间及在1920至1930年间）工资每年平均增长2%。[2]

这提高了工人购买力，使很多西方国家很快进入了“消费社会”时代，甚至达到“大量消费”时代。

这实际上形成这样一个良性逻辑链：工人们努力工作，使得社会财富增加，资本家在获得了暴利基础上，提高了工人收入，工人的购买力增加；使得资本家继续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创造更多的财富，工人的收入更加提高，社会购买力更加扩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这样繁荣起来。可见，工人购买力提高与工人的努力劳动提高生产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个前提条件。如果资本家只管压榨工人劳动，扩大再生产而不提高工人的工资扩大社会购买力，就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

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以欧洲为代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为全体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全面担负保障责任的“福利国家”。需要注意的是，西欧是在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全面恢复时期，而不是在1950年至1973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建立起社会福利制度的，这不能不反映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压力作用。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仅是将工人辛勤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较为合乎公正、公平原则的再分配的结果，不仅是资本主义对广大贫苦人民在道义上的妥协和让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它也为促进社会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平稳快速发展作出贡献。显然，由国家担负起保障普通公民免遭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众多风险的责任，是转变价值体系长期存在的

[1]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2]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弱势状态的重大的系统举措。福利制度通过对税收的再分配、通过国有化企业扩大就业率、通过改善工人劳动生活待遇、通过社会全面保险制度等等，促进了社会收入平均化，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消费购买力，极大地缓解了产销矛盾。因此，进一步拉平了与动力体系强势状态的差距，促进了经济平稳发展。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凯恩斯、贝弗里奇等经济学家的“国家干预”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资本主义将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市场缺陷——如需求不足、生产无效率、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而崩溃，同时市场经济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也将会丧失。”[1]尽管这样评价有些夸张，却证明出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从上个世纪70年初到80年代初，西方却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再一次陷入经济危机泥潭中，这是否说明是对两个体系评价原则的否定呢?

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进一步拉平了价值体系状态与动力体系的差距，促进了经济平稳发展，但是，这只是从“标”的层面上获得的进步，但从“本”的层面上二者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很多项目主要靠政府制度化的再分配来体现公平、平等的社会经济价值原则，对于缓解价值体系弱势状态的效用没有有效地融入生产领域中，也就是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没有形成直接有效的“挂钩”机制，而追求充分就业、拉平收入差别、实现社会公平等价值取向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平均主义倾向，这就与动力体系的相互联动关系出现了“空隙”。因为资本主义动力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利己主义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建立普遍的福利制度也是以利己主义为根据的。主要通过税收来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制再分配由生产领域（或其他领域）直接获得的初次分配。如果靠再分配获得效用等于或者大于由劳动获得的初次分配获得的效用，任何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理性选择就是放弃劳动就业，转而依赖社会福利的无偿供给。这样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追求社会公平原则的社会福利制度就会成为基于利己主义的动力体系功能发挥的障碍。当初步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时，不仅会提高劳动者积极性，而且还会促进社会收入平均化，提高社会购买力，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促进动力体系功能强势提高的作用。但是，当福利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利己主义原则会促使事情由良

[1] 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主编：《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性循环走向反面。高福利制度会使很多人主动放弃就业，片面依赖社会福利供给，这样社会发展动力就会受到消极影响，转而造成国家税收减少，这样，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的福利支出就会遇到困难，而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却需要不断增加福利支出，结果，二者的缺口越来越大，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乏力与日俱增，社会福利国家出现了问题。到上个世纪末，受到经济增长乏力的打击，社会福利国家已经出现穷途末路的迹象。德国的克劳斯·科赫指出："作为社会互助的中心支柱的社会福利国家之所以无法得到拯救，是因为它的组织原则瓦解了：几乎所有的僵化状况都产生于由国家保证的互助保险关系。它不能通过一种建立在可靠制度上的组织把社会成员彼此联结在一起。相反它损害了社会互助。"[1]

这说明，运用两个体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实行高福利政策、出现价值体系功能强势，反而造成动力体系功能弱势，经济出现"滞胀"现象。这也说明，任何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现代化道路，任何以纯粹的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现代化道路，从本质上说，是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统一的。只有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普遍实行公有制、由社会组织大生产，集体主义不仅是一个可提倡的道德原则，而且是一个在实际中发挥着直接的调节经济发展的价值原则，劳动不再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通过劳动向社会作贡献成为唯一价值追求的时候，才会真正实现二者的统一。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高福利赐予都不会影响人们劳动的热情，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将在没有限度的条件下正比例递增。

（3）"新资本主义"理念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在1980年至1983年的大衰退中，通货膨胀、失业人数和企业倒闭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而穷人的增加造成排队领取干酪的队伍，竟与大萧条时期排队领粥汤的队伍惊人地相像。但是，正如大萧条曾经迫使美国的旧经济制度向现代化转变一样，这次倒退也形成了一个类似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上的变化，甚至像美国这样崇尚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也逐渐接受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盈利'应该'放宽'或'现代化'，使促进'民主的人类价值'和'企业自由'的西方原则具体化，以便使企业'更有创造力'。"[2]这推动企业行动起来，开始"对公众的利益做出了极大的让步"。许多公司制定了改善劳

〔1〕〔德〕克劳斯·科赫：《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2〕〔美〕威廉·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页。

动条件、改进与消费者的关系和资助地方社区的计划，等等。"在美国，一度至高无上的利润目标和日益重要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正在得到解决，因为进步的公司正在把这两种需要都纳入强大的新公司的使命中。"[1]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带有人性化的经济改革——在企业内部，实行谋求与雇员合作性质的改革。例如：把民主扩大到工人日常生活，使雇员能够参与企业领导；雇员拥有股份，使其收益与企业命运直接挂钩；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在保证正常工作不受影响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雇员活动自由；扩展雇员各项权利，如职务保障、隐私权、公平对待、报酬公平等。在经济体制上，逐步确立起"把右派的自由企业价值观同左派的民主价值观结合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2]，寻求形成合作的企业—政府—劳工关系，建立民主的经济决策机制。这些措施给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带来了良好效果——"在奥地利、西德、瑞典、瑞士和日本这样一些国家，不仅利润和社会福利和谐共存，而且整个经济也最繁荣，社会目标已经和企业一体化，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3]

在《新资本主义》中，威廉·E.哈拉尔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新理念——通过学习社会主义某些成功的经验，建立企业与工人合作途径，把企业目标与社会公共目标统一起来，谋求企业利润与社会福利正相发展，谋求企业中自由所具有的活力与民主所具有的公平的辩证统一，最终"可能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综合成一个更强有力的单一框架。"[4]

当我们从政治层面上大张旗鼓地批判资本主义"趋同论"的时候，应该看到这在经济层面上所具有的客观进步性，至少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步性。这一理念的提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未来发展产生多大影响并不重要，关键是从它提出的背景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的转变——企业利益应该与工人利益统一起来，企业利润应该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才能使资本主义更有能力对付经济危机，走向一个新的未来。

这种新的价值取向比早期的社会福利原则更有意义的地方，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推动利己原则与利他原则的"直接合作"，谋求价值体系在生产领域中获

[1] [美]威廉·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2] [美]威廉·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3] [美]威廉·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4] [美]威廉·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

得改良、寻找实现与动力体系直接统一的途径。西方的福利制度之所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遭遇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只关注生产后的收入的公平性问题，而忽略了强调资本家与工人利益在生产过程中的一致性问题。因此，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收入差别却并没有因此“拉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的鸿沟——工人从政府那里获得帮助不会因此感谢企业主而去努力工作。而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则把政府、社会、企业和工人直接作为一个系统化的利益整体来寻找合作的平台，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吸收了社会主义所坚持的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积极因素，或者说是，淡化了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新资本主义所奉行的价值理念谋求与动力体系实现正相统一获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今天，资本主义在现代化发展上获得的巨大成功，若从其自身寻找原因来看，与这种“新资本主义”理念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是分不开的。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它自身的固有矛盾，从而高枕无忧了——在私有制框架下，这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我们只是从其成功的方面看待问题吸取经验而已。

有一个观点需要厘清。在《新资本主义》里，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正在走向“趋同”，“混合经济的扩大看来正在使两类国家沿着一个共同的道路走向自由企业和民主。”[1]应该说，在客观历史事实中，确实存在过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着这种相互学习的现象，但是，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作者混淆了一些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的是自由、竞争和活力；而社会主义代表的是民主、平等和公平。其实，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自由、活力与民主、平等的有机统一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们不是分属于哪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只能说，哪个社会意识形态在其中某方面发展得更成熟一些，其经验更值得学习。建立在自由企业基础之上吸收社会主义的民主经验，并不意味着两种意识形态自身“趋同”了。或者说，学习西方有效发挥动力体系功能的成功经验，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全盘西化”。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没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经济发展的规律必然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但是，这与意识形态自身的相互关系变化是两回事。事实上，如果不彻底放弃私有制，“新资本主义”是不会自动变成社会主义的。

[1]〔美〕威廉·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

4. 资本主义现代化演变历程的启示

资本主义现代化从蓬勃兴起到陷入困境再到走出困境、劫后复兴，实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回归，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资本主义能够实现这一回归？资本主义能够永恒吗？马克思的预见还能够实现吗？如果不能够，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才会彻底成为历史？如果能够，是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吗？还是资本主义凤凰涅槃，获得新生？它将如何做才能在经济危机的袭扰下不断获得生命力？

在两个体系视野下，资本主义现代化起始于困顿之中，即大致指从15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陷入全面困境的整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以"恶"为动力源，在动力体系处在状态强势情况下，仍旧片面注重发挥动力体系功能，而忽视甚至抑制处在状态弱势的价值体系的功能，造成二者巨大反差。工人遭受的残酷剥削不仅是资本主义道义上的失败，反过来激化了阶级矛盾，工人运动波澜起伏，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以长期压低工人工资并强迫工人努力生产更多的商品为手段来获得既得利益的结果，就是造成社会购买力增长远远落后于商品生产速度从而出现经济危机，最终带来经济发展的巨大困境。这从本质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一定时期表现得如此突出，产生的社会革命风暴如此强烈，经济危机的打击如此震撼，资本主义遭到重创如此沉重，无不反映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确实存在着尖锐的问题，资本主义确实曾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困境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即将失败的判断正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逐渐激化的基本状况做出的，而任何根据当时客观条件的历史预测都可能做出同样的预测结果。

在生死边缘，资本主义是如何开拓出一条生命线出来的呢？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腐朽的另一面——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在合理性基础上的连续不断的追求利润，而不是单纯的贪得无厌。显然，这存在美化资本主义的一面，但是从中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绝不是由一群只顾既得利益的卑鄙、狭隘的贪婪分子驾驭的破旧木帆船。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一直在为资本主义摆脱一个又一个困境绞尽脑汁，使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的忧患中不断得到调整、改革。二战以前具有代

表性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以后西欧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后来转向“新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这些适应时代要求的调整变化在客观上不断强化价值体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了其先天性的弱势状态，拉近了与动力体系强势状态的差距，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宽松的空间，从而增强了抵制经济危机的能力。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轨迹就是这样从困境中逐渐发展过来的，尽管这一过程很曲折。

资本主义能够劫后复活，我们可以归结为现代科技、全球化、知识经济等带来的机会，也可以归结为苏联模式僵化腐败在争霸中迅速衰落带来的运气，还可以归结为通过不平等国际贸易体制剥削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人民、通过建立联盟增强抗击经济危机打击能力等有效手段，但是，从资本主义内部因素来看，得益于它不断同经济危机的对抗所带来的进取精神，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在《新资本主义》中，作者辩证地认为：“危机并不单纯是一种灾难，还是一种激烈加剧的痛苦，是取得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按照这种积极的观点，危机能迫使我们面对事实，看到我们必须克服的局限，而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的创伤则可以引导前进的方向。因此，经济危机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甚至是一种神秘的事件，标志着从濒临死亡的过去向即将诞生的未来的过渡。所以它的特点是‘变化的逆流’，既表现了很大的危险性，又展现出光明的前景。”[1]这反映出，资本主义应付困难的积极态度。面对内部的经济波动和外部的政治竞争，它能够存在下来，甚至获得暂时的“兴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腐朽的另一面存在着谋求应对困难的改革进取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资本主义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自身的痼疾，但却在“治标”上灵活机动，通过钟摆似的经济策略调整，把一次次经济风险化解。二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为了对付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掀起了国有化浪潮，政府利用财政手段积极干预经济，强化宏观计划对市场的规范，推广社会福利制度，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但是这很快造成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失业增多和生产萎缩等严重后果，未能消除经济危机，却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针对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为刺激经济发展活力，转而采用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理论，又掀起私有化浪潮，消减公共福利计划，实行有利于富人和企业的税制改革，制

[1]〔美〕威廉·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定严厉的工会法，打击工会活动等等。这在一等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经济活力，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但是又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于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吸取了前期一"左"一右政策带来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两者兼有的政策，探求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最佳结合的政策方式。这虽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固有的矛盾，而且积累了许多新的矛盾，但却有利于帮助资本主义避免因走极端政策带来的经济巨大波动。对于资本主义政策调整所体现的"钟摆"特点，我们的学术界一般用批评的眼光审视其消极的一面。但是，若从其积极的一面看，如果不能"治本"，只是对应表症下药也是一个次佳选择，因为这至少可以把矛盾暂时缓和下来，维持资本主义有机体正常新陈代谢。如果说，苏联曾经醉心于自己所谓的完美制度而放弃改革的大好机会，顽固坚持僵化的体制导致最后走向崩溃，那么，经常在风雨中胆战心惊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调整中生存下来，成为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竞争的赢家。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并不是"最后的一个人"，"新资本主义"理念也没有实现两个体系的本质上的统一。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在利己主义基础之上，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彻底克服的。要实现两个体系的统一，价值体系必须建立在利他原则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是建立在利己原则基础之上的，而从根本上说，利己价值原则与利他价值原则不可能直接地、完全地调和在一起。如果放弃利己原则，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将失去动力源而运转失灵，如果排斥利他原则，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最终也会把其动力体系卷入泥潭中，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这两难境地。因此，对于两个体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不断地"治标"来得到缓和，但不可能通过"治本"来获得一劳永逸。这一钟摆式的运动过程是它的优点，也反映出它的劣根性。

第三节　两个体系下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苏联模式）的历史演变

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的典型模式，而苏联是其发源地，所以，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问题是认识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的重要窗口。苏联模式是一个集合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形式。在这里，主

要是从经济体制的视角分析苏联模式的成因和得失，而分析到其他方面则只起到辅助作用。回首历史，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苏联模式曾经发挥过非常有效的作用，但是，为什么最终却黯然沉落了呢？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终结吗？

1. 苏联模式的成因：一个分析角度

关于苏联模式的成因，人们从很多方面做了研究，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例如，苏共（布）党组织缺乏民主传统是形成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自然结果；斯大林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及战争逼近这一特殊的国际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有密切联系；与苏联共产党战略构想有关联等等。如果再深入一步，从苏联模式理论渊源来看，我认为，与苏联领导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解读有密切关联。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那里，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依据对当时社会及其矛盾运动的深刻剖析来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的问题，还不是一个直接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他们所追求、宣传的共产主义不是从寻找“本质”开始的，它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共产主义对他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描述有四个特点：一是必然与资本主义弊端有关联。也就是说，他们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弊端“对症下药”的逻辑推定。二是属于价值目标的描述。对任何尚未具备实现条件的或者没有直接实践基础的理想的描述都是价值目标的描述。尽管经典作家也曾强调暴力革命和废除私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和途径，但这只是相对实现社会主义目的性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手段和途径，而它们本身仍属于价值范畴——工具性价值。三是具有简略性、方向性和非确定性。没有充分现实条件为根据的历史预测只能是方向性的原则性预测，而不可能是可提供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方案性预测。列宁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述是谨慎的，只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作过一些“最一般的暗示”[1]对此，恩格斯曾声明说：“我所在的党

[1]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4 页

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四是属于特征性而非本质性描述。对于一个尚未出现的东西，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认识到它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现象出现，是不能够抓住本质的。而没有本质规定的特征认识是理想化的，而不是完全理性化的。也就是说，没有本质认识为基础，对于表现本质的特征认识就不可能是全面立体的、动态发展的和可透视的。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能从价值取向出发做出理想化的预测认识，而这个新生婴儿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生、这个新生婴儿会是什么样子、如何成长、如何才能完全具备起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等等一切认识都是有待进一步认识的盲点。这四个特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依据当时社会发展基本状况，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了理想化的价值性描述。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如何体现出这些特征出来，将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全新探索过程。因为基本国情不同、民族传统不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体现出来的方式和程度就会不同。有些具体特征不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就立即完整地体现出来的，需要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逐渐映现出来。所以，通过制度设计直接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容易出现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现象。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生产关系适当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必要的，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这需要不断地调整，实现与生产力发展的相对协调。而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则追求一劳永逸的制度设计，不能从实际出发，做出相应的调整。其中，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认识就具有代表性。

在苏联领导人当中，列宁在这方面做出了最有创见性的探索。突出表现在他及时纠正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晚年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1]则反映出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务实精神。但是，他对社会主义还没有做出更深入探索，就过早地逝世了。有人通过学理分析，认为新经济政策属于列宁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属于迂回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对他的“社会主义步骤”理论的实证。[2]但是，他曾经指出过新经济政策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途径。列宁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中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而但我们有找到建设这种途径的唯一方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3]

列宁逝世之后，就新经济政策问题，苏联共产党出现三派意见分歧，[4]但分歧焦点只是由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和速度上，而不是对新经济政策在建立、建成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历史定位上。其中，最保守的布哈林一派虽然主张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来恢复和发展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将通过市场竞争会逐渐加强，最终排挤、战胜和改造私人资本，[5]但是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制度，新经济政策只是向真正社会主义的“过渡”，其本身不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其他人的主张，要么把新经济政策仅仅作为恢复经济的权宜之计，要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通过行政措施尽快地结束新经济政策，要么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在国内外不利条件下被迫做出的退却，因此要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就应该迅速结束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才成为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建设的“通病”——因为如果这一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尽可能缩减“过渡阶段”的时间、不尽可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不尽可能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从而尽可能早地享受到美好社会的甘甜雨露？布哈林一派在同斯大林一派

[1] 集中体现在列宁晚年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被人们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和书信中。

[2] 关于新经济政策如何历史定位，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处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也就等于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尝试。但俞良早认为，从列宁本人视角看，新经济政策思想源于“社会主义步骤”理论，它的实践意义仍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参考俞良早：《关于列宁学说的争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3]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4] 有的从党派政治分歧出发，认为是：一派以布哈林为代表，一派以托洛斯基为代表，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有的从党的经济观点分歧出发，认为是：一派以布哈林为代表，一派以拉林为代表（与托洛斯基属于一派），一派以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

[5]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360页。

论战中，虽然揭露出斯大林的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是超越苏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激行为，但始终拿不出足够的理由指出它错误的实质，反而被斯大林一派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理论高度。

斯大林对于苏联模式（有的干脆成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他在推动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绝不是曲高和寡，是得到苏联党的大力支持的，尤其在斯大林的政治地位尚未巩固并受到列宁“政治遗嘱”挑战的历史时期。苏联党为什么会支持斯大林的主张呢？从深层次原因来说，就是因为简单地认为只要建构起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等于建成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从而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斯大林主张着重发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由此形成的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从形式上看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表现。尽管斯大林强调走工业化道路、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实现苏联经济独立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理由都是建立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基础之上。人们对斯大林领导地位的认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主张代表着社会主义理想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了。显然，只要基于这样的认识——只要具备了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略客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而导致实施激进政策，导致建构苏联模式化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特征作为可描述的东西，是可以主观建构起来的。事实上，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路径选择基本上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政治动员来直接构建社会主义特征的。从客观条件来说，只是相对具备了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缺欠就是价值体系处于严重的弱势状态，这不仅造成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受苦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而且反过来造成经济发展的对抗性、波动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性描述主要强调社会公正、公平原则。主张取消商品经济，实行由社会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以此消灭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经济危机、生产力浪费；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促进城乡结合，以此消灭社会贫富差别、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社会公平；取消议会制、由全民普选的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保障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等等。这些主张无疑是围绕价值体系构建展开的。经典作家没有具体阐述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问

题，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动力体系问题上，资本主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而社会主义将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之上的，这一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二是只要构建起强势的价值体系，动力体系会自行发动起来。因为社会越合理，生产力就应该越得到解放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这方面的特别解释，这只是逻辑推导出来的。但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如美国的亨廷顿，认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属于公平优先原则，也就是认为只要实现社会公平，现代化就会健康快速发展起来。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作为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立物以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扬弃的方式诞生的，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肯定的。

苏东剧变以后，国内有很多学者考察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各种劣势因素。例如，落后的生产力、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陈腐的封建残余、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等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优势因素。至少有三个相对优势因素：第一，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种种弊端充分暴露之后建立的，这可以充分借鉴其经验，吸取其教训；第二，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经有了一段历史进程，生产力已经获得长足发展，这能够成为可利用的外部条件；第三，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苏联在最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在列宁领导下，较好地发挥了这三个方面的优势，但是到斯大林之后，主要利用了第三个方面的优势（却没有得到科学利用）。尽管如此，斯大林时期，不仅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而且在当时也是西方国家研究、学习的对象。

不会有人怀疑，斯大林是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原则来建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化、集体农庄、按劳分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一党制等等价值目标的形成和实现，都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相吻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1936 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宣布，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在他的语境中，也就是已经建成了马克思和列宁所指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可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斯大林在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激进方式容易受到揭批，但其建构的最终成果在很长时期内没有人怀疑。因为这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反映，而且曾经在实践中体现出巨大的优势。他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苏联迅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打破了西方的经济封锁，也为战胜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军事工业基础；他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和计划经济体系，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有力的证明就是在西方陷入大萧条的悲惨境地的时候，苏联却

在建构苏联模式过程中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一跃成为工业化强国。如果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苏联模式尚且有苏联"推广"的因素，那么，中国革命胜利后"引进"苏联模式就主要是它的榜样起作用了。

按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形成的苏联模式为什么会失败呢？难道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错了吗？应该说，当斯大林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建构社会主义大厦的时候，实际上也在解构这一科学思想。因为苏联模式只是从形式上达到了貌似的"吻合"，但是，从本质上，却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为了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得到自由发展；二是一切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描述则是服务于这两个基本出发点的。如果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属于"价值目标"，那么，这两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价值目的"，二者构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苏联模式只具备了其中的形式，而忽略了其中的内容。从静态视角看，只要具备了相应的形式，未必就会有相应的内容。而从动态视角看，这里的内容是一个展开的过程，那么，它就会要求形式也应该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但是，苏联模式是通过制度设计来直接建构起完整的"形式"的，这就必然会脱离"内容"的内在要求，以此形成的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必然会偏离原来"内容"规定的路径。而造成这一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建构的顺序发生了偏差。按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生产力是首要因素，满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需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首要目的，而它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则相应存在一个由"必要条件"向"充要条件"转变的过程。按着苏联模式，则是首先建构起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由此直接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在这一基础上再建构动力体系，然后发展生产力。这一偏差使得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成为判定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根据。这样，在实践中，出现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扭曲现象就容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被掩盖起来。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把价值目的放在首位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没有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给予足够的重视……滋长了脱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来谈论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社会主义原则满天飞，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似乎是没有的。"[1]由于苏联共产党对社会

---

[1] 薛汉伟、王建民：《制度设计与变迁：从马克思到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主义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使得在形成苏联模式的实践中，一方面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在给予解构。建构起来的是形式上的价值原则，解构的是其核心价值目的取向，由此形成的是扭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在苏联建立起来的却是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1]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特点。

有人以此为根据，认为苏联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左’倾修正主义”[2]，这值得商榷。应该说，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有“修正”的地方，至少不是对元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兑现”。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异类”！它存在的错误不是根本上的路线错误，而是具体走法上的路径错误。它的得与失，无论如何都与马克思主义休戚相关。苏联曾经把苏联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是不对的，但把苏联模式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也是片面的。从指导思想上、建构的目标上和最终的价值理想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实践路径包容性的科学理论，在实践中，可以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即使那些不成功的实践路径也应该包容在内。这不是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抹黑，也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实际上，实践中错误运用理论导致理论实践上的错误与理论的科学性本身是两码事，前者只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正如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与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一样，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中的路径选择，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性的背叛。这只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份营养，而不是毒药，所以苏联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不会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感到畅快，但也无须宣布马克思主义失败，一条错误路径的旁边还有很多正确的路径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

2. 苏联困境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困境

有人指出，苏联起码错过了三次改革的良好机会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历史原

[1] 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 页。

[2]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于《炎黄春秋》2007 年第 2 期。

因。[1]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斯大林晚年时期。当时，可以借助二战后良好的国际环境和重建的机会推行改革。第二次时机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虽然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存在严重的弊端，主张改革，但改革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最终失败了。第三次时机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这一期间，改革条件已经成熟，改革形势已经十分紧迫，但平庸求稳而体弱多病的勃列日涅夫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机会。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则推行了完全的错误路线，最终葬送了苏联。这里的问题是，苏联为什么会错过改革机会呢？或者更准确地说，苏联也不乏主张改革的领导人，但为什么会失败呢？

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来说，我认为，就是囿于具备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才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不敢从实际出发来突破即成的理论束缚。在斯大林时期，已经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特征都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来规定——社会主义即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即坚持公有制、社会主义即按劳分配等等，那么，对于苏联模式就不可能大动手术，因为这将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挑战。

事实上，在斯大林后期，苏联模式内在弊端就已经在许多方面暴露出来。由于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优先性，工业结构严重失衡。1953年同1940年相比，苏联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产量增长了2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的产量共增长了77%。[2]由于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下，企业被管得过死，造成总体经济效益差，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十分缓慢。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日益下降，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而最严重的是隐藏在工业高速增长背后的农业长期不能恢复到二战以前的水平，农业品供给匮乏，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困苦。到赫鲁晓夫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促使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这导致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探索性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四面出击，飘忽不定，尽管在很多方面做了改进或调整，但收效不佳，而且随着他本人被赶下台，改革进程也就寿终正寝了。有些人从赫鲁晓夫本人的见识、能力和性格方面总结他改革失败的原因，认为这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触及苏联模式本质性弊端。陈新明曾做出这样比较中肯的评价：

---

[1]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94页。
[2] [苏] 波梁斯基：《苏联国民经济史》（下册），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658页。

"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赫鲁晓夫终究未能突破这种影响和束缚。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赫鲁晓夫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性，无法理解赫鲁晓夫个性之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鲁莽、不顾一切的冲劲和犹豫彷徨的痛苦、革新和守旧、对现行模式的批判和留恋等等矛盾。在赫鲁晓夫身上所暴露出的这些矛盾冲突，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矛盾性，这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和典型特征。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时代，但同时这又是一个传统模式的影响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1]

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不能摆脱"传统模式的影响"呢？从深层原因说，就是受制于把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看作为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认识的框架中。但无论如何，赫鲁晓夫改革还是闪现出一道灵光，给苏联进行又一次改革尝试创造了一定条件。"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某些方面开始改变现存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关系，捅开了盖子，搅动了昔日表面似乎平静的一潭死水。"[2]赫鲁晓夫改革留下了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推动了利尔曼建议的大讨论和试验。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在柯西金努力下，将这个试验扩展为新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以扩大企业独立性和主动性为目的，引进"利润"、"经济核算"、"价格"等一些刺激生产积极性的手段，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新气象。但是，在改革与稳定之间的选择中，勃列日涅夫选择了稳定，最终使新经济体制改革"安乐死"。对这次改革的失败，有的归结为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平庸和保守，有的归结为"布拉格之春"事件的刺激，有的归结为苏联领导人普遍存在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思想，有的归结为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作用，有的归结为对当代世界发展缺乏客观认识等等。但是，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原因呢？原因的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溯本求源，还是苏联共产党囿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认识，在思想上始终打不开这一牢笼。站在国际立场上，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我们会不理解苏联为什么会敌视南斯拉夫的改革，为什么会干预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指责这是"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但深入考察其原因，就是由于对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特征关系的认识误区造成的。苏联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改革取向，因为它认为市场经济是与

[1] 陈新明：《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263页。
[2] 陈新明：《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计划经济相悖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否定，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这不仅束缚住了自己，也束缚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最终造成苏东剧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一次扭转苏联经济发展颓势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有学者指出："在斯大林晚年和赫鲁晓夫时期，原有的体制还在发挥积极作用，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比较高，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也有某些欠缺，因此当时错过改革的时机还可以说是有情可原。但勃列日涅夫在形势十分紧迫和条件相当成熟的情况下再次错过改革时机，而且是错过了改革的最后一次良机，这就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了。这样便使苏联社会积累了大量矛盾，形成严重的潜伏危机，从而为苏联的剧变提供了条件。所以，从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来说，勃列日涅夫要负有主要责任。"[1]

在这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虽然也曾想在经济体制上打开缺口，但因阻力过大，转而从改革政治体制入手，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被边缘化，必然会是徒然的努力。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什么以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收场呢？实际上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局限性——要改变苏联的困境，就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等于社会主义，所以改革就是改变社会主义。

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改革开放，也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有突破性的认识，但是我们敢于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用“摸着石子过河”的精神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价值取向来指导实践，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中打圈子，最终突破了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建设路径制约，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新认识。

3. 两个体系视角下苏联模式成败原因分析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模式是苏联迅速强大起来的根据，也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内在原因。对于苏联模式在实践中成败的归因问题，学术界上观点众多。有人指出苏联模式具有功率递减的规律性，这是它造成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虎头蛇尾的主要原因。理由是这种模式动力资源短缺，动力结构不合理，实际上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必然会出现功效递减趋势。但是，为什么在建立之初会有足够的动力能呢？为什么经过发展一定时期之后会出现动力不足呢？如果用两个体系来分析，就会找到答案。

---

[1]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苏联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水平之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对于在一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答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是做了有益的探索，也没有在理论上给出成熟的答案。斯大林则在建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动力体系。这实际上是一个通过价值体系来建构动力体系的过程，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主要表现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总的来说，它属于价值规定。透过苏联模式的特点，可以简单地归结出动力体系的基本框架：以上级的经济计划指标为核心，把行政命令和行政管理作为拉动手段、把政治动员和精神鼓励作为推动手段，把实施全面的福利制度和对个人工作、生活的全面负责为诱导手段，而在集体主义利益至上的约束下，劳动者是站在整个国家利益或者至少是企业、农庄的集体利益基础上来追求利润收益的。这使得动力体系的功能发挥主要靠外部驱动力（行政指挥、榜样促进、宣传鼓励、互相督促、团体协作、集体风气、社会精神面貌等）而不是劳动者自身的内部驱动力来启动。因此，这一动力体系需要一个转化机制——外部驱动力需要转化成内部驱动力才会在每个劳动者中发挥有效作用。这一转化机制就是提高劳动者的觉悟。

1927 年，第一个美国个人代表团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生产的基本动机是希望取得利润。当然，相对地说，这种动机在苏联是不存在的。什么东西代替了它呢？……它能不能成为经常的？"斯大林的回答：由于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资本家的，管理工厂的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他还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作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们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另外，他还强调：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不是用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用来减低工农所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是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最终他的结论是：它们无疑是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动力。而且我国的工业愈发达，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长。[1]

[1]《斯大林全集》（第10卷），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06—108 页。

有人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是片面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能这样脱离历史看问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发展奇迹就是主要靠这种推动力实现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也在局部仿效过这种管理模式，利用过这种推动力。虽然从理论分析上，苏联模式存在中间的转化机制是增加成本和降低效率的。但是，存在大量非生产性的思想动员者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额外成本并不是唯一的后果，它还可以较大地降低经济危机的风险，使经济更加平稳发展。虽然二者在程度上不能对等，但至少说明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不是一百个好，苏联的计划机制不是一百个坏。

但是，为什么这种动力机制会有功率递减的规律性呢？给出的一般解释是：这种模式动力资源短缺，动力结构不合理，不能合理恰当地对整个社会资源实施有效配置，不能有效调节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不能激励社会成员充分发挥才智等等。这种解释是从既定的事实出发，从表征上看问题。这些实际上是造成功率递减规律性的具体表现或者是直接原因，不是本源性原因。苏联模式的动力机制是把个人利益诉求的时空放大了——强调成就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来间接满足个人利益。所以，在现实性上，不把直接的利益诉求作为动力源泉，但对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诉求是存在的。而劳动者的劳动觉悟的提升也主要靠这一实质性根据来实现。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真的能够保证实现斯大林所说的——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和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那么，在其他方面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发生功率递减趋势。但是，苏联模式是做不到的。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求得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来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围困以及应对临近的军事威胁到片面强调军工企业以获得与美国争霸的相对优势，这两个重点目标的转变都以牺牲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为代价。这就使得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由原来美好的理想逐渐变成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从根本上扭曲了当初对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的理解。在斯大林时期，人们“勒紧裤腰带”，发挥生产的积极性，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当苏联开始全面展开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候，人们“勒紧裤腰带”就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社会主义事业”了。苏联人民构建起社会主义特征大厦，但是，在这一大厦中，苏联人民一直生活在理想、信念、奉献之中，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普降的甘霖。一直没有物质利益兑现，鼓舞人们建设热情的精神动力就会打折扣，“大锅饭”所起到的副作用就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功率递减趋势就必然会出现。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存在这一问题。政府利用劳动人们最初的热情创造出来的财富构建一个更长远的建设计划，产出利润总是被高比例地生产投入吞噬掉，宏观经济虽然发展起来，但人民的生活得不到相应地提高，动力体系的转化机制必然会失灵，社会发展动力就会降低，“贫穷的社会主义”现象就会出现。

正因为如此，当苏联建构起强势的价值体系时，它的动力体系的运转是不稳定的。在经济发展顺畅的时候，它的动力体系可以有效发挥功能，而且会产生良性循环；相反，一旦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它的动力体系功能就会受阻，不仅不会帮助克服困难，而且还会产生恶性循环。以对国家或者集体的整体利益的预期作为间接地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为动力基础，就像炒股的预期规则一样：买高不买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越好，人们的整体利益就会越得到保障，个人的预期就会越得到振奋，人们的觉悟就会越高，干劲就会越足；反之，则越差。动力体系所具有的这一特点，使得苏联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高速增长的，但当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加紧扩军备战时，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下来，从此不可逆地迅速递减下去，一直到90年代的负增长。

另外，苏联模式还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动力体系建立在价值体系之上，使得整个动力体系要服务、服从于价值体系的要求，从而失去其自身的规律性和主动性，容易造成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蛮干现象。这也是造成苏联模式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也经常出现类似的蛮干现象。我们归结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穷过渡等等原因。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应该是动力体系受到价值体系的直接规定和控制，不能有效地发挥自身规律性的结果。在当时，发展经济总是要打上政治立场的标签就说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细分析。

4. 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演变历程的教训

苏联模式是基于价值体系的需要来建构动力体系的，所以价值体系处于状态强势，而动力体系处于状态弱势，造成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发展相似的基本问题——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体系存在巨大反差，只是性质相异而已。

苏联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是比较好的。在当时，苏联模式曾经创

造过巨大辉煌，使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在卫国战争中，苏联模式最终发挥了巨大的优势，成为苏联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重要机制保障。二战以后，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医治创伤，发展工业和军事，坚决对抗西方"铁幕"政策，应该说也得益于苏联模式能够集中有限力量干主要事情的特点。在两个体系视角中，对比资本主义来说，苏联模式在最初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得益于价值体系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它不仅给动力体系带来较为公平的分配方式，而且给动力体系带来充足的动力源。如果我们考察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工人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就能够得到证明这一点。陈新明在《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中指出："事实上，30年代正是前所未有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劳动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期。在那个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人往往只有起码的维持生计的必需品，但他们相信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创造者，相信自己的忘我精神不仅对本国的命运、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1]

但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初期的辉煌掩盖了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体制固有矛盾的深刻认识，结果，苏联体制固定成为苏联模式，甚至视作社会主义标准范式并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这就必然会产生体制僵化的刚性倾向。动力体系缺乏充实的物质要素，很容易造成中间转化机制失灵。事实上，外部驱动力中的任何因素，如榜样促进、宣传鼓励、互相督促、团体协作、集体风气、社会精神面貌等，一旦发生问题，都会对中间转化机制也就是劳动者的觉悟产生不利影响。而这种动力体系功能的发挥又存在着炒股票所具有的买高不买低的运动规则，一旦劳动者的觉悟受挫，就会产生连带效应而蔓延开来，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功率递减现象，最终陷入困境。

苏联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改革的努力，但都半途而废。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因为固守"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僵化的理论认识，在着手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时，不敢对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开刀"，使得动力体系的弊病无法得到解除，结果造成改革失败。当苏联沿着一条扭曲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时，其发展轨迹必然会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常轨道。但是，这不是要注定苏联的失败。当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迫

[1] 陈新明：《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近到悬崖边时却可以劫后复活，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入困境时却可以柳暗花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不能东山再起呢？在现实性上，社会历史发展是由实践理性指导的，而不是由理论理性指导的。人的能动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条社会主义路径尝试的失败。

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苏联模式的典型代表，它反映出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路径探索，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但是，这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失败的，也不能反衬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唯一选择。应该说，这两条现代化路径尝试都是有缺欠的。在现代化发展的竞争中，资本主义能够坚持下来不是它“体健无病”，而是得益于它“生于忧患之中”，得益于它的改革进取精神。传统社会主义不能够“逆境扬帆”，不是它“病入膏肓”，而是因为它“僵化于安乐之中”，受损于自负与自欺。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即得益于对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得益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扬弃。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路径探索中遇到困境时，积极向西方学习，大力实施改革开放，开拓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一位苏联学者曾经说过：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共产党曾经嘲讽中国改革是一种“西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先倒向了西方，而中国却依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面包含的道理是值得深思的。

5. 两条现代化发展历程对比分析

通过研究两个体系视野下两条现代化路径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由悲到喜，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兴到亡，这一长一消，对比如此鲜明，确实值得分析、值得反思。当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起时，所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人都会认为社会主义正在战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处在垂死的阶段，它内在的总危机正在摧毁它的生机。但是，当苏联社会主义一夜之间轰然崩溃的时候，所有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又都认为社会主义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资本主义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历史总是与人们开玩笑，30年河东30年河西，两条现代化道路兴衰变化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结局，垂死的资本主义却能够实现中兴，衰退的传统社会主义里

却生长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树苗，看来二者竞争与合作还要进行下去。但是，两条现代化历史演进轨迹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的大回归，到底由谁来主宰？

在起始阶段，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要优越得多。事实上，苏联社会主义初期要比资本主义初期进步得多。如果考虑到二者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即使在时间上直接对比，从1917年到1950年30多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苏联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尽管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不能否认，正是依靠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俄罗斯从一个落后的、腐朽的沙皇帝国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化强国。相反，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现代化却遭遇到生死攸关的考验。从15世纪资本主义产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走到一个危险边缘。面对着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竞争，资本主义现代化日益暴露出衰老的迹象。英国历史学家埃·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指出："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大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而"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是苏联免遭使西方备受折磨的大衰退。"[1]西方很多学者认为，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是推动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因素之一。美国罗斯福曾借鉴苏联实行新政。这个新政曾经被称为"渐进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E. 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2]

正因为经历了1929年的这次生存大危机，资本主义开始转变发展理念，在加强国家控制和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支配下，在为反危机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中和战后重建时所进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运行机制调整中，建构起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缓和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体系与动力体系态势差距，使得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大大减弱了。尽管经济危机依然存在，经济发展的各种弊端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政策摇摆不定，但资本主义现代化还是摇摇晃晃走过来。相反，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传

[1]〔英〕埃·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

[2]〔美〕丹·耶金·约·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页。

统现代化发展却逐渐陷入困境，不能自拔。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的弊端一样，苏联模式也存在着的价值体系与动力体系态势差距的问题，但它主要体现在动力体系中的驱动力系统不稳定，容易产生失灵现象。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导致政治体制的僵化，而僵化的政治体制限制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两个现代化发展状况前后形成了鲜明比照。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在美国的苏美贸易公司登广告招募六千名熟练技工到苏联工作，结果报名应征的竟达十万人，这与苏联解体前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前等待签证的长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胜利，社会主义也没有失败，世界上仍然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竞相发展的局面。只不过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开始出现多样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其中最大亮点。资本主义现代化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也有了新的变化，与历史上的“原资本主义”有了很多不同之处。站在历史高度，对比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历史演进轨迹，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从中轴线视角来看，可以概括出四条经验教训。

第一，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历史规律体现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是宏大的，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把它汇集出来说明问题，否则，在实践世界中，它的碎片承担不起解释社会问题、解释社会发展趋势的根据。社会历史发展在任何时期都存在着“可能性空间”，都会受到人的能动作用中不确定性的强烈地影响。因此，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苏联模式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原则指导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逐渐暴露出各种弊端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由于初期取得显著的经济建设成绩，苏联模式曾一度备受世界关注和学习效仿。不仅相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用，而且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纷纷仿效，学习苏联的“赶超战略”，甚至很多西方国家也来取经，希望找到医治经济危机的良药。张占斌在《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一文中指出：“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希望凭借政府的力量，走一条快捷的工业化道路。因此，苏联的经验就备受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苏联的‘赶超战略’因全国动员和资金密集倾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模式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1]这就使得苏联领导人很容易把这种体制神圣化、

[1] 张占斌：《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模式化，认为找到了一条发展现代化的万能之路而反对作重大调整。这是导致历史上苏联改革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也是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只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矛盾，就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以变应变、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精神。早期的资本主义强调以市场自动调节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在经济危机不断打击下，被迫加大了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力度，逐渐推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由于“福利国家”遭遇经济发展困境，又开始倡导新自由主义；当新自由主义导致一些系列社会问题时，又开始探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企图走出一条兼有国家调控又能发挥私有制动力的中间发展路线。这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变化的道路。正是这种见招拆招的应对办法，使资本主义劫后复活。实践证明，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第二，要有积极的学习精神，现代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既体现着符合本民族特色的具体的历史规律，也体现着符合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的历史规律，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从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是不一样的，都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和劣势；从人类普遍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社会历史发展都存在共性，是可以互通有无的。因此，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能够走过来，还得益于它能够客观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敢于学习、吸收属于社会主义的长处、优点，弥补、完善自己的不足。威廉·E. 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写道：“最近的革命大多数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令人害怕的“极权主义”，不如说看来很吸引人，因为要消除“自由”企业造成的不公平就需要有国家的权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保守的美国人如此一心一意地猛烈攻击共产主义，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分行为使共产主义继续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作为对资本主义的限制的反应，社会主义已经遍及世界许多地方。”[1]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自我反省意识，资本主义才有学习社会主义的举措。盛行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雇员拥有股票计划”在西方曾一度被指控为“社会主义”，但是经济危机迫使企业的管理人员、工人领袖和政治家们去寻找这种既省

[1] [美] 威廉·E. 哈拉尔：《新资本主义》，冯韵文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2—353 页

工又能恢复生产率的有效方法。当时，在经济发展的改革中，很多西方国家并不讳言“社会主义”，实施了很多某种带有社会主义特色或倾向的一些举措。例如：法国倡导“自我管理”、德国的“共同决定”、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业民主”、以色列的吉布茨“工业合作社”等。甚至在政治上，欧洲西方国家也不讳言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直到今天，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仍然强调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重要性。反过来，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是非常欠缺的，政治立场的至上性往往成为在经济上向西方学习的障碍。列宁曾经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粮食税》等著作中特别强调苏维埃的管理者应该向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学习、向西方的企业托拉斯学习。但非常遗憾的是，受到政治观念的限制，继列宁之后，苏联其他重要领导人对于这种学习西方的精神的认识不很充分。斯大林把经济对抗与政治对抗联系起来，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使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经验都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阵营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由于苏联把自己的模式神圣化，在后来的几次改革尝试中，都没有认真向西方学习，而且还用武力禁锢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直至最后发生剧变。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推行极“左”路线的时候，也曾提出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把资本主义一切东西都打上政治烙印而拒之门外。但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突破了“左”倾束缚，实事求是，全面对外开放，谦虚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乃至市场运行机制，最终开拓出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假设当初苏联有这种精神，突破思想上的禁锢，敢于并善于向资本主义学习，那么，它在同美国对抗中，最后的赢家未必是山姆大叔。

第三，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是最后的赢家。在历史发展总趋势中，阶级社会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它必将因完成其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没有阶级矛盾的未来理想社会。而它在动力体系上获得的成就和经验必然要被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所继承和扬弃。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个总趋势是由历史规律客观规定的，是由整个人类的能动作用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定的，因此，没有谁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是最后的赢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功，而始终坚持计划经济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这似乎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取向的现代化道路是最后的赢家。真是这样吗？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基础上、价值取向上和政治

制度上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二者不是同一"战壕"里的市场体制。其次，如果我们姑且不考虑二者的区别性，只考虑其中的统一性，是不是就意味着"市场取向"将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两个体系内在矛盾的最终手段呢？不能这样认为。计划经济所具有的价值体系强势和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动力体系强势都有自己的优点，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个体系内在的平衡问题。今天，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吸收了对立面固有的优势因素的结果，并不是把"计划"彻底放弃了，只不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已。显然，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挥动力体系作用应该具有相对优先性，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这不是解决两个体系矛盾的最终方案。从人类发展的最终趋向来看，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两个体系的内在统一。也就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才是不折不扣地正比例协调发展，而不会出现公平与效率的对抗现象。市场经济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取得任何经济进步都需要或多或少付出代价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中国也不能指望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解决两个体系内在矛盾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发挥社会主义价值功能，把两个体系的内在矛盾性限定在动态的和谐状态之中——这不是要企图彻底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而是运用积极手段化解其于萌生滋长的过程中，避免因其过分积累而激化。我们正在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就在这里。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合我们当下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可以肯定，未来共产主义将不可能建立在今天这种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发展变化的。从人类长远未来发展角度看，市场经济取向不是"最后一个人"，它终究只是一个历史产物。具备社会主义价值功能和市场动力机制双重优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且不是最后的赢家，那么，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更算不得最后一条路了。在同苏联模式竞争中，它是赢家，但不是最后的赢家。一个拉丁美洲的神父的声音倒是充满辩证法的光辉："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然而失败了的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1]

[1] 参见肖枫：《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第四，保持“动态平衡”才是最佳选择。既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做到两个体系始终成正比例协调发展，那么，不断地调整经济发展状态，在动态中维持两个体系相对平衡就是比较符合理性的选择。在这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采取的措施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在长期对抗经济危机的斗争中，始终没有找到使得两个体系正相发展的万能钥匙，总是像跷跷板一样，推动两个体系的功能强势你上我下我上你下运动，经济发展也表现跌宕不定、动荡起伏。究其原因，就是它实行的是被动应付性改革，而不实行主动适应性改革。对于资本主义每一届政府来说，它只承担本届任期内的经济发展责任，因此对于实施短期内即见效的经济改革要远远比进行长期性的根本性改革更有兴趣。当经济发展矛盾尚未突出的时候，积极推行改革很难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大众支持，就意味着会丢失选票。所以，对于政府来说，这是风险博弈，是不划算的。所以，改革的力度往往取决于矛盾激化的程度，对于只有“栽树”的付出而没有“乘凉”的获得，是做不得的，因为下一届政府尚不知晓由哪一个党来执政。从表面上看，西方的一些民选政府确实兢兢业业为民众服务，在很多方面也积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是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过分追求短期收益性的改革使经济政策疲于应付，而不是未雨绸缪，积极谋求两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这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重要区别的地方。要保持两个体系的动态平衡，就需要未雨绸缪，而不是亡羊补牢。社会主义坚持一党执政，可以从长远利益上制定政策，可以保证社会发展战略上的连续性。这就可以从容地实施主动性改革，积极探索两个体系的动态平衡点，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防止经济发生巨大波动性。当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四节 两个体系下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之路

从以上分析中得出，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有保持动态平衡才是最佳选择。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在改革中探索，在探索中改革，努力择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发展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尽管

根据中国国情，做了很多改进，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没能够打破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陷入极“左”误区中，长期得不到改善。痛定思痛，我们的改革就是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入手，也就是从改善动力体系入手。苏联模式中存在着动力体系状态弱势的“软肋”，动力不足是它的致命弊端——形象一点说，就是“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们的改革首要解决的就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问题。对于改革实践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二者之间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渐进式改革是摸着石子过河的。尽管这一历程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成功的

1. 用两个体系考察中国改革合理性

众所周知，中国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通过改革铺就的。只有洞悉中国特色改革的特点，才能使我们能够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层意蕴

（1）从改革动力体系到调整价值体系的波浪式递进

历史规律并不能超越人的能动性之外独立发挥作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会一劳永逸地给人们带来福祉，社会历史发展在任何时期都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存在“可能性空间”，因此，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我们国家的改革是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政治、由具体运行机制到基本体制的逐次深入调整的过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贯穿这一过程的红线。也就是说，我国改革基本上是从调整动力体系，强化动力体系功能入手的，并在此基础上培植新的价值体系因素，使得原来的价值体系顺势发生改变

我们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土地承包直接带来了利益驱动力，使得农业发展的动力体系一下子有效运转起来，农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个体化的经营方式和农产品商业化作为一种新型的价值原则嵌入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价值体系中，农业生产的计划体制下的原有价值体系被撕破了，而且随着改革的深

入发展越撕越大。对于企业改革，我们也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入手，改革重点放在"搞活"上。尽管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值体系，但是，却嵌入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价值取向，使得企业活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人们对"铁饭碗"的认识也发生着变化。对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也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对于体制上的矛盾，我们采用了体制外循环方式，即所谓的"双轨体制"现象。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市场化的产物，既没有政府作财政靠山，也没有向政府承担必要的政策性义务，完全以利润为导向，所以动力十足。新的动力体系因素必然产生新的价值体系因素。"效率"、"利润"、"盈利"、"收益"等市场化的价值取向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分配原则，正在孕育新的价值体系因素。

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的不断推动，双轨体制已经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体制更新趋于成熟。接下来，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建构起以市场为导向的全新的动力体系，使社会经济发展获得新的驱动力。与此同时，因势利导，积极扬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值体系构成，构建新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价值体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双轨体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换——由整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局部市场化导向的状态转换为整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局部保留计划化规范的状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两个体系的基本态势来说，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在这之前，改革是在不断强化动力体系功能态势，来解决动力不足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价值体系状态强势地位；但在这之后，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驱动经济发展，这实际上出现了动力体系状态强势的局面。但是，构建新价值体系、强化价值体系的正确导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体制改革在理论上首先会遭到困境：如果完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公有制"、"集体主义"、"按劳分配"这些社会主义原则怎样糅合进以竞争、利润、收益为动力的市场体制之中呢？如果放弃这些东西，市场经济又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特征呢？显然，在理论上必须有一个对姓"资"姓"社"问题的合理解释，而且，在实践中这些社会主义基本属性与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统一起来更是关键环节。对于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搁置争论，开拓进取，充分体现"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拿破仑语）的勇气。在体制改革

上，可以有两条路径选择：一是首先建立起市场取向的动力体系，然后积极探索构建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价值体系；二是首先建立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价值体系，然后构建市场取向的动力体系。在实践中，我们党选择了前者，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市场化的动力体系，然后积极构建新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价值体系。在具体改革实践中，我们党积极推进市场化的动力体系建设。例如，完全在市场规则的框架内改革国有企业——搞多种形式的股份制，划清产权关系，明确责权利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用立法的形式肯定并规范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并适当扩展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继续活力，等等。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为了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我们积极推动加入WTO，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融入西方主宰的WTO体系中。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进一步推进动力体系强势，我们党承担了这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风险。就是在这一改革实践过程中，在理论认识上也获得了巨大突破，努力为促进市场化的动力体系建设铺平道路。例如，重新定位“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控制力，而不是单纯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根据，这为继续大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把所有制与所有制表现形式区分开，为公有制企业改革顺应市场化需要引进股份制开绿灯。同时，一方面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肯定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这种新的分配原则由于体现出分配形式的多样性，显然有助于发挥市场化的利益驱动力作用。

但是，当我们党为满足改革动力体系需要而相应调整价值体系的时候，改革价值体系也不是一个完全被动地应付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应变的过程。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越来越受到党的关注而被放到重要地位。

在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发展路径中，价值体系属于状态强势，动力体系要服从、服务于价值体系的需要。“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等等这些口号都是两个体系关系在极端政治化环境中的反映。但是，透过这些突出价值导向的政治化的面纱背后，也包含着这样一些反映高尚精神境界的价值原则：无私奉献、集体主义、社会利益至上、为人民服务、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艰苦奋斗、自我牺牲、造福子孙后代等等。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是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引导社会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一支不可

替代的动力。但是，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在人们的现有觉悟状况中，它们只能是对少数先进者提出的可操作要求，而对一般民众则只应是可提倡的道德操守，而不应该成为促进生产的核心动力源。把这些直接作为动力源，并以劳动者的觉悟为动力转化机制，在实践过程中，是很容易失灵的。若片面施加政治高压，这种失灵就会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吃大锅饭”中的“出工不出力”、“干活不下力”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

我们的改革从强化动力体系出发，系统地纠正这种扭曲现象，努力提高生产积极性，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我们判断改革是否成功，也是从这一视角来看的。但是，相应形成的价值取向被“强行嵌入”到原来的价值体系之中，是否已经融合起来呢？实事求是地说，融合的交汇区域是不稳定的，而且随着新的价值原则的形成和强化，原来的价值体系得到的持续的冲击和弱化，二者的强弱态势不断发生着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一变化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利于转化动力体系弱势状态，打破原来价值体系状态强势对动力体系功能的“束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新生的价值原则正在建构起崭新的价值体系，而原来的价值体系已经被“冲击散碎”了。正如新生的价值体系并非一切都好一样，原来的价值体系也不是一切都坏，如果我们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就不对了。我们仍然需要原来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只不过在新的动力体系运转系统中，应该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中。否则，我们的改革就真的为获得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动力功能优势而丢失掉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价值功能优势，也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刚好就是以失去的为代价，反过来，就等于重复着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努力避免的社会弊端。我们改革还是成功的吗？

因此，积极建构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新价值体系是我们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特别强调：“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但是，在具体改革中如何正确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呢？如果像苏联前中期改革那样，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束缚，改革就会半途而废；如果像苏联晚期改革那样，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要求建构价值体系，改革就会滑入资本主义。我们党在这方面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保证了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1987年，当调整动力体系已经初见成效，原有的价值体系已经被嵌入许多新的价值取向时，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本身不具有新价值体系的内容，但它为建构新价值体系提供了理论根据。正因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所以，我们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帮助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而不是走同步富裕道路（这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由于伤害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只能是同步贫穷）。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价值体系，这些是与发挥动力体系强势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因素，因为它们把生产效率放在了优先地位。在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了又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原则。在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规定着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属于工具性价值原则取向，"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属于目的性价值原则取向。二者的有机结合，表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构具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性，是一个伴随着动力体系发展而逐步完善、逐步发展的过程。这就从内质上提升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作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表层认识，由此确立的新的价值体系则解脱了传统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认识的理论束缚，为强化动力体系改革实践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不仅对动力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价值体系也提出新的要求。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谋求全面发展的新理念，使得社会发展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获得有机统一，为改革深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则为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确立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使之找到了一个理论平台。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新的动力体系已经发挥着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还不能说新的价值体系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因为原有的价值体系精华部分如何构成新价值体系的基础，还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张宇在《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一文中指出：“就中国的改革经验来说，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能否把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稳定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形成的”。[1]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就是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当它在经济领域中体现出来时，不仅是一种实质性的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体系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就是指社会主义一系列价值原则、价值观念渗透到经济运行的机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而这一过程就是新价值体系形成的过程。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正因为存在这一难题，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才是社会主义优点的体现。

（2）对社会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扬弃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预测，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实行全社会占有；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计划来调节；商品货币关系不复存在，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不再通过货币这种曲折形式，而是直接凭借某种“凭证”按劳分配；等等。而苏联模式就是以这些为目标建构起来的，尽管由于实际需要，在很多方面不能具体达到这些目标，但这只是发展程度问题，目标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中国要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走新型的现代化之路，就需要对社会主义原有体制进行根本性大调整，就需要引进、吸收资本主义一些先进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就会必然触及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等于社会主义”这一传统理论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没有纠缠在单纯的理论争论中，而是主张从实际出

〔1〕张宇：《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发，在改革实践中去寻找答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经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我们党是在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单纯从理论视角上看，容易被看成一句套话，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它成为指导我们党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局限性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思想基础。我们的改革没有像苏联那样囿于理论的框框中，半途而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得益于确立起这一条思想路线。

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很多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举措都是对原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弱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集体所有制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获得自主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繁荣起来，所有制经济出现成分多样化；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大量外资企业，这对"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提出新的课题；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发展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受到冲击；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原则受到挑战……如果按着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来看，我们的改革与其说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说淡化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从表面上，这的确是一个渐进"解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过程。我们的改革实际走向与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目标取向似乎存在微妙的南辕北辙的现象。新型现代化之路还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很容易使人产生怀疑。邓小平就曾指出："世界上对我们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2]但是，表面上解构的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本质上的建构过程。邓小平曾经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改革开放所解构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原则，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错误认识的纠正。新中国是按着苏联模式建构起社会主义基本体制的，由此通过制度设计直接形成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系由于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根据，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这对科学社会主义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思想建构过程中，也包含着对其核心价值目的的解构。建构是外在的，解构是内在的。我们要走的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则是一个通过改革开放系统纠正这一历史错误的实践过程。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看，我们实际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只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在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时候，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不应该立即完全体现出来，其中很多方面需要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长期显现的过程。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构"原来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正是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追求稳妥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生产关系过程。由此建立起来的新型的现代化之路，实际上是真正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确立两个目标：一个是发展生产力；一个是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统领社会主义具体特征的两个本质性规定，是最基本的特征，它们也正是两个体系的具体反映。追求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对动力体系的核心目标的追求；实现共同富裕，则是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核心目标取向。二者的统一，也就是两个体系的统一，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是从这一角度，说明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们走上新型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使科学社会主义打上中国化烙印后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过程。

今天，我们看不到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社会主义，相反，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全新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所建构的不是社会主义空架子，而是它的实在内容。当然，也许会有人抱怨说，改革造成了贫富分化、贪污腐化、道德堕落、环境污染等等，这些在改革以前是少有的。是不是说明中国在改革中走上了一个错误的现代化道路呢？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的具体过程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取向出了问题。因此，不是抱怨该不该改革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推动改革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1]我们党勇于从实践出发，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调整发展理念，寻找解决困境的突破口，始终保持着改革开放大路畅通无阻。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2. 中国改革克服困境的关键：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理念

在现实社会，历史轨迹在“可能性空间”中的可变性取决于实践理性的发挥程度，没有一条既定的改革线路能够解决在改革实践中遇到的所有困难。“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因此，“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的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1]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我们党的告诫。实际上，我们的改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克服困难、推动改革不断胜利前进的秘诀。

（1）从改革实践出发，用新的发展理念解决新的问题

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社会未来发展趋势，是一个顺畅的坦途还是一个曲折的小道，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著作现成的理论规定的，也不是由历史规律预设的，而是我们主观努力的结果。当我们党下决心进行彻底改革时起，就开始了以变应变、以新促变的历程。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为此，他在《北京共识》中展示所谓“中国模式”的三个定理之首就是：“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地变化和更多地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为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党在改革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发展理念，引领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矛盾和困难，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理念，不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境界。

在改革起步及全面展开阶段，邓小平提出来一个朴实而又深刻的发展理念：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体悟、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真切认识，也是基于我国具体国情、从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出发提出来的。这一理念为中国改革的兴起、展开和转进划出了一条中心线，成为引领改革胜利前进的指南针。从《邓小平文选》中，能够明显地体会到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感悟，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的倾情关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期，与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67页。

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谋求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于中国，发展问题迫在眉睫，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促进改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归结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充分体现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反映时代要求的科学理念。

在改革起步期，倡导解放思想——启动改革。要实施改革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解放党和人民长期被“左”倾教条主义禁锢的思想。在当时，“左”倾思想还相当严重，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原有的价值体系还牢牢地规范、制约着动力体系。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思想上打开原有价值体系的缺口，为启动改革动力体系创造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那个时代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在改革起步期，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两个体系来分析，就是要求原来的价值体系应该为改革动力体系让路，把搞活经济，促进发展放在第一位。

在改革展开期，倡导放开手脚——推动改革。中国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但是，改革本身也需要动力。这不仅来自“左”倾思想的障碍，还是由于改革自身的所具有的困难属性。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必然会涉及利益调整问题，因此存在阻力是必然的事情。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越过这一障碍。中国能够坚定地走过来，邓小平功不可没。邓小平作为改革设计者，深刻认识到改革是有风险的，恰似一场吉凶未卜的革命，但中国的发展客观要求必须改革，要求我们党必须承担这一风险。一方面，邓小平倡导我们党改革思想要放得开，看得远，“不仅要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2]，要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鼓励我们党要不断推动改革全面展开、深入展开，要走出一条新路子。另一方面，他还告诫我们党改革不能偏离正确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这说明，邓小平首先强调应该努力推进改革，解决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注重改革的政治方向问题，在价值体系调整方面不要滑向西方。

在改革转型期，倡导放开观念——导引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改革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双轨并存的局面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必须做出抉择。苏东剧变，以及国内出现的暂时政治波动使很多人“左”倾思想兴盛起来。这为我们体制转轨改革造成了很大阻力。以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倡导放开观念，积极导引改革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道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改革向市场化转进打开了思想之门。在这一改革关键时期，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突出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原有的价值体系应该为调整动力体系让路，改革不能裹步不前，促进发展才是中心要点。

纵览邓小平对中国改革作出的贡献，我们发现，他实际上抓住了改革的两条脉络：一条是“促进发展”，另一条是“规范发展”。前者即通过改革，谋求怎样促进经济、政治发展。这是主线，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后者即要求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这是辅助线，体现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的科学性、实践性。在当时，尽快发展起来，追求发展量的扩张，是当务之急，是改革重中之重。邓小平扣准了这一主要矛盾，在两点论中抓重点，在“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探索中，强调“只有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使得中国改革破冰起航，十年不顿。

邓小平为市场取向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走下去，这一历史重担落在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仍然是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继续促进发展问题，一个是如何保障在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框架下健康发展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了十余年改革带来的高速发展的基础，尽管继续强调发展速度仍为重要，但强调发展质量问题已经凸现出来。后一个问题，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首先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在市场价值观念中不迷失方向，则是当务之急。正是凝结这两点客观需要，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理念。“三个代表”既对党和人民适应市场改革时代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提出了政治要求，也对发展的质的问题、发展的全面性和目的性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应该说，首要的是对发展的质的要求——不仅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追求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新的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在中国改革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转进时期，倡导与时俱进——拓新改革。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活力的发展模式，而竞争是以商品的质量为保证。参与全球化竞争，如果民族经济没有质的全面提升，就会有被外国竞争挤垮的危险。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国民经济发展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1]如果说邓小平度势未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则审时世界，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有力回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号角，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另外，我们党还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和顺应世界潮流，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两大发展战略为我们实现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轨、全面提高发展的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六大则提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实现产业升级，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质量迈上一个新台阶。

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深化时期，倡导创新精神——助力改革。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与市场机制如何做到兼容共进，仍是一个未解的重大课题。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需要全面调整，但新的适应市场取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有待发展完善。为了使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的实践探索中，"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不被传统思想束缚住手脚，江泽民大力宣扬"创新精神"。他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1 页。

推向前进"[1]他要求首先要实现理论创新，并由此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从而为改革不断注入活力。正是在创新精神的鼓舞下，才有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革等措施先后出台，对国企改革实践才有决定性进展，而在所有制、分配制度等基本理论方面才有重大突破。但江泽民告诫全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2]

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过程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建设。要保证市场取向改革不偏离正确方向，首先要保证党的领导不腐化变质、不动摇变色。加强党的建设，是江泽民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重大举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搞好全面发展，在物质文明上，要追求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精神文明上，要追求先进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保证把人民创造的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自己来享有。可以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对党既提出了动力体系方面的要求，又提出了价值体系方面的要求，实现了二者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动态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旨在告诫全党，既要谋求发展，又要清楚为谁发展，谁才有资格享受发展的成果，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方向。

适应改革实际需要，江泽民所强调的改革取向仍具有强化动力体系功能的优先性，但是，强调发挥价值体系功能的必要性显著加强，尤其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成为与谋求社会发展同样重要的举措。在21世纪之初，我们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地实现了体制转轨，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我们的人民富裕起来。但在发展中积累的社会问题也多起来——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收入差别加剧问题、环境问题、原材料和能源短缺问题等等成为困扰继续健康持续发展的难题。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带来发展的强大动力，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原来积累下来的发展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改革就有可能陷入困境，甚至失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59—660页。

[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0页。

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理念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把发展指导思想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中国改革历程中，起到了继往开来作用。

在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倡导求真务实——推进改革。根据中国改革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结合中国发展的新形势，胡锦涛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江泽民时期，谋求发展，是侧重质的方面的提升；胡锦涛时期，谋求发展，则是侧重度的方面的升华，即发展应该是统筹的、协调的、全面的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第一次把发展的目的性放在首位——强调发展应该“以人为本”，这实际上是把强化价值体系功能放在了优先性。在此基础上，才强调发展本身——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对发挥动力体系功能的系统化要求。为什么在新的世纪之初，我们党的发展理念开始转向强化价值体系功能？一般的解释是：就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按着国际发展经验，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以后，将是一个问题爆发期，发展将是一个转折点，要么像亚洲四小龙那样加速发展，要么像拉美一些国家那样徘徊不进，即所谓的“拉美陷阱”。造成“拉美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贫富差别严重，无法顺利实现产业升级。而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6以上，远远高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值0.35，也超过国际0.4的警戒线，进入收入差距较大时期。如果再不重视发展中人的因素，就将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由于过分强调发展的动力，片面追求高速发展，见物不见人，出现贫富加剧，从而限制了社会购买力的相应提升，造成经济危机，反过来影响发展自身顺利进行。以两个体系角度来分析。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之前，虽然新的价值体系因素完全为适应强化动力体系功能改革需要而建立的，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价值体系状态强势地位，尽管在分配原则上产生一些困扰，但由价值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并不突出。然而，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之后，出现了动力体系状态强势局面，由价值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当然，这也是一个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转折期。正如胡锦涛说的：“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能不能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考验。”[1]因此，落实科学

[1] 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发展观，倡导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绝不是要被动地解决问题，而是要积极地抓住机遇，促进发展。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功能提出更高要求——发展不仅要高速度、高质量，而且是统筹协调发展，要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要把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走全方位的发展之路。

由此观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历程中，我们党不墨守成规，坚持实事求是，继承前人又开拓进取，不断根据形势变化，根据出现的新问题，调整发展理念，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体系动态平衡，保证了改革成功地持续推进，深入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创新性发展的实证。如果邓小平时期，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发展虽然重视质的问题，但更侧重量的扩张，那么，到江泽民时期，从市场运行机制出发，发展虽然仍然强调量的扩张，但侧重点则是质的提高。而到胡锦涛时期，谋求发展，则是侧重度的升华，即发展应该"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全面和可持续。这分别是从量、质和度上对发展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

（2）"双和"理念——追求"动态平衡"的价值体现

以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标志，强化价值体系功能被放到优先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赋予其社会主义基本属性，而且表现在对于如何发展本身也赋予了价值体系的直接规定——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则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价值体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在学术界，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关系，存在着是前者统领后者还是后者统领前者的争论。用两个体系来分析，我认为，二者既内在统一，又相互区别。首先，二者都强调了发展与价值取向的统一性——要追求科学发展，就必须实现社会和谐，要追求社会和谐，就必须实现科学发展。可以说，没有和谐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没有科学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和谐，二者统一在社会主义这一平台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贯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才能顺畅。从这一角度看，两个理论都包含着"和谐"与"发展"这两个范畴，因此，"和谐发展"是贯穿二者的一条红线。同时，二者又有各自的核心点——科学发展观尽管把强化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功能放到优先地位，但这是建立在动力体系状态强势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在动力体系框架下强调发展的属人性、发展的协调性、全面性、统筹性，也就是发展的和谐

性；相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是在价值体系框下体现着追求发展的属人性与和谐性。前者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后者蕴含着和谐的发展性。正因为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可以说二者具有相互包含的属性；又因为二者有各自的侧重点，又不能简单地把一方归结到另一方。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学术界上的争论是把单一方的概念外延扩大了。

在改革的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了对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共建和谐世界，构建起“双和”理念，进一步深化了“和谐”思想。提出“双和”理念，绝不是为了政治动员而提出来的抽象的口号，它深深植根于时代挑战和实践的土壤中，是为应对国内国际现实问题而来。它是孕育于时代挑战的背景之中，是对挑战进行主动回应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党以往提出来的诸理念，都把“发展”放在核心地位。虽然里面也都包含着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规定，但是谋求发展是核心要点。“双和”理念第一次把“和谐”放在核心地位。虽然里面也体现出“发展”的必然性，但是谋求和谐的价值理念是核心要点。实现这一转变不是偶然。当我们实现市场取向的改革之后，动力体系逐渐获得了状态强势，由此导致的发展问题凸现出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但是，对于如何建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需要新的理念来指导。另外，我们当下正处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给世界发展带来很多全球性问题，而某些对中国有敌视的舆论针对中国的发展壮大也鼓噪不停，这也需要我们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出发，提出新的价值理念来回应。“双和”理念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双和”理念的提出为我们找到解决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与市场机制相互融合的钥匙——首先，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状态，是对理想社会整个社会状态的总概括。实现共产主义，从社会发展状态来看，就是实现了高度和谐的社会发展状态。我们所说的实现共产主义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和共产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基本特征，可以说都是为达到这一社会发展状态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表现。立足当前世界发展状态，我们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理念实际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延伸和扩大，是向世界树立、扩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种表现。二者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双和”理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的总概括。以此为基础建构社会经济发展价值体系必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体系。其次，“双和”理念是建立在对发展的规定基础上的。发展是需要竞争为驱动力的，但竞争不一定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竞争是以和谐为基础的，是反对资本主义残酷的、破坏性的竞争性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展是和谐的发展，是为着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的发展，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双和”理念就为建构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提供了相互契合的理论平台。也就是说，以“双和”理念为框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值体系既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又是满足市场机制下动力体系需要的，是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钥匙。

这里所说的“和谐”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一个长期构建过程的目标追求。所以，在构建过程中，不和谐现象总是要出现的，正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体系和动力体系总会出现不协调的状态。但是，就像大海的涨潮，总是在一涨一落的交替中慢慢攀涨起来一样，只要确立起“双和”这一目标导向，通过党和人民的努力，和谐因子总会不断积累，和谐成分总会不断增多，而不和谐现象出现的次数和程度总会不断减小，那么，和谐目标总会不断趋近。所以说，“双和”理念提出，是追求实现价值体系和动力体系“动态平衡”的体现，为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寻找两个体系动态平衡点提供了价值标尺——在经济动态发展中，两个体系的平衡状态就是趋向社会和谐发展状态，也就是趋近理想化的发展状态。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成功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希望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新型的现代化道路。本着追求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希冀在公平、平等、民主等价值原则基础上，走出一条赋予人性化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盘根错节，消灭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在经济关系上具有平等性的基础上起步的，从客观上说，这个起点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这不仅体现在符合人性道德价值原则，就是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也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时和中国大陆相类似的台湾地区、韩国也是在土地改革、削弱地主阶级势力基础上顺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台湾学者萧新煌在《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

探索》一文中指出："在台湾和南朝鲜如果没有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从而大大地削弱地主阶级潜在的反对工业化的力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许不能以如此组织良好的方式来动员各种资源以求得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1]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在最初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时，虽然也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然而，最初的发展顺畅却没有迎来持续的高歌猛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在这些事件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在谋求经济的发展，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也是紧随阶级斗争之后的目标追求，但为什么却逐渐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呢？除去政治运动造成的消极影响之外，从客观的经济因素寻找原因，一般的解释是由于种种错误的做法严重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的。其实这是从最终的结果上看问题。如果对比实行改革开放来总结历史经验，这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而苏联模式存在功能递减现象（在探讨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已经分析其原因）。但若是从历史过程上看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最初阶段都曾唤起人民冲天的热情，尤其是"大跃进"，人民的劳动热情非常充分。但是，为什么没有获得预期生产效果呢？理论界归结为不遵守经济发展规律，实行蛮干。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蛮干现象呢？理论界或者史学界归结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层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制定高指标结果。这在逻辑上有个误区，似乎党的领导层头脑发热是掀起群众蛮干的原因，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因果关系。其实，各地方的"放卫星"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或者说是强化领导层头脑发热的原因，这里面存在互动的性质。而这种互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苏联模式以价值体系为根据来建构动力体系，造成动力体系直接服从、服务于价值体系需要，而价值体系又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为标志、以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为根据、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为内涵的集合体，使得动力体系的运转受到政治性目标的直接干预而失去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导致蛮干现象。在苏联模式中，动力体系要通过提高人们的劳动觉悟这一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疑通过政治思想动员来提

[1] 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载谢立中、孙立平编：《20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47—1048页。

高人们的劳动觉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把政治思想动员活动限定在民主的说服教育范围内，它要想使人民的劳动觉悟获得提高就必须体现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来，但是若直接服从于政治化的目标规定，就无须考虑客观规律了。被政治严重扭曲的生产指导行为就会把人民劳动生产的热情演变成"浮夸风"、"共产风"、"大呼隆"等蛮干的现象，这反过来又影响到领导层的理性决策，从而达到荒唐地步，自然就不会得到预期的生产成果，最终还会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他（指毛泽东，作者注）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大致时间应该在1958年（包括1958年本年）到1977年之间的二十年，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曲折中探索。邓小平评价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

但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通过改革，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光明的前途，从此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若以两个体系来评价，主要应归结为两点理由：第一，针对传统现代化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改革，优先调整动力体系，成功地解决了动力不足问题，调动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二，在顺势推动新价值体系建构中，保证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性和原则性，努力注入社会主义价值新鲜血液，使渐进式改革具有稳定的政治导向，防止出现政治动荡和方向偏差，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当然，改革之路不是一个平坦的大道，崎岖与障碍同在，危险与困境同行。中国改革还面临许多困难亟待解决。但是，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国改革就是在解决问题中取得巨大发展业绩的。因此，中国也必将在问题中开辟出路，在解决问题中发现机遇，取得新的成就。

对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轨迹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简单获得这样的启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相反，如果我们通过改革体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现出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么，社会主义没有失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前进而向世界扩散开。

第五节　全球化视野下的对比分析

对于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优劣这个传统问题，应该如何回答呢？两个体系可以看作两个坐标轴，它们构成一个坐标系。其中，动力体系是横向坐标轴，指明社会发展速度，价值体系是纵向坐标轴，指明社会发展的平稳状态。显然，如果两个体系都是强势，社会发展又好又快，反之，要么快而波动大，要么平稳却迟缓，要么波动而缓慢，总之，都是有缺欠的发展状态。而历史发展轨迹就是在这个坐标系中得到衡量、得到对比。透过它，可以获得昨日得失缘由，借助它，也可以看清未来发展之道路。

1. 到底孰优孰劣：一个辩证性回答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两个体系组成的坐标系中，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演变成三条路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曾经陷入劫难之中，但却劫后复活，坚持下来；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却渐入困境，最后出现苏东剧变现象；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也曾陷入泥潭之中，但是，通过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最终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之路在竞争与合作中并存、发展。那么，二者到底孰优孰劣？

在资本主义社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动力体系的核心驱动力，价值体系则完全服从服务于这一动力要求。表面上看，二者是一致的，人们都是为着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但是，在纯粹的私有制的平台上的，对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们来说，二者是对立的——他们创造财富却不直接占有财富，而他们的收入却成了资本家成本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让工人们生产更多的商品并获得尽可能少的工资就是资本家的理性生产法则。这就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出现严重缺欠，与动力体系之间出现矛盾。因为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的工人们的收入是社会购买力的主要因素，当资本家为了获得最大化利益而拼命扩张商品生产时，社会购买力却得不到消费主力军的有力支持，生产相对过剩现象就出现

了，经济危机就发生了。所以，私有制是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挥之不去的梦魇。

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濒临绝境时能够劫后复活呢？而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道路却行不通呢？中国有句古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资本主义经常受到经济危机的袭扰，迫使它不得不通过改革具体制度、调整政策来对付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不是主观上着意，但在客观上却不断弥补由于忽视价值体系作用造成的缺陷。通过立法推行一系列福利制度，并通过全球化途径依靠剥削其他民族国家获得的财富来改善本国劳动人民的工作生活条件，缓和阶级矛盾，缓和经济危机的破坏幅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空间。

然而，片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全面改善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滞胀现象？这也根源于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来说，因为私有制把生产和分配直接分隔开，使动力体系与价值体系之间在生产领域中存在天然的对立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家生产。若通过依靠科技发展、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来相对改善工人的工作状况、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无疑会缓和两个体系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性。但是，高福利制度中的很多成分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的，由于没有涉及生产领域，分配的公平化趋势就不会正相促进生产的高效化，而且相反。因为过分追求分配领域中的平均化就使得工人感觉到劳动效用变小了，就业的热情就会降低、劳动的积极性就会下降，动力体系运转就会出现低效化。最终使社会经济发展陷入滞胀困境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个体系是不可能达到永久正相发展的和谐状态的，只能追求二者的动态平衡。显然，资本主义做到了这一点。从古典经济学追求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到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再到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钟摆式经济策略调整，就是在摆脱发展困境的摸索中，客观上追求两个体系动态平衡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弊端的反映，也是它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

但是，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道路为什么会最终导致苏东剧变？

苏联模式是以价值体系为根据来建构动力体系的，使得整个动力体系的运转

不是首先从自身规律出发，而是要服务、服从于价值体系的目标要求。但是，价值体系又不是完全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的出发，而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为基础，从具体的、形式上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出发来建构，因此，政治化的目标规定必然通过价值体系而干预到动力体系之中。这不仅容易造成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蛮干现象，而且这种动力体系也容易出现功率递减现象。苏联模式的动力体系功能发挥主要靠外部驱动力来启动，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这一个转化机制来启动生产的内驱动力。由于是以对国家或者集体的整体利益的预期作为间接地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基础，这种动力体系的动力源供给是不稳定的。在经济发展顺畅的时候，它的动力体系可以有效发挥功能，而且会产生良性循环；相反，一旦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它的动力体系功能就会受阻，不仅不会帮助克服困难，而且还会产生恶性循环。这种动力机制是把个人利益诉求的时空放大了——强调成就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来间接满足个人利益，而劳动者的劳动觉悟的提升也主要靠这一实质性根据来实现。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真的能够保证劳动收益直接用来进一步扩大生产和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那么，在其他方面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发生功率递减趋势。但是，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优先发展重工业，人民的个人直接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这就必然会挫伤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出现生产功率递减趋势。继而，苏联改革又走了两个极端：在赫鲁晓夫和波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限定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不能自拔，结果铩羽而归。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则慌乱了阵脚，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搞全盘私有化改革，结果也失败了。在调整动力体系方面，苏联没有解决动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在调整价值体系方面，又放弃了原则，结果就出现了邯郸学步似的后果。

但是，苏联会在改革中崩溃，而中国却为什么会在改革中取得成功？中国改革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作为切入点进行的。因此，强化动力体系功能是我们改革的着力点和核心点。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可以说，我们的改革既跳出社会主义框架又坚持社会主义框架。首先，为了解决动力不足问题，积极学习西方成功的经验，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把发展经济放在突出位置。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很大的

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1]我们改革从搞活放权到体制改革，中心问题始终是发展经济。所以，调整动力体系，强化动力体系功能始终具有优先性，直至建立动力体系状态强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跳出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框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被教条思想束缚住手脚。但是在建构与动力体系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过程中，我们又坚持社会主义框架，没有走邪路。我们建构的新的价值体系，实际上贯彻两个原则：一个是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融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另一个是直接体现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具体形式上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原因就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有社会发展水平与我们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尚有一段差距。现有社会发展水平要求必须存在一定收入差距下发展才有效率，但是我们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要求必须在没有贫富差别下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二者需要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是动态的，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动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平衡点越远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反之，则越靠近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我们在改革中，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发展理念，克服困难，实际上就是在动态中探索这一平衡点的过程。在改革初期，为了推动改革发展，我们倡导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强调直接体现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当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时，我们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体制改革初期，为了克服思想观念阻力，我们通过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认识、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通过确立“三个有利于”判定标准和倡导实施台阶式发展战略等拨开姓“资”姓“社”的理论困惑，这虽然包含着加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成果，但从理论认识的直接目的上看，属于强调直接体现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这一方面。因这些新的理论认识都是为实施市场化体制改革铺平道路，也就是属于确立动力强势的价值原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虽然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强大动力，但是改革积累的问题凸现出来，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中国就存在重复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理念，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放在优先地位，使得改革坚持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健康发展。我们的改革就是这样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也建构了社会主义——解构的是原来对社会主义错误建构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的东西，而建构的不再是社会主义特征的空架子，而是它的实在内容。

在今天新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上还是两条现代化道路并存竞长。一方面，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希望穿上一身相似的行头就会和杂技演员一样做出精彩的表演；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正以榜样性的影响力在世界上扩散开来。那么，两条现代化道路，到底孰优孰劣？西方一些主张自由主义市场化的经济学派认为，中国改革“同时包含着符合市场规范和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而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符合市场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应该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从而，当中国的经济‘转轨’从所谓的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还在探索之中，改革尚在深入发展之中，存在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他们对中国改革给予这样的判断显然是把西方性质的自由主义市场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结果。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难题正是力图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固有矛盾的结果。我们要争取的是翻过一座大山，不是站在山腰的一个平台上玩资本主义钟摆游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构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的性的价值体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但是一旦解决，就可以找到解决动力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经济危机困扰不平衡运转的出路，使之更有利于追求两个体系的动态平衡。社会主义“和谐”理念的提出，已经为其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这不仅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从这一视角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孰优孰劣就有答案了。

2. 回眸与反思

纵观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规律性认识：社会历史是人的能动作用的结果，没有人的能动作用，就没有社会历史发展，当然，也就不存在历史规律了。历史规律不是在人的能动作用之外，而是在其中。人的能动作用体现着确定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其确定性因素孕育着的历史规律并只有在历史长河上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只有在宏大的历史层面上，我们才可以谈论历史规律的客观支配作用。在现实社会，其不确定

[1] 转引于张宇：《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性因素与其确定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社会未来发展在一个“空间”规定的范围内具有可变性、不确定性。在现实性上，历史规律发挥着三点作用：一是从总的发展态势上规定着历史发展取向；二是规范着历史轨迹波动的空间范围；三是通过实践惩罚并借助人的能动性“强行纠正”人们曾经历史选择的错误。而这一切都不是在人的能动作用之外实现的，而完全是在其中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幸福就体现在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之中。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不能在我们能动性之上发挥作用；任何一个理论都不能超越实践之上发挥指导作用。所以，科学理论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预先规定人们在实践上的行为选择，而是为人们在实践上的行为选择提供理性的导向——人们首先是根据实践而不是根据理论来做出理性选择。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建构起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会天然显现的。它也需要改革，也需要与时俱进。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正确的，但是脱离本国实际、教条地照搬照抄现成的条款就完全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旨，就是错误的了。当苏联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框架来建构社会主义时，实际上是这样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的结果——依照苏联模式来建构社会主义。姑且不论它的弊端性，苏联模式只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选择，不具有普适性，也不具有不变的永久科学性。这条路径选择不管最初如何，不断地根据实际进行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不确定因素随时都在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现代化得益于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也得益于此。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历程都曾遭遇过困境，又都通过改革走过来。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放眼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轨迹，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呢？

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不管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还是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的，有其深刻的理性根据。今天，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已经褪去了当年的血迹和伤痕，这反映出人的能动性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但是，不应该以今天的视角审视那个时代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要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毕竟，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在事实上确实到了悬崖边缘。任何根据当时客观条件的历史预测都可能做出同样的预测结果。预测结论与事实发展出现偏差只是由于预测技术出现问题，在某种程

度上也融入了这些历史伟人过多的主观因素。但是历史预测所依赖的逻辑根据是正确的，即使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的改良，对其做了某种程度的缓解或者化合，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终将会折射出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断言"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资本主义必然只是一个过程的存在，因为它既不是合乎人性的理想社会，也不是合乎理性的永存社会，"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2]将永远闪烁真理的光芒。

如果因为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灭亡的进程延缓下来，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那样很快就会走向灭亡，而感到疑虑，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政治对抗观点。从全人类的价值利益来说，资本主义未能陷入悲惨的人间地狱之中，未能陷入混乱和战火之中，终归是一件好事。在全球化的时代，利益之间密切的连带关系使得这一点显得更加值得肯定。社会主义的确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来到世间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自身不能克服的弊端而来的。因此，对抗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主要源于资本主义要对抗。但是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仅仅凭对抗是不够的。这不是要倡导"趋同论"或是放弃阶级斗争，关键是我们要拿着什么样的武器去斗争。在二者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应该有更崇高的价值追求，应该从全人类的普遍幸福看待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有容乃大！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就应该做到这一点。或许这就叫做社会主义精神，一种为着全人类普遍幸福的价值追求而能够兼收并蓄各种经验教训来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精神！一种凭借自身的合理性而不是单纯依靠暴力战胜敌人的精神！社会主义"双和"理念的提出鲜明地印证了这种精神。

在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竞争中，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首先不是区别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条平行线路，而是应在扬弃资本主义因素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更多优点的新生事物，一个诞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之上的新线路。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没有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上的成功经验，而是片面强调建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重要性。这实际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等于把资本主义的“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走出一条与其不一样的平行的现代化线路。显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强调价值体系的时候，忽视了动力体系重要性，与资本主义片面强调动力体系而忽视价值体系一样犯了错误。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总是在经济高涨后陷入矛盾冲突中，而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化道路总是首先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长期陷入到增长乏力的困境中。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昭示未来的。

当资本主义为了生存，可以敞开胸怀，不避讳嫌疑，向社会主义学习，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会有更宽广的胸怀，向资本主义学习呢？因为害怕资本主义提出的趋同论而拒绝吸收资本主义长处，那是不自信的表现，也是狭隘阶级斗争的表现。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得一向以自由资本主义著称的美国突然效仿社会主义体制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大规模国有化的进程，很多人因此嘲笑美国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但是美国不会由此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推崇依然是坚定不移的。不过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为了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可以一夜之间超越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红线，但却没有因此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演变”的迹象。反过来，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你吸收了对方的长处，你才更有机会战胜对方。社会主义首先表现出来的不是既成的实践程序而是抽象的价值理念，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填入具体的新内容，它才能闪烁制度优越性之光。如果有些人妄谈社会主义失败了那只是说社会主义某一具体路径未能行得通，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理念是不会也不该会失败的，失败的只是实践上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理念的内在要求。同样道理，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与投身社会主义实践并非一定要完全统一，前者是一种价值指导，后者是具体物质表现形式——它必须从现实出发。因此，吸收多少资本主义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所利用，与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不是对立、不

[1] 对于华尔街的这次“金融海啸”，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称，它引发的连锁反应“有可能动摇美国的国体”，而对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的“大手笔”，美国舆论则称这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某些亚洲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还开玩笑讨论美利坚合众国（USA）是如何演变成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USSA，the United Socialist States of America）的。前德意志银行高管罗杰·依伦伯格（Roger Ehrenberg）用“我们已经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来评论美国政府对这次华尔街危机的反应。依伦伯格说：“美国政府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历史性的反应将我们置于一个几代人也没法看清的一个位置。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正式地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有关资本主义太多你需要一点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太多你需要一点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争论，在我看来只具有象征意义”。

相容的——我吃了牛尾巴就一定会长出牛尾巴吗？总之，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天然的，它是从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而这一环节在客观上就要求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从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里还需要指出，没有一条普适性现代化道路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能行之有效，因为具体指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是具体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普遍性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起到原则性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成功地把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列宁专题文集》（1—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4.《列宁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5.《斯大林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6.《毛泽东文集》（1—8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起陆续出版

7.《邓小平文选》（1—3 卷），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8.《江泽民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 1986、1987、1988 年版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 1991、1993 年版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2006、2008 年版

13. 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研究报告：《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著：《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5.《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16. 萧延中：《思想的永生》，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年版

17. 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年版

18. 王景伦主编：《走进东方的梦》，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

19. 褚春友：《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20.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21. 王俊彦：《开国外交》，时事出版社 1999 年版

22.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 1 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23. 张福记：《中国近代社会演化与革命》，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24. 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26. 罗荣渠等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7 陈海燕等：《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8. 杨耕：《为马克思辩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29. 刘小彪：《"唱衰"中国的背后：从"威胁论"到"崩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0. 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31. 张卓元主编：《20 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年版

32. 黄楠森、庄福龄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 2 卷）》，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

33. 郝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34. 陈启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35. 祝大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疑难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6.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7. 俞良早：《关于列宁学说的争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

38. 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39. 杨国荣：《理性与价值：智慧的历程》，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40. 吴增基等：《理性精神的呼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41. 李从军：《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4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4. 徐艳玲：《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与社会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45. 徐艳玲等：《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全球化》，大连出版社 2005 年版。

46.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47.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8. 韩明谟等：《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年版。

49. 黄宗良、孔韩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历史和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50. 蒲国良、熊光清：《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51. 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52. 廖丹青、陈文科：《面临严峻挑战的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研究》，海天出版社 1991 年版。

53. 姜桂石：《全球化与亚洲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54. 姜长斌主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55. 关海庭：《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56. 陈新明：《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57. 张占斌：《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58. 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59. 张宇:《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60. 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61. 綦常清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新探》,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

62. 曹天争:《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63. 刘德福:《思考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64. 严英龙.:《中国经济现代化》,南京出版社出版 1998 年版

65. 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66. 李转良:《全球经济一体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67.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68. 陈光泉:《全球化与价值冲突》,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69. 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70. 刘德福、汪澄清等:《中国大势》,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71. 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72.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7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74.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农商部统计报告》中华书局 1918 年版

75.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76. 刘笑盈:《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77. 沈觉人:《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

78. 郑竹园:《台湾海两岸的经济发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79. 刘海藩、杨春贵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五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80. 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出版社 1993 年版。

81.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8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8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84. 王东、丰子义、聂锦芳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5. 〔美〕E. 卡多索等：《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86. 〔美〕西里尔·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87.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88. 〔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9. 〔美〕西里尔·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景跃进、张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0. 〔以色列〕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1. 〔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92.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93. 〔美〕威廉·爱·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朱鸿恩、刘绪贻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94. 〔美〕威廉·E. 哈拉尔：《新资本主义》，冯韵文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95.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1册），朱协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96. 〔美〕卡奇米耶日·Z. 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97. 〔美〕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8. 〔美〕丹·耶金·约·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

版

99. ［苏］波梁斯基：《苏联国民经济史》（下册），秦文允等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

100. ［苏］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主编：《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贺晓波等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

101. ［德］克劳斯·科赫：《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奈》，张洪明、王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02. ［德］汉斯·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03. ［英］戴维·S. G. 古德曼等编著：《中国的挑战——调整与改革》，俞晓秋、尹铁钢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

104.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5. ［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06.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107.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国与中国》，商务印馆1989年版

108. ［俄］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09. ［埃］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10.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11. ［美］西里尔·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12.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13. ［美］西里尔·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景跃进、张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4. ［以色列］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115. Eisenstadt · S · 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Change. Boston, 1968.

116. Avineri · S.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1969.

117. Duby · G.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8. David Apte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postmodern polities. Newbury Park, 1987.

119. Alam · M · Shahid. Government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Lessons From Korea: Taiwan and Japan. New York, 1989.

120. Dieter senghas.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 Learning on, 1985.

121. Cfsammuel P ·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Foreign Affair, Sunner 1993.

后 记

本书是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02JAZJD710005）最终研究成果。项目于2002年底通过立项批准，2003年正式启动，2011年基本完成，迄今已逾九载。

课题立项时，首席专家为张乐岭（1942—2011）教授。张乐玲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副校长、副书记、书记等领导职务。2000年从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和科研管理工作。课题获准立项不久，张乐岭教授患病、很快卧床不起，后来竟然是长达数年的昏睡！2011年的一个秋夜他静静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作为张乐玲教授的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接过由他启动却没能继续的工作。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与老师有很大差距，加之，这是虽属份内，却又是我们原有教学和科研任务之外的工作，致使项目拖到今日方告完工。对于这份答卷，我们已无可能请老师打分了，不知老师是否满意。但可以告慰老师的是，我们没敢胡弄，而是尽心尽力的。

本书的导语、一、二、三、四章由山东大学徐艳玲教授撰写，五、六、七章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龚培河副教授撰写，期间几经反复和交叉修改，最后由徐艳玲通修、定稿。永远失去聆听老师批评的机会，是我们终生的憾事，但听取读者批评机会应该是有的。我们期待着。从事本项研究工作期间，我们还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338）的资助。谨表谢意。

作 者

2012年8月